步入中国清廷仕途

——赫德日记(1854～1863)

(美)凯瑟琳·F·布鲁纳
费正清　　编
理查德·J·司马富

(中)傅曾仁　刘壮翀
潘昌运　王联祖　　译

傅曾仁　　校
戴一峰　　复校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3年1月

我想我应该尝试写一首歌。我写了下列几行，配上“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

朋友们，命定要在国外漫游的人都会聚在此，
我们已在天朝安定多时；
当你问为什么——我同意，为你歌唱我的朋友，
在宁波府围着筵席而坐，
在宁波府，朋友们，
在宁波府——
我们在宁波府品尝着冒到杯边的酒趣，
在宁波府，
尽管现在听到的话语，我们能了解的不多，
尽管友好地点头和紧握所伸之手的朋友不多——
尽管看不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可同她卿卿我我——但我们在宁波府这里仍然有一些欢乐。
在宁波府，等等，等等。
没有与美丽淑女一起的黄昏散步，没有紧紧搂着腰的亲密——
虽然现在从没尝过朱唇醇厚的玉液——
虽然没有月光下的聚会——没有温柔的情书——
但在宁波府这里我们仍然有一些乐趣，
在宁波府，等等，等等。
于是在我们远离英国的欢乐——姑娘——
音乐会——舞会——和游戏——
中国习俗中最好的与古老英国的好方式混合在一起——
爱本地的少女——抽雪茄——饮酒——美好的煮酒——

如果不在宁波府享受某种生活，那是我们自己的错。

在宁波府，我的朋友们，在宁波府——

有使我们生活迷人的东西，即使在宁波府

1854年12月20日 星期三

对——就是这样！多么悦耳的乐句！多好的诗的感情——多崇高的思想！多优美的语言！是的——我有充分的理由为它自豪！我对一群喝醉了的水手唱过它——他们即使是船长又如何——受到欢迎和祝酒，“赫德先生和他的歌！”多大的胜利！——

我衷心地为这一抒发感到羞愧；我出自内心地为我的行为的愚蠢感到羞愧；我鄙视我自己。我是什么人——我在干什么——我该做什么呢？

愿上帝怜悯我，为了“我已经做了我不该干的事；我留下该干的事没干”，我已经犯罪，我已决心要犯罪；我把罪过当作甜食，——极甜的一口压在心里。而且上帝没有存在于我的思想里。我不知所措——我不知要做什么——往那里去寻求舒适——做什么决定——或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方针。我的状态是什么——我的思绪是什么——我该干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是的——唉！在我明知而没有去做，问这些问题是多有用呀！（原文如此）我是在为清算的那一天积累证据吗？“请怜悯我——啊，全能的上帝；看在基督面上，摧毁我的心——我的坚硬的意志——世俗的欲望——我的肉欲，除去罪过的负担；给我真正的悔改；宽恕我的罪过，整个洗清我的罪孽吧！”

没有人能想像出这个时刻的苦痛。我写出来以解除痛苦——抑制我的焦虑。我有了罪过——我祷告过——我发了誓——我相信过——我怀疑过——我没有实践誓言——我亵渎过——我的生

命——它是什么？不要紧！它是什么——那处于背叛上帝的状况。

我必须把我的心奉献给上帝：我必须当牧师。没有别的什么事会使我心情平静。牧师职务应该是我的生活道路；我的心应该从这里前进，除非有别的说明，否则我的心应该完全奉献给上帝和他的事业。但是它现在怎样？我曾经在上帝的爱中幸福过；我偶然遇到一个同伴，把我引向罪恶（也许太愿意被引诱）；我犯了罪；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我接受来中国的任务，为的是要离开欢乐和罪过的场面——为的是避免作牧师。结果是怎样呢？我没有一刻平静——一切全完了：我不能说自己在生活上已经定下来——我仍然期待着做牧师——该做些什么呢？我仍然继续留在罪恶中。我没有办法，只能说："愿上帝怜悯我——看在基督的面上宽恕我，啊！我主上帝！"事情在这个地方开始显得比较有意思了。事实上，某种巨大的事件很快就要发生。

浦新玉的船队开到北门一带已有一些时候了；人员全在船上——武器弹药正在准备，等等。今天晚上一艘大海盗船——据说是浦新玉为道台租来的——已经开来。这艘船和英国的500吨级船一样长，一样高，漆成黑色带有一道红线，装载有大批火炮和人员。浦新玉把一支大船队弄到这里来，为的是用它达到个人目的，这并不是毫无可能。在镇海聚集了大批上海的叛乱者：我们预料宁波城会很快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上星期四或星期五，魏德曼先生和帕特里奇船长抓住一艘挂英国旗的中国船。我们已经接管并且在昨天卖掉了它；得到了420元西班牙鹰洋。安官充当拍卖人；他干得不错，只是叫喊的声音太大了，事先听他练习时把我乐坏了[39]。

昨天赫德森先生乘"虹彩"号去一个海盗窝照料他的一些财物。他遭到枪击；不过当他看到一两只宁波船在卸一艘被掳的船上的货物时，他抓住了他们而且现在已扣留了他们。这些船竟然

是葡萄牙人的。今天晚上葡萄牙人试图从赫德森处将他们要回去，但是他们仍在他手中。这一切表明很快就会发生某种重要事件。我们在这里不见得会像想象的那么安全。不过既然已身在此处，我们就必须尽力干好。

密妥士和我被柯宝德先生邀请去参加圣诞节宴会。

“希腊人”号可望不久就到达这里[40]——

1854年12月21日　星期四

今天早晨，冬天像是真的开始了：我们不再有无云的、湛蓝的天空——太阳不再用惯常的光辉照耀大地了；天空是阴暗的，大块的乌云急驰——洒下濛濛的冷雨——由于与之俱来的强劲北风而显得更加惨淡。

今晚窗户在格格作响——风在呼啸——树在叹息——一阵奇怪的无可名状的畏惧情绪袭来，通常这是怒号的寒风引起的。

什么时候我能再享受通过理解而达到的平静呢？什么时候我的心完全交付给上帝——我的全副力量都投入他的事业呢？

今天我极为思念诺拉，这有什么用呢？我害怕我没有很恰当地使用我的时间，我忽视现在，把希望寄托在未来。

1854年12月22日　星期五

今天上午遇见我的老师时，他朝我深深鞠了两三个躬，嘴里连连说着：恭喜，恭喜。我说“为什么恭喜”？[41]他告诉我这是中国历法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官员们到处恭喜，而每个人如果方便的话都得在祖先的坟前或画象前表达他的敬意、崇拜或别的什么。

汉语是怎样的一种语言呀！每个词有这么多意义——每一个汉字似乎都包含一个完整的概念。就拿恭喜和拜来说：如何把它们正确地译成英语呢？不能用一个英语词来翻译，必须用几个词

来说明动作、意义等等。

白天多次放炮；爆竹声到处都可听到，锣的雄壮的声音多次传来。“斯派克”号今天到达——从福州到这里需要10天。它受到一队海盗船的袭击，一些货物被拿走，除福州港的出港证之外，全部证件被抢走。我想海盗很狡猾，他们希望利用这航行证来掩护他们自己，不过他们很可能落入他们自己的陷阱[42]。

今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两大张）给格兰特先生。又读了几页《亚当前的土地》。读完《理查德·威廉斯回忆录》——组成火地岛传教团的是一批多虔诚的人呀！

我打算将来更经常地研究新约全书；怪不得上帝的话语被忽视，——没有做祷告时，邪恶的思想就受到鼓励——并几乎见诸行动。上帝，看在基督的面上，请宽恕我的罪孽，洗净我的罪过和亵渎；并使我用全副精力爱你，为你的事业献身；用你的神圣意志教导我；让它在我身上，由我，和通过我来实现它；最后为了救世主之故，接受我回到天堂。

1854年12月23日　星期六

我常因力求思考个人责任而感到困惑。世上每一个人的责任是什么？上帝希望他做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这答案所深深打动——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8、29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

当一个人这样信仰，而且在一切方面承认上帝时，就会无所畏惧地去执行神的意志，走在责任的道路上，“做神的工。”

今天我们给道台送去10份证明书以供他的水上警察使用。近来有一些外国造的宁波小帆船被雇来运送海盗的劫掠物入港，通过这种手段来欺骗海关，助长海盗行为，由此商业遭到妨害，许多坏事发生。确实，赫德森先生几天前抓住的船实际上是海盗

船；因为海盗行为的同伙，罪恶的协助者和教唆者本身都是罪犯。为此宁绍台道台招募了100人。他们被授权搜查进出宁波港的船舶[43]。他们的船舶（收税船）都要漆成蔚蓝色，人员也穿蓝制服。这一情况将使许多船长有机会利用双关语表达戏谑的评论并使之长期流传。例如，当搜查之后一无所获时，船长就会说："现在你们自找麻烦：你们上当了，怪不得你们显得闷闷不乐。"等等。由英国领事签字的证书将发给每个税务官，这样英国船必须接受中国税务人员的检查。

在这里不断飞翔的老鹰似乎和猫一样有生命力。我常常试图开枪打它，不过从来没有打下一只。尽管如此，枪弹一定也有了效果；因为我已经击落了一只"飞得不太快的鸟"，而且打掉了另一只的一些羽毛：不过这鸟逃走了。"羽毛带走了肉。"几天前我看见一只知更鸟，胸脯上有一点红；不过在别的方面——在跳跃方式上，在长着独特的眼睛方面——在地上站立的姿势上——它与我们爱尔兰鸟相似。

今天上午人们领到了这季度的报酬。我拿到了薪水余额计现洋136.28元。

我付给我的老师月薪7元，还给他100文作为纸钱，等等。我有些日子没走出领事馆了。自从上次见到我的传教士朋友们以来也已过了十二三天。但愿我的健康完全恢复，这样我可以多出去几次，利用寒冷的晴天看看乡村，并通过好好锻炼以增强身体和精力，以便能抵抗夏季来临后的炎热。自从1月（原文如此，疑为11月）28日以来我一直是最可怜的活人；事实上我是一个正式的犯人——。

今天晚上我一直在阅读华生《神学词典》中的一些条目，现在继续再看一点《亚当前的土地》[44]。

1854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倪维思讲道，他引用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 14 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布道讲得好极了，它的主要目的是指出基督徒对死亡的安慰和希望；说明死并不可怕。对于在这个尘世信仰基督、服从他的教义，而对死已有准备的人，死只不过是通向更神圣、更幸福的世界的大门——今天上午讲道的出席情况良好。

离开礼拜堂时，我留下来和从身边经过的人握手。其中几人说，他们"听到我最近生病感到难过，希望我已完全康复"。这种念头一定是由于上礼拜日我没去做礼拜而产生的。中国人根本不是可以谈话的那种人；他们太随便了。不过他们仍然是性情很好的人。当一个英国人同他们谈话时，中国人大声说话，使得过路人和旁观者都注意这不幸的外国人。今天上午去礼拜堂时，一个魁伟的大个子赶过我并开始说话。当然我听不懂他说些什么，但听出了"天主"两个字的发音。我假定他是在问我是否到教堂去，所以我说"我要拜天主"——我不知道我的汉语发音是否很正确，不过他明白了。随后他不断地说着。在他说完时，我说，"不晓得"，他说"啊！不晓啦（不懂得）"——他也用"不知道"这个说法。到礼拜堂时我们都说请——请，然后分手。饭后出去时，我偶然碰到我的木匠，"啊，赫老爷"他说。"啊"——我说——然后指着他拿着的肉，"啊"，"什么东西"？——"牛肉"他说。我正说着"的确，中国人不吃牛肉"时，我们遇到一伙广东人；其中一人大喊"哎，中国人吃英国牛肉"[45]。当时他说话的样子激怒了我，所以，我让木匠往前走，我则回到我自己的沉思中来。今天晚上我一直头痛。我归之于在宴席上吃了不该吃的东西。随后不久我就在炉火前睡着了。我很恨这里的火，尽管这是

必需的。它在室内发出很多难闻的气味，毒化空气。我记得去年的今天，那是1853年的圣诞节——一个寒冷阴湿的早晨——一个寒冷的白天。那天上午詹姆士·约翰逊先生为R. 约翰逊先生在里斯本礼拜堂讲道；他的讲道语调温和而平稳——实际上是一篇印好了的文章。明天是圣诞节，它一定是永远值得记住的日子，过这节日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以人形升天。下一次圣诞节我在哪里呢？我在哪里或处在什么状态并不重要，只要我的心想着上帝，对基督的爱仍在心中。现在一年很快就要结束，到下星期，新年就开始了。上帝允许随着新年的到来，我的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就可开始。我必须感到羞耻——我必须把脸藏在灰尘里——把手放在嘴上——因为我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生活；而是以成千上万的方法破坏了上帝的命令，把光荣的主重新钉在十字架上，轻视神的圣灵。啊！为了将来我的确可以不负上帝期望——把我的一切力量奉献给他的事业——至高无上地爱他——而且在他的恩典帮助下坚持到底，以便我最后的归宿能在天堂。阿门。

1854年12月25日　星期一　圣诞节

早饭后我出去放了几枪。哎呀！圣诞节时在希尔斯博罗附近有何等可观的射击呀！每人都有自己的枪，在这些武器中有不少生锈的老家伙。马奎斯先生（葡萄牙领事）大约11点钟来访，他来祝贺圣诞节。他也邀请密妥士先生和我明天6点去吃饭。后来他离去。不久之后密妥士去英国工厂。我正在那里给休士写信。这时我听到一些可怕的尖声叫喊。在听了一会儿后，我觉得害怕起来，就走出去看出了什么事。在看门的屋子里我发现所有的人都聚在那里，我问安官出了什么事，才得知他的内弟被一个葡萄牙人伐尔皮诺[46]打了。这家伙被拖到我面前，他确实被揍得不轻，前额是一些打青了的肿块，一只耳朵全青了，鼻子在流血，嘴唇肿了，一只手划破，他茫然地望着周围，样子十分可

[illegible]

笑。在这期间安官的妻子继续嚎叫，而且在地板上迅速地跺着脚。我于是去找密妥士先生，发现他正与马奎斯在一起。他们一分手我就告诉密妥士发生了什么事；他听后回到领事馆，细问这事，并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戴上领事馆的帽子，拿好一根棍子。同时他挂上刀，在腰带上别上双筒手枪，然后在仆人跟随下走到葡萄牙人呆的那间屋子。我跟在后面，起先留在屋外，但是听到里面发生了一阵扭打后，我感到相当激动，而后就冲了进去。我发现伐尔皮诺躺在楼梯脚下，双手紧紧抓住栏杆。那些中国佬一边把他拉开，一边用木棒痛打，这可怜的家伙被打得很重，所以我赶忙上前叫他们住手。然后他被拖出来，一直拖回领事馆（仅穿衬衣和裤子）。他被绑在柱子上，安官用绳抽了他35下（原文如此）。安官肯定是“使劲”抽的，随后我制止了鞭打。密妥士先生非常激动。我想他并没想过这人是怎样被利用的。这个人被松了绑，然后他对领事说，“领事先生，我可以走了吗？”“是”，密妥士先生回答。“谢谢你”，他优雅地鞠了一躬后走了。这家伙虽然挨了鞭子，却似乎毫不在意。挨打时他大叫，但不流一滴眼泪。这个人常常欺侮中国佬。之后不久，马奎斯先生来抱怨此事，但是尽管说了许多话，事件并没解决。由于这件事我们决定辞谢他的邀请，当然不会直接这样对他说，但我们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安心去赴宴。这些三桅船上的人都是一些令人讨厌的家伙，而且不管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行，马奎斯不会、不能、也不敢处罚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密妥士自己才插手这事。不过整个事件可能会有什么后果，还很难说，结果可能相当严重。密妥士先生说，如果他不能把这家伙弄到领事馆，他会毙了他。我倒是颇为反对这种做法，而且努力劝阻他，不过他很早就已下了决心这样干，如果葡萄牙人竟然打了一个领事馆仆人的话。

晚上去柯宝德先生家赴宴。出席的有高夫夫妇，陆赐夫妇，奥尔德希小姐，戴尔姐妹，胡德迈先生，密妥士先生和我。密妥

士先生携柯宝德太太去餐厅，柯宝德先生携高夫太太，胡德迈先生携奥尔德希小姐[46]，高夫先生携戴尔小姐，陆赐先生携玛丽·戴尔小姐，我则伸臂给陆赐太太。在餐厅里我们很难排座位，最后我坐在陆赐太太和奥尔德希小姐中间。胡德迈先生穿着苏格兰方格呢晨衣，显得相当古怪。奥尔德希小姐戴一副很脏的小山羊皮手套。玛丽亚·戴尔小姐像往常一样显得可爱。汤的味道很好，随后我和陆赐太太一起喝酒，过了很长时间，第二道菜才上来。是一只炖羊腿，两只烧野鸡，一只烧鹅，一大片熏片。然后是葡萄干布丁，碎肉馅饼，果馅饼和牛奶冻。大家都光顾葡萄干布丁，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女宾们退席后（遵照柯宝德太太对每人使的特殊眼色，每人都会意了），我们闲谈一会儿，以喝咖啡结束；然后去客厅和女宾们呆在一起。看到玛丽亚独自一个静静地坐着，我把我的椅子拉到她的身边，跟她说话。她是一个如此温柔，有教养的姑娘。随后在做过家庭祷告后，我们便散了。一回到领事馆，我们就发现“希腊人”号已到甬江了。有给我的4封信。一封是查普曼写的（12月1日），告诉我我的书已送到厦门去了!!! 另一封是凯恩写的，要我帮他定做几个相框；一封是妈妈写的，日期是8月31日——是回我7月6日从锡兰寄出的信。在妈妈的信里她告诉我特丽萨的婚礼——亨特小姐的死——麦基尔太太——和麦克鲁尔。这是亲爱的妈妈写的仁慈可爱的信。第四封信是爸爸写的（9月16日），没有什么消息。他写时假定我收到时会在香港，因此要我报告第尔博士坟墓的情况等等。

我写给家里的信是下午8点离开宁波的，两小时后我收到了这两封家信。送还孟甘他的马若瑟的著作和领带等，还有一封给玛丽和一封给格兰特先生的信。

1854年12月26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收到孟甘的一张条子和《麦都恩汉英字典》以及艾

约瑟的《汉语会话》[48]。

今天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休士并交“虹彩”号带走（在书页边上赫德写了一个他的“等等”符号）。

1854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三

今晚，基恩船长（希腊人号）、福钧先生、柯宝德、陆赐、高夫、魏德曼、帕特里奇、杜因斯[49]和我自己与密妥士先生一起进餐。

帕特里奇和杜因斯都随身带着左轮枪，他们说 3 个葡萄牙人怒气冲冲地对“斯派克”号船长亚提斯发火，又说一大群葡萄牙人和马尼拉人到了马奎斯先生那里，发誓要为前一天被鞭打的那人报仇，所以他们有一些恐惧。杜因斯说那人很可能会死，不过我怀疑这一点，尽管他的头上挨了几下痛击。

1854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四

昨天晚上，密妥士在别人离开后，同我谈了一阵子宗教问题。我想他是一个极可尊敬的，有道德的，有高度原则性的人（在这里的页边上，赫德后来加上了几个问号）。他谈到人的创造，为什么要创造人？他说：“我常常坐在楼上，这时周围一片寂静，我问自己为什么创造了我——伟大的上帝！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了我？”在他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我倒很想知道他的历史，他的哥哥是他现有的惟一亲人。今天上午他告诉我，他打算在下星期日写出他的遗嘱。他问我是否愿意做一个他的指定遗嘱执行人。他把全部财产留给他的妻子，更确切地说，他的中国夫人，她像妻子一样与他同居。

上海捕蟹船案子今天上午送来。船从上海下来，遇到海盗袭击并被劫走；后为亚提斯船长所救，他把一个马来人放在船上。

亚提斯同意把船安全送回宁波，如果该船能在拉格德群岛停泊并等候他从郭施拉岛回来的话。但是后来刮起了顺风，中国人认为不必等他，于是自己继续前进，结果在靠近镇海时，再度被劫[50]。“鱼鹰号”船长罗伯茨目击了这场行动，他派出小艇，重新救回它，因此亚提斯和罗伯茨都提出要颁发给他援救费。现在要决定的问题是“两方都应得援救费吗？如果不，哪一方该得？援救费应该是多少？”杜因斯船长和帕特里奇估计该船值200元，而且在华德曼和帕特里奇充当估价人的协助下，由副领事决定“鱼鹰号”有权得援救费，费额定为船价的1/8，即25元。但现在这艘中国船被扣在这里已有一个月，所以必须付给看守人员10元管理费；杜因斯船长和帕特里奇为船估了价，并要求每人应得12元酬金；由于这笔钱必须从援救费中拨出，所以罗伯茨船长不但得不到什么，似乎还会欠领事馆9元。他得到了终裁，因此是不幸中有幸。尽管如此，中国船的主人还是很高兴能这样容易地脱身，他们付了所有的费用，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今天在汉语上没做什么。我真希望永远不到中国来；但既然我在这里了，我就必须努力使坏事变好，我真是“隔山买牛”。

1854年12月29日　星期五

今天冷极了。12点左右韦理哲先生来访；我跑去脱掉中国袜子和晨衣，和他一起坐了20分钟左右：我觉得真冷！他告诉我，他是佐治亚州人；在那里奴隶都很舒服；他从没有看到任何人受到过“汤姆叔”受到的或描述的那种待遇。南方各州的奴隶比北方的自由黑人不知要富裕多少；而美国的这后一部分人的反对有色人种的偏见却比前一部分人大得多。

我的老师今天带给我几本书——两本（不同版本）《圣谕广训》，这只花了200文。还有4支铅笔和1个石杯，笔放在杯内使之变软；花去100文。在一页《圣谕广训》上花了两个半小时

——弄明白了大部分词汇，但还不能把全文连接起来。我清楚地看出，我正在进步，然而，还有许多其他事要干，要取得更大的进步就很难了。我想，学会写短句会比仅仅写单个汉字要好些；因为很少有几个汉字是有固定、明确的意义的。一切都决定于连贯顺序——何者在前，何者在后——与其相连的词等等。

在汉语学习后读了一点格莱格的《轻龙骑兵》。

附近没有发生什么重要事件[51]。

1854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六

我发现倪维思先生大约是 26 岁，他的妻子 22 岁。这使我很惊讶；他们看起来非常年轻，使我觉得他大约只有 22 岁，他的妻子 18 岁。我越来越发现，个人外貌并不是全然可靠的标准——无论是就年龄而言，还是就性格而言都如此。

今天我相当顺利地看完一页《圣谕广训》，但是要弄懂每件事的关系和所指的是什么，老师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除多练习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使一个外国人顺利地看懂中文书。汉语是很独特的一种语言——许多在我们的语言中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都被省略掉，而添进那么多的词仅仅是为了美化句子。要取得进步确实是需要很艰苦的劳动，不过耐心和毅力终能创造奇迹。

今天看完《轻龙骑兵》，很不错。把汉密尔顿写的《R·威廉斯生平》还给柯宝德先生。关于巴塔哥尼亚传教团的情况一般了解得很少。听人提起过，威廉斯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的日记明白地表明他真正热爱宗教。感谢万能的上帝，自上周以来我的内心比过去一段时间平静、虔诚、愉快多了，我已经安心。

1854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日

1854 年的最后一天

又一年过去了！它现在几乎是渐渐消失在无限的过去中了。

自从我进入这个世界以来，还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突出。对于我自己来说，一年的时间第一次显得过得如此之快；其次，这是我一生中最多事的一年。这一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在这一年中我已开始走上了我或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想到过的生活道路。我现在到了中国，这有多奇怪。当我坐在原始礼拜堂里（贝尔法斯特、唐尼格尔街），有漂亮的柯黛利亚在身旁，听着欧威克博士做关于中国的讲演时，我想得多么少——那时，我很少想到我会在那个陌生的国家有个人的经历——我会与它的人民熟识——或学习它的语言[52]。真的，有时当一阵传教热情涌上来时，我曾想到中国是我的劳动园地，而且祈求我能被派往该处；想到我的能力相当不错，我曾假定我能够轻松地学好它的语言，以使自己对那个国家有点用处——这不，我实现了这些梦想。近6个月来，我多次问自己，是什么原因使我到中国来？我想我现在能回答了。我希望成为传教士时，我对宗教很感兴趣，而且很愿意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上帝和他的事业；那时我希望中国成为我劳动的场所。但是我结交不慎，失掉心情的平静，极可耻地犯下罪孽，而且接受这任命部分是出于想避开我不端行为的场所——部分是出于想避免在法律与福音之间做出抉择：我现在已在中国了！也许这是应了我1853年所做的祈祷；如果是这样，我现在是在天意的道路上，上帝会赐福给我！看在基督的面上，祈上帝允许！阿门。

这一年使我在世俗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大长见识。在前半年，我被引导着走入了我以前总是躲避的恶和恶行的场所。与放荡的妇女在一起，我变成了一个放荡的年轻人。我以前养成的学习和勤奋的习惯已经变得枯燥乏味，难以忍受，以至令人厌恶了；我深深地贪饮着罪恶欢乐的酒杯。然后，我也认识了“我的叔叔”（当铺老板雅号）——事情就是这样。同斯旺顿兄弟住在一起，我们3人成为了朋友。我们以前在同一所寄宿学校里呆了三年

半。在那里，年轻的一个和我是很要好的伴侣。他们进了科克学院；我进了贝尔法斯特学院。虽然彼此通信，但直到1853年9月杰姆和我拿到学位（文学士）以前，我们没见过面。在我的恳求下他来到贝尔法斯特；他的哥哥威廉（一个23岁的善良、踏实的人）陪着他一同前来。现在杰姆变得颇像一个人物了。有一部漂亮的连鬓胡子，留着髭，穿着整洁，戴一只戒指和一枚金别针，这是他常换的一些物件；拿一根光滑的小手杖，抽烟，台球打得极好——是击球的好手。所以结果变得不是我影响他往好处走，而是他影响我往坏处滑。我陪他去过戏院一两次，然后去弹子房。我失掉了心情的平静，不是求助于祈祷，而是奔向有刺激性的事物，为的是压制良心谴责，放纵声色和肉欲。圣诞节后不久，我的朋友杰姆陷得更深，有人向他父亲报告，他父亲就从斯基伯森赶来教训了他一顿。这时杰姆的表和金链子都进了当铺。他知道他父亲会问他表到那里去了，他请求我让我把我的表拿去“当”一个星期，把他的表赎出来。我照他的希望做了。但是一个星期过去后，真够准的，我这老朋友又去当他的表，因而两个表都进了当铺。我对这事有点生气，但几天后他得了一些钱，赎回了我的表。我继续胡闹，我的钱“长了翅膀”，所以我也不得不进当铺。我的金奖章（奖品）在贝尔法斯特邮局附近的F麦克唐奈当铺里放了3个月。但是上帝看到惩罚我的时候已到：由于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滥用的结果出来了，我在床上躺了几个星期。这事刚好发生在我报告申请派来中国的时候，我卧病在床。这时有人告诉我在34个申请同一任命的人中，当局把第一个任命交给了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学院——我被学院理事会一致选定。在我收到由克拉伦敦伯爵签字的委任时，我是能起床的。虽然从那天以后到我离家来中国这段期间，4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我的身体却非常虚弱，我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就这样，我不得不离开爱尔兰多年——也许是永远——没有向一半朋友和熟人告别。所

以，我勤奋学习的结果——在学校和学院来之不易的荣誉——就只换来这次奉派来中国的命运！于是我就在19岁零3个月的年纪里离家到中国来图个发迹。

我记得两个场面，我是忘不了的。我去萨姆·哈特家告别，我与这家关系很深，还有点爱上这家最大的姑娘（阿格尼丝）。我只见到哈特太太和小姐，我告诉她们我终于要向他们告别时，可怜的阿格尼丝看上去像是愣住了。我记得她的脸色，我没法描写，可怜的、亲爱的阿格尼丝。我向拉塞尔太太道别。珍妮特和我曾经是一对恋人，但她现在已订婚要嫁给别人了。我是在会客室离开她们的，不过珍妮特跑过来跟在我后面到了门边，样子很像是希望我吻她一下。我竟然愚蠢到掀掀帽子而不去碰坏她的女帽。

在贝尔法斯特时，我也知道一些家庭中勾心斗角的事，这使我很吃惊。我们租住的那家有父母，3个成年女儿、两三个男孩和1个小女孩。成年的女儿是23岁左右的哈黛，20岁左右的简，和17岁左右的科黛利亚，她们都急于结婚，她们的父母也热衷于她们的婚事。一个学院的同学（休·斯图尔特）曾经向哈黛小姐求爱，被看作是已与她订婚；他厌倦了她，而爱上了简小姐，而后者不是像一个正经姑娘该做的那样，把他赶走，而是把他作为自己的情人。在我住进他们家时，他们两人被人看作是已订婚，并要结婚了。在2月里有他们婚事的传闻。他们却闹翻了，休（休·斯图尔特）溜走了。他就这样抛弃了两个姑娘。如果科黛利亚在他手里受到同样对待，我是不会吃惊的。现在这几个姑娘全都长得非常好看了，两个小的尤其如此。最年长的在美丽方面的短缺由好脾气弥补了。杰姆、斯旺顿和我都决定与科黛利亚恋爱。但是我们解决不了这件事。尽管如此，这家人“风闻”杰姆的恶劣行径，所以他们决定不和他说话，科黛利亚被分配给我了。哈黛小姐对大家都极力周旋，但更倾心于威廉·斯旺

顿。我们常常被邀请去喝茶，而且过得很愉快。我和科黛利亚相处得相当好，我们从来不谈情说爱——从来不接吻等等。杰姆到斯基伯伦去了，我来到中国，威廉一个人留在那里。我离开后他进展怎样，我说不上；不过我想，他非常老练，是上不了当的。我们都知道为我们而设的圈套，所以我们很小心。但是婚姻阴谋是一件坏事，搞阴谋的人通常都要遭阴谋的报应。

唉，我离开了贝尔法斯特——离开了爱尔兰：在海上和陆上我都遇到风险！到达埃及时，我患了很厉害的腹泻，我感谢上帝，没转成霍乱和痢疾，否则就要了我的命。我也逃脱了海上的风暴和海盗。年底我在宁波这里。回顾起来，许多事我觉得愉快，许多事又觉得遗憾。但是借用皇家诗人的诗句，我能赞美上帝给我的一切慈悲："赞美我主，我的灵魂，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他以慈爱酬报你的生命"，"怜悯和仁慈一定会跟随我的一生。"

昨晚我得到了上帝来临的欣慰保证；今天我在感恩和祈祷时大大表达了自己。当我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低头时，我的灵魂完全融化了。而今晚——旧年的最后一晚——在 1854 年匆匆离去时——我能满怀信心地抬起头来说："上帝，父亲！"我知道主是我的上帝——我的父通过基督与我和好：我知道基督是我的救世主，我毫不迟疑地依靠他的荣誉得到拯救；我能将自己献给圣灵的引导。因为有了他的引导，我才不会迷失我的上帝的道路。我赞美和推崇你，啊！伟大和全能的上帝——我的创造者，保护者，恩人，救世主和顾问；我崇拜你，啊！主啊，感谢你给我的慈爱！我举起挽救的酒，呼唤你的名字，我坦白我的弱点；啊！请给我力量！我坦白我的不值一文——但基督是值得一切的！我坦白我的罪过——啊！使我净化和鼓励我！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心中的愿望是为你的事业和你的光荣而奉献！啊！上帝，请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愿即将开始的一年是我整个奉献给你的一年，不要让我堕落；允许我在明年这时回

顾我的举止——允许我，啊！主啊！我不会有用来指控我自己的倒退行为；愿我能继续享有你的爱，愿我能善于利用时间，愿我能得到祝福并向他人祝福；愿我能得到认可，宜进天堂。啊！主啊！如你认为把我迁往另一世界是合适的话，让我准备好，留心和准备好我主的来临。愿我能听到你宣布欢乐的话语："干得好，好心和忠实的仆人，进入你主的欢乐吧"。我要求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所崇拜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之故，愿一切光荣和荣誉永远、永远归于他和你及圣灵。阿门！

丁韪良今天上午讲道，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5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次讲道是我到宁波来后听到的最好的一次。

鹭宾·赫德

于宁波英国领事馆

1854年12月31日星期日晚8时

公元1855年元旦，鹭宾·赫德

（加一个花体字）

1855年1月1日

虽然昨晚睡觉时，一心要在今天早晨早起，但我离开被窝时，已将近10点钟了。我迅速穿好衣服，赶到办公室，向我的老师鞠躬，他则向我连连恭喜，几乎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时门开了，走进领事馆的仆人们，都穿上最好的衣服，戴着领事馆帽子。我诧异地望着他们，当我看到他们全都跪在我的面前叩头时，我这种感觉又增加了几分。我躬身站着，玩着纽扣，对这种祝贺我"新年快乐"的方式吃了一惊。在他们都走了之后，我给安官5块钱让他分给大家；我自己的仆人每人给1元；老师给两元。我也给我的厨师每月加薪1元。

去了礼拜堂；罗尔梯先生主持礼拜——他讲道的题目是："和谐——它的性质、手段和好处"。讲得很长，我认为质量很不高。不过大家似乎都感到愉快，而且为罗尔梯先生选了这个题目而感到高兴。我在那里感到非常冷，外面阳光虽然很强，但仍然冷，刺骨的寒风也和鼻子、嘴巴开玩笑，把鼻子冻得通红，嘴唇发紫。远处一座盖满白雪的山，衬托在蓝天的背景下，显得特别美丽。昨夜结了几乎半英寸厚的冰。礼拜完毕后我拜访倪维思太太，尔后在她丈夫陪同下，"挨家拜访"这里的外国人士。我曾经和倪维思先生做过一些推心置腹的谈话。从那以后，我们有了共同的看法，我感到轻松些、好些了。朋友比其他事物更重要。晚上，密妥士的仆人们来向我恭喜：没给他们什么。看到他们一齐扑通跪下，十分可笑。对我来说，要忍住正常的笑的确需要一番努力。在这件事上，有一点十分滑稽的东西。

柯宝德先生约我明天去吃午饭。传教士们要去他家讨论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去。

我感谢上帝，神圣和虔诚仍然是我的心愿和祷词；今晚我的心情平静得多。啊！这样开始的一年可能是幸福的一年。愿上帝准许我在一年结束时，仍能在热爱救世主和寻求得到完全拯救的人们之中！阿门。

1855 年 1 月 2 日　星期二

今天上午去柯宝德先生家参加教会的会议，讨论问题是"应该把整本圣经，还是部分圣经，连同注释发给人们"（当然指的是中国人）。我认为这次讨论是极其糟糕的。确实，无论其中的哪篇发言是由我而作我都会感到羞愧的。在家时我曾与一些辩论学会有很多联系，我常常取笑他们的幼稚，而且设想年长的人一定会取笑整个过程。但在这里，我发现许多聪明的，有理性的人——也是公众的演说家——他们的"学会"却与我们的学会一

样。我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上午。我敢说这个学会是有用的，不过发言的方式却使我吃惊。我坐在一个窗户旁边，一股往里吹的冷风在我的背上转悠了两三小时，使我直打寒战。我领着迷人的倪维思太太下楼去饭厅吃午饭，坐在她旁边欣赏她的谈话。没能和玛丽亚·戴尔小姐在一起，我再次感到失望。圣诞节那天陆赐先生把她从我身边弄走，而我则陪着他的妻子。今天倪维思先生携着她，而我则携着他的夫人。下一次我要尽力搞到她。今天的午餐是一流的。和倪维思太太、兰津太太以及她们的先生们一起步行回家。在今天的会上，麦嘉缔大夫说了一句双关语。某篇文章里有一个错误，有人提出要修改；陆赐先生说："啊！那是一个'笔误'(与便士谐音)"，大夫说，"那么，我们不能拒绝表示'同意'(与一分谐音)"，我奇怪，这妙语是不是值一文钱。

今天领事馆内没发生什么特别事件；的确，这里单调的生活很少被打断过。

"啊！我们这里的一切苦难都算得了什么，
如果主啊，你能让我们
遇见那天上出现的圣众，
并匍匐在你的脚下礼拜！"

是的，天堂的前景——忠实的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应当使我们承受一切而无烦恼，感谢上帝，我仍幸福，啊！愿我能这样继续下去。

1855年1月3日　星期三

今天上午忙于公事，开列出上一个季度的费用。"英格尔伍德"号船是件挠头的事。它的两个船员今天过来申请解雇。他们说，伯顿船长在岸上是一个脾气很好、很平静、说话很温和的人，但在船上却完全相反。我必须就这事写封信给他；这两个人

明天上午须到领事馆来一趟。这样一来，今天汉语就学得很少；不过我与先生一起看了一页圣谕[53]。密妥士先生今天交给我文件簿，我必须保留它，而且抄下他的文件。今天我没走出领事馆。

晚上读了一点《亚当前的土地》但很快就把它扔到一边，因为今晚一点也不想读英文书。我现在对钻研汉语兴趣较大；说来奇怪。如果我留在中国，如果我的健康允许，我已下定决心成为一流的汉学家，以便我在推进伟大的工作中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某方面有点用处。如果中国人都是基督徒，那么他们即使不是最伟大的民族，也是其中之一。没有基督教，一个民族似乎就没有别的民族能走得这样远；即使在极盛时期的希腊人或罗马人也不行。

坚持和忍耐似乎是一对联结在一起的词汇。两个词所表达的同样的强度适用于施动者和受动者双方；施动者坚韧，受动者有忍耐性。一个受动者可能在忍耐中坚持；一个施动者则在坚持中有耐心。他们是一切成功必不可少的两种伟大品质。因为一个人必须有所作为，而且承受他人的作为。今天我想我愿意不久就死去——离开这个地球——而且看看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上帝的意志必须实现；我活着仅仅是为了对这世界有用。我不怕死而且对世界也不抱渴望。就我自己来说，我把自己的心奉献给上帝，就已完成了我存在的伟大目的。但是上帝在创造我和使我成为现在这样子时，可以有自己的目标。在这一切已经实现时，他就将带我回到天堂。愿上帝认可我，使我可以坚持到底——使我能“总是坚定不移地多为上帝工作”——使我终能继承正义的荣誉，赞美荣耀的上帝。

1855 年 1 月 4 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听到马修斯（英格尔伍德号船上的服务员）说的话，感到非常有趣。他在抱怨船长。当说到这位船长每天早晨一

起来就咒骂时抱怨达到了巴拉德先生称之为“高潮的顶峰”。一个水手竟然能说出这些话!

今天邮件到了；不过没有给我的东西。

夸特曼先生今天来访。

收了上一季度的费用。

今晚对学习有点厌倦，不管原因是什么。

我听说“斯派克”号的阿提斯抓了3艘据猜测是与海盗有联系的中国船，而且枪毙了3个中国佬。我怀疑这是一起无法无天的勾当。今天的风很大。

1855年1月6日　星期六

昨天上午一个名叫威廉·基尔本的人来到领事馆，他自称是美国人，来这儿的目的是要控诉“英格尔伍德”号船上的一名船员诺伍德。事情是这样的：基尔本住在西梦宿舍，诺伍德也在该处过了一天。元旦那天晚上基尔本回去睡觉时，诺伍德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把他的两只眼睛都打青了。现在领事怎么处理我不知道。我想，这件事出在那个打过领事馆中国仆人的葡萄牙人遭打之后，葡萄牙人想出来这样一个花招，要试试密妥士先生如何对待打了美国人的英国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很害怕，这事不会给密妥士先生带来什么好处。两点半后我去陆赐先生家赴宴，在那儿见到麦嘉缔大夫和太太。大夫免不了说双关语，他说恩卡纳考（一个葡萄牙三桅船船员）是魔鬼英卡马托[54]。饭后大夫夫妇走了。我陪着陆赐夫妇一起做傍晚散步。其间陆赐先生摔了一跤，他躺在地上大笑，直到几个中国佬扶他起来。当1841、1842年英国兵在这里时，中国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外国人的腿都是直的。因为看到这些兵直腿走路的样子，于是他们以为，如果他们能把这些兵弄倒，他就再也不能站起来。不过他们说“要把他们弄倒很难”。我敢说陆赐先生的举动会使人更确信

这种说法。陆赐夫妇极力留我在他们那儿过夜，我同意了。喝茶后，我们祈祷，然后陆赐先生大声为我们朗读，完了再一起闲谈。他说了两三个中国人诡计多端的例子。前几天高夫先生去看过一所有些人认为适合他的中国房子。不过他并不喜欢房子，他离开时说，他很快就会决定；但他认为他不会要。在这房子附近住有一位林先生。一个裁缝叶先生，知道高夫先生来看过房子，就到林家去对林说，外国人打算买这所空房子，并要在它上面盖一座楼，这样一来“风水”就完全被挡住，到不了林家了。当然，林家对此很惊慌，无论怎么做他们都要阻止高夫得到这块地方。因此，他们问叶先生该怎么办。叶先生说，如果他们给他30吊钱（大约200元），他作为高夫先生的代理人可以阻止他得到这所房子。林家认为这笔需索高了些，所以要他等到第二天，他答应了。不知怎么陆赐先生听到了这消息，于是去告诉林先生，高夫先生不要他的房子，并抓住了叶，罚了他的款。另一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当时在中国人和葡萄牙人之间有些纠葛。有一个人由于行为不端而被一个上海人家赶了出来。到宁波后他觉得设法“筹款”是个不错的主意。当时陆赐先生在舟山，胡德迈先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在这里的代表。这上海人有一天在一家茶馆里开始散布说，他已被安插在对他很有利的职位上，他只怕由于某种原因不能维持下去。他说陆赐先生曾指示他招募一个400人的卫队，由他当队长。他对听他说话的人说，如果你在你的村子里帮助我，我为你谋个副队长的职位，来的人每人每天给5角钱。那人为这提议高兴得跳起来，按照约定时间交给这上海人一份名单，他招了有80～100个人的样子。这上海人然后又对他说，这些英国人有个古怪的习惯，每个被招的人登记时要交费，每人交500文。那人很快就同意了；因为每天有5角钱，怎么会舍不得交500文呢。所以他给了上海人50吊钱。当对方问起这些招来的人什么时候可以向他报到时，他回答说，一个星期后人

数才招齐，到时候他们可以在某个地点与他碰面。到了约定时间，这一队人来了。但这上海人已携款潜逃。于是他们就到陆赐先生家问陆赐先生是否在家，结果得到答复说，他在舟山。他们说“不是他要招 400 人吗?”——陆赐先生的仆人很惊讶，回答是否定的；不过告诉他胡德迈先生正处理陆赐先生的业务，他们应该去找他。他们去了，胡德迈先生大为吃惊。这上海人便这样把钱骗到手，然后溜了。陆赐先生还告诉我一个老头的故事。不久前这老头来拜访他——这是一个样子可敬的聪明人。他说他住在离宁波大约 30 里的地方（10 或 12 英里)。10 年前他得到一本圣经，自从那时以来，他就没有得到过外国人的指点。他仔细研究了圣经，现在已是基督教徒了。他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和对耶稣基督的热爱证明了这点。他使陆赐先生感到惊奇。“真的”，扔在水上的面包“在很多天之后回来了”——“永远多多为主工作，因为就你所知，你的工作在主的方面是不会白费的”。这就是上帝拯救的力量，也是基督福音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他说他已经写了一本书描述他自己在疾病折磨下奋力前进的事迹。他介绍了疾病的症状：这种病是“罪恶——罪恶——疾病”。道士和尚治不了它，一本书（圣经）放在他的手中，却治了它——因为对了症——他甚至非常琐细地描述他的病例的特点；然后他开始把圣经——基督的福音——推荐给所有因罪恶而得病的人，福音有力量治愈一切病——适应每一种病，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情况。没有人知道它会在中国产生多大的有益影响；我的确相信上帝就要唤醒这个民族。

陆赐夫妇对待我很诚恳；我的床铺很舒服；一切都很舒服。他们极力留我与他们长期住在一起，不过我不能。他们说：无论什么时候我想去，一个床总供我使用。陆赐先生给我一本圣经，陆赐太太给我一本叫《耶稣的话》的小书。

上午 10 点钟回到家。不久之后，那个小官员来谈阿提斯和

胡德迈抓来几只船的事。我们跟他到戴维森那里，看到船交给了他。我跟他稍谈了一会；我发现我的汉语已有了进步，我听懂了密妥士先生对他讲的和他讲的大部分内容，我自己也说了几句。他邀请我到他的衙门去看他，我很可能会去。

晚上马丁先生（老马丁）来访[55]。在拉过家常后，他转入宗教话题，我们就这题目谈了谈。在告诉了他我的观点后，他给我提出一个理由，即为什么我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政府部门的工作，成为一名牧师："你现在担任的职务"，他说，"有很多人愿意接替，而你自己似乎愿意充当的职务——即传教士的职务——却找不到多少人能承担起来。现在如果你愿意接受此职，从而干起没有多少人希望干的工作，政府是不会受到多少损失的，因为有许多人会申请你空出来的位置。"我认为这主意很好：也许我还可以当牧师。我想陆赐先生也暗示过这问题，倪维思先生也暗示过。

唉！我应该非常感谢上帝，他使我置身于这些好心的朋友之中并真正享受到那么多的特殊荣幸！每个人对我都很诚恳，而且都是希望我好。

晚上翻开圣经，看到一段经文——我的目光落到的一段——对我的情况特别适用（在这里，赫德在书页边上画了一只手、一个食指和指向这一段的星号）。我已经"由于多方的引诱而被抛弃了"，我悲哀而且堕入无信仰和不幸之中，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翻开历代志，第二十八章第9、第10节："我儿所罗门哪，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修行"。

"我们将不需要全面的指导，

或是失去无意的路。”

任何道路都掌握在上帝手中，我希望投身于他的事业中，献身于他的工作，也许不久就将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传播亲爱的主和救世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工作中。“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将通过你的忠告引导我，以后接受我进入荣耀。

啊！终于得到了一本圣经，我有多高兴——全本的圣经！上帝许可我可以珍视它——永远使用它——而且在动机、思想、言语和行动上全然属于上帝——阿门。

1855 年 1 月 7 日　星期日

今天兰津先生讲道，他的经文是：“直到如今上帝始终在帮助我们”，他把讲道内容分成 3 部分，也就是感谢、信心、依赖。整个说来，他的讲道很好。

本想在两点钟去陆赐先生家做礼拜；但渡口没有船，只得呆在家。

1855 年 1 月 9 日　星期二

“斯派克”号船上的炮手约瑟夫·佩里今天上午到领事馆来，告诉我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中国佬：我想他是出于自卫才这样做的。他带了两个黑人——一个来自圣海伦纳，另一人来自新布朗斯威克；这二人都长得很好看，尤其是后者。两人的英语都说得很好。没过多久，年轻的哈特来申诉他在海关受到的待遇。他说，他到那里去查询一些被中国人扣留的货物，一个人打他，他就还了手。接着他便受到许多中国人的攻击，被摔倒在地，还捆上了手脚。他说，有三四扇门被打破了。他焦急不安。他刚要走开时，道台的副手来了，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佬用“维

维德”号运来一批货物，不交关税便运上了岸。但是海关关员听到了这个消息而且扣留了货物。这时年轻的哈特同一批人赶去逼迫海关放行，企图恐吓他们。结果他们把他捆了起来直到通知道台时为止。道台到达时那个小官吏正要离开。在他们走后，我们（密妥士先生和我）对如何处理这事谈了很久。威廉·哈特先生的船“维维德”号没有航行证；没有注册；没有领取出港证，而且没有申报。它从上海运来货物，企图走私。那么现在“维维德”号是英国船吗？当然，如果哈特先生说它是他的，那它就是英国船。那么，由于不申报，要罚款200元，由于开始卸货要罚500元[56]。所以，如他承认船是他的，他就必须交罚金700元。如果他说船属于中国佬，那个人就会掉脑袋，“维维德”号将被中国当局没收。密妥士先生想扣押小哈特，送往香港处分。这是哈特这家人第二次在海关制造混乱，“诚实肯定是上策”。

最近我们在领事馆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在这里，每一个关节上的事情都开始显得颇为异特，我认为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某种爆发。

今天借来米怜翻译的圣谕[57]。这本书将对我大有帮助；不过我必须注意避免使用不当。今天得到柯宝德先生的一个通知，说新教堂将在星期五，即19号下午两点做礼拜时正式开放。

昨晚写了一封信给孟甘，希望很快能寄出（页边上画有星号）。

晚上听更夫打锣和敲竹梆子，觉得那声音很悦耳；敲打声很有规律，且有韵味，尽管音色变化很少，但效果很好，令人感到很高兴。

从上一周以来我的胸部一直有些痛；今晚我坐直了时，痛得相当厉害，而且费了劲才能坐直。我怕是我工作太辛苦了。

1855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三

从上次写完日记后到现在已有一个多星期了。尽管如此，上一周并不是没有什么新鲜事——高夫太太分娩：小孩必须在子宫内切碎。因为长得太大了。高夫太太情况还好——倪维思先生因患丹毒卧床，现在正在康复。高德太太和家人已动身回美国。

今天约瑟夫·佩里的案子被提上来了。他被控告杀死了一个中国佬。他承认他是这样干了。被调查的证人中 7 人的证词对他不利，3 人对他有利。中国人支吾其词——躲躲闪闪——而且前后矛盾得很奇怪。结果是以自我防卫为由，宣判佩里无罪。陆赐牧师和帕特里奇船长是陪审推事。陆赐先生今天给我一本漂亮的圣经作为礼物；我把两周前给我的那本还给了他。晚上和丁韪良先生一起喝茶，柯宝德夫妇和夸特曼先生都在那里。丁韪良给我一本官话本的《马太福音》。看完纽约州伊卡巴德·斯潘塞博士著的《一个牧师的笔记》：两卷，一流的读物。（在边上竖着写的）密妥士太太想要把一些木柴丢在火上，她说——“请把木头拨一拨”[58]。

感谢上帝我仍然喜欢宗教。怀疑和恐惧的确有；引诱的确在进攻；但是我的平静心境并没有离开我。

1855 年 1 月 18 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审清理查德·哈特的案子；柯宝德牧师和 E·魏德曼先生是陪审推事。密妥士先生使我很生气；他似乎对哈特很反感而同情那个中国人——所以我尽可能支持哈特。他被罚款 300 元。魏德迈先生不同意这种做法，而且记录下了他的异议，以便这案子送交约翰·包令爵士裁决。晚上给威妥玛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我找一个教师，而且说我愿出每月 20 鹰洋的高薪。

1855 年 1 月 24 日　星期三

我给威妥玛的请他为我找教师的信还未寄出。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没能下决心留在中国；我没能下决心回家。我请求神的指引。我不怀疑我的祷告会得到回答。但是因为我不能看到一年以后的事，我感到不愉快，不知该干什么。是否我应该存钱以便明年这时回家，或者是否应该留出钱来请两三个教师——这使我为难。还有，是否应该读些英文书，一些使我能当牧师，或者读一些为回家当律师做准备的书，我不知道。我现在真是左右为难。由于害怕在一个方面浪费精力，我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进步。我像一个旅行者，来到了他所走道路上（靠近同一点）的五六个分岔路口；他不知该走哪一条，因而想要坐下来，哪一条路都不走。尽管如此，我必须很快做决定。上星期五我和麦嘉缔大夫在兰津先生家喝茶。大夫极力主张我从事传教工作。上星期日夸特曼先生讲道；他的布道试图证明死亡并不是我们一般称之为死的东西，而是与上帝有关的罪恶。一般说来，他的讲道很难以理解。圣公会教堂在 19 日开放。陆赐先生领头作祷告，科波尔德先生讲道。他的经文是“证明上帝的恩典”。他讲得很好。密妥士先生出席了这次开幕礼拜，他去的意图是要表示它与英国人的联系，所以他以官方的身分出席。他跟着一起做祷告——念应答的祈祷文——而且以很正式的方式说阿门；但他做的一切都是要说明这教堂是受英国保护的，他以英国官方资格祈祷。这是多么受欢迎的奉献呀！礼拜之后，我们去拜访顾主教：他正和田嘉璧主教在一起，（如密妥士先生所说）争论得“像猫和狗”。罗马天主教堂即将成为一座雄伟的建筑物。据我所知，19 日晚上有一次轻微的地震。自从我在小哈特案件上大胆不同意他的意见以来，密妥士先生对我很冷淡，说话也干巴巴的。星期二晚上倪维思先生来访；还有高夫先生。以后去塞缪尔·马丁先生家喝茶。麦嘉

缔大夫和太太都在那里。马丁太太谈到她在家乡时教过她的一位教师。她说“他是英国人，是当地惟一教女生的教师，他使她们不看爱情故事”等。她似乎非常恨这个英国人；而且确实，在这里的美国人没有一个像是特别喜欢英国这个国家的。

20日这天我收到两三封孟甘的信和附来的福格公司账单(170.66元)。这账单我将在3月底付清，如果兑换率不上涨3.3%左右的话。孟甘也转来一封大约是去年12月24日左右到达上海的信。是我姐姐玛丽写的，再次极力劝我回家（在页边上，在这点上有一个挑勾)，这使我很想回家。信是9月30日写的。孟甘得了腹泻，看来颇为厉害。

由于我的心情不定，这两三天我的“汉语”学习进行得不像我想的那么好。我的确希望走上本分之路。啊！愿上帝清楚地规划出我的道路！有很多事情告诉我说回家去吧，很多事情又说别回去——哪一个正确呢？愿上帝指引我！我决心把自己交托给你。啊！务必请你在你认为正确时和我在一起。

1855年1月25日　星期四

昨天一个葡萄牙人来到领事馆，带来一封用葡萄牙文写的信。信里说颠地先生的一艘纵帆船为了躲避海盗已经驶进一些岛屿中间，而且不得不留在那里了[59]。这个人曾经和海盗交战过：他把自己的船弄上岸，然后又放火把她烧掉。他的头上被砍了一个大口子，而且锁骨骨折。（在页边上哈特评论如下，注明日期1855年3月15日）这是“西风”号。“仙女”号10月被海盗抓去，船员全被杀害，“尼娜”号据说已被捕获。

为高夫先生建房购买一块土地的协议昨天签字，地价680元。

今天上午密妥士先生到我处来，告诉我他的职员和我的老师利用领事馆的公章向别人诈取钱财。我对此非常生气，今后我要

监视这老家伙。我正忙于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没能弄清为什么老许在隔壁房间里这么重地走来走去。他明白，我差不多敢肯定，我们已经谈论过他。所以我把一只眼睛贴在隔板缝隙上看；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看不过去，慢慢不透明的东西挪开了：原来这老混蛋也在注视我的活动，因而我们俩人的眼光相遇了。多可笑！我很快就会赶走他。

我从来没有尝到过比今天吃到的味道更好的羊肉了。饭后散步一直走到陆赐先生家，没有人在家，所以我留下我的名片，而后在城里逛了一圈。过渡时，渡船上的人都在揣摸我的斗篷。他们根本弄不清它是什么料子做的。我每次出去，斗篷都引起人的注意。它在许多地方、许多场合都成为奇怪的目标，甚至对我自己也如此。

（以下两行放在括号内，然后在页边上有星号）

今天为凯恩定做了相框；一共21个，我敢说，这要花60～70块鹰洋。在40天内做成；大约在3月10日左右（他在这页底部画了个√号），3月12日完成；价70元。

1855年1月27日　星期六

昨天晚上，在麦嘉缔大夫陪同下，我走到城的另一边，听佛教徒的晚祷。不巧我们去迟了一刻钟的样子。就我们那次散步的具体目的来说，我们是失望了，但就我来说，这次散步还是很愉快的。大夫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谈话既有趣又有教益。他的缺点就是多次重复同一个故事。他是最坚决的爱用双关语的人——从不放过可利用的机会。我对他谈起密妥士先生说过顾主教和田嘉璧争论起来就像猫和狗时，“啊”，大夫说“一个天主教团结的例子”。

今晚我打算绕着城墙走一圈；但走了一半的样子时，落日就警告我，如我再稍走远一点，我就得留在黑暗之中了。因此我离

开城墙，从城中直穿过去。当我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时，我迷糊了，我失去了“方向”；如何回家我不知道。我继续往前走，直到最后看到陆赐先生家的屋顶我才放心，这屋顶使我的心绪恢复正常。从城墙上看到的景色——不管往城里看，还是往城外望——都令人心旷神怡。如果我早想到城墙是这样好的散步场所，我应已在此之前多次绕着它走了。不过今晚我的脚特别痛，我走得太远太快了。

今天看到一张本月20日的上海报纸。上面有一封长信，是检察官写给阿礼国先生的，他用委婉的语调批评他。文章提醒他不要过于被威妥玛先生（税务监督）牵着走或受其影响，并说李泰国是“没有经验的少年”。报上还有一份中国传单的译文，号召人民起来消灭“鬼子和毛猴子”（即外国居民）——上海现在一定是比较激进的地方。什么时候该轮到宁波呢?[60]

1855年1月30日　星期二

今天“英格尔伍德”号驶往厦门，我请它带一封信给郇合。昨晚有一只船开往福州，我利用这机会写了一封信给休士。今天我的教师批评了这里各个英国人的汉语，他认为丁韪良是最好的——无论是说官话还是说土话都行。他对密妥士先生的官话似乎并不怎么赞赏。至于玛高温大夫，他似乎是最差的[61]。

晚上我并不特别满意和愉快。

1855年1月31日　星期三

下午拜访丁韪良，退还《认真生活》。城里有大批广东人，根据他们的服装和傲慢的姿态，很容易看出他们与宁波人不同。会见了许多传教士。

读了几篇1854年的《上海杂录》。玛高温笔记中的一些摘录写得很好，包含不少风趣话[62]。

晚上写了一封信给亨利博士。

又一个月结束了。总的来说，这是愉快的一个月；在我的宗教体验中我有过“起伏”，不过我没有失去爱上帝的愿望，而且我仍然信仰救世主。“愿主用慈悲帮助我，用忠告引导我，以后收纳我进入荣耀！”

1855 年 2 月 3 日　星期六

这一周我一直在苦苦考虑未来，几乎忽视了现在。我不可能以满意的心情看待继续在政府任职；我简直不能对什么行动方针下决心。几天前我开始考虑经商——我为迅速赚钱以便不久就能回到朋友身边的前景所眩感。我几乎要在这方面下决心了，尽管经文“赶快富起来的人将落入潜水者的圈套等等”不断地在脑际萦回。我穿过田野，看到几座坟墓，其间一块石头是娄理华先生的墓碑。他是到中国来的一个传教士，被海盗淹死。碑的一侧刻有一行字：“我是这土地上的一个陌生人”[63]。这话再次使我的思想回归正道，我们应该看重的是下一辈子，引导我们的应是看重下一辈子所引发的思考而不是这一辈子——这一辈子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手段——愿上帝帮助我摆脱那种把它看成是目的的看法。我已下定决心——我决定留在这岗位上直到我学会官话和土话；然后我将从事传教士工作。我相信这是我的责任。

昨晚和倪维思先生一起喝茶，他借给我《娄理华回忆录》。

已给亨利博士和麦考希写过信，开始给汤姆逊和（?）（写信）。

感谢上帝，耶稣是我的“一切的一切”。我只信赖他一人；若相信自己，那我就什么也不是。

1855 年 2 月 4 日　星期日

今天收到经“虹彩”号带来的休士的信。起床后出门，及时

赶到礼拜堂。倪维斯先生讲道，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不论在实际中还是在玄想中都应该有神秘的事物；虽然我们得相信这些并凭信仰前行，我们也应利用我们拥有的知识，不应该让未来使我们忽视现世。啊！现世——其中蕴藏着多么无法计量的价值呀！

今天下午4点参加在湖山堂举行的中国人礼拜。礼拜先由兰津先生主持，后由马丁先生结束；唱了两三支中文赞美诗，唱得很动听。两个儿童和3个成人受洗。在成人中有一个是马丁先生学校的教师，余下两个是同一学校年长的学生。我为这次礼拜深深感动。啊！愿这些人坚持到底，安全地到达迦南的幸福彼岸！为基督服役是多大的殊遇！什么时候成为我的殊遇呢？愿上帝帮助我正确利用我现有的机会，为有用做准备，以便在时机来临时，我能够利用它。我能为基督愉快地抛弃一切。生命本身——现有的欢乐、朋友和希望——所有这一切我都摆在基督的十字架前。如我有更多的东西，我也愿意放弃。啊！愿上帝使我处在使众人从黑暗转向光明的工作中——在传播救世主基督的知识中，起到作用！

我已读完《娄理华回忆录》的大部分；很有意思。

今天我在想，关于拯救，人们仅仅遵从一个条件：他们必须信仰基督，而且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上帝才接受他。因此基督的死是弥补人类的冒犯，是为人类赎罪，而人类信仰基督则被认为是还他的公道。

“啊！为了更近地与上帝走在一起！”在宗教里有着世人永远梦想不到的幸福。有时一个基督徒对一些俗事一时发生兴趣，这多奇怪。只有时时的信仰，不管是否伴随着感情，才可能是心情平静和在神的恩典中成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1855年2月6日　星期二

密妥士先生今天动身去上海。我想他会遇到坏天气，因为晚

上一直刮着大风。不过，我想他会呆在镇海，等到天气变好。现在我是这个地方惟一的一个英国官员了。万一有什么事发生，我就得负很大的责任；如果密妥士先生遭遇什么意外，那么很可能连着几个月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特别不希望出现的事。我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孟甘，还送信给威妥玛（帮我请教师），给凯恩（要小提琴），给妈妈（关于我想干传教工作的愿望），给亨利和麦柯希博士（告诉他们我已到达以及目前的状况）。我想这些信（3封）经由3月份的邮班递送——可能在5月中到达目的地。晚上拟订了一个学习计划。我已下定决心啃孟子，而且好好学完马若瑟。这要花一年多，如果实行得当，我想，会很有益处[64]，我着手这项艰苦工作为的是使我自己能够有用；我相信，鼓舞我工作的是对上帝的爱，而且只有它才能使我坚持到底。我的愿望肯定就是上帝的荣光，我希望在世界的这块土地上为他的事业做点什么——不是信赖我自己的能力，或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因为我知道，是上帝的神灵支配和完成工作。不过我相信我可以被用作是一件卑顺的工具，来执行上帝的有关堕落人类的宽厚计划。啊，上帝！我愿把我的每一份力量——体力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奉献给你。啊！接受我，用你的忠告引导我，用你的恩典支持和加强我，保护我，赐福我，最后在这土地上实现你对我的差意，接受我回到天堂，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崇敬和极其敬爱的救世主！阿门。

1855年2月11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丁韪良讲道，他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他首先说明自由是什么，而且给自己下了个定义，称之为"我们的天然能力所起的作用"：包括身体的，非宗教的和道德的。他然后说明，"天父的儿子"如何在这几方面使我们自由。礼拜后我陪同

倪维思夫妇去英国教堂。上午 11 点钟陆赐先生在那里主持汉语礼拜。儿童们（学校）在朗读轮流应答的祈祷文时，应接得很不错。他引用的经文是："罪恶的代价是死"。礼拜结束后，我同陆赐先生去他家，吃了饭，在两点钟时再次同他去英国教堂。一次英语礼拜在那里举行。他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 31～33 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要触犯任何人，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还是教会的神。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使他们得救。"讲道讲得好极了，而且陆赐先生不仅对"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的必要性和责任，而且就既不要冒犯别人亦不要使人摔跤的行事方式阐发得很明白。商业圈的人也在座，如果他们不被这讲道打动的话，他们肯定是怪人。礼拜后，大门打开，教堂内挤满了中国人，随后中国传道师作了一次讲话，陆赐先生和高夫先生都宣称他们讲得很好，包含有大量的圣经真理。的确，福音是向一大批人宣讲了；上帝许可一些种子可能已撒落在了肥沃的土地上。在传道士说明偶象崇拜的荒谬性时，他引起了多数听众开心的大笑。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男孩笑得那么自然，他的笑声感染了大家，而且使我难于保持庄重。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传道师立即作答。高夫先生简短地说了几句，然后分发一些书，礼拜就散了。接着我回到家，看了几篇布朗特的《巧合》（一流的书）——这书写出一些支持圣经的内心证据，这些证据是无可辩驳和不可抗拒的。喝了茶，写了这些，等等[65]。

1855 年 2 月 15 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长期盼望的邮件到了。我收到 3 封信和一包装有近来我一直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韦斯理赞美诗"。3 封信是：1．爸爸寄来的——10 月 16 日写，复我从香港寄出的第一封信(8 月 3 日)；2．威廉·斯旺顿寄来的，日期是 10 月 26 日[66]；3．

玛丽来的，日期是11月1日，复我9月11日的信（我在信中告诉他们我被派到宁波）。收到这些信高兴极了！还有一张孟甘写的便条，一张密妥士先生的便条，告诉我领事部门的大变动——关于人员的派驻。我敢说，老歌曲唱的是对的——“一个好时光就要来到，只是等得要稍微久些”。

晚上去参加祈祷会——然后去倪维思先生家，在那里喝茶，过了一个极其愉快的夜晚。我们分别谈起过去的日子，这种交往肯定对我有好处，帮助我摆脱“忧郁”。

我刚刚被叫去看火灾——在道台衙门附近正烧得厉害。

1855年2月17日　星期六

今天是中国新年的第一天——“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昨晚四面八方都响着放不完的鞭炮；大约今晨4点，我听到几声炮响，是迎接新年的礼炮。今天所有的仆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到处都在说着“请、请”。没有人来看我，这很运气。仆人们“请、请”我，我送出几张贺年片也收到几张。昨天麦嘉缔大夫乘“孔子”号动身去上海，这艘船是送一批美国商人到宁波来的。他们以1,000元租用了这艘轮船做为期3天的航行。据我所知克陛存先生在船上。上次邮班带话给麦嘉缔大夫说，他可能去日本，代表长老会理事会“侦察那个国家”。前一两天晚上我得知麦嘉缔太太比兰津太太大两三岁，感到吃惊。我原以为她比她小五六岁呢[67]。

这3个月以来，我记日记很频繁。在这一本里，这是最后一条了，我想照样保持这个计划开始写另一本。1855年2月17日，星期六晚。

鹭宾·赫德

于“西头”英国驻宁波领事馆

[赫德日记第二本扉页顶上有下列字样：第二本，从1855年2月18日到1855年7月29日。接着是“我在中国的生活”，是我的第二本日记——（一个花饰）第二本开始于1855年2月18日，于宁波“西头”英国领事馆。鹭宾·赫德，爱尔兰女王大学文学士和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两次第一名，前奖学金获得者和前理科奖学金获得者。]

1855年2月18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兰津先生讲道，经文是保罗达提多书第二章第12节：“教导我们除去不虔敬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以自律、公义、敬神的态度度日”。——自律是约束我们自己的规则，公义是有关我们与邻居之间关系的原则，敬神是对上帝的态度。礼拜后读“华生”的论加尔文主义和宿命论：我不知道关于这问题我应该怎样去想：或许我应当把它作为教义，对它形成一个明确、坚定的看法；或者我应该避免过分深入地探究上帝的奥秘。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是明显的——不管哪一种看法正确，把我的心交给他，崇拜他，服从他的要求，而通过遵从表明我对基督的忠诚，是我的义务（如被上帝的赐福所创造，保存和包围）。赞成哪种意见，都需要很多鼓励。我的感情倾向于使我相信那种解释，即“上帝并不愿意看到一个罪人的死，而是要所有的人都皈依他而且活下去”——为一切人向基督奉献牺牲品，无论是谁信仰了他，就会得救。上帝的天意是信奉者如要被洗清罪孽，得到拯救，就应该使自己像基督那样。但我不知怎样对待罗马书第九章的一段。我还没有准备站在任何一方；但我肯定同意彼得在保罗的信中说的，“有些东西难于理解”。哪一方曲解这些东西，我不知道。1点1刻时我动身去英国教堂。在过甬江时，我不得不

站在船头，因为在中舱里放有一顶轿子。轿夫中有一人面对我坐着，在我们两人眼光相遇时，我禁不住朝他微笑。他立即说："坐、坐"，这似乎是中国人特有的礼节和礼貌的客观形式。我想找一个坐位，但没有了；我想在我向他指出我身后的地方时，他显得有些不解。在穿过大街时，我的注意力多被走过的人穿的漂亮衣服吸引住了——在中国，一年开始时的仅有的几个假日就是探亲访友的日子，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使人难以辨认，而对这种改变又似乎感到高兴。所有穿戴起来的人都戴红缨官帽，但是除官员外，没有人敢戴顶子。我遇到许多戴铜顶子或金顶子的人——他们都是等级最低的官员。挂在许多大门外或窗外的都是色纸做的鸟和人像。我看到的仕女像和鸭子都做得非常好。我遇到的一个人向我道"过年好"，我用右手的食指点向他表示还礼。我走得太远了，必须往回走。通过打听"城隍庙"在哪儿我才找到教堂——城隍庙就在教堂附近。略略一瞥庙的内部，我看到里面摆满了桌子，人们围桌而坐。许多穿着非常华丽的人走来走去。礼拜由高夫先生（声音很单调地）主持。他根据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8节讲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儆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他的讲话很长，而且他拖着长腔讲话，使得讲道冗长无味。在大部分时间里，室外一直响着很大的喧闹声——锣鼓在敲，竹板在打，号角在吹，火枪和鞭炮在放。而在那里，我们十一二个人在偶象崇拜的城市的中心做礼拜。礼拜堂离人们正在里面叩拜偶象的庙宇太近了，我们的耳朵里充满了他们的音乐声。我注意到在几个地方，一个象一条大龙一样的东西由几个人举着穿过里面正敲锣打鼓的房舍。现在人们开始认识我了，最令人高兴的是听他们说"赫老爷"。"那是谁"，一个人说——"赫老爷"。4点钟回家吃饭。外出稍稍散步，回来时发现一良家里的人（妻子和女儿）同密太太正在院子里走动。我逗着"诺拉"玩，同时又认识了一些妇女[68]。我的小狗情况不错——

很活泼，长得很好，也很可能会咬人。我不知道这最后一点是否值得喜欢；很可能以后有用处，不过到那时，用她的名字来叫狗的那位年轻妇女的情况又会是多么不同。我的姐姐在信中描绘她“非常温柔”。不管它将来怎样，它总会成为令人感兴趣的，令人高兴的某种生物。今天阳光很强，室外空气也足够温和，尽管在室内相当冷。我害怕我就要患一场疟疾，今天去外面走了走就使我头痛。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断的战斗；我们必须战斗，击退虔敬肉体的和世俗的情欲；要生活得“自律”、公正和敬神，不断地和坚决地斗争是必需的。而且“靠着圣灵多方祷告和祈求——并要在此儆醒不倦”，这是多么必要呀！但热情的力量常常是理智和良心的承认所无法抵挡的。使我惊奇的是，引诱临近时，一个人却不愿意求助于祷告——即最宜于“在危难时从中得到帮助”的那件事。引诱有两种，1．一种是会诱使我们并唆使我们不服从上帝命令的享乐，2．一种是会使我们不服从或抛弃福音的痛苦或潜在的处罚。我最为前者所苦恼。有时我想，如后者侵袭我，我会很坚强！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引诱，基督教是符合一切条件和情况的，一个不能在一种状态下保持基督徒品性的人，永远不必认为在别种状态下可能会表现更好。

1855 年 2 月 20 日　星期二

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我满 20 岁了。我还可以活多少年——我在什么地方过这些年——如何过呢？我很想窥视一下未来。

上午柯宝德先生来访，我捐了 20 元给士兵基金会。昨天许先生来拜年。他穿得非常漂亮，我简直认不出了；他的帽子上有一个铜顶子，他告诉我那是高级秀才的标志，不是最低的官员[69]。我的宁波话老师（邢先生）来访；他给我带来许多书。我告诉他，我决定 23 日开始学土话。他似乎很快活，“爱闲聊”；

我很高兴这一点，因为这会大大有利于我学习口语。晚上一队人来到领事馆，五男二女。后者拿着一种纸做的东西——有点像色当狗和中国黄狗之间的杂种狗。男的和女的一边唱，一边用竹板、鼓和锣打拍子，在每唱一句之后他们打钹，发出很大的声音。与此同时，拿着“纸机器”的女演员前后跑动着，而且以非常可笑的姿势将其飞速旋转。他们唱的调子很好听，不过他们的嗓子却短而尖。“戏”（安官说是戏）快结束时，一阵狂风吹来，几乎把女演员们刮倒，这使得他们快快地收了场。

我听说密妥士先生的游艇在几个月前胡德迈先生的船失踪的地方搁浅了。无疑，如密妥士先生今晚出去，我想他会陷入困境的；风刮得厉害。还报导说，杜因斯船长在回上海时被海盗抓走。有人看到他们追赶他。他有1门炮在船上，还有6门假炮——即木制的炮。如果密妥士先生遇到什么意外，我将被置于一个要承担比我所愿意承担的大得多的责任的位置。如果家里的好人们没有开始忘却我的远离，我想我是常在他们的思念之中的。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使我有可能或必须在家过1856年2月20日，我是一点也不会感到不满意的。不过，那时我的骨头可能已躺在英国的坟地里了。好吧，如果我的路程以欢乐结束，我不会介意死亡来得有多快。称得上幸运的是生活中能看到无形的他，并使他的慈爱撒在永久的事物上而不是撒在这一世的事物上。实在，“一切都是虚荣和精神烦恼”。

（我们在这里插进两封信，它们散附在赫德日记第二本里，信是写给威廉·斯旺顿的，比起日记中有关宗教的文字，文笔轻快得多。）

中国宁波，英国领事馆，1855年2月20日：

没有这种事，亲爱的威廉！你是大错特错了。一个在中国的额外译员，特别是现在给你写信的那个不走运的“单身汉”需要

一个妻子远比一个卫理会牧师需要妻子迫切得多。你到底需要一个妻子干什么？无疑，你的总管的夫人或某些女舍监，或巡回区的小姑娘会为你的衬衫缝上一粒扣子，或在你需要时给你的手帕镶一个边，至于织补你的袜子——那怎么样，巡回区里的每个老妇人都会因替你干这事而感到骄傲！不过，老兄，你看这里！这两个月我的脚趾都已露在袜子外面一两英寸了——我的衬衫已丢了好几个扣子——上次理发以来已有几个月了——我对女性说话也许一周才一次？“雷声和草皮”——那不是足以使任何人想要个妻子吗？再看看这里。你有多少次是坐下来一个人吃饭——在你感到寂寞时，你找人说话有困难吗？我是怎样生活的呢？或许3周一次我出去喝茶，其余的时间你知道吗？——看，我在吃早饭，在我面前的桌上是面包——天哪！我真希望星期日早晨你能来吃——搭面包师的车来，提出你的要求——有鸡蛋——不过没有黄油。我的仆人为我倒茶，在我吃饭时，他一直站在我的背后，一句话不说：因为我们都不懂对方的话——如果我想这样做，那我的早饭就被搅乱了——而后中饭也这样，晚上的茶也这样——出色的一顿社交饭食——为什么，你这个人啊，你不需要一个妻子！我要是有半打才好呢。

你谈到了在外两周的痛苦；要是你能在这里一会儿就好了——的确痛苦——为什么在爱尔兰没有这种事！来宁波同我过几天吧！如果你不想要有一把剃刀来了结自己，像你希望那个人，即提议过4年独身生活的那人所受到的惩罚那样——那就是奇迹了。

请你设想一下仅仅学习语言的乐趣——一个有理智的人，一面学习单词和方块字，一面脑子里却没有概念——为什么有时我几乎要疯了——现在你听——哎！先生，恭喜好不好！啊，好啊！庆贺！天可好看啊！没有公事所以要念书——说话——那是我的老师刚进来，我问他怎么样，祝贺他身体健康，并告诉他我今天没有公事，因此我希望多学习，多谈话。于是我们坐下——

坐坐——；书打开了我们就开始——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我们继续像这样念中国经书，有些时候谈得很多。不过这老罪人已经习惯于我的思想方式——说话，尽管错误使用成语和发音，所以他理解我，他满意了，所以不花工夫纠正我的错误。我明白我说错了，但他却放它过去，于是我生起气来，停止了说话——他不再说话，也只是沉默。我从来不骂人；我不能忍受——我觉得这样做降低了自己的身分。所以我只是对他说“请多加注意”今天就到这里，——于是威廉，只有上帝和我才知道那些像急流一样涌上心头的痛苦，可怕的思想。不管怎样，我能掩盖，但是我不能控制我的思想。

鹭宾·赫德

亲爱的威廉

是我

是我

是我——又名鹭宾·赫德

（1855年2月24日的另一封信，也许是给威廉的另一篇信稿）

中国宁波，英国领事馆，1855年2月24日：

——亲爱的伙计，现在不要武断，因为，老实说，你完全错了。为什么老兄，我必须在我的衬衫上钉扣子——穿上既无跟又无尖的袜子——自己泡茶，等等，等等，而与此相反，你所在的教区的许多年轻女子都乐于为你的手帕镶边——为你做衬衫，供给你领带和“标志物”——更不用说织补袜子了。而你遇到的每一个老婆子，都为能做这事而感到骄傲。尽管有这一切，你有脸说，在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中，“卫理会牧师最需要妻子”。现在给你写信的，倒霉的“单身汉”这两周来还没有同一个英国妇女说上3句话，只对一个美国人点过头，除了倒夜壶，刷夜壶的那个

中国妇女外，很少看到其他中国女人。唉！威廉，我已经看得够多了，足以放弃任何浪漫感情，并使我坚决相信，除了仅仅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那部分以外，女人身上没有什么神圣和天使般的东西。但是“负担”！这并没有给我任何好处，因为我和平日一样仍然十分敏感。你认为怎样？就是现在我正在爱上一个14岁的中国姑娘，双脚只有两英寸长，我也正爱着这里的两个英国姑娘，我同他们已握手6次；我也正爱着在爱尔兰的一位年轻姑娘，我曾经见过她7次，在3个不同场合同她谈过话。你看，亲爱的伙计，我所处的困境，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如果我向那个中国姑娘提婚，我就不能向别的什么人提婚；如果我向这里的英国姑娘中的一个人提婚，我就不能向另一个人提婚了；如果我向别的人提婚，我就不能再想我的金发爱尔兰姑娘了。现在你可以看出我是多么进退两难了。四处不通的死胡同，弄得我苦恼不堪。我的一个老师昨天对我说，如我想要妻子，他可以告诉别人每天都叫三四个姑娘过来让我挑选，直到我看中一个为止，这种办事方式，你觉得怎样？的确，我在这里的情况很不如意。在领事馆里只有一个英国人——那位副领事。一天中我们很少交谈几句，而且处理公务大都是“在纸条上涂写”。我总是忙于白天的学习，晚上6点吃饭。饭后我不大想学习；我不想看书或写字，所以我在火炉前徘徊，而且真的不能不烦躁。唉！这种寂寞——这种孤独！也许3周一次，我和传教士中某人一起喝茶；隔一天晚上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我们崇拜的救世主似乎就是在荒野里受到最严酷的引诱。我祷告上帝，你的经历不要和我的一样。是的，是的，是的——在拥挤的市场，在跳舞厅里，在戏院里，没有能与孤独相比的引诱出现。思想斗争是最可怕的；考验最激烈的时刻只有被引诱的个人、引诱者和上帝才知道，正如基督徒最幸福的时刻是无法说明和描述的一样。说得够多了——

1855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五

今天我又恢复了学汉语。我必须说，我没有多大心情干这事。在傍晚（从 3 点到 5 点）我的新老师，邢先生，跟我在一起，我开始学宁波土话。我想我学土话很可能会比学官话快得多。

20 日晚上，戴维森先生写信给我，要求批准他在晚上有船只靠近“克里奥帕特拉”号时可以开炮，因为他已听说“广东人”正阴谋抢占这艘船。我知道，这些家伙已经被道台从他们的船上赶走。他们想劫一只有武装的三桅帆船到外面去干海盗勾当。他们向“克里奥帕特拉”号的船主直接提出要求，要他把船交给他们[70]。

21 日密妥士先生回到宁波，我在“代理”两星期之后，非常高兴把权交还给他，因为我已开始有点焦急了。义军已离开上海，上海现在在清军手中。那里是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的可怕景象；房屋倒塌，许多地方被焚毁。密妥士先生得到一个福建男孩，是一个起义者；现在已有 9 个这样的男孩受他保护。玛高温大夫已被任命为这个地方的美国代理副领事。向密妥士先生通知这事的信表明，他几乎全身充满了小人物一旦高升时就自然产生的那种得意心情。约翰·包令爵士已接到命令，要他“遵守他以前的命令”。他已经把保证书归还给上海商人。我相信他在收回以前的承诺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因克曼发生了一场大战。我知道 41 团的一个叫 A·泰勒的中尉被打死。我想这是阿尔伐·泰勒，是我的一个老同学赫尔比·泰勒的哥哥。我觉得这场战争会持续很长一个时期，我很怕英国到头来会得不到什么光荣。寡妇们一定会很多，而要得到妻子我想一点也不困难。我知道，一场暴乱已在澳大利亚开始，他们举起了独立的旗帜，“南十字”。慢慢地，英国就会没有殖民地了——到那时，该怎么办呢?[71]。

1855 年 2 月 25 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韦理哲先生讲道；他用的经文是“因为我愿意献身，为你而做出奉献”。他的讲话意在表明圣保罗在哪些方面是牧师和俗人的榜样——一个忠实的传道者和始终如一的普通基督徒。他没有像他可能做到的那样，把这个题目讲好：——圣保罗，牧师们应作的研究，可以是一篇文章的好题目。在英国教堂，柯宝德先生讲道；他用的经文是路迦福音第一章第 74、75 节——“他叫我们一旦从仇敌手中被解救出来，就可以终生坦然无畏惧地在他面前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他所讲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一段可以从精神上来解释，可以施用于我们自身，——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罪恶，等等。从教堂出来时帕特里奇船长说：他不明白这次讲道讲的是什么——说柯宝德先生在应该讲下去的地方却中断了，等等。我认为这是一次顶好的讲话，而且组织得好。我不认为“斯奈普”号船长有资格理解和听清楚一连串的神学议论。

肯定的是“夏天正在来临”：今天室外很热——室内很凉但不冷。

倪维思先生再次因丹毒卧床。

“耶稣会让罪人死掉吗？

为什么他吊在那边远处的树上”

确实，在为了拯救人类做了那么多工作之后，上帝不会在危难时不守诺言，给予援助的恩赐。

1855 年 2 月 27 日 星期二

昨天上午我和麦嘉缔大夫就至福一千年——预言等等作了一次长读。他谈的一切，使我无比激动，我昨晚一直坐到两点钟，钻研圣经。我很惭愧我对圣经太不熟悉。但是为了未来，我得多

多关注这本至高无上的书。

一些上海起义者已经来到宁波；由于他们为数不多，不大可能引起什么骚动。阿林（领班——从前是巴黎施先生的领班）在这里，与他在一起的有两三个外国人。他们在吴淞抓了一条船，几天前来到这里。今晚我和邢先生作了一次关于耶稣的长谈。他说：凡是读过圣经的人很难不相信它，他说他可以依靠[72]或信任耶稣。今天渡河时，水流汹涌。他告诉我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他信任耶稣。我非常乐意同他谈论我们共同的救世主。啊！愿我们二人都得救，进入永生！

鹭宾·赫德

1855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一

唉，自从在这日记本上涂上几行后到现在已差不多两星期了！而日子过得就像是同一天。的确，时间对我来说开始显得比一年前过得快得多。——我们在前一些时候由于几个上海“王爷”来到宁波而担心会发生某种骚乱。

上星期五晚上，姚太爷[73]来见密妥士先生，询问对于来到宁波，并与上海起义者有牵连的外国人的处理办法。密妥士先生对他说，在采取每个步骤时都得非常小心，否则很可能会使他的政府与英国或美国发生纠葛。在星期六，大约 3 点左右，一个仆人来见密妥士先生，说当局已抓住两个欧洲人，其中一个已在东门砍头了。密妥士先生立即叫了我，我们一起出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在麦嘉缔大夫住处附近碰到两三个人，其中一人同我们说话，问我们是否能告诉他麦嘉缔大夫在什么地方。我说他到乡下去了，不过那天晚上会回来。这人于是把我们仆人讲的事重述一遍，说两人被抓并被砍了头。我们要他跟我们一齐走，他同意了，而且很随便地交谈。他是一个年轻的、干净利落的小伙子，是一个典型的一往直前的美国佬式的人物，而且还很早熟。我们

首先来到西梦寄宿舍，想看看他们是否知道有什么人到城里去了。有一大群人走了出来——我们猜想他们全都与上海匪徒有联系——而且他们都是一些看起来很结实的小伙子。通过和他们的交谈，我们怀疑被抓的人是奥尔德里奇和汤姆·罗伯茨。在告诉他们周围有暗探，他们最好自己留心一点之后，我们过了河。在东门，我们看到一些血迹，但还不足以证实任何人已被砍头的说法。由于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没有看到尸体，我们决定到道台衙门去。从街道上的景象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已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人心浮动，到处可见——一小堆人、一小堆人聚在一起谈论着——成群的人站在很多店铺的门前。在弄清我们是马老爷和赫老爷[74]之后，相当多的人跟在我们身后。在我们靠近道台衙门时，我想总有1,000人紧跟在我们背后。在那里我们遇到一个人，头的一侧被砍了一个大口子，由另一个人架着走，看起来很虚弱。当人们看到我们是往衙门去时，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奔跑；大堂和院子都挤满了人。我看到约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那里，出了什么事，也许我还估计低了。我们大着胆子从他们中间走过。我敢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惊奇，在刚刚发生了特殊事件之后，3个不带武器，没穿官服（我们都穿着便衣）的外国人竟敢直入段大人的衙门，而段大人是以杀人成性闻名的。我们一直往前走，并不宣布我们是谁或是递交名片。在我们到达最后的大堂时，我们发现有两个大木笼子（不是箱子）——两英尺宽——6英尺高——3英尺长。在这木笼子内是两个戴着手铐脚镣的欧洲人。其中一人被砍得很可怕——他的两膀、头和脖子都是血迹斑斑，而且全身都湿透了。他曾挣脱了抓他的那帮人，跳进河里；我猜想就是在那时候，他的头才被砍成那种样子的。另一个人看来没受那么多伤，但他的手却被砍伤得很厉害。他似乎曾抓住一把刀的刀刃，当刀从他手中挣脱时还在抓住它。我倒有点认为，中国人是有意砍伤他的手和另一人膀子上的肌肉的，为的是防止

他们逃走。汤姆·罗伯茨或杰菲逊说："他快要死了——是被杀死的"。而后又说，他"是美国人"，"他的名字叫约翰逊"。另一人说他的名字叫"阿金"（他就是奥尔德里奇）（曾因在香港犯杀人罪被判处21年流放——他越狱逃走——到了上海——参加了起义军——帮助杰菲逊从上海监狱越狱，完全是一个"该被绞死的人"了）。随后姚太爷出现，紧接着道台也出来了。我们向道台"鞠躬"，道台请我们进屋；陪同我们的那个美国青年害怕单独一人留在这样多的人群里，所以我留下来和他呆在一起，尽管姚太爷似乎决定带我去跟他"喝茶"。随后我弄了点水给那两人喝。不久，一个可敬的老先生（我认为是道台的父亲）碰碰我的肩膀，而且点点头，我也点点头并回答他的问话"侬的弗认得"说"弗认得"。以后我从密妥士先生那里得知，这人就是乐先生——是一个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老混蛋；就是他把自己的老婆卖给密妥士先生，就是他抓住了这两个人。不久密妥士先生和那些官员回来了。这时奥尔德里奇要求会见英国领事。在一番迟疑之后，他说，他是英国人，是从"萨拉曼德"号逃出来的逃兵。这可怜的家伙看起来若不是很惭愧，就是已灰心丧气。他的同伴则是大声叫嚷，不断地问周围的中国人，为什么要逮他，而且向他们保证他想做的就是要到开往厦门的那条船上去——他希望回家。中国人当然不懂他的话。密妥士先生决定不干预这事；道台正打算把他们经杭州送往上海。我们交涉的结果是，他们会受到较好待遇，也不关在木笼里。那个美国少年要求允许送几件衣服给这两人。清朝官员很想从衙门派一个人跟他去。不过我告诉他们不要让任何人陪他去，因为还是不让清朝官员知道他的朋友在那里住宿为好。今天密妥士先生说，他那天打算用法语告诉那人同样的意思，因为站在周围的有几个人懂英语（赫德用方括号把下一句括起来，而且划掉）[我怀疑密妥士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干着对中国当局有利的事]。我们然后离开衙门回家。密妥士

先生明天去见道台；很可能还要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呢。

1855 年 3 月 15 日　星期四

今天两袋邮件到达，我收到一封夏洛蒂 11 月 16 日的信、一封布雷热先生 11 月 14 日的信、一份 12 月 6 日的《辉格》、一封休士（福州）2 月 17 日的信、一封孟甘本月 10 日的信。夏洛蒂告诉我 R·穆尔海德已升为波塔当民兵陆军中尉[75]。收到几份公文，其中一件令密妥士先生暂时停职，并命令他去香港；我被指责用手枪柄打了本温奈多。我写了一封公函给密妥士先生，否认此事。昨天发生一场口角，涉及几个福建人。今天海盗亮出了三合会的标志等等。他们也开了枪，一发飞过韦理哲先生的房子附近，兰津先生看到一发子弹沿着水面掠过。麦都恩的第二个妻子死去了。

和兰津先生一起喝茶。

1855 年 3 月 17 日　星期六

今天大约两点左右我和密妥士先生正站在我的起居室窗前谈话，突然间窗户开始摇动起来——墙同样地动——地板在我脚下颤动。这是地震——震动只持续了几秒。我看到我的老同学，48 班的杰姆·林在第十八皇家爱尔兰团无需花钱购买就得到陆军中尉的职位（1 月 5 日）。我看到欧洲大陆的犹太人正组成社团，要求返回巴勒斯坦。今天上午安官告诉我有关玉良和其他领事馆仆人的一些“敲诈”事件。我很后悔来到中国。如果我留在家里，我有把握弄到一个东印度公司的任命。我要是能满足于现状就好了——我十分可怜。不过，送牡蛎来了！

1855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收到孟甘本月 15 日的来信。他说，甘尔韦文学博

士杜甘得到了“国民学校督学”的职位，“汉学”暂时放弃。上星期一为费陶买了一些东西，共计14元996文。将由费陶把钱给孟甘，孟甘再把它转到他与我的账上。星期一晚上在陆赐先生家喝茶并睡在那里。星期三再次与陆赐先生一起喝茶，年轻的女士们都在那里。今天收到香港来的公文，其中一件告诉密妥士先生，文极司脱博士已被任命为副领事（署理），并命令密妥士先生回到他原来的翻译职位等待进一步命令[76]。密妥士先生说，如果文极司脱来，他不当翻译；他可以这样干一个月直到他能结束他的事务。不过到那时他会离开领事界。另一份文件询问密妥士先生“英格尔伍德”号是否运走一批在宁波买到的儿童。很幸运在收到香港公文之前，密妥士先生昨天曾就此事写好一份长报告，今天刚发走。晚上收到父亲1月2日的来信。一切顺利；查普曼威士忌酒不久即寄出；马礼逊字典已订购并寄往上海给我。附有一张物格先生的纸条，要求我订阅弗里德里斯特街礼拜堂(1镑10先令)。我已完全忘记这事了。昨天寄出给玛丽、爸爸和威廉·斯旺顿的信——还有一封给寇克博士的信——一两封给孟甘的，今晚又写了一封给孟甘，明天寄出。罗尔梯先生现在舟山——他如想回到宁波，必须得到海盗允许。哈特先生的船在镇海附近被海盗船的船队开火击中。昨天寄了一箱货物给费陶。

1855年3月24日　星期六

今天上午收到帕特里奇船长的一封信，叙述他的船“宝德来”和另一艘外国造的小帆船昨天在镇海附近被海盗掳去的经过。特派一名信使从陆地前往上海，请调一艘“战船”。也有一个人被派乘“厄林”号前去。

今天收到本季度薪水100元。

密妥士今天忙于腾房间，供文极司脱用。我们每天都期待他乘“斯梯克斯”号来。我希望文极司脱博士能把我的一批书随身

带来，如这些书仍在厦门的话。

1855 年 3 月 28 日　星期三

前两天浦新玉的船队，正如我们所想的，出发去干海盗勾当了。不过他们回来时，带回了他们从舟山惯盗那里夺回的“宝得来”号。他们也为道台带回 4 个人头和七八个犯人。这些犯人都被钉在木板上，钉子钉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肉上，所以不怕他们逃跑。道台将如何或者已经如何处置他们，我不知道。密妥士先生一直忙着为文极司脱先生的到来准备地方。把自己的所有家什[77]都搬出了屋子；我成为领事馆内惟一的住户了。密妥士先生和他的夫人住在“黎明”号船上。他说他在那里很舒服，不过我想他一定会为房子等事而不知所措。

今天同我的老师邢先生说话，他说宁波人不愿跟前额隆起的妇女结婚。他们认为如果结了婚，那就命定为早死。他还说一个人在 33 岁时，是处于危急关头时。如果不死，他就会长寿。他教给我的另一个知识是，拥有几个妻子的中国人养的女儿比儿子多。大自然就这样为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做了安排。

现在我离开家已 10 个月了！时间过得多快！

1855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五

今天天气很温暖。现在我已是满身大汗了，而且还没有生炉子。今天空气中充满了蜜蜂采蜜的嗡嗡声；鸟也忙于表示爱情；群狗似乎在试验谁的舌头伸得最长。密妥士先生似乎仍“在希望”约翰爵士会修改他的命令，我想这不大可能。傍晚去丁韪良先生家，得到朱利恩的孟子一书[78]。我们谈到了曹先生。拜访了陆赐先生家，留下几份报纸，也到了倪维思先生家，还了“卢瑞”和“布朗特”。

1855 年 4 月 1 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斯梯克斯”号到达，送来本口岸署理副领事文极司脱博士和夫人。同船的还有驻上海领事罗伯逊博士，以及同一处的翻译星察理先生。我和代理指挥官布鲁斯，一个极好的年轻小伙子，还有西维尔和小罗伯逊先生整天到处奔走。写信给查普曼、郇合、凯恩、孟甘和费陶。由“斯梯克斯”号运去几只装有相框的箱子给凯恩：它们将随着星察理先生运往上海。费陶再将它们带往香港。在这些东西上我花了 71.50 元。收到凯恩·查普曼和郇合的信。我的书由于在厦门的另一个失误而没有运来[79]。

1855 年 4 月 2 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斯梯克斯”号开往上海。今天收到本季度薪水余额 14.68 元。

傍晚和文极司脱太太散步。中国人见到这样高大的妇人感到惊讶，我觉得颇为开心。我听到许多人叫：啊！呀！和嘘！哟！正在那时一大队人在行进；我听到锣声和别的声音，敲打得很欢快。上星期六晚上我去了临桥门附近的一座庙，那里正在庆祝“灯节”。很值得一看。

1855 年 4 月 4 日　星期三

密妥士先生已经辞职，而且退出领事界[80]。

前晚我去过的那座庙宇并不是在庆祝“灯节”，那完全是私人在祭祖，这位祖先从前曾做过中国的宰相。

（这则日记写在单独一篇信纸上）

1855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二上午

我睡得正香，是的，今早 6 点钟，我还在睡乡时，我渐渐意识到我的仆人清常进来了。他老是重复着“老爷”，低声地说着“老爷”，知道我不喜欢高声说话。我说啊！——啊！是一个什么词：无论什么时候中国佬对我说话时，我每隔一秒钟就“啊”！一声——6 点钟——清常说。在问过今天早晨天气怎么样等等之后，我派他去看看文极司脱博士是否已决定进行我们为今天计划好的旅行。我打呵欠、伸懒腰，然后又打呵欠，想着有一张好床可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可能独处到上午 10 点钟，真是很痛快。我的仆人回来说，文极司脱博士还没决定是出去还是留在家里，因为今天早晨看起来天气不怎么好。不久送来一张条子说，我们也许 9 点钟动身——所以我躺下来安静地“思考”。早晨在热被窝里躺着是最惬意的了。有什么事情人在那时没想到呢？在那时他的心思都停留在一切令人高兴的事情上，而不高兴的事则都被“排斥”了。所以我想到了每一件事——想知道邮件什么时候来——忽然想到该起床了，以便在领事想早一点出发时我能把一切准备就绪。在穿衣之前我看到仆人端来小小的褐色茶壶，正好里面盛下 3 杯左右的茶和里面有两个鸡蛋的小碗。早点已准备好，我就坐下来吃。在时钟敲响 8 点之前我已从里到外准备好，可以上路了。[在这张纸背面有一些数字计算和商行名字，宝兴行（?）和瑞开行（?）]

1855 年 4 月 29 日　星期日

又一个月快过去了——一个又有变化又无变化的月份，有考验和幸福时刻的月份：整个说来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一个月。下了许许多多的雨；确实，几乎每天看起来都是“下雨天”，而且倾盆大雨常是一阵阵地下。刚才正下着“瓢泼”大雨，几分钟前更

是下得“千军万马”似的。另外还有三四场极大的雷暴雨。昨天晚上我看到一道很亮的闪电，同时（不是随后）听到震耳和可怕的炸雷，好像大炮就在头顶上开火一样。今天得知那道闪电击中了停在兰津先生家附近的一艘船的前桅。我看到了那根桅杆，一部分已折断，余下一截的下部有一道很明显的参差不齐的槽。今晚远处也在打雷。我知道在一年中这个时候有那么多雷电是不寻常的。中国人说天空里有妖魔鬼怪，神派雷电来殛死它们。

17日星期二邮件到达，为我带来3封信；是杰米（他写的第一封）、妈妈和莎拉·简写的。爸爸寄来几条金带子，不巧的是种类不对，所以也就没有用处。他还告诉我马礼逊字典已按孟甘先生的地址由同一邮班寄往上海。莎拉的信告诉我珍妮特·拉塞尔、布里尔斯兰德小姐和詹姆斯·麦考伦等人的婚事。

17日我与文极司脱博士乘“火箭”号去大营；在18日与陆赐先生和太太、奥尔德希小姐、戴尔小姐（2）、德佩斯先生和太太，去“奉化”区[31]的“雪窦寺”，21日回来。我雇船（两天半）花去2,100文，一顶山轿1,000文——一共3,100文。这次旅行很愉快。我们雇了6只船，在陆赐先生的船内我们聚在一起吃中国蜜饯并聊天。上山往雪窦寺去时，我走在戴尔小姐轿边大约一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说得很少，当我要“宣布爱情”等等时，我有六七次几乎要晕倒。我有一次竟然清了清嗓子，但我喘不过气来也就说不下去了；我让机会溜掉——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青年呀!!! 上星期一我和高夫先生喝茶，在那里遇见娄理华先生最小的弟弟鲁本和他的太太。娄理华在1847年被海盗淹死。鲁本是在上海的传教士。上星期五晚上我在韦理哲太太家喝茶，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参加这些茶会时，我设法坐在麦嘉缔太太或倪维思太太旁边，时间便欢乐地飞走了。昨晚我和文极司脱博士一起进餐——这是我第二次同他在一起进餐。他只邀了我一个人，他以同样方式请过密妥士先生一

次。几个晚上以前他请了帕特里奇及魏德曼。今天上午丁韪良讲道，讲“用虔诚锻炼自己”，讲得好极了。在英国教堂由柯宝德先生讲道。我认为他的讲道令人厌倦，他讲的是“利用宝贵的承诺获得神圣”等等。天气很潮湿，我卧室的地板湿得厉害，衣服也有很难闻的霉味。

185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一

就天气来说，今天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一天。虽然太阳很厉害，热气却不怎么逼人；这得多多感谢一直在吹拂着的清风。今天 1 点钟的样子我和文极司脱博士去城里闲走；我们走进“灵官庙”，沿着浮桥，穿过叫做“衙东”的郊外，然后顺家具街直走到“天主堂”，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船上。文极司脱博士看到“斯派克”号悬挂着白色舰旗。他说这是极不恰当的，他也把它描绘为“虚张声势”[⊗]。天气这样好，我把我的衣服都拿出来晾晒。这非常需要，因为它们都已长绿霉和有霉味了。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世界；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干下去。一个人似乎在说另一个的坏话，等等。我很想知道性格每天是怎样在发展的。在别的地方能遇到多少种有关人性的研究，在宁波也就有多少种有趣的研究。

我不知道学习宁波土话究竟有多大用处。我不想学了。

1855 年 5 月 1 日　星期二

今天收到一封休士（福州）在帕特里克日（3 月 17 日）写的信。他似乎有一点迂回曲折地谈论欢乐的事。他提到中国女人时所使用的语言，就我所知，是他在有关性的方面从来没想到要使用的。他似乎认为有可能让编外的译员长驻在这里。今天戴维森先生的小帆船“宁波”号［1854 年 7 月 28 日在洪（岛）丢失］的大副梅纳德在这里作了一项声明。他说澳大利亚当局似乎

不愿意让中国船员回到中国以免他们招引其他中国人移居。我认为这有点不大可能——而且不可靠。

今天收到本季度暂付薪金 71 元，我向帕特里克船长借来《名利场》，晚上就看了 160 页左右。

1855 年 5 月 2 日　星期三

今天我和张先生谈得很有趣，他问我英国是否有燕子，我告诉他有，它们春天飞来，秋天飞走。他说，这点和中国的情况一样。他问在爱尔兰人们是否认为捉燕子或弄死燕子是不吉利的。这样，这两个国家都相信这种奇怪的迷信。他告诉我一条中国的双关语："燕来雁去，燕去雁来"——他说男人娶一个颧骨高的女人为妻不吉利——肯定会发生什么有害于他的事。在中国为父母服丧 3 年，在此期间居丧者不能作官。因此，两三天前来到宁波的中国知县李太爷，由于据报他在湖北的父母去世，所以不能在这里继续当知县。在邢先生帮助下，今晚我翻译了一封很糟的中文信。这是一个中国水手的妻子写的，似乎是所有奇特的胡言乱语中最奇怪的——无头无尾，没有意义或目的。

今晚散步回来时，我看到密太太站在入口处，神色看起来很阴郁。凑巧我的扣眼里插有一朵好看的玫瑰花，当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就递给了她。随后在领事馆里我又摘了几朵，一起拿回来给她。

晚上看《名利场》，我不像喜欢狄更斯那样喜欢萨克雷。不过与其他小说家相比，我更喜欢利弗一些。我在轻松阅读中喜欢的是能使我发笑的东西，不管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读到这种内容，仅仅微笑是不够的，而是能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某种在随后想起时总能使人暗自发笑的事件。利弗的著作中就有很多这种材料；愿他长寿！看他的书，我在欢笑中消磨了很多时光[89]。

1855 年 5 月 6 日 星期日

今天是中国夏季的第一天；春季在昨天结束。这一天宁波人像是要遵守多种多样的习俗：有关这些习俗，我从邢先生那里搜集到一些。每个人最少吃一个鸭蛋，以增强头脑，而今天吃两个鸭蛋的人却被人斥为想加强他的生殖力。每个人都称自己的体重(清明——多少斤两)，而且每人吃两片竹笋，它的形状和长度都象小腿骨[84]。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强步行能力。

一个中国人死了，没有闭目，据说是他不愿意死。不是留下任务没完成——某事没了结——就是想留下来和朋友在一起享乐。反之如果一个人死时闭上了眼，就被认为他在尘世中的事业已经在恰当的时候终止了。

昨天“孔子”号船来，送来一批去岭东的上海绅士。文极司脱上了船并带我与他同去。他遇到一些熟人，他和他们交谈，却把我独自甩在一边——真倒霉！他有点喜欢炫耀他的权威，我还没找他的麻烦呢；否则我的名字就不叫鲍勃了。我必须放弃宁波土话的学习，因为它太搅扰我的官话学习了，而且它是否是必要的呢!?! 我必须要么请假去上海，要么与文极司脱博士商量商量。我很想知道自从我来到这里以来我的身体和精神是怎样维持下来的！想到过去 15 个月里我的身体没有一小时是健康的——真正的健康！

昨天晚上密妥士太太来了，文极司脱告诉安官，提醒她以后别再这样做了，而且似乎他还说过这可能会在他和密妥士先生之间引起一场争斗。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是什么鬼使神差地把我弄到中国来了——。

1885 年 5 月 7 日 星期一

今晚文极司脱和夫人动身去岭东。他留给我一把钥匙——钱

柜——和一把旧手枪。和密妥士先生一起步行去书店，然后与他还有亚提斯船长一起走过坟地。里斯已买了“赛克”号——我想是花了1,600美元。他们说这太贵了，一些人还责怪D先生要这个价是在里斯喝醉的时候，这是常见的事[88]。

一个以前曾在中国某个港口呆了些时候的商人开始感到寂寞，因而想在中国女人身上占便宜。他用72元买了一个，保证健康，是处女，交游正派等等。但是过了一些时候，这商人听见她说英语和孟加拉语——她曾经是接待最普通水手的普通妓女！多恶心！

（写在单页纸上的给休士的信）

1855年5月9日于宁波英国领事馆

亲爱的休士：

你经由上海寄给我的便条我早已收到；不过你在“帕特里克日”写的那封信直到本月1日才收到。近来我本想多给你写写信，可是不巧的是，我没有送什么东西去福州的机会。一直在说“斯派克”号几天后可能要到你所在的那块天朝之地去，因此我要写几行复你最近的两信。

在这些“为什么”的日子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能认为我理所当然地应在帕特里克日按正统的爱尔兰方式浸湿白花酢浆草。人们期望像你和我这样放逐在外的爱尔兰人能保持古老的优良的民族习尚，这是肯定的。但是“真惭愧”，我把这事全忘了。尽管有时吹笛我也吹“帕特里克日”，但我全然想不起爱尔兰还有一个伟大的日子纪念一个英勇的绅士。他从各种各样爬行动物的脚下救出了“土地上的第一朵花”。而且据说他的骨头正在帕特里克沙丘教堂的墓地里腐烂。尽管如此，下次我会记住怎样做好这件事。4月1日“斯梯克斯”号进港，文极司脱博士和夫人

到来。他们在同一天上岸，住在密妥士先生原来住过的领事馆里的那部分房子里。4月4日密妥士先生递交辞职书；但是在文极司脱博士的鼓励和恳求下他继续充当翻译直到派人来接替为止。我真不知道谁可能被派来。文极司脱博士是苏格兰人——不过你已见过他，所以我不必向你描述了。一段时间以前，他的夫人对我提出劝告，这立即使我明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用尽一切办法讨好大人物”。溜须拍马，去你的吧！如果一个人想在事业上干下去的话，他就必须贬低自己去拍马屁，这不是很令人讨厌的吗？不过老实说，我不知道，我们都多多少少是拍马屁的（在这一页底部有一处涂抹）。在另一面上的花体字的意思是我想在屋里踱步而不知道该说什么。至于新闻，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1855年5月12日　星期六

哎呀，天哪！多讨厌——热天又回来了。想想在世界的这个地方夜晚所带来的乐趣吧。我简直喘不过气来——这个炎热的夜晚是这么闷热憋气。我的衣服都粘在身上，粘糊糊的臭汗使我感到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空中充满了蛙鸣声，田野里（现在有水了）也是一片蛙鸣。它们发出的噪声在一个年老的农村妇女听来像是早晨打开鸭舍让鸭子出来时发出的嘎嘎声。不过，天哪，什么样的老妇人能有这么多的鸭子以至足以发出这样大的吵闹声呢？或者有什么样的雌鸭或雄鸭能几天几夜地一直唱着这嘎嘎嘎的歌呢？它们曾经这样唱过吗？还有，远方像是有一列火车在全速飞驰——像是在一个平静的夏夜里听到的那样。尔后在室内我又为各种动物所逗乐和烦恼！两只很稳重的蛾子——它们一定是上年纪的女才子——在我写字时静静地坐在纸页上。它们很有礼貌地相互注视着——仅仅是相互认识——生硬地傻笑，每句话说完都带上“是，夫人”。天哪，我不知道它们都能谈点什么，十

之八九它们是在谈论那两个蛾子和兄弟所干蠢事的道德方面的问题，它们两个正生气勃勃地绕着我的灯相互追逐着。哎呀！一个大家伙进来了，这3个现在正围着温暖明亮的灯光“兴高采烈地”飞行。毫无疑问，如果它们老了，它们会想起过去在家里蹦蹦跳跳的日子——这个是妈妈的，那个是爸爸的宝贝——绕着甜混合饮料的大缸走，一、二、三。唉！那两个老处女中的一个似乎踱得有些激动：诚然，这不足为怪；年轻的绅士中一个开始每转一圈就靠近一些。喂！她往那边去了——它们是多愉快的小东西呀！——一只极大的难看的蜘蛛（在家中没有什么东西像它）从天花板上看着我一些时候了。我的好伙计，你呆呆地在想什么啦！我刚一重复这想法，它就下来了，而且尽量快跑——跑得看不见了。许多蚊子在周围嗡嗡叫，每当它们似乎要凑得离我的耳朵或鼻子太近时我就会发抖。一群小动物在周围跳舞。一个奇怪的家伙，从滚圆的通红的身子上伸出一个黑黑的脑袋或更确切地说，是从身子上突出来的，像一道水流一样古怪地四处跳动。无疑，它是因洋溢在桌子那一边“辉格”杂志旁边的威士忌酒气味而感到惊奇。哎！我的桌子今晚看起来很不错，在我的右方有一封道台的信和姚太爷的名片；靠近我左肘的是第十二期《黑檀》，保护着3封信的侧面——一封是3月2日埃德加舅舅写的；一封是玛丽妹妹2月28日写的；一封是罗斯3月2日写的。再外边是3本《辉格》，两本《信使》，同样多的《国内新闻》，以及记着我每天中国方面费用的蓝皮簿子。这样一个私人与公家、文学与政治、多愁善感和忧郁思想的大荟萃，一起展示在我的桌上。是的——一个流放者，因为这就是任何一个人在中国的情况。他只能在思想中和心中与古老英国的文学和生活联系在一起——个人的交往已成过去——愿上帝赐福你——我的祖国！

1855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一

近几天天气多变：热了冷——冷了热——再由热变冷。昨天很热，昨夜热得尤其厉害。拿昨天跟今天比较，几乎像是火炉和冰块相比。我整天只穿衬衫，不穿外衣，而且被过分的热弄得筋疲力尽。大约 5 点钟左右一场雷暴雨倾盆而降。雨过之后开始刮起一阵喜人的大风，非常令人振奋。六点半时地面干得与几天没下过雨一样。我出去静静地散步。但由于热，不得不走得很近而且脚步很轻。青蛙在路边蹦跳，数目之多令人吃惊。有各种颜色和形状，有许多就像一块泥土。我走近时看到一块泥土忽然跳开，常常把我吓一跳。我第一次看到一条蛇，好家伙！有四五英尺长。最粗部分的直径有 1 英寸又 1/4。它很隐秘地悄悄溜过；我还从没见过别的什么东西比这位老兄更像是狡猾和隐秘的化身。我跟在它后面一会儿，几乎想脱下鞋来打它一家伙，不过我害怕了。最后我捡起一块石头给它一击。我不知我是否瞄准了，因为它立即往回一跳，藏起来了（随后赫德画了一根线，像是一条蛇，还在括弧内写上像“一根竹”的字样）。

晚上一些甲虫捣乱；它们是一些大家伙，特别是其中一只不让我安静，尽管我把它“打倒”至少有六七次。就在这时一大群蚊子在我的头四周飞舞。试图打死一只也无用——“它们的名字是军团”。今天我挂起蚊帐，早三四天我就应该挂上了（在页边上有一星号）。今晚我的仆人为我买了一把扇子（价钱是 10.5 文），一只中国烟袋（354 文）和两包烟叶（68 文）。我吸中国烟，味很弱，但不令人讨厌。我的雪茄差不多要抽完了。我听说起义军已经占领玉山，是靠近本省（浙江）边界的一个富裕的围有城墙的城市。这城市距宁波很远，有1,000～1,500里，即 300～400 英里。上星期三，即 16 日（中国历四月初一）提台来访。中国官员每月初一、十五朝拜众神，然后访友。他们早晨 4 点朝

拜，提台到我们这里大约是 7 点。我真是慌里慌张，一点不假！我闪电般地穿好衣服。提台大约由 15 个戴顶子的军官陪同，另外还有六七十名士兵。他戴红顶子和挂一串很漂亮的朝珠。他就我们的战船问了一大堆问题，似乎很想买一两艘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他假定价钱在10,000 元（3,000 镑）左右。他是一个聪明好问的家伙。第二天他就去杭州，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回拜。第二天道台姚太爷为一些山东帆船的援救费来领事馆，这些船是被魏德曼、帕特里奇的船和“狄万”号船在陆港从海盗手里救出的。援救费定为6,000 元（3,000 给“狄万”号的林哥）[86]。

我开始非常喜欢的老师邢先生（但最初我认为他若不是可恶的伪君子，就是极好的人）竟然是很坏的人。有人发现他偷罗尔梯先生的书拿去当，此外还谎话连篇，所以现在不能再相信他了。而且，上星期发生了仆人之间的口角后（关于企图敲诈山东商人之事），再让他回来也是不妥当的。但是，自从我发现那事之后，他就没走近过我。

上星期在港的有两艘轮船、3 艘纵帆船、3 艘方帆双桅船、6 或 7 艘帆船，总共 15 艘大船，其中 12 艘是英国的。它们全是运米到广州去的；在那里米的售价是宁波售价的 4 倍（在这里每担是 1.5 元）。

本周已写了 4 封信（页边上有一星号）——给汤姆·埃德加；弗雷德 K 哈特；玛丽妹妹和罗斯先生。罗斯先生上次的信告诉我他在文学硕士考试中得了两个第一：一次是英语课第一，另一次是初等法律证书第一（两块金牌 25 镑）。祝你成功，我的伙计——（边上有一√号）。

今天收到许先生一封信。

我必须考虑在密妥士先生离开之后要他的房子。绝对比我现在的破房了要好得多。我想房租每月会是 7 元或 8 元。

1855 年 5 月 24 日　星期四

女皇万岁！
愿上帝佑我女王！
送给她胜利——
幸福和光荣——
治理我们直到久远——
愿上帝佑我女王！

现在我不完全是个忠实的年轻平民了吗！今天是女王陛下的生日，是世界各地应该记住并尊敬的日子；甚至在日本，对英国人也会致敬。两点钟时我们的人放了 21 门小炮，然后下半旗一两秒钟再升上去。

今天看到一条蛇钻进我卧室的木板下面，我对这位绅士感到有些紧张。

今天下了一场大雨，所以晚上多少凉快些。

自从到宁波以来我就发现，人们说别人缺乏的东西其实就是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拥有的那种东西。因此，M 虽抱怨缺乏有知识的谈话，他的谈话却很少有那种性质。虽然 P 在发觉拼写错误上很在行，但他时常因在完全正确的东西里找岔子而自己大出洋相。

我不相信（空白）的荣誉，他对此却唠叨个没完，不过我想他架子太大。

在这几个暖和的晚上，一些甲虫和各种小昆虫闹得我不胜其扰。

昨天读《陆军中尉》，看完寇松的《地中海东部诸国的修道院》[87]。

1855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副领事、密妥士和我去提台衙门回拜。他的官邸在奥尔德希小姐家附近。我们走进一道围墙，在里面我们看到 4 只跃立的石狮子。穿过两三座大堂然后下轿[⊗]。9 个戴顶子的军官接待我们，引导我们去见提台。他有几个军官陪侍。我们鞠躬，然后进去。他的客厅是一个精致通风的地方，对着一个小花园，园内有假山和石洞。这些水师提督（原文如此）的 5 个儿子都在室内；最大的 22 岁（我想是个绷着脸的家伙），最小的大约两三岁。我们和 4 个小的握手并向作继承人的儿子鞠躬。在走开时我听到大儿子正对小家伙们咆哮。

昨天晚上沈先生（领事馆的文书）在他三弟的协助下把他的二弟淹死了。中国法律很独特，它使家庭——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对相互的行为负责。沈的这个二弟近来表现很坏，沈作为一家之长开始为自己害怕，所以在把事情详细考虑之后就下了决心，并在昨晚把他的意图付诸实施。我认为这事是一种怯懦之举，我总认为自杀者是懦夫，不过与这样一个人相比，自杀还是勇敢的。

今天下午 1 点钟我收到了我的书。1854 年 9 月 29 日我离家来中国：今天，从那时算起到现在正好一年，我的书才到达。在装箱时我放进箱内的一些花都露出来了。由于箱子紧密，它们尽管碰来碰去，到达时仍然完好。它们是装在“弗兰西斯”号里从厦门运来的。

昨天非常冷，我不得不生火。我以为这种多变的天气对健康一定很不利。

400 名宁波士兵今晚开赴杭州协助那里的军队防备起义军的出现。

我听说几天前两个葡萄牙人和 1 个俄国人为海盗所杀，几只

三桅船和 1 艘英国船（猜想是“西提斯”号）被掳。

今天见到福钧先生。现在有大批逃兵上岸。

1855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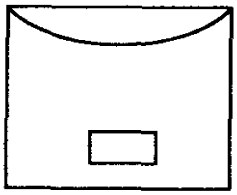
今天道台砍了 22 个海盗的头。他们都是由“孔子”号船送来的（在这则日记上方赫德用铅笔写道：各个报告相互矛盾）。

1855 年 6 月 1 日　星期五

公文昨天到达。约翰爵士已由暹罗回来，巴夏礼已带着条约回国[89]。李泰国被任命为江海关税务监督，接替威妥玛。密妥士案已呈交克拉伦敦勋爵。玛高温一家和伊迪斯·包令小姐都在上海；预计不久将到这里来。收到凯恩和查普曼来信，费陶没有把相框运往香港，我担心它们已到了耶利哥。我再也不接受委托了。

1855 年 6 月 3 日

今天我到茶厂去了，看到人们在忙于制茶。



进去后左边有 60 个形状如图的炉灶。顶上的平锅里是茶叶青叶子，每个灶边站着一个赤着上身的男子在翻动茶叶，以免烧焦。右边是一架簸扬机，从机器里出来的叶子在簸去灰尘时似乎已搓得较紧，外表也较脆。再往前是 8 个或 10 个拿筛子的男子，筛孔大小不一，每一个筛的筛孔都比前一个筛的筛孔稍微小一些，通过这种办法得到不同质量的叶子，最好的茶叶叶子最小，香气非常好闻。

每斤价钱是20,500，按每斤1,400美元计算（原文如此）合 14.69 元强。如果 1 斤等于 131 磅左右，则每磅价钱大约为 11.2 分［或者，如果25,500分＝14 分（7 便士）1 磅］。

1855 年 6 月 7 日　星期四

今天玛高温先生和全家回到宁波，包令小姐同行。她是与文极司脱太太一同来游览的。几天前我们拜访了道台，向他建议在这里设立一个与上海海关相似的外国海关。他接受了建议，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得多。我们然后告诉他包令小姐就要来宁波。并说，她和文极司脱太太将拜访他的夫人。今天姚太爷到密妥士处了解应如何接待包令小姐和应该给她多少，因为衙门里的好心人认为她是正在进行某种诡计而不仅仅是拜访。道台的夫人从来不离开衙门，所以看来在回拜方面会有困难。

1855 年 6 月 8 日　星期五

副领事今天写了一篇有关我的公文给约翰·包令爵士，原文如下：

英国领事馆第 57 号，1855 年 6 月 8 日

阁下：

我认为提请阁下注意我已形成的对随习翻译鹭宾·赫德的工作和能力的赞赏意见实为公允。赫德先生主管送交中国海关的航运报告，在执行助理职务过程中他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才智，而此项工作由于本馆最近业务增加而更趋繁重。赫德先生在汉语方面有了非常令人满意的进步，他以一个真正学生的毅力投身于该语言的学习。在品格上他不仅行为端正，而且堪称楷模，等等。

查尔斯·文极司脱（签字）

约翰·包令爵士法学博士阁下

他写了这样有利的报告，当然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不过我怕只会有微不足道的好处。包令爵士可能回答说，他很高兴我干得不错，他会记住我，等等，结果还是一切烟消云散。不过由于文

极司脱博士已答应在私人信件中指出我如何可能成为“可造之材”，在我看到这一切的结局之前，我用不着“大惊小怪”。

一切都在这里静静地进行。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为想家烦恼了；不是由于我喜欢这里的生活，而仅仅是因为我开始像畜生一样地生活——也就是，我工作、睡觉——吃饭——写字——抽烟——闲逛——却没有思考。有时在早晨的时候，我希望夜晚来到；夜晚来了又希望它是早晨。傍晚6点钟时我一般出去，到领事馆背后的山丘上，手脚四伸地躺在一块坟地上，看着四周，欣赏着凉风，逗着“诺拉”跳跃来取乐。我想很可能我会在月底离开领事馆；密妥士考虑接办赫德森的商行，而且他会因此腾出他现住的房子，租金每月7元。他一离开我就要这房子。在我搬进去之后，我就可以拍打着翅膀喔喔啼鸣，因为到那时，“我就是城堡的国王，谁敢把我打倒?”

上星期我一直在阅读《汤姆·克林格尔的航海日志》和《米奇的巡航》[90]。

汉语方面我现在正在读《红楼梦》，我并不觉得这书没有趣味。

但是这是个最可怕的地方：没有娱乐——没有任何乐趣。

1855年6月24日　星期日

自从在这日记本上写完上次日记后，这里没有发生什么重要事件。

文书沈祥亭在几天前淹死了他的弟弟。这个年轻人行为极其不端，沈害怕他会干出某种使沈家丢脸或毁了这个家的行为。在父亲死后，全家事务的管理便转到老沈这长子的头上。因此，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选定了处置兄弟的这个办法。他把袋子罩在二弟头上，在三弟协助下把二弟带到防波堤上，把他的头按在水里直到把他淹死。没有人能从他的外表上猜出他竟能干出这种非同

寻常的事。但是我知道，外边的人现在都不怎么喜欢与他有什么联系，与他一起写中国字的密妥士先生似乎想把他赶走。

仆人领班安官结婚十多年却无儿女，而且一般作为耐心等待期的10年已经毫无结果地过去了。他买了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子作儿子，价钱是5,000文（大约15先令）。前天晚上安官设宴招待朋友，在酒宴中小家伙被带来与客人见面，大家全部站起来对他点头。我注意到领事馆的仆人们坐在一桌，与领事馆无关的客人坐在另一桌。小家伙有时来到我身边，似乎很喜欢一些图画。

昨夜大约11点睡觉。我发现我卧室的一张桌上我的衬衫中间有一条大蛇。我用手杖打死了它。它长5英尺，最粗部分的直径大约有一英寸半。在卧室里看到这东西太使人恶心了。

今天早晨我和密妥士先生一起吃早点，中国蜜饯好极了，谈话很愉快。

夸特曼今天讲道，而且没忘记对我们说一大堆的“实现”。

最近阅读了《哈当·巴巴》和《哈当·巴巴在英国》[91]。这是贾斯·摩里尔写的两本非常有趣的冒险故事，说明波斯的风俗习惯。汉语学习在平静地进行，已看完半卷多的《红楼梦》，还读了美国条约。

今天颇为暖和，阳光很强烈。最近雨很少；似乎很需要雨。水塘全干涸了，稻田缺水。我想农学家会希望下一个星期有好雨。

写了一封信给父亲，回复我本月10日收到的他的一封信。他在信里满意地详细讲述了托马斯·席林顿先生的女儿的可爱之处，也许诺拉还是我的。我也收到汤姆·埃德加的一封短信。

昨天收到孟甘一信；凯恩的一只箱子由“独角兽”号送去。我写了一封信通知他。

1855年7月1日　星期日

最近6天来身体全垮了；先是腹泻，然后在星期四便秘。我

服了药，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病得很厉害。今天多少好些，但舌头仍很脏，嘴里有一股很讨厌的味道。昨天和前天热得厉害，昨晚和今天早晨仍然热。今天上午身体非常虚弱，简直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到哪里去才有风吹进屋来。幸好两点钟左右开始下雨——随后刮大风——再后是雷暴，伴着大雨，雨点大如普赖斯小姐的顶针。由于这场雨下午凉爽宜人，蟋蟀、蝗虫、蚊子和青蛙现在都忙着歌唱。我敢说，明天会和昨天一样热。

明天我去帕特里奇船长家暂住，以度过热季。

邮件预料很快就到。帕特里奇船长的小帆船“道清”(?)号在福州附近被海盗所劫；魏得曼的“希望”号逃脱。

上海商人们租用“孔子”号来肃清上海与福州之间沿海的海盗。他们出15,000元。“孔子”号则由美国装有大炮的帆船“马其顿人”号的水手驾驶和武装——

有消息说“赛克”号船长里斯于6月18日前后在江阴（镇江府）附近为他的中国船员所杀。

1855年7月4日

今天邮件到达。其中一份公文是答复一段时间以前文极司脱先生所写的有关我的文件，全文如下：

贸易监理处

香港　1855年6月

阁下：

我很高兴看到你对赫德先生如此称许的报告，并将根据你××号文件的建议任命他为你们领事馆的临时助理，年薪270镑，待克拉伦敦勋爵批准后生效。

约翰·包令（签字）

前天我已迁居，现在和帕特里奇船长住在一起，他对我很友好，给我一间卧室住，以过夏天。

1855 年 7 月 29 日

上星期有几次大风和阵雨，今天天空晴朗，阳光很强，天气很热。最近四星期过得很愉快，我的健康状况良好，我很少为意气消沉所烦恼。我怕回到领事馆过冬时，我会非常寂寞。尽管如此，还是及时行乐，未来怎样到时候再说吧！

（以下是在装订的日记内发现的写在零散纸页上的一些文字）（单独一张纸：）“一般人性和自我”——

人是多么反复无常：而在反复无常的人们之中，谁又像我这样反复无常到无法解释的程度！的确，在个人内心和人们之间进行的战争，只有一个人自己才知道，常常是要比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更为激烈，更为痛苦。人是具体而微的世界：他的激情——他的偏见——他的动机——他的良心和其他品质之对于他，就如国家和帝国之对于整个世界一样；诉诸激情的不同目标，和鼓舞意志的与动机相反的目标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党派。但是其中又有不同：世界不像人一样具有知道内心一切活动的灵魂。某个阶层的形而上学家在到达他们的云遮雾障的玄学顶峰时，如此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谈论的世界的灵魂和自然界的精神，并不俯允为平庸的人所知。而这些平庸的人得到的满足和安宁的回报，比起那些一直在攀登人类刨根问底精神的顶峰，并因此而陷入危险，接近毁灭性的悬崖的人要大得多。而人们通常也为这种事感到骄傲；不过毕竟爬到最高峰顶巅的人——到达人类声誉最高点的人——乘着想像力吹胀的气球不停地求索直到消失于视线之外，又得到了什么呢？他已脱离了自然——到达了他不适应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并不愉快，而且还必须从这个境界深深地（虽然可以是私下地）俯身以求得最小的一点欢乐。好吧！说完这番狂言之后再回到我要说的话上来。我是一个多么自相矛盾的、奇

怪的人呀！多么的反复无常。而什么东西能帮助一个人达到始终如一呢？对于有些人事实是全能的，对于另一些，原则是全能的。当一个人以他的信念发誓，但却不按照它行事；或是当一个人要求某种东西，而同时他又想要另一种东西，以致使前一种东西变得无用时，这人就是反复无常。至于说什么是反复无常的规则，这种词本身似乎就包含着原则或规则，或任何构成反复无常的基础，以及区分反复无常的等级的事物。

（另一篇文章）“基督教”

基督教是它宣称的包含在“上帝真实话语”中的宗教体系，这似乎已由下列证据加以证实：奇迹、已实现的古代预言，还有它的内部证据以及它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和确实给予的影响。

基督教的道德倾向和有益的影响有力地表明自身的价值。在关于它的真理和神圣起源的间接证据中，它的迅速而惊人的成就恰如其分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它是为了反对刀剑、教士的诡计、哲学的傲慢、流行的激情和偏见而生发出来的；它不是秘密地、逐渐地，而是充分地，不加掩饰地突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以便我们能在统览全部内容后判断整个事实；因此，人们是经过适当的审查并信服之后才接受了它。此外，它是首先在耶稣履行他的职务的地方得到宣讲并受到信仰，而且是在每一个人都有办法知道他的话语是否都是事实的时候。在这里，基督的（?）从来不可能被接受，除非它是真实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是真理。它是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和城市中宣讲的，是在据说他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时代里宣讲的。而那个时代由于有了一些才能因社会生活的最完美状态而得到提高的人而名声远扬。而且这些人是为支持福音历史书中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的优秀判断者。在希腊和罗马，福音书中讲述的事实被接受了。在那时，如果证据有假是能够很容易地被驳倒的。

因此，基督教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

再有，在那个时候，基督教的誓言是领导所有的人摒弃世俗的欢乐和荣誉，而且使大家都看到最不光彩的痛苦。

（在另一张记事纸上还有一些赫德的宗教反省）

毫不犹豫地信仰上帝的基本原理确立了圣经中所有篇章的真实性，这些篇章使人们深深懂得过分地焦虑未来是不恰当的。它是上帝神奇爱护的充分证明。他献出自己的儿子代替我们受苦并死去。跟他在一起，他肯定会给我们一切良好的和必需的东西。我们头上的头发是有数目的，我们比同样受到上帝照顾和保祐的麻雀更有价值。诚然，我们的上帝是无限慈善的神，会无限地为我们赐福以使我们幸福；他的意志由他的无所不能所支持。因此，为什么还让折磨人的心事来打搅人和使人不安？——为什么你被你的灵魂困扰——而且为什么你要降身于小我之内呢；信仰上帝吧！因为你还得赞美他。啊，我对救世主的信仰是多么健全啊！把我们所有的心事都扔给关心我们的人。让我们把每一种障碍和每一项常常重犯的恶习都抛在一旁，以忍耐对待摆在我们面前的精神食粮，让每一刻过得像每一刻应有的那样，直到“干得不错”和“忠实的仆人”这样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陶醉，并让我们进入没有顾虑和悲哀的避难所。

那么人类该干什么？他们该向上帝悔罪——信仰主耶稣基督，而且一生中都生活得很严肃正直和虔诚。现在我最诚恳地悔恨我的一切罪过，我已违犯了上帝的律条；但是他已给了我他的圣灵来使我认识我的罪恶，并使我请求宽恕和和好；我的希望是什么？愿人们都以基督的名义祝福上帝，如果上帝慷慨地宽恕我并将恩惠和安宁给予了我。我能够相信上帝的真诚；我接受给我的这一切；我能够毫无怀疑或畏惧地把救世主作为我的救世主，以赎罪代替冒犯——用牺牲来代替我的罪过。我能毫无畏惧地向

前看，如果就在这一时刻叫我去，我看不到有什么可惧怕的。

我的债，基督已经还了；他的死已经成了我不朽生命的保证。在一个基督徒走到这一步时，他该做什么呢？回到我自身——什么事情一直妨碍我在恩宠中成长，我为了将来应该采取什么较好的行动方针呢？

我一直是太为未来焦虑了；我设想过各种或然性和可以性，因而导致我忽视目前——躲开眼前的责任和优惠，为的是在（?）中尽情享受想象中的各种未来可能性的欢乐。现在这一切已经可悲地扰乱我的康乐，所以必须抛弃它；那么该以积极的态度做点什么呢？

恰当的行动方式就是在利用现在的时候能为未来做准备，而那只有通过履行我们的责任才能完成。让一个人始终不渝地、连续地和彻底地完成对上帝和人们所负有的责任。让未来采取它可能有的外貌。人类将在上帝的天意下对此有所准备。如果要有一次海难事故，他会把船只准备妥当，在船内有使他登岸的必要物资。如果他沉下去，“他是与上帝一起沉”。现在我在这里是“一种处境”。我对人（我的雇主）负有的责任是学汉语——官话。我对上帝的责任是献出我的心，逃避罪恶，如饥似渴地追求正义并完成对人们的责任。但是在这里我有学习宁波土语的机会，而且有可能使这种知识有用处的境遇。所以我将努力学习这两种方言，在一切方面感谢上帝，并向他献出我的全部心灵。

（以下是一篇短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它是包含在日记第二册里的）

马特·鲁尼上尉生活中的几件事

在××年我正在南美，通常在××城与一个叫梅森的年轻小伙伴一起闲逛。一次我们一起碰到两个非常标致的年轻姑娘，有

仆人跟着她们。她们的外貌打动了我，那个年纪较小的姑娘的美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城市的房子都盖成四面有街的住房区，所以如果步行速度比另一方的一个人快3倍的话，就能够在每一个街角遇到她。利用这种妙计，我们见到这两个姑娘几次，而且发现了她们走进去的那座房子。我想她们看出了我们明显表示出来的对她们的倾羡慕之情，丝毫没感到厌恶。梅森想跟她们进去，但我认为最好别这样干。因而，我们就离开了，决定在某个其他场合再去看她们。梅森很着急，要我以荣誉担保，没有他陪伴就不去找她们。对这个要求我不同意，而且问他要求我这样做是搞的什么鬼。他回答说，我们是一起碰到她们二人的，所以我们也必须一起去拜访她们。但是如果我竟看不出他的诡辩是如何的软弱无力，我就真该死了。

好吧！先生们，一天晚上有一个化装舞会。梅森和我都要去。在我们穿衣前，我们相互展示了各自要穿的衣服，以便在舞会上能相互认出来。不过请注意，我始终没有丝毫意思穿上我给他看的衣服去。他穿好衣服走了。然后我穿衣服，走到那两个姑娘走进去的那所房子。敲门，门是那个年轻的姑娘开的。我没有做什么进一步说明，立即双手搂着她的脖子来了一个该死的热诚的发出声音的亲吻。我走进去，同老妇人说好，然后带这姑娘去参加舞会。梅森几次走到我身边，问我同我在一起的是谁。但是我当然否认我的身分，而且只说西班牙语，尽量用假嗓子。以后，我租了一所房子，安置这女子。但有一天，在我们外出散步时，遇到了梅森。他在我身边走过时，对我说："你是一个该死的混蛋"。这女子问我，他说了什么，我告诉她，那是"你好"。咳，一天我们在街上相遇了。我的这位绅士用马鞭子在我的肩上碰碰我，我夺过马鞭指向他自己。但，请注意，在此之前，他要我跟他决斗，我拒绝了，理由是这只是一件有关女人的问题。我说，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不想让她知道我是为了一个妓女与人争

吵而遇到枪杀。但他不明白这点，因而决定用马鞭抽打我。

唉！又一个晚上，我正在戏院的正厅里，这时他要弄同样的把戏，我照以前那样对付。老天作证，第三次他在一家公共台球室走向我，而且在我头上打断了台球棒。当时我已大醉，而且觉得相当恼火，这是你们可以猜想到的。所以我说，既然你他妈的欺人太甚，老天作证我决定和你斗，少说你那些他妈的废话。因此，我锁了门，不顾他要到外边去决斗的愿望，让他隔着台球桌来向我进攻。啊呀！我打断了他的手。我的枪弹擦过他的手枪，猛击他的手。他应该感谢老天爷的保佑，只碰到了他的手枪；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立即就进入天堂了。(未完)

[附在这一册日记中的有几篇关于中国景象的短文，从短文的体裁看，也许是意在发表——或是遵照包令爵士的建议写给他的？(参看 1854 年 10 月 9 日所记) 一共有 12 张]。

论述中国和中国人的作者在多数情况下都犯了未经前提论证就进行归纳的错误，Exuno disceomnes 可应用于许多事情上；但如果有一个特定的中国人——中国土地上一个特定的地点，没有一个人能根据这二者中任一点说出这个帝国另一部分风俗习惯的特征应该是什么，或者另一者中人们的习惯应该是什么。一个地方的海关、贸易、关系曾被人当作帝国所有其他部分的海关、贸易和关系的代表。这类书籍的读者很容易首先陷入另一种错误：他们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在远离和全然不同于作者进行观察的所在地的一些地方，而后在将实际与所描述的进行比较时，他们倾向于假定后者全然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因此，在本文中，我一刻也不会想到要一般地论述中国人或中国；而是把我的注意力和论述局限在宁波、宁波居民和它的邻近地区。在任何我可能使用“中国人”这个字眼的情况下，我是较为特定地从宁波观点来

提到中国的。

浙江是中国××个拥有海岸线的省份中的一个。宁波府和城——“宁静的波浪之城”就坐落在浙江这个安宁——也许可以说是忠顺的省份中，距海大约12英里。杭州湾南部，面对李江岛，就是甬江口。一进入甬江，右边是镇海要塞——一所大庙坐落在招宝山山顶；左边是另一座较高的山。山顶上有一小塔楼，用作瞭望哨，有时用作发信号的场所。在招宝山——一座非常象直布罗陀的山——只是规模小一些——的后面，就是镇海城。四周围有城墙，而且非常正规。航行过镇海时，旅行者的眼光不得不为海关对面呈现的生活景象和日常活动所打动。无数帆船停泊在那里——有些满载着（原文空出留待后补）货物，刚从北方到达；另一些则将远航南方福建各港口——摆渡船在四面八方往来如梭，到处飘扬着三桅帆船上的葡萄牙国旗，这些船都由恶棍们驾驶和武装，用来护航和在公海上敲诈勒索。单调的敲打声和锣声到处回响，不是欢迎一艘刚到达的船就是祝愿一艘即将起航的船“一路平安”。顶部白色的宁波船，白色的帆裁剪得很好，上下来往，其中许多艘形成强烈对比，而且展示了高他人一筹的异国情趣和维修水平。如果坐上一只小船，你可以不费多大困难在船堆里穿行；但如果船大，便会有许多碰撞。而且许多时候船主会说，港务长——在别的地方也许是一个讨厌的人——在这里会予人极大方便。真是奇怪的补偿原则：一个地方的官僚过分爱管闲事和惹人讨厌，却为在某个别的地方没有官僚所补偿；一个地方由于官僚在场引起了愤怒和坏脾气，却为另一个地方由于他们的不在场而激发了同样的情绪所补偿。

当你穿过了所有这些船只，又有顺风的话，你就会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河道航行。左边是山，几乎濒临甬江河岸；右边是一片宽阔肥沃的平原，××英里之外就是围绕中国的花园，慈溪的小山。所经过的河的两岸都有几个小村子，特别是在一个地方可

看到几只木船摆在高而干燥的泥船坞上，等待季风转变。它们的桅杆埋在旁边的泥里，船员则呆在别的地方。最后，我们到达最后一段河面，正对着白沙村。稍稍往前，右边就是英国墓地；左边河岸上则有无数的房子（原文如此）。外国洋行在望了，外国人的船只也在那里。放下锚，我们到宁波了……

（新的一节）

与其他地方一样，宁波有它自己的妓院，而像别的地方的人一样，宁波人偶尔也忘我地到那些地方去寻欢作乐。我的老师有一次告诉我少花钱过一夜的巧妙办法是两个人一起去一间屋，在那里让一个姑娘服侍他们——装烟、递茶，等等，然后他们安排谁睡前半夜，谁睡后半夜。第二个人于是移交，然后去睡。第一个人仍然醒着，喝茶，抽烟，与姑娘作乐；等到商量好的时刻到了，他叫醒朋友，自己去睡，年轻的姑娘便转到另一人的怀抱。唉！你们这些经济学家呀！你们怎么会喜欢起这种方式的节俭呢？

在一些妓院里只住着一个姑娘。她很可能靠她的生意来维持年老的妈妈或者某个上了年纪的人。最好的是那些有几个姑娘的妓院，她们能唱，能表演，并能陪客人作乐。在有三四个房间的屋子里，一般是有三四帮男人在喝酒、抽烟、赌博。每个房间有一个姑娘，她坐一会儿，然后到另一个房间去，在那里，她照顾他们，然后离开，等等。对于中国人，没有欧洲一些地方那种拖来拖去，搂搂抱抱，或者打打闹闹的举动。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过一晚上。

这些姑娘都被看作是从事一种行业的妇女，而不当她们是坏分子；我常在街上听到一个妇女说生意好哦（?），她的衣服表明了她的职业。

作为外国人的居住地，宁波似乎在各方面都很好适应。气候

有益健康，供应丰富，居民友好，乡村宜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要求了。在宁波这有益健康的地方住上一两年，你就习惯这个地方了，身体也服水土了。最初，夏天太阳的威力，冬天刺骨的寒冷加上春秋的潮湿多雨，极端令人讨厌；不过经历过一两次这些烦恼后，它们也就不再会引起令人不悦的身体状况了。至于食物，宁波的鱼和羊肉是上等的，家禽和蛋总是能买到的；有时仅仅缺少英国人食用的蔬菜。人们非常友好，从来没有无礼举动，他们总是恭恭敬敬的。能够说他们那种语言的人都可以发现他们相当开朗，生活愉快。到各处旅行，不用担惊受怕，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经运河或河流到山里去，那里的优美风景和环境变化能使你心情舒畅，并弥补宁波所在的平原造成的单调情绪。

宁波城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居住的“天主堂”。有一个主教，一个总管，和一个做杂役的僧人——还有几个神父。他们全都穿中国服装，而宁和（Ning Ho）（?）是一个法国教会。南门外有一所养育堂，即慈善团体的修女们办的育婴堂。一批男女小孩在这里得到抚养，并受罗马天主教信仰的教育，然后互相婚配。对罗马天主教信仰就这样传播开去。如果新教传教士也这样做，他们的教徒无疑就会为数更多了。小男孩中显得特别聪明或天资好的就教他们学拉丁文，培养他们成为神父。教徒们都不学法语。关于教堂公事神父说拉丁语，私下里则说法语。在新教传教士中，有由英国圣公会派遣的——有由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和英国浸礼会派遣的。这些传教士大多数都是结了婚的，他们的妻子协助他们办小学和访问中国人。传教士有他们的班子和集会，他们有时也利用给他们的机会对人数众多的会众讲话。他们真正的、真诚的信徒的数目不确定——也许很小，而且在被认为是信徒的人中，可能有一些属于那样一类人，他们之所以被吸引来信奉任何信仰，或侍奉任何人，只是出于谋生的指望。传教士们到底做了什么好事，无法肯定。他们无疑教导了几个人关于真正的

上帝的知识，而且他们的教育可能使几个人停止了许多普通中国人进行的错误崇拜，而且避免了许多信仰或崇拜异教神祇时才有的举动。一些人也可能还遵守安息日，等等，但在这拥挤的地方，效果是难以察觉的。不过，“一点点发面会使整个面团发起来”，而宁波在安息日早晨到处响彻教堂钟声的日子，无疑会到来，那时世界的创造者将会受到真诚、谦卑和得体的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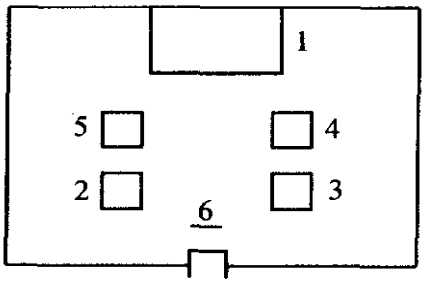
结婚和生儿育女，在全中国，在宁波，都是人们一致的愿望。中国人的婚姻是被他们通过有色眼镜来观察的。他们透过这有色眼镜来看待每一个对象。不是爱情把人们引入夫妻的羁绊，而是外部的风俗习惯和内在的想要子女的愿望，使得父母们为子女办理嫁娶，并使年轻人愿意有妻子。中国男子到 40 岁时，可以合乎礼法地讨第二房妻子。不过，如果他的第一房妻子 10 年无儿女，他可以在外寻找，带另一个女人回家。不喜欢这种主意或负担不起第二房妻子费用的人，可以买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作养子，让他姓他的姓，把他当成儿子来养育，而男孩也把他们当作父母来侍奉，在他一生中，他要按照中国孝道的思想尽各种必要的义务。在买到男孩后，做父亲的大摆宴席，邀请朋友和邻居。在酒宴快散时，穿戴很鲜艳的小孩被带出来，作为主人的小孩介绍给客人。他让小孩鞠躬，所有客人站起来（?），对他鞠躬。客人不是给小孩，就是给这家带来礼物。确实，被邀请参加这类场合，例如结婚、生日等等的客人，都必须根据他们的财力，赠送礼物。

（在下一页的顶部是下列文字，开始有日期：10 月/56 年）

我的一位姓凌的老师，26 岁，与一位年轻姑娘订婚已有 13 年以上。近两年间，他受到女方朋友的极大纠缠，他们害怕他想毁弃婚约。不过，事实上是他还没攒下足够的钱，使他认为有资格娶一个“好女”。凌先生是一个矮小的人，脸很方正，高颧骨，

有一对滑稽可笑的眼睛。本月 8 日，他穿上最好的衣服到我家来，放下一封请我参加他的婚宴的请帖。婚期是 11 日，宴请订在 18 日。9 日傍晚，我买了一把漂亮的扇子和一根手杖，另加 10 元钱，送给他作为结婚礼物。11 日上午大雨如注，没有一点放晴的迹象。10 点钟我坐轿去他的家。我到达时，他在门口迎接我，带我进入他住宅的堂屋。堂屋里的墙壁用图画和卷轴装缀得很华丽，天花板上悬着无数红灯笼，椅子和桌子都装饰过了，尽量做到好看。在厢房里我看到这家的女眷和其他女客。仆人们穿过院子，匆匆准备东西。在堂屋的一侧是吹鼓手，只要有客人进来，他们就吹打起来。看到客人们鞠躬的那副样子，我觉得非常开心：他们走到凌先生面前，他向前迎接他们，每人都握拳拱手到下巴边——然后稍稍转向一边，彼此鞠躬，垂手——在俯身时动作像我们爱尔兰人所谓的“下蹲”，然后前后扭动臀部——就像一只狗在交配时做的动作——他们随后站起来，把握拳的手举到下巴边，然后分开，一切就完事。客人全都围着我，仔细看我的手和衣服。他们很好奇，但有礼貌，所以我允许他们看我，就像看“西洋景”一样。我非常喜欢在那里的那些小男孩，他们全都穿得很整齐——洗得很干净——欢乐异常。最后我听到一个人喊“花轿来哉”——不久花轿就被抬到会客室门口停下来——轿杠被抽出——由彩绘木头镶嵌成的轿门被卸去。于是两个送新娘子来的人坐在花轿旁，轿内则坐着一个穿漂亮的红棕色衣服的奇怪人物；头上蒙着一块长的方盖头，使她的脸不被人看见。她必须坐上一小时左右，因为领她出轿的小姑娘还没来（这小姑娘同她的妈妈一起来，她的妈妈由于有许多子女而被认为是有福之人）。在这一小时内，服务人员忙着点好蜡烛，放进挂在堂屋的大红灯笼里。人们赠送的边上写有良好祝词的大蜡烛，也被点燃放在花轿前的桌子上。在桌上还有一张硬纸板，上写“天地君亲师”几个字。一个小炉子，或更确切点说，一口大锅，里面有一

些燃着的煤，被拿进来放在大桌子前。然后4个坐垫如图所示放好。然后在花轿前放一小块木头，很像马鞍似的架子，上面蒙着一块红布。然后宣布有福气的妇女已经来了，她带着她五六岁的女儿，穿着缝有光片的红衣，显得很好看。这妇女于是走向花轿。这时忽听到外面一阵喧哗，这是新郎的一些朋友拉着他从屋子里出来时发出的，新娘先前到达时，他就已经在那里了。这小姑娘这时把手伸进轿内拉着新娘，新娘在两个送娘子的搀扶下走出来，随后她被带到坐垫2旁边站着。这时新郎站在坐垫3旁边。有福气的妇人于是用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磨光的棍子轻触新娘的头，戴在新娘头上的两块红盖头布被揭去一块。新郎的大伯然后站在坐垫4的位置上，手里拿着两支香，他把香略略画了一圈。这时站在第一号位置的人开始诵读，奏乐；众族长正位；吉祥安静；跪；上香；上香；三上香；兴；复位；鞠躬；拜；兴——（四拜四兴）平身；跪；磕跪；读书文（于是来一小男孩读婚书）；叩首；兴；鞠躬；拜；兴（四拜四兴）；平身；礼毕；迎入洞房。在他说奏乐时，音乐开始；然后在正位时，新郎家的家长走向前，走过坐垫4，站在坐垫前，然后跪下（在“跪下”这词上赫德写“弯腰”）（在那个坐垫前的另一个较小的坐垫上）举香3次；在复位时，他回到原来的位置；在鞠躬时，他弯腰，头低得和屁股一般高；在平身时，他站直——“立正”；在跪时俯身，而在磕跪时完全趴下。读书文时，一个小男孩被带上前，跪在坐垫6上念婚书；在叩首时他们弯腰，等等；在迎入洞房时，一个送新娘子来的人抓住新郎衣服的下摆，让新娘捏住。然后新郎走过院子，新娘则由送娘子扶着跟在后面：他们走上楼来到放有新人床的房间；中国床都有里面和外面之分，但在里面有较大的架子。床头和床脚处有两



个地方可放进箱子；房内有椅子，新郎和新娘都坐下——女的坐在床脚——叫做跪高堂——在他们之间站着两个送新娘子来的人，他们把一根线的两端递给新郎和新娘，然后倒两杯酒，新郎和新娘共享。这时两个杯子都放在嘴边，再同样送上两杯茶。在新娘坐下时，有福的妇人靠近新娘，她揭去还戴在新娘头上的那块红布，这时才第一次看到新娘的脸。当他们在屋里完成这些仪式后，我要求看看新娘，新郎立即闩门。

她然后脱下部分衣服，我们就下楼。新娘留下和她的一些妇女在一起，换衣服，装饰头部。在我们下楼后，许多客人进来，每个人都以一种叫做打千的方式鞠躬；一些年轻妇女也进来，她们鞠躬的方式是将手握紧到头一侧，她的头则靠近她祝贺的人——即姑娘的右侧对着这男人的右侧——然后迅速地上下移动两三次（叫打躬）。

新娘穿着称为睡衣的衣服被领到家里来。上楼时，她换穿别的衣服，并且装饰头部，然后再次拜祖先——这次是在一张桌子前完全拜倒。桌子上摆有供祖先的祭品——然后拜这家的每一个人。这之后她在桌子脚边坐下，她的女客就围着这桌子饮宴。一天中余下的时间就在这祝贺和欢宴中度过。这时这一对新人被送进他们的屋子。

第三天我再次去拜访，这时新娘已是不同的装束，仍留在房内，不对任何人说话。我细看了她的手和脚，和凌先生说了几句笑话就回来了。同一天晚上我拜访了易奇先生——他的儿子是一个 15 岁的少年，已同一个 18 岁的年轻姑娘结婚。小家伙被带到面前来时满面通红，而年轻姑娘，在我们告诉她我们祝他们好运气和多子女时，似乎很想笑[93]。

第五章

从宁波到广州

1855～1858：赫德与时代俱进

赫德日记第二卷的末条为1855年7月29日的记事，其中附有若干散页如后：一些未写完的致友人的信件，以宗教为题材的经文数篇，在宁波时期的一些生活片断（显然是应约翰·包令爵士早先对他提出的建议而写的），还有一篇颇有启发性的短小故事（全部包括在第四章内）。现有的第三卷起始于1858年3月

1906年12月20日，赫德在北京就有关使用他的日记一事所做出的最后决定写信给马士说："关于我的日记，本来打算在我归天之日把它付之一炬，然而在1900年的兵燹中虽然其余一切皆荡然无存，此物居然得以幸免，真是不可思议。但此次幸免于难，并未使此物获得任何不同寻常的价值，而我还深恐其不仅难于理解，反使涉猎者徒耗精力，得不偿失。我估计目前我已写到第70卷。要把它从头到底重读一遍，并把其中不能用的部分剔除出去，可能需要花费五六年时间，而且我的生活必须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无稍许的变化②。"

总而言之，人们不禁会说，写日记成癖的赫德在宁波的几年中是确有日记的。可是这个时期正好是他和中国女子阿姚开始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不是1858年年末就是1859年年初出生的③。这样，赫德在为把他的日记公诸于众作准备的时候，就完全可能觉得几十年前的这段佳话，还是不提为妙。在这样的处理过程中，他就不得不把那些多事年代中外交和商业史上的许多日常事件一并销毁。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

个人的成长

鹭宾·赫德通过他的日记对他自己做了如此详尽的说明，我们这些人当然也总会永远铭记着他以后作为清廷客卿所取得的成就。在致力于追溯他的个性形成过程的时候，对此必然会心存感激。日记中从1855年7月29日～1858年3月20日的一段脱漏——几乎长达两年又9个月的一段空白只能使我们感到遗憾。但这一现象本身也对我们说明了某些问题。我们在本卷中将严肃认真地致力于追寻各种事实。但是读者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人在经常地祈求上帝帮助他过一种无邪的生活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他何

等频繁地表示过，只要有一位年轻而富有生气的宁波传教士的妻子在他身旁，他就会感到愉快，哪怕只耽一刻儿也好。这就使人不难窥见并理解他那进退维谷的心境了。鹭宾·赫德的整个青春年代主要是由良心、意志和责任感三者支配的。他和他的朋友斯旺顿为伍，走上了叛逆和邪恶的道路。这条道路显然把他引导到了不贞洁的女人身边，其后并使他得了某种（惩罚性的）疾病。这是他以19岁的年龄犯下的一种坠落行为。就在这个当口，他来到了中国；这正好是他心灵上深感寂寞无聊，而女人问题随时随地都在伺机冒出来和他纠缠不休的时期。他在日记中给我们描述生活给他带来的各种烦闷、诱惑、道德上的斗争和苦恼的时候，他正克尽厥责地埋头学习语言。他和传教士们保持着时断时续的接触，所谈无不是一些宗教问题。可是他每星期必有的教堂之行却是兴高彩烈的，这与其说是为了去听传教士那索然无味的讲道，毋宁说是为了去体会和一些年轻妇女们接触一刻之温馨。他已经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个可爱的人儿。说实在的，要不是他的神经紧张到使他说不出话来，也喘不过气来的话，他差点儿就要脱口而出，向一位叫戴尔的姑娘求婚了。而这位姑娘他几乎还不认识。最后他总算找来一只小狗逗着玩，对他来说，这当然要比一位年轻女子差远了，既单调，又乏味，只好说聊胜于无吧。

这位20岁的年轻人在英国驻宁波的领事馆内，孤独地工作着，他渴求着异性伴侣的情爱，欲火中烧，与日俱增而不可遏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会想到（这是历史学者的特权）赫德在其后几十年中，在身任海关总税务司时的生活是什么样。他在1886年以后（这时和他结婚20年的夫人已经返回伦敦居住）的许多信件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位整日劳形案牍的官吏——尽管他时而也喜欢和一些妙龄女郎应酬交际，并且非常专注于向几位他所爱慕的年轻妇女馈赠礼品，但他还是一个具有自觉意志的

人，工作中从不走神。50岁以后，他的性生活似乎是既非沉湎，亦未废弛；可以想见，他在十多年前，甚或更早，已成强弩之末。

权倾一世的一位总税务司对人间男女之情却处之澹然，这样一个形象和1855年在宁波与良心搏斗的那个年轻人相比如何对得上号？把1855年的鹭宾·赫德和3年之后在广州的同一个人摆到一起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比较？

还好，在这些问题上，赫德自己给我们提供了证据；那就是他在1875年4月5日致金登干信中所提到的3个受监护人；换言之，就是他和中国情妇阿姚所生的3个子女。他写道，“安娜现在16岁，赫伯特刚满13岁而阿瑟则将近10岁”。因此，这3个孩子应该分别是在1858或1859、1862和1865年出生的（3个孩子在1866年全被送到英国，由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账房戴维森先生和他的夫人抚养）。很久以后，赫德又记载过他和他的中国情妇是在1857年相识的。但是他似乎把1855年以后的日记全部都销毁了。我们可以推测，他这是为了要把那种不能公开的生活方式从日记中删除掉。他在1855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明天我去帕特里奇船长家暂住，以度过热季。据此，我们几乎可以准确地推算出他生活上发生这一转变的时间。

丹·帕特里奇是怡和洋行在宁波的代理人，因此，尽管他的商货几乎全部是进口的鸦片烟，他还是当地显赫一时的主要商人。他的商品实际上是通过甬江外的陆港鸦片接收站运进的。尽管他可能还年仅30出头，但却已是个无其形而有其实的商人。他与怡和在香港经营的庞大贸易网络有着很多的联系。怡和在中国各港口都派驻有代理人，为其接应外来的洋船，并经营船只如“厄林”号，把旅客、金钱和邮件等运交给英国派驻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和传教士。赫德住进帕特里奇船长家中，他的生活就很惬意了。那房子无疑是处于一种和风拂面舒适宜人的境况。宅内

婢仆成群，这些人都懂得外国人的喜好，善于逢迎，令人心满意足。

历史上女性渴望已久却姗姗来迟的妇女解放运动，本来应该把她们带上许多从来都是男性独占的历史舞台。这些历史舞台上之所以只见男人不见女人，是因为历史从来都是由男性执笔写成的。多少个世纪以来，西方人常常提到中国的人力丰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不要忘了，其中也有女性的半片天。赫德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后，最先收集到的消息中就有这么一条，那就是花40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中国女人；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婚姻一般都是由别人安排的，并且要为新嫁娘付一笔钱。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女人是可以用钱买的，而且货源丰富，要多少就有多少。赫德有个同事，名叫郇和，刚到中国不久就买到了一个“中国情人”。这显然不仅仅是偶然的一例。译员密妥士也有一个中国情妇，他倒是矢志不移地把她当作夫人来对待的。总而言之，西方人在中国所过的高等生活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享有中国女人。这种女人实际上是一种会走路的商品，任何外国商人照例可以通过他的买办买来。教会人士们不经手商品，也没有买办，所以很快就学会了把他们的夫人带到中国来。

只要在脑海里装入了上述那种图景，你就不难想象，帕特里奇作为小赫德的朋友，是有办法解决这位小朋友寂寞伶仃的苦闷问题的。而且他的办法要比麦嘉缔医生和其他传教士所能安排的更为切实可行。我们不妨设想，帕特里奇十之八九有一个中国情妇，不是在他家里就是在什么地方的金屋内住着。而她呢，随时都可以把她自己的姊妹、表姐妹或是其他亲朋故旧家的年轻姑娘们买来。

鹭宾·赫德给自己解决孤寂问题的办法一点也没有什么新鲜之处，还是按那早已确立的老规范办事。阿姚这个女孩可不是个单枪匹马瞎闯的人，她是个良家妇女，不过出身比较低微，是经

一个买办或其他什么可靠人士找来的。赫德养着她，必然还要定期地支出一定的费用。其中一部分是给她的家庭作为补偿费的。

这里我们所最关心的倒不是小两口为何恩爱缱绻，而是这一结合给那小伙子的成熟带来些什么影响。不论他和他那美以美派良心作斗争的酸甜苦辣为何，事实俱在的是，从此以后，上帝在他的日记中是稀客了。自己做个传教士的想法一去而不复还；祈祷和求神助的姿态也降低了。女人的爱似乎是把他永远勾留在这个世界上的锚碇。他也无须考虑来生会遭到什么报应。

我们还可以推断，使他永远地留在中国的不是别的，正是他和阿姚的一番经历；他一生成熟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发生在中国。毫无疑义，他仍然是个外国人，在中国执行着外国的任务，但他却是越来越向往中国。他在日记中再也没幻想要回到贝尔法斯特去（只有很久以后的择偶之行是个例外，这种事情按惯例是要在祖国办理的）。他在文化生活上也仍然是个移居异国的人，经常阅读来自伦敦和爱丁堡的各种期刊。但是他的情感生活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他在中国住着，毫无他乡之感。

3年以后出现在日记的其余部分中的那个鹭宾·赫德则完全是另一种形象——充满自信，旨趣分明，和与其往来的中国人士打交道时应付裕如。他在宁波的经历使他变成了一个称职的助理翻译；并且这个年仅23岁的青年，在立身处世方面也已经锻炼得颇为成熟。确实，只要综观一下他和海斯特·简·布莱顿的20年（1866～1886）夫妻生活，以及赫德夫人回伦敦安享清福后他在北京度过的20年独身生活，便不难臆断，他和阿姚同居的岁月（大约是1857～1865年）是他一生中享受艳福的高潮时期，使他称心满意，她使他感到无以复加了。在这以后，他对异性伴侣的需要就开始减退。从此他一往直前，专心致志地更热衷于管理大清帝国的海关事务；其原因何在，却无法说明。在宁波的时代，他的文化生活是自给自足的，尽管当时他还没有一把小提琴

供他作业余消遣。等到他有了阿姚生的3个孩子和海斯特·简生的3个孩子以后，他却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样子，以致在1877年竟得了神经衰弱症。从神经衰弱症中恢复过来以后，他显然觉得异性伴侣是可有可无的了。

公职生涯

鹭宾·赫德之所以能以23岁的英年便臻于成熟，也得力于他在宁波任公职时期的经历。宁波是个国际贸易中的小港口，可是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各地所遭遇过的各种商业上和外交上的问题在这里却一应俱全。首先，赫德虽然官职不高，却成了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内的老资格人物。我们知道，他在1854年10月来到宁波的时候，正值副领事帕特里克·黑格休假回国，当时，自1850年以来一直担任馆里翻译的密妥士正代理总翻译职务。在贝姆文多事件（当时有一个葡萄牙人侮辱了一个领事馆的中国仆人，密妥士下令把他笞杖，作为报复）发生后，密妥士先是被停职并调往香港（见赫德日记1855年3月15日所记），然后又降级为翻译，等候新任代理馆务副领事查尔斯·文极司脱的到来（日记，3月22日）。后者于1855年4月1日接任视事，但在宁波任所仅呆了1年左右，其任务是去应付密妥士降职后出现的各种危机。1856年，他在外交部花名册中被列为何礼国手下的驻广州副领事。

当时的密妥士已经不再恋栈政府官职，并转而考虑营商谋生了（这是他最终选定的道路）。同时对上级的不问情由便予以革职也愤愤不平，一气之下便递交了辞呈。虽然辞呈是由克拉伦敦勋爵作为抚慰澳门政府的一种姿态，及时予以接受了，但密妥士作为一个翻译实在是离他不得，因此又让他在宁波“暂留”了1

年。大约在1856年夏秋之交，他离开了政府官职，并定居天津；后来他在那里成了商界的显要人物。他的兄长密迪乐本来在上海任翻译，于1857年1月到宁波接密妥士的后任，此人后来长期在外交界任职。星察里（他曾于1855年4月1日陪同文极司脱一家由上海出行）并填补了文极司脱于1856年4月离任后到密迪乐接任前之间的空缺。

赫德本人在宁波时曾于升迁广州前得到过几次提升。我们已经看到，1855年2月6日～21日，即密妥士上海之行期间，他曾负责过宁波领事馆的馆务。据某方面称，“英国驻宁波领事停职期间……年轻的赫德（曾）奉命负责馆务达几个月”。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赫德的日记中写着，3月15日的公文停了密妥士的职，3月22日的公文任命文极司脱为副领事代理馆务，密妥士为翻译，其中均未提到赫德；而文极司脱不到10天就到任了。如果当时赫德确曾得到过提升——他又是这样一个颇有竞争力的小青年——他会得意非凡地把这件事写在日记里的。当时他确实是迫切地希望得到升迁。一个月后，文极司脱向包令发了一封公函，表扬了赫德的“工作和能力”，赫德竟把它一字不差地抄入了自己的日记，后面还加上了些有气无力的按语，意思是他对文极司脱非常感激，但又担心这封信起不了多大作用。

官场经验丰富的文极司脱为抚慰赫德，就给他许了个愿，说打算再给约翰爵士写一封便函，着重指出赫德是个“可造之材”。果不其然，1855年4月，外交官花名册中记上了赫德被提升到助理翻译的官阶。在赫德中断写日记之前，他显然并不知道这一任命，那是因为当时邮政班期不准时的关系。在他于7月1日搬到帕特里奇船长家去之前，他已谈到如果密妥士果真兑现他打算走掉的威胁之言的话，他就要搬进密妥士的房子——显然不在领事馆内——去住。当文极司脱到任时，密妥士已经搬出了领事馆大院（他的中国妻子在那里是不受欢迎的），搬到他的新游艇上

去住了。并且扬言要去租下“赫德森洋行”。赫德写道“如果他搬走，我就搬进那所房子去，”“一旦我住进这房子，我就要拍拍翅膀喔喔叫……”他到底住进那房子没有，我们当然说不上。但是他的日记中的这一段空白却暗示着，他至少是搬出过领事馆，去过过比较自在的生活的。

即使是在宁波这样的小地方，也还是能感觉到“天下”不靖的震撼。自1853年9月7日起，属三合会支派的小刀会部众占领了上海县城。赫德于1854年10月初取道上海前往宁波，他记述了一些有关的情况。清军从西面和南面包围了起义军；外国人在公共租界内号称执行中立政策，实际上是对起义军有所偏袒；他们和起义军进行武器和粮食买卖，获利甚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起义军或清军——都有可能向外国人发动进攻，而事实就是这样。到1854年末，清军与洋人间不时发生的事端日趋激烈，结果英美驻在港内的军舰进行了炮击。清军被迫后撤，从此不再严重骚扰租界的安全。但是法国人在法租界内设有天主教堂和领事馆，他们向另一方，即叛军方面采取了单独行动，以保护他们弹痕累累的领事馆。一支法国海军部队与清军采取联合行动，夷平起义军的一个炮兵阵地，而军舰则炮轰了县城。虽然这次进攻是以失败告终了，但是连续不断的炮轰也使县城无法防守。最后，起义军于旧历大年初一，即1855年2月27日撤出了县城——我们还记得，当时密妥士正在上海，而宁波领事馆则由赫德暂代馆务。

赫德在他2月23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密妥士回到宁波一事，以及上海县城内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房屋倒塌，许多地方被焚毁等等惨状。几天后，他报告说，宁波也出现了起义军，但认为人数极少，不足以构成骚乱。但到3月份，他的调门变了。3月12日他写道，最近以来，他一直在担心由于从上海来了一批人，可能会产生骚乱——这不仅是指起义军，还有许多

来自欧洲的冒险家。他们惟利是图，看风使舵，两面讨好。宁波道台确实来找过密妥士，问他这些外国人来到宁波时他应该怎么办。密妥士告诉他要注意，切勿使“他的政府”（中国政府）和英美发生纠葛。但是紧接着，赫德的日记中就出现了一个事端：密妥士和赫德发现有两个冒险者被人用铁链锁在道台衙门的木笼内。

三合会在上海的地方性暴动当然仅是后来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军起义的一个不祥之兆。太平军于1851年在广西立国称朝，1853年北征至长江一带，建都南京。在19世纪50年代的整整10年中，中国各地的外国人社会始终是在和一个受内战分割的国家打交道。

1855年5月，宁波有被太平军攻下的可能。21日，赫德听说太平军已占领玉山县；该县位于江西省与浙江省交界处，距宁波1,000余里，即300～400英里之间，他称之为富丽之战。这一告急非同小可，中国官员闻讯之下，立即于28日把4万人从宁波调往杭州，以便在该城出现起义军时进行协防。杭州位于宁波以西约100英里，地处杭州湾口。实际上他们此举是为时过早了，杭州是到5年以后，即1860年3月才陷落于起义军之手的；当时太平军已在杭州西北100英里（疑误，南京距杭州实际约为160英里——译注）的南京受到包围，粮草已尽。

与此同时，宁波方面面临着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葡萄牙三桅帆船船夫和广东海盗间互相争斗的问题。海盗的出没滋扰，特别是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等各省沿海一带（即从广州到上海），对各国的外洋运输事业是一大威胁；因此有一种护航系统便应运而生。它最早是隶属于英国海军的，其后又转而依靠欧洲各国商船的声誉和炮火威力。护航需要收费，他们和海盗每打一仗就索要一笔费用。但是逐渐逐渐地这种系统就转了手，走了样——举例说，他们把良民的船只宣布为海盗船，横加勒索，并把这些船

上的货物说成是合法的掳获物，予以瓜分。总之是弊端百出，以致早在1848年，英国政府便把参加护航的危险性正式警告其臣民。于是此种业务便落入葡萄牙人之手。在宁波，甚至在葡萄牙政府还没有设领事之前，葡萄牙人就已经把当地的中国海上商业活动的保护任务承担起来了。他们在那里滥发各种证件；征办的费用每年高达50万元，真叫荒谬绝伦。这是伦敦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库克说的，他认为此数目骇人听闻，但却是确凿无疑的[5]。

事件接踵而来。宁波渐渐地聚集起一个外国人的小社会，其中良莠杂处，国籍不同——有亡命之徒，有走私贩子，也有敲诈勒索者；有些来自葡萄牙，有些来自果阿或马尼拉。但是在中国人眼中，他们和英美人一样，都是西洋人，都是一丘之貉。澳门的葡萄牙政府由于英国人啧有烦言，于1851年诱使英国驻宁波领事帕特里克·海格同意，临时兼任了葡萄牙领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到1852年4月真正的葡萄牙领事J. F马奎斯到任后方告结束。至于马奎斯其人，我们也已见到。

与此同时，各路海盗在臭名昭著的浦氏兄弟（阿爸和阿郎泰）羽翼下，已经和清廷当局另行交易。他们俩是在1851年带着1,000人的船队来到宁波海域的。长话短说，他们已经编入大清帝国的海军，宁波港实际上已由阿爸及其党羽掌握。他们在海上劫掠得来的东西照例要带到宁波，在岸上进行处理。1855年8月，文极司脱曾备文上报，阐述了下列情况：他（阿爸）有八九只武装船停泊在慈溪支汊内。他和徒众们在宁波城内盐门附近占有一个大商行，经常有几十个人在那里厮混。他就在这里指挥他的徒党进行各种活动，给他在外面的同伙派出补充船只，接收所得的赃物，等等[6]。

中国人对付这种局面的老办法就是以贼制贼；也就是由官方支持海盗执行护航和保镖业务，和葡萄牙人进行竞争。其结果不难预料，那就是相互间的对抗。这对商旅来说则意味着一片混

乱。赫德日记中断以前，这种局面已经相当紧张。举例说，他在1855年2月23日所记中曾写过，有个英国商人戴维森曾提出要求，如果在夜间有任何船只靠近他的克麦巴特号商船，就要允许他开火，因为“广东人”企图劫持该船。赫德还写道，“据我所知，这些人被道台从他们的船只上赶了下来，因此他们想要抓一条武装的三桅帆船来进行海盗活动。”后来义军从上海败退下来，死守在宁波近郊，凡有需索，无所不用其极；就又增加了一重混乱。赫德记有“昨日发生了一次骚动，与福建人有关。今天海盗们亮出了三合会的旗徽，等等。”

局势每况愈下。曾发生过一次对抗。那是在1854年7月。赫德还未到宁波的时候。先是在4月份有一个葡萄牙人被暗杀，另有两个广东人也被杀。这两件人命案差不多同时发生。马奎斯便把东耀1号海防舰从澳门调来。该舰于7月10日到达宁波，并在和阿爸船队的纷争中炮轰了宁波城。马奎斯要求中国人对葡萄牙人之死作出赔偿，同时提出往后不得为难葡萄牙的三桅帆船夫，并指定要阿爸和阿郎泰画押具结。10天之后宝哈坦号（美国兵舰）由上海到达宁波，运来士兵75人，上岸支援道台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这就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就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已对葡萄牙人越来越反感的密妥士便借题发挥，于圣诞节在英国领事馆下令笞杖贝姆文多。其后密妥士受到降职处分，这可以理解为受窘的英国政府在葡萄牙政府的抱怨下做出一种姿态。

尽管在1856年的冬天有关动乱的各种谣言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但是事情却直到赫德的日记中断了两个寒暑之后才发展到最高潮。赫德的内侄女裴丽珠在她所著的《赫德爵士》一书中道出了个中原委。这无疑是若干年后听她舅父说的，当然其中也免不了有某些记忆上的讹误以及这种作品所常有的细节上的润饰。她说，某个冬夜，由于当时广东人扬言要对葡萄牙人进行报复，并且因此会在郊区发生恐怖事件；为了筹划对策，整个外国人社会

在一起进行了聚餐。据她说，赫德认为“作长夜之饮的人无法应付仓促事变”，因此他没有应邀赴宴。由于心惊胆战的婢仆们都已逃之夭夭，于是他就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睡起觉来。他在枕头底下放了一支左轮手枪；并把床边的窗户敞开着，准备必要时就跳窗逃走，并且打算步行逃往上海。但是到头来不过是虚惊一场。

经过3年的抗衡之后，直到1857年6月，广东人才把各路武装集中起来，沿海岸追击被击败的葡萄牙三桅帆船，直入宁波的内河。到此，战斗仍在水上和岸边继续进行。有的三桅帆船人员登陆得逞则狼奔豕突，寻求藏身之所。部分人到英国领事馆门前吵嚷呼救，而密迪乐和赫德则不敢纵容他们，惟恐反葡的骚动一变而为排外的浪潮。据裴丽珠后来说，最后这些人全被追逼到他们在田间中国老式坟场内的避难之所。他们在那里负隅顽抗。他们或在那里被格杀，或被俘，然后被送到原来属于他们自己的一条三桅帆船上，船被拖到沿江上游一点的地方，之后，广东人架起一把火，把他们烤成人干。最后广东人猛攻葡萄牙领事馆。当法国战舰“卡布里休斯号”徐徐溯江上驶时，他们正爬上屋顶，降下葡萄牙国旗。这艘快速舰是从上海派去的，专程送法国领事来宁波调查早先被葡萄牙人扣留的一条法国船舶的事件。该舰来得适时，使葡萄牙领事馆得以免遭一场洗劫，并把葡萄牙船只上的幸存人员带到澳门去交付审讯。

《泰晤士报》记者库克在8月份就这次事件写了一篇语气比裴丽珠更为平和的报道。他强调广东人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克制的。具体表现，就是有3艘确实是经商的葡萄牙三桅帆船悬旗停在江内，丝毫未受触动。没有一个欧洲人，甚至包括葡萄牙人在内受到过狂怒的屠夫们[8]的侮辱。他接着说，“卡布里休斯号”离去之后，葡萄牙双桅船“蒙德哥号”带着约12艘三桅帆船溯江上驶，去向道台正式要求归还被俘的三桅帆船，以及其他归附

事宜。得到的答复还是那老一套，就是要求两个护航船队自行解决争端。于是葡萄牙和广东人都摩拳擦掌，准备继续战斗。但是与此同时，另一艘船却适时而至——那就是英国水师总兵杜乐得克率领的“尼姆乐德号”舰。他给葡萄牙指挥官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如果三桅帆船将发动进攻，他就会把他的船转移到火线以外；但是如果“尼姆乐德号”或是沿江任何英国居民的房子中了弹，那么“他的责任就是要干涉”。蒙德哥号及其僚舰便立即启锚开往上海。库克 8 月 24 日在报道的结束部分写道，广东船队的船只有的仍在从事护航，有的停泊在江中。使商人们和传教士们都深感庆幸的是“尼姆乐德号”也在那里。

这就是赫德在宁波任职期间当地的气氛——实战只有一次，但挑衅事件却始终不断。护航买卖，海盗的掠夺，正经商人也有许多疑似违法的交易，以及宁波与上海之间从内地接运商货的船只来来往往，不绝于途——等到赫德成为惟一的英国低级官员的时候，他对所有这一切就更熟悉了。他可以先后为四任领事介绍当时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满怀自信和机巧精灵中成长起来的。他变得越发善于和中国官员们打交道（并且越发善于用中国话和他们打交道），越发洞悉对外贸易中成败的种种关键。

对这位未来的总税务司来说，这是有幸得到的训练场所。

上海海关的外籍税务监督制度

与此同时，上海发生了许多演变，这些对赫德的终生事业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1855 年 6 月 1 日他的日记中断前夕，他写道，“李泰国接替威妥玛被任命为税务监督，此事意义重大，尚需进一步阐述其背景。

上海在根据 1842 年的第一次五口通商条约开埠的时候，地

位并不重要。但从那时起，它在人口和贸易上的重要性都在持续增长。下面一些数字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在条约签订的那一年，即1842年，全中国还只有大约259个西方商人（成年男性平民）；到1850年，在贸易的刺激下，外国人口总数增至994人，其中香港占404人，广州362人，上海141人。1855年，即赫德到中国一年之后，上海的外国人口数追了上来，而另外两个较大城市则相对减少；香港为377人，广州334人，而上海则为243人（其中包括基督教传教士30人）。上海开埠后的第一年中，有44条（8,584吨）外国船进入该港；到185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37条（157,191吨），其中249条为英国船，96条为美国船[9]。包括进口和出口两方面的税权数字，在1855年达2,270,884元（此数可能不能反映贸易量，因为数字报告中存在混乱情况，这在后面将会明白）。到1860年为止，还只有3个国家在上海驻有领事——英国（领事馆于1843年11月成立）、美国（最早由旗昌洋行的吴利国和其他人代表，直到1854年正式领事到任为止）和法国（领事于1847年1月方露面）。其他各强国都由“商人领事”代表。

如前所述，1853年9月～1855年2月，上海始终掌握在起义军手中。当赫德取道该地前往宁波并在那儿的英领事馆住了两周时，情况依然如此。由于城池易手，海关的业务中断了。1685年创建于上海的中国海关，现在设在位于一排外国商行间的一座红白两色粉墙的庙宇中。由于上海港的贸易额急骤增长——这是1843年上海根据五口通商条约开埠以前所未曾有过的——海关的重要性也日渐提高。掌管海关的官员是苏松大道的道台；该道辖区内人口数百万。征收上海的关税仅是道台诸多职责之一。由于海关人手不足，再加上中国官员向有榨取的惯例——多数外国商人对此都心照默认——道台显然无法对海关进行强有力的管理。因此，早在19世纪40年代便制订了早期的海关办事细则，

并由领事监督，以保证各国商人在缴纳条约规定的关税方面受到平等待遇——这是在广州的各国外商在五口通商条约缔结以前最迫切的要求之一。把关税待遇平等作为自由贸易的基础而努力保证其实现，这是英国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关心这个问题的只有领事，中国海关的税务人员和洋商却对诈取税收的现象互有谅解，心照不宣。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由外国人来防止中国关税被偷漏的怪现象，英国商人称之为领事干预。英国领事们都知道，逃税的现象久而久之将损及英国的贸易；但是中国官员的颟顸和外国人的默契却一拍即合。据说到 1850 年，逃税数字已经非常庞大，以致海关报给领事馆的出口贸易统计表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在宁波，中小额贸易中估计有一半是走私货；在澳门，只要把商人的收据和海关给领事馆的统计表对照一下，就可以说明，有几千两银子装入了官员们的口袋[10]。

除此以外，英国方面还要担心美国人出面竞争。1849 年航海法案废止以后，英国的茶叶买卖终于向美国的大型快速帆船敞开了大门。这种帆船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最大的海船。1850 年，“东方号”快速大帆船满载茶叶，以 81 天的创记录航速，从中国驶到了纽约。当时英国的第一艘快速大帆船还未制造。由于上海的进出口货物已经有几近一半由美国人运输，英国商界展望前途，感到不寒而栗。肯定地说，英国商人由于领事为防止走私进行干预的威胁而处于不利地位。其他许多事件，例如玛丽·伍德夫人号事件（该船船主曾因走私在领事法庭上受审），突出表明了商人们的认识是，领事的任务应该是被动的，只要在别人有所行动时作出反应就行了。这样，那本来就从未全面生效而逐步解体的条约体制，到 1851 年就面临彻底垮台的局面了。

在未来的改造海关工作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阿礼国于 1846 年到上海出任英国领事。他年方 37 岁，此前曾在澳门和福州短期任职。因此，从 1846 年起到上海被义军占领为止，他的工作

就必然是终日埋首于处理扩展中的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各方面问题。他是个满腔热情而意志坚强的人。他曾写过许多旗帜鲜明的信函，主张使用武力，不惜一切地保卫英国商业的合法性，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在中国的首要之务”。这些信函都由贸易监督文翰转递给外交部的巴麦尊。他曾处理过玛丽·伍德夫人号和约翰·达格代尔号等事件。他是商业帝国主义的全心全意的倡导者；但他身在异国，与在白厅的英国政策制订者们彼此遥隔，邮程长达两个月。在19世纪50年代，各种事件发展的步伐是很难让当事人慢条斯理地等到祖国的训令到达后才做出决定的。

1853年9月7日是孔圣诞辰，也是暴动之日。当时的上海道台吴健彰（从前是个广州商人，人们称他为爽官）从衙门逃出，藏匿起来，幸免于难。不仅是他的金银财宝被洗劫瓜分，而且到了天明前后，暴民们甚至破门窜入中国海关，翻箱倒箧，把那里面的东西席卷一空。当时上海港内有10条英国船，11条美国船和5～6条其他国家的船只，都已作好起航的准备。于是问题就来了。这些船只是否应该等待正式放行？由谁来下达命令？它们应该交税后再走呢，还是不交税就走？税又该交给谁？

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中，阿礼国完全能够做出适当的处理。他直截了当地用情理来对付这一危机。他给在香港的文翰发出一封公函，其中概括了英国人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我对这些船只应交的税款不予核实，并取得以后补交的保证便任其离去，那么我就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英国的利益；这是不符合条约明文规定的。反之，如果我把船只扣留下来，等待海关重建起来并发给出港证后再放行，那么我就是为了维护一个已经不能履行条约义务而且可能不久就会覆亡的政府的利益而全面牺牲英国的财产和贸易，这是一种冒险行为，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11]”。

阿礼国一心想要保持有合法协定基础的贸易，于是就开创了

一种暂行制度。其中规定，允许各国商船在不具备条约所规定的海关放行证的情况下离港，但必须先向该国的领事开具本票。他和美国全权委员（即公使）马沙利于9月9日按照这一精神向各国的全体商人发出了通知。但是英国的通知比美国的多一句话。据阿礼国事后声称，这一句是在商人们坚决要求下添入的，当时他正在病中。该句为："一旦收到英国政府同意付款的通知，"该本票即须兑现（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狡诈的保证书；赫德日记中1855年2月23日的记事中写道：约翰·包令爵士把保证书交还给上海的英国商人时显得很勉强。）。

阿礼国请示他的上级，即驻在香港的文翰，请求批准这一暂行制度；而文翰又转而向英国外交部请示。四个半月以后外交部才向上海发出回信。1853年的英国外交部所专注的不是关于中国的事情，而是有关克里米亚的决策，因此，克拉伦敦这位外交大臣就接受了贸易委员会根据上海英国商会内一些商人们的各种怨言制订而成的建议书。这是一种最容易而又最省时间的办法。他甚至一字不动地把该部的建议抄入了他给文翰的信件：如果中国人在上海重建政府，则不论其为叛逆政府还是清室正统，阿礼国手中以本票形式掌握的税款都应移交给该政府；否则就应交还给原纳税商人。不过到这时，上海的情况已无可避免地变样了。

吴健彰在躲避了一个月之后，决定提出恢复海关监督名义的问题。他认为这并无风险，而且还是权宜之计。拿定主意，他便于10月10日把这一意图通知了美英国的领事。但是阿礼国却把他从公共租界内驱逐出去，理由是他私通叛匪，昭昭在人耳目，这将危及外国人的中立地位。此外，众所周知，他一贯利用与各外国公司的关系，建立自己的垄断事业，并且经常蔑视各种条约的规定。总而言之，阿礼国拒不承认道台的职权，而坚决要继续执行其暂行制度。在这个问题上，他和美国领事分道扬镳了。后者认为恢复收税才是信守条约的一种表示。他表示即便不承认吴

是道台，也承认其为海关监督。马沙利果真在10月24日向美国商人宣布，“暂行制度”将自10月28日起停止执行；他此举的意图是恢复中国的征收关税。

与此相呼应，吴宣布，在上海恢复旧关并能正常执行海关征税业务之前，要在浦东岬的黄浦江中派驻一两艘船，以执行海关业务；并要求在此以前继续执行暂行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外国人在这一段黄浦江区域的自卫问题，浮动海关无法执行业务，不久便销声匿迹了。除英美两国以外的各外国商船都分文税金也不缴纳就离港；有一段时间美国商船还开具本票。阿礼国还在等待文翰的回音，文翰则等着伦敦的答复。与此同时，马沙利赴广州，他的副手金能亨又因事去福州，领事馆仅留下一个助理代理馆务，而这个助理还是兼任，他本来是美商旗昌洋行的助理。

在这种情况下，其后果不难预料，就是陷入混乱状态。从1853年9月9日～1854年2月9日期间，有84艘船驶离上海港，其中没有一艘船用硬币付过税款。有9艘船根本没有承诺要纳税；其余的船中除1条外，都向各自的领事交付了本票，但有无价值，殊难把握。1854年1月，马沙利迳自宣布上海从1月20日起为自由港，然后乘船归国。可是到了2月9日，由吴道台创建、从未起过作用的浮动海关却死灰复燃，向与中国缔约的三大强国的领事（阿礼国、金能亨和伊担）发出了一个通知，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这一海关的存在。不难预料，接着就出现了一段混乱时期。有些船只不纳税而进出；有些把货卸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再从那里免税驳运；有些则和吴道台做私下交易。阿礼国从来也不是一个眼看着英国的海运业务处于不利地位却撒手不管的人。于是他提出要求，英国人也必须享受其他各国船只所享受的同样放行条件。实际上，到1854年4月份，上海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自由港。

如果说阿礼国是英国贸易事业的一个热情的支持者的话，那么他同时还是一个谋略家和一个政治家。海关行政业务的崩溃，实际上也埋葬了条约所规定的制度，这不是一种可以无限期忍受下去的状态。很幸运的，此时，他跻身于一伙既具有政治家眼光，又能互相合作的人当中。3 月 4 日，第一位真正的美国驻上海领事马辉到职视事（马沙利是个全权委员，并非专门指派在上海的）。一星期后，美国新任驻中国专员麦莲到达香港，并于 4 月 13 日与新任英国公使约翰·包令爵士会合。他们一致同意阿礼国的看法，认为除非在往后几个月内（茶季的开始）能建立起某种常规，否则上海的贸易就会转向别处。

阿礼国在 5 月 1 日致新返任所的包令（自 1849 年后即任驻广州领事，后休假回国）的备忘录中，初次表达了关于海关设置外籍税务监督的设想，他写道：如果征收关税的业务能以任何方式置于三大缔约国的有效管制之下，例如以海关行政机构的执行人身份进行管制，则我不放弃获得成功的一切希望。麦莲和吉尔杭阿以及吴健彰曾有多次会谈。5 月，他作了宁波和福州之行，然后溯长江西上，最后于 6 月与南京总督怡良（应为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译注）会见；怡良是个阅历丰富而诚实可信的官员。这次会见为签订一项有关设置可执行职权的协议开辟了道路。麦莲在离开以前和包令进行了会商并阅读了阿礼国于 4 月 15 日发来的一封长信，其中建议由一个诚实可靠的外籍税务司[12]为首来实际管理海关机构。

至此，上述各种事件方在赫德的日记中反映出来，因为在 1854 年 4 月，上海领事馆的新翻译是李泰国。上述 1853 年～1854 年初的种种事件使每个有关人员都疲于奔命，因此需要更动一下人事。密迪乐（在宁波工作的密妥士的兄长，是上海的正式翻译）离开中国回英国养病去了。阿礼国自己的身体也不好，经常缠绵床褥；然而在这种不利情况下他竟能干得如此出色，真

是不可思议。在这种状态下，他的副手（副领事），有卓越成就的汉学家威妥玛就不得不承担起份外的翻译任务。这种任务特别繁难，因为阿礼国本人不懂汉语。阿礼国在有待进行的关于条约的解释和海关的管理等问题的谈判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还有许多危机。于是他就向包令迫切陈辞，要求配备得力助手。包令度假返任，正在盘算着想把李泰国任命为商务监督署的汉文副使。但是，鉴于上海方面急需翻译，就把李派到上海去了。

1854 年 10 月 7 日赫德到达上海时，最早接触到的人士中就有李泰国及其弟李蔚海。当时赫德正取道上海前往宁波。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副领事多童子气呵！我知道他已 22 岁，可看上去还不到 19 岁哩。”虽然李泰国比赫德不过年长 3 岁，可是在有关对中国的知识、英国的公务，以及升官之道等方面，赫德就望尘莫及了。李在中国已经住了 7 个年头；从 15 岁起，就在英国驻香港的商务监督署有了官职。他学习中文的启蒙老师是商务监督署的汉文正使郭士腊，其后又跟威妥玛学过，学得很深入，语言运用已很熟练。他曾在香港警察署和最高法院短期担任翻译官，小试牛刀，并磨砺以须。

这样，他小小的年纪，倒是说得一口漂亮的中国话，能够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了。当时能达到这种水平的英国人为数不多，其他几个是麦华佗、巴夏礼、威妥玛、星察里、金格尔和马理生等，都比他年长。李泰国已于 1854 年 2、3 月间陪文翰爵士到各通商口岸去辞行；他被派到上海时，又另有许多非同寻常的机会在等待着他。当包令和麦莲无法从与他们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们那里得到满足时，便决定把他们使节团内的汉语专家们派到天津去，以便和北京展开谈判，于是包令就不得不依靠李泰国来效劳了。因此，在 6 月中旬到 7 月中旬那一段时间内，和吴健彰，以及更重要的和吉尔杭阿打交道的，就是李泰国（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那年 10 月 10 日赫德陪同一伙英国人从上海溯江西上，前往

总督大营的时候，李曾随行为阿礼国当翻译；当然那时赫德还根本不懂中国话)。

6月份到7月份的谈判产生了在上海海关建立洋人管理机构的决定。6月21日，怡良同意，上海海关的中国监督应与三大缔约国的领事们达成一项协定，使洋人对该港海关的管理永久化；这显然是投桃报李，因为洋人做出了把未缴税款的全部或一部交与中国的承诺。接着，在一个星期后，道台吴健彰和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及法国领事伊担举行了会议。阿礼国在会上推出了他煞费苦心的杰作，就是他在4月15日的备忘录中所勾画的一套方案——其结果就是海关外籍税务监督的诞生。该项制度定于7月12日开始执行，并提前一星期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外国人社会。阿礼国建议书中所提到的税务监督，原来想出的人选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史亚实；但是道台却要求由三大国各自指定一人组成一个税务监督委员会。因此又加上了英国副领事威妥玛和美国公使馆的贾流意。

这种制度是一大成就。它使各国领事摆脱了他们不愿承担其责任的那套繁琐业务；它为商人们提供了一套可以预料得到的条例法规；作为一个征税代理机构，它可以自食其力。可是这个机构还需要一个首脑，而这个首脑则需要具备一种与外交业务有所不同的行政才能。史亚实和贾流意两个仍旧在各自的领事馆内供职，把在海关所承担的责任看作外交任务的附庸。威妥玛之所以接受这一任务，主要是因为他指望借此扩大他对中文的知识；因此他提出过一个附带条件，即如果他感到此项工作不相宜的话，他是要去重理领事业务的。结果刚到8月份，他就表示要辞职了。但是经劝说后他还是留任到1855年5月才离职，以便有时间可以选择继任人。

实际上，一直到1855年年初，还没有着手对继任问题作出什么安排。阿礼国和威妥玛都认为李泰国显然是这一空缺的适当

人选。包令意中的人选是金执尔，但他希望避免由于把李泰国指派到广州去当翻译而已露出苗头的一场冲突。在这一问题上，他不仅受到了阿礼国和威妥玛的反对，而且上海的英国商界（估计就是他们在煽风点火）也反对，连中国官员吉尔杭阿和署理道台兰蔚雯（曾受李的嘱托直接去函包令支持李补该缺）也都反对。从3月中旬～5月中旬的两个月内，包令离开香港，和西亚的几个小国谈判条约去了。等到他回到香港时，他认输了。5月30日，李收到让他接威妥玛后任的批准书；5月31日，威妥玛辞职。6月1日李接任海关的英方税务监督。同一天，赫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公文于昨日到达。约翰爵士已经从暹罗回来……李已被任命为上海海关税务监督，接替威妥玛。"

广州的权力之争

1854年上海组成了公共租界，以工部局为领导。这加强了上海洋人的地位，从而使得中外磨擦的焦点仍然集中在广州。1858年赫德调到广州以后，便插手于当地权力的三角斗争；这种斗争是1850～1860年10年间中国政治上的特征。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仅是这种三角关系中的一方。另外两角之一是清（满洲）廷及其上层以及当地城市居民中的支持者；其二是反叛的各种力量，主要来自农村。

在广州，这种三方角逐所围绕的中心是两广总督，他也是朝廷委派在地方处理对外事务的官员。徐广缙和叶名琛先后担任此职；但其中叶是主要人物。他于1848年任广东巡抚，1852年升任两广总督。在他必须对付的问题中，英国人的入侵与太平军以及其他反叛势力相比，仅是个次要的问题。用征讨和杀戮叛逆分子的手段平乱是叶在19世纪50年代的主要业绩。他所采取的办

法是动员地方绅商首领建立团练自卫部队，对反叛势力施加粮食和兵员封锁；与此同时，他那由许多肆无忌惮的将领们率领的朝廷军队则对叛军进行讨伐，大肆屠戮[13]。

在19世纪50年代，广州的混乱与宁波的法纪废弛状态不同。宁波的事态是大量违法事件造成的——肯定地说是大规模的，但并非有组织的反叛运动——而广州的运动则是直接或间接的与太平天国起义有关。1851年太平军在广州以西不远的广西省立国称帝的时候，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最突出的地方军事集团之一，但是后来却形成了各地武装暴动的核心和汇集点。于是中国最南部的两个省广东和广西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便由于地方性的混乱而陷于瘫痪；这就不可避免地危及广州的对外贸易。

1860年前后，清廷认识到，如果在贸易和外交上对洋人做出让步便可以使他们感到满足，从而可以借他们的力量来镇压反叛力量。于是就不再同时去对付内部的叛逆分子和外来的侵略者了。这时，上面所说的围绕权力展开的三角斗争就发生了一个转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清廷还发现，把上海海关的外籍税务监督制度推广到所有口岸会有用处。

但是，对一个在异常混乱的时期中发生的无数争端和掠夺做如此简单的概括是不相称的。清廷方面在政策上有两种态度：其中之一是简单的仇外态度，就是对洋人的侵略抱憎恨态度；另一种比较具有政治家风格，就是能看到洋人的军事技术很值得学习，并且还看到，如果使洋人的商业利益得到满足，就可以导致洋人向清廷提供支援。某些满洲官员特别持有这后一种态度。他们自己已经意识到，中国人所怀抱的那种具有现代民族（汉族）主义色彩的仇外心理，有朝一日也会把矛头指向清朝本身的。

因此，英国人的扩张主义和广州人仇外心理之间的对抗仅是大型舞台上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英国人的要求仍然是从外交上开始的。1844年签订的中美条约规定，应在12年后，即1856年

对条约进行修订。但是根据最惠国条款，1842年签订的中英条约应在1854年修订。三大国的使节们全都不遗余力地寻找并求见可能被授权负责谈判的官员。他们一开始先把赌注押在叶名琛身上。叶是一位深受朝廷倚重的官员，从1852年以后一直是负责广州洋务的钦差大臣。长期以来，叶对外国代表们惯于使用敬而避之的手法，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举例说，包令于1854年来到中国的时候，曾求见钦差大臣，得到的答复是："时下各省军务纷繁，不克抽身。一俟稍有暇晷，定当择吉候驾。"其后经过进一步通款，叶提出在江边的一座包装仓库内接见。此一见面机会，自然会遭到拒绝，这是不难预料的。

使节们碰了几次橡皮钉子之后，深信必须到北方去求见，必须设法进入北京。因此，1854年9月份，包令在向北京的进军途中在上海露了面。9月30日和10月3日，包令和麦莲同吉尔杭阿做了坦率的会谈，但是后者还是对他们说，只有叶才有谈判全权，他们还是得回广州去。不过他们还是坚持到底，于10月份前往白河。他们在这里仍然受到了对付不速之客的蓄意冷待。包令和麦莲各自向本国政府打了报告，说明若不用武力示威来支持他们的要求，就不可能达到修订条约的目的。直至1856年到来之前，他们再没有做进一步的尝试。

与此同时，广州的老百姓则在重新掀起抗击洋人的活动。用于对付叛匪而由士绅领导动员的农村自卫队的那一套工具，也可以把矛头转向外国侵略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标语招贴，警告洋人不得进城，否则格杀勿论。有两个英国人在城外乘骑，老百姓就投之以石。小事件时有发生，远郊则常发生比较严重的事件。洋人的代表们越来越垂头丧气：中国政府每次都告诉他们，这类事件只能和叶大人交涉，可是这位贵人却每次都置之不理。

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1856年10月8日又发生了"亚罗号"三桅帆船事件。领事巴夏礼从伦敦度假归来，已明显心怀默

契，就是中国政府非得再给念念紧箍咒不可了。他报称，“亚罗号”挂着英国军旗停泊在广州城外，正准备起航，忽然有4个中国官员带着60个士兵登上了该船。船主是英国人，名叫托马斯·肯尼迪，当时正在近旁的另一条三桅帆船上，他立即赶回去升起英国国旗，并对来人拘捕12个中国船员提出抗议。但是他的忠告终归无效。巴夏礼领事到载有12名被俘人员的守护船上去进行了交涉，也无济于事。这些案情，经过如此这般地言之确凿，就成了开战的理由。但是近期的研究却使那些证据蒙上了可疑的色彩，特别是该船到底是否确实挂上了英国国旗的问题，更为可疑[14]。惯于借故生端的巴夏礼宣称，他无论如何不会对这次侮辱善罢甘休，并要求把登船的人员交给领事馆进行审查。结果他吃了闭门羹。他又给叶大人写了一份抗议书，坚决要求中国对这种公开的侮辱做出公开的赔礼道歉。他得到的答复只是船上当时有个臭名远扬的海盗，其他船员许多也有牵连；该船是中国人所有，因此无权悬挂英国国旗。事实上，“亚罗号”执有的香港所发航行许可证早已过期。

这次意外事故引起了第二次中英战争。有争端的问题本来是一点小事，但是小事一而再，再而三，同时又出现了一些其他怨情，问题就严重化了。叶大人又死抱着他那鄙夷洋人代表的态度，顽固不化，不肯做出任何让步。10月12日，巴夏礼提出对他先前提出的各种要求予以默许，叶的答复是老调重弹，也没有表示一点歉意。10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英国水师提督西马糜各厘麾下的海军便占领了进入广州港航道上的各个要塞，并且攻破了钦差衙门前面的城墙。28日，叶发布公告，号召军民“团结一致，灭绝这些可恶的英国坏蛋”，并且悬赏征收英国人头，每头赏银洋30元。

到此为止，英国人一直是在单独作战。美国人和法国人都有政府的指示，让他们保持中立。尽管美国的麦莲曾函告本国，这

个国家必须把它置于炮口之前，方能和它作外交往还。但是任何美国总统都不会忘记，只有国会才有对外宣战之权。不过，三大国再加上第四方俄国，现在在要求推进商业和外交特权方面已经联合起来。虽然俄国和美国都有严格的指示，只许它们的代表使用从道义上说服对方的手段，但是法国现在已经以天主教堂保护者的身分找到了掀起战端的借口。

1856年2月，法国传教士马奥斯多神甫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这一消息5个月后才传到广州。这一来，就使法国找到了理由，联合英国一起提出赔偿的要求。事实上，这是事先由克拉伦敦勋爵和法国大使在伦敦商定的，对马奥斯多神甫被处死事件要由两国联合提出索赔要求，并要联合远征白河口以迫使清廷对广州以及其他地方出现的敌对行为做出赔偿，并修订条约。这是1856年10月份的事，当时“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以及事后所采取的报复行动等还未传达到伦敦。如果和中国的谈判多少要按以往10年的模式进行的话，那么英国和法国政府的意图就是要把他们的行动委诸已经任命的两个代表，就是包令爵士和布尔布隆先生。但是关于““亚罗号”事件和西马糜各厘水师提督所采取的行动等消息，则意味着危机已经深化，需要由较高级的官吏来处理了。为此，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勋爵为高级专员兼全权大使，法国也给噶罗男爵授予了相应的官职。

1857年，英国政府为了给额尔金作指导而规定的要求包括：对英国和法国国民所受损失给予赔偿；全面执行在广州及其他地方签订的所有条约；英国全权大使在北京享有居住权并有权与在京各高级官员作书面通信；修订各种条约，以增加贸易的方便条件，其中包括增辟若干新口岸。额尔金带着上述以及其他更细致的指示，于1857年7月2日来到了香港，噶罗男爵则在10月份到达。

英法两国都已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弄得筋疲力尽，战事在一年

之前才以1856年3月的巴黎和会而告终。此外，英军从波斯战场返回印度途中，于1857年5月发生了兵变，经过约一年之久，事件方得彻底平息。额尔金在去香港的途中收到了兵变的消息，同时还收到了英国总督要他把原定派到中国去的军队转调到印度去的请求。额尔金立即从新加坡派去两个团的军队。后来他又从香港向加尔各答增派了两艘兵舰和一队海军陆战队。当时虽然已经向英国本土申请派遣补充部队，但是这些部队要到11月或12月份方能抵达。噶罗男爵离开欧洲的时间比额尔金晚一些，要到秋天才能抵达中国。额尔金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便利用7月12日～9月20日这一段时间到加尔各答走了一趟。因此，就外交而言，1859年的夏季是一个拖延时间的时期。

可是，英国海军的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过。5月份，有一队炮舰攻击了东江北面的支流埃斯卡波小湾内的中国战船。6月份，又在佛山（在西江三角洲广州上游120英里处）打了一仗，争夺很激烈，结果英国分遣舰司令官哈里·凯帕尔大获全胜，全歼了中国战船约160艘。8月，水师提督西马糜各厘认为有能力封锁广州的珠江和港口了。12月，法国水师提督里戈·德·吉奴伊打算步他的后尘。

1857年7月额尔金到达中国时，首先要做出抉择的是，要么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立即北上进军白河，在京畿附近采取军事行动，借以向清廷施加压力，而把广州留待以后再做处理；要么就率先进攻广州。西马糜各厘严厉督促他采取这后一选择。他坚决认为广州的问题只能在广州解决而不能在北方通过谈判解决；他确信，对付广州的惟一现实可行的办法是使它屈膝投降，给广州的那些勇士们来个下马威。否则，中国人那种自认为坚不可摧的信念将益加牢不可破。他宣称，“中国人排外和傲视洋人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但是，无论额尔金采取哪一种选择，他都必须取得他的法国

搭档噶罗男爵的支持。他于8月12日抵达香港。法国人特别关心的是马奥斯多神甫之死的赔款。噶罗经过一个月的寻访了解，对叶“无视公理”一节，就一清二楚了。由于白河在11月份即已封冻，因此北征之计已经为期过晚，抉择无多，于是商定立即在广州采取行动。接着，包令爵士和布尔布隆先生（二人仍为各国委任的代表）把英法两国任命两名特使一事通知了叶名琛。事态的发展前途就掌握在此二人之手。两天以后，额尔金和噶罗打着停战的旗号，分别向叶发出了通知。叶的答复正如他的两个收信人在24日给他的照会中所称：“含糊其辞，不能令人满意。”与此同时，西马糜各厘已经攻占了广州对面的最后几个要塞。叶又一次发出了与以前同样倨傲的回信。至此，大局已定。12月28日清晨6点，英法舰队开始轰击广州；到次日中午，英法联军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广州城。

尽管广州城已经为他人控制，但是没有一个人投降，没有一个人屈服。12月31日和1月1日，浩官和另外几个中国商人通过与额尔金的翻译威妥玛会谈，向额尔金提出联合维持广州治安。但是叶大人毫无动静，对和平如何考虑，对他治下的子民的身家性命如何打算，一无建议。广州的老百姓也一如既往，来个消极抵抗。叶名琛是长期抵抗的象征兼祸首，看来只有把他搬开，才能打破这一僵局。因此，巴夏礼领事于1858年1月4日指挥一个分遣队把叶抓了起来。当时他正藏匿在鞑靼将军的衙门里。他被关押在黄浦港内的一艘英国皇家海岸炮舰“不屈”号上约1个月。但是为了防止他留在附近会变成密谋的核心，又在2月份把他送到加尔各答，并把他安置在城郊的一所住宅内。1年之后，他在那里去世。尽管从他的档案中找到的公文都证明他自始至终是按朝廷的批示办事的，但他毕竟是被俘了，所以朝廷终于降旨把他革职，并任命黄宗汉为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我们可以在赫德的日记中找到黄宗汉当时彷徨逡巡，迟迟不欲南行的迹

象。到1858年10月份，赫德仍在翻译致黄的各种信件，并往北方发送。事实上他是某个重大计谋的中心人物，这一计谋就是要唤起士绅领导下的自卫队把洋人从广州舞台上驱逐出去，并要光复该城。清廷的政策是双管齐下，其中之一着眼于武装驱逐，其二则是虚与委蛇，假意姑息。

广东的华洋共治

在执行绥靖路线的过程中，广州和广东省的衙门落入了柏贵的手中，他原是个有名无实的广东巡抚。联军本身显然无法治理这样一个城市。它拥有“几十万人口”，这是额尔金自己在致克拉伦敦信函中的说法：“我使整个广东省失去政府，从而置千百万生灵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因此他们就决定恢复柏贵的巡抚官职，但要把他搁置于适当的限制之下；那就是按马士所说的“用一根绳子把他拴着，而这根绳子则由一个代表联军的委员会牵着”。[15]1月初，两位联军司令和柏贵互致了信件，从而商定了恢复柏贵官职的各种条件；然后两位司令和柏贵分别贴出了告示，宣布广州仍然处于联军的管制之下，但政府则委托柏贵代管。两位联军司令和鞑靼将军也交换了信件，规定担任广州城守备的满洲部队要予以解散。各种条件中，包括由联军任命一个委员会“协助巡抚维持秩序”并在全城巡查；巡抚发布的告示，非经加盖委员会关防不得生效；所有武器和军事库藏悉数缴交联军。

1858、1859和1860年3年内，治理广州的联军委员会是中外合作政府的滥觞。柏贵是个蒙古人，他首先是效忠于清王室的。从19世纪40年代起，他在广东为官多年，对当地的情况比较清楚。在他一如既往地在洋人胁迫下充当清廷代表的角色时，清廷却另外任命了一个两广总督黄宗汉，行将南下，从洋人手中

把广东收回，这就使他碰到了一个对手。这位黄大人把过去那个强硬的叶名琛和广州士绅们共同建立起来的一套组织关系承袭了下来。他们共同向英法占领者发动了一场斗争，把那些洋人们弄得坐卧不宁；并旨在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最终把洋人赶出去。

与此同时，联军委员会的三方成员：托马斯·哈罗威上校，弗·马蒂诺·德·查维斯上尉，巴夏礼（这3个人在赫德的日记中都曾多次出现）自己组织了一支中国警察队伍（其中有700人用于城内，600人用于郊外），另外还控制着一支由100名英国兵和30名法国兵组成的巡逻队。这一委员会虽然受理西方人之间的是非曲直问题，但中国人的事还是让中国官员去管——但是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1858年2月取消了村镇。我们在赫德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柏贵有时候也是难以驾驭的。同时，他又不知道在北京眼中他的牌打得对不对，必然又是整天提心吊胆的。因此他急于要把官邸尽快地转交给黄（见日记1858年4月28日所记）。在清廷和巴夏礼这样一个泼辣的洋人之间充当一个夹缝中的人物，真是不容易啊。

巴夏礼在委员会中是精力充沛而积极行动的一员，也是惟一精通中国语言和风尚习俗的一个。他是“实际上的两广总督”。就是他，整天领着一小队士兵（有时赫德也自愿参加）满街乱窜，只要听说有什么地方藏匿着武器，就寻踪追迹，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就是他，只要发现街上有一家店铺的门关着，就要冲进去，揪住那拒不开门的人的辫子，把他拉出来；当他发现在他命令赫德留在办公处后，他的同僚哈罗威却让赫德出席法庭担任译员时，就给哈罗威来了个白眼；见到额尔金过于软弱就当面直言不讳。他写信告诉他的表姐夫，当听说柏贵要让勇士们和乡亲们反对西方人，西方人只要离开广州城1英里就不保险时，各国的全权大使竟下令，谁也不许走到距广州城1英里以外的地方！对此，他嗤之以鼻。

在史不绝书的英国人的侵略活动和广东人的仇外运动的幕后，还有另一出戏没有充分加以说明，那就是英法两国人员与清廷官吏们在治理广州这样一个大城市中比较具有建设性的合作的一面。这些人主要是致力于维护法律和秩序。而赫德所从事的翻译大多都和联军对中国人抗外骚乱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有关。由于联军委员会是以清朝官吏的名义对广州实行统治的，赫德就成了处理中国公文和中外交往的渠道。再没有其他学艺过程比这更苛求，比这教益更多了。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推动另一种重大的中外合作事业，那就是重振广州的对外贸易。这使他得以和海关候补道或监督直接接触。此人是个满洲人，名叫恒祺。他把自己的坐骑供与赫德乘用；而且几年之后在北京，他将成为赫德的上司。

对外贸易毕竟是中国人和洋人之间主要的共同利益之所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即使在宁波这样一个小地方，英国领事对贸易问题是何等地关注。由外国人充当税务监督的原则一经在上海被证实为确有价值，包令爵士就反复地设法把它推广到其他港口去。有识的行政官员们早已洞察到，英国的臣民可以由英王陛下的领事们来保护，而他们要进行顺利的贸易，则有赖于海关中的洋人税务监督的效劳。最后的条约体系中的那些基本成分，已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额尔金和噶罗早已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广州转到了他们出使的主要目标上——与北京的清廷谈判，达成条约的修订。为此，他们同时向北京的“朝廷大臣们”发出了照会。美国和俄国的公使见到这些照会的文本后，也同意并起草了他们自己的照会。这些文件由英法两国使团的秘书俄理范和德·康塔德子爵两人送往上海。

李泰国的发迹

1858年的中外对抗给一位英国的翻译提供了良机。李泰国于1855年取代威妥玛当上了上海海关的英国税务监督。他是个热衷于名利的年轻人。当时这种职务初设，涵义未明，威妥玛凭着他惯常的热情和洞察力，却使某些原则取得了有关方面的承认——举例说，外籍税务监督在以中国官员的身份执行任务时，他本国的领事必须按这种身份来对待他；他作为中国的官员，不受本国领事的管辖。这样当然就会导致后来的历届领事和海关外籍税务监督之间的纷争与对抗。后来他们终于学会了互相尊重各自职权的做法。但是在这种体制初创的年代里，外籍税务监督的处境是颇为艰难的。他没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外国商人们一来就要摸摸他的底，看他到底有多大权力；中国官员们则等着瞧，看他对中国的关税收入能起多大作用。这种局面，没有一副厚脸皮和充沛的精力是担当不了的。他必须是精力旺盛，咄咄逼人，才能扮演那为皇室金库充当看门狗的角色。李泰国其人恰好堪当此任。

此人精通汉语，这成了他的看家本领。俄理范（额尔金的私人秘书）和德·康塔德于1858年2月20日到达上海。当时正值中国的新年期间，他们发现当地没有哪个能够和朝廷接上头的官员在家。他们和两国的领事商量之后，决定把照会直接送达在省会苏州的巡抚。临行前才把李泰国叫来随行。他们一路平安无事，于2月26日见到了江苏巡抚赵德辙。由于李泰国与赵巡抚早已稔熟，因此大大方便了这次接触。人们不禁会想，李泰国毫无疑问是眼前的一个中国通，真是踌躇满志，无以复加了。俄理范忙里偷闲，由李作向导，到姑苏城外作了数日郊游，然后到宁

波与额尔金重聚。他在提到李的工作时，着实把他夸奖了一番。

3月25日，北京的复照到达上海，依旧是老一套——谈判只能在广州进行。可是额尔金和噶罗却不能容忍这种搪塞，他们率领着由大队舰船组成的赫赫远征军向天津进发了。

因此，额尔金于1858年4月离开上海时，随带的是给他充当翻译的威妥玛和李泰国——其中一个是官方人员；而另一个，李泰国，身份还不大明确，因为他仍然受雇于清廷。英国人以及与他们同去的法国、俄国和美国人和清廷的两个使者在天津见面。但这事是李泰国发动的。李这个人生性好斗，而且脾气很坏。这正如赫德在北京时就发觉并记入日记的。作为联军的发言人，李泰国在谈判过程中肆无忌惮，气势汹汹，蓄意用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的口气，来使人低头就范；最后甚至还以额尔金爵士的名义威胁说要重启战端。外国使节们在6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对清廷官员们做了一次礼仪上的拜访。此后一直到1858年6月29～30日条约签署为止，再没有和清廷官员们见过一面。一切都由李泰国包办代替。尽管清廷的全权使节曾就李对他们横加侮辱一事向态度中立的使节们提出了抗议，并且俄国的普契心伯爵也曾私下转告，敦促额尔金爵士通知他的代表李先生，慎勿采取那种与全权大使的崇高身份很不相称的粗暴作风。遗憾的是额尔金却认为李泰国所采取的做法并无不妥。他事后写道："我们不断地进行斗争和恐吓，迫使那两个可怜的钦差大臣一步一步地退让。"英国人打赢了在天津进行的外交战，就和他们在广州取得了军事胜利一样；但是李泰国的行为所造成的恶感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与此同时，赫德于1858年3月被任命为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二等帮办。他于3月20日到达广州。他在乘炮舰"福雷斯特"号从香港赴广州途中，在船上开始继续写他那已经中断了3年之久的日记。4月份，上级要把他从领事馆调去当联军委员会的秘

书——这实际上意味着是给巴夏礼当秘书。留在这一岗位上1年后，他暂时回到领事馆，然后调到新成立的海关机构当副税务司。这次和在宁波时一样，他又一次鸿运高照，取得了进一步了解清廷官场内幕，观察外交礼仪和姿态的机会。而他当时还没有正式参加外交事务，仅是个观众而已。渐渐地，他负责越来越多的事务。经过4年的锻炼，他已才思敏捷，看到什么都能做出反应，完全走上了自己在中国的历程。再经过更长时间的锻炼，他就将由观众一变而为演员。

第六章

日　记

广州 1858 年 3 月 20 日～12 月 6 日

（本章是赫德日记第三卷的卷首部分，原文并无卷首页。本章开端部分的若干页显然是从另一册类似的记事本中撕下来的；不禁使人揣测赫德在事后曾对他的日记进行过编纂整理，并把他和中国姘妇同居的那一段删除了。因此本卷一开始是叙述他取道香港前往广州的事。）

1858 年 3 月 20 日　星期六

我今晨 4 点起床，很快穿好衣服，6 点早餐，7 点登福莱斯特 87 号炮艇，立即起程去广州[1]。船上乘客很多，行李也不少。乘客中有孟甘和《中国之友》的塔兰特，还有司令官鲍尔将军。有人把我介绍给他[2]。上午颇感春寒料峭，而且风雨交加；我尽管躲在雨篷下面，但是随着逆风的转厉，还是觉得相当寒冷、阴湿和不适。十二点半经过虎门要塞，左侧的两个炮台在岛上——那里居高临下，峰峦起伏；另一侧的两个则在大陆上[3]。我对孟甘说，第一个要塞内的中国人一定已经被杀光了。“他说，唔！

不对，刚一开火他们就都逃跑了；他们往山下奔，纷纷落水了！”听来好像是个地道的爱尔兰人。使我非常遗憾的是那天有雾，雨又下个不停。如果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的话，那么那江上的景象，或者说是景色不仅会很有趣，而且会很怡人。下午4点前后，我们到达黄埔，“护民”号和“阿克大勇”号都在那里，还有几艘炮艇，6～8条商船和几只驳船④。文极司脱署理领事从驳船中下来了，我把巴特的信物（32元）连同密妥士的信件⑤一并交给了他。我又向“阿克大勇号”的“蹦蹦跳跳的詹金斯”递送了名片。5点零几分，我们到达广州城外的停泊所，在“比特恩”号附近下了锚。我把行李放在一只小船上，然后和孟甘一起登上了“比特恩”号，当即有人向海军高级军官埃杰尔⑥舰长引见我。接着我们上了岸。这时从一座小房子里来了一个人，他听说我身上没有零钱，就付给船夫2角5分钱。这是他主动办的。我本来以为他是个法国人，却原来是个意大利店主。我们从东南门进了城，经过联军大街和南街到了专员衙门。这是一座美仑美奂的大宅，其中有数不胜数的庭院和屋宇。最后我们到了巴夏礼的住宅，在那里见到了罗存德牧师（原文如此）和随习翻译有雅芝⑦。后者把我领进了我的宿舍，我放下了行李，然后洗了一个澡。然后我们到专员家中进晚餐，有人为我向巴夏礼专员作了引见。他身材中等，面容白皙而微微偏黄，留着淡黄色的头发和沙色而柔润的小胡子，真是仪表堂堂。他额头峥嵘，显得智慧超群；但是他的鼻子和嘴部却使人感到他的活动有些神经质，而不是一种有决断的性格。我交给他两封信，一封是巴夏礼太太写的，另一封是乔治·凯恩⑧写的。草草吃完晚餐，又坐下来闲谈。我抽着上等的哈瓦那雪茄，这真是难得碰上的享受，巴夏礼花20元买了500支。到深夜11点告辞出来，但是我无法入睡！这一整夜把我冻得真够受。哨兵们的吆喝和巡逻队沉重的脚步声使我大半夜无法合上眼。等到我朦朦胧胧倦极思睡时，也还是六神

不安；他们就是有这么点能耐。

岗哨上喊道："过路的是谁啊?""自己人。""自己人吗，过来，说口令。""英国。""过去，自己人，平安无事!"

1858 年 3 月 21 日　星期日

9 点早餐，餐后信步前往登陆地。我走着走着，一路上始终感到提心吊胆，生怕有个什么不怀好意的家伙，会在我背后琢磨着要给我这个孤孤单单地在他们的大街上游逛的番鬼猛地来上一拳[9]。一些大街小巷内并不太拥挤，街上的人们似乎都在看热闹而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一些店铺也是这样，虽然开着店门，但是看来并没有多少买卖。我从一个小男孩面前走过的时候，他忽然喊了一声"外佬"，但是他近旁的一些年龄较长的人们就立即对他投以责备的眼色。"讨不是"和往常一样，总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10]。后来我走到了登陆地，看到并没有来过什么公用汽船，就思忖着可能要过一阵才能拿到我放在昌盛号上的行李。下午两点做了礼拜。在到点之前，巴夏礼先生把我引见给了另外两位专员哈罗威上校和马蒂诺上尉[11]。前者是个优雅而宁静的有绅士派头的人物，使我肃然起敬；另一位则似乎颇为冷漠，满脸高傲之气。此人和巴夏礼先生同我们一起穿过花园，该处有一所天花医院，我们在那里看到了鹿的脚印。来到另一端的大门，经过查问，知道此门是非军用的。把门关上的时候，上边的构件掉了下来，巴夏礼先生和我都差点被打伤。做完礼拜后，我和巴夏礼先生长途步行直到总部，我们沿着城墙走，一路上拜访了几位大人物。

1858 年 4 月 1 日　星期三

上午罗存德先生动身前往香港，鞑靼副都统巴达兰比的两个孩子随行：其中有一个是女孩，居然让她随着一个洋人前往香

港，这证明巴达兰比家对罗存德先生确实信任非凡[12]。上午十点半，因鞑靼将军回访，前往总部为冯·斯特劳彭齐少将和最高司令官达布维当翻译[13]。将军的官邸位于观音山下，我走到通往将军府的头道门时，看到那里禁卫森严，准备以雄壮的军礼接待鞑靼将军，一切已经准备就绪[14]。我跨出轿子，登上了四五层石砌的台阶。部队在两侧排列，左手是法国水兵，右手是英国军队。迎宾大厅前一片喜气洋洋，戎装炫耀的英法两国军官们徜徉其间，情绪活跃；另一端则排列着59团的军乐队。迎宾大厅内挂满了五彩缤纷的万国旗帜；英法两国的国旗则挂在主要人物坐的椅子后面。接着我按将军的要求走下台阶去请穆克（原文如此）坐着轿子跟着我攀登台阶直到预定的某个地点，然后英法两国总司令的副官将把他从这里带到迎宾大厅去。隆隆炮声宣布贵宾驾到。走在头里的是一个男子，打着一把大红伞，其后是50来个穿戴整齐的随从，对对成双地行进着；再后面是一个男子骑着一匹小马；再后面又跟着6～8个面目狰狞的汉子，头戴高帽，故意地歪着脖子，手中还提拎着锒铛的铁链。接着又是20来个随从。最后出现的则是坐着八人大轿的那位将军。我把他往上引导到预先指定的地点。他在这里出了轿，那副官就上前迎接他。他的随从们扶着他攀登那最后两段最陡峭的石级。当他登上最后一磴台阶时，乐队便奏起一种激昂慷慨的曲调。等他到了台阶顶部时，看到周围都是穿戴得金光闪闪的军官，接着两位总司令出来欢迎他，互相握手言欢。进屋后的一番谈话不过是礼节性的老套。他说前次将军来访时，他正好不在衙中，失迎为歉。又说了些阴晴寒暖的话。接着我们请他坐好摄影留念，结果拍了一张很好的相片。斯特劳彭齐将军、埃杰尔和达包维两位上尉也摄了一张3人的合影。那位鞑靼将军和他的扈从们看到了那照相机似乎有些怀疑，但他还是勇敢地坐在那里，尽量装出一副庄重的样子。他摄影完了后，便告辞了。我则留下来喝了一杯酒，闲谈了

一会儿。

1858 年 4 月 5 日　星期一

今天下午与费希尔上尉、巴夏礼先生一起骑马去一个村庄。上星期六，费希尔在这里进行测量时感到村民们想要攻击他，因为当时看到他们围作一团，并且听到了打铜锣的声音[15]。经过查问才知道那天村民们是在取乐，并在做一些（?）。村民们都很客气，我告诉他们不要伤害外国人。晚间和哈罗威上校共进晚餐。

1858 年 4 月 6 日　星期二

今天工作如常。审理了 5 个案件——都是些琐碎的指控——下午和巴夏礼、迪克森医生，以及另外 5 个人外出乘骑，在白云山下转了好长一阵子。白云山上的点点墓冢布置很美观，装点得也很富丽，一簇簇的都像个花坛。所到之处人们都很客气[16]。昨晚——在巴特上尉丧命的东南门附近——看到有个船夫被人暗杀了，今晨在沙滩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1858 年 4 月 7 日　星期三

整天有大量工作。审理了许多中国证人、原告及犯人，并翻译了各种公文。三点半吃午饭，然后骑马到联军登陆地去。是和巴夏礼先生一同去的。他要去和泰勒修先生确定某些标志——事毕后乘骑去府学宫。该处房舍占地甚广，但倾圮不堪，几乎无人居住。[17]。

1858 年 4 月 28 日

今天下午我随同两位专员去找柏贵，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以后，他说有些事要告诉我们，但必须等到适当时机来到，方能将此事言明——要等有关信件到达以后[18]。结果我们略施诱饵，

他便上钩吐实。他先把仆从们打发出去，然后就说，他打算去北方一趟，去见新总督黄某。他之所以急于起程，是为了要赶在康或周或是3个招募乡勇的钦差大臣中的任何一个见到黄之前，和他见面。柏贵说，康或周现在与他为敌，他二人对他毫不尊重，完全无视他是现任钦命署理广东巡抚之职。甚至番禺、南海两县的知事也事先未向柏贵请示，便擅离治所，前往花县[19]。他深恐如果他们二人先与黄谋面，则黄将与他们同去花县参加反英和反柏贵集团，因此他渴求立即动身，以便棋先一着，向黄陈情。我们沉默了一会，又以体谅的态度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才了解到，宣布黄受命来任的公文随时都可以到达，他准备收到此公文时立即起程。实际上，他可能当晚或翌晨就要起程。巡抚大人并说，他只须携带3个小箱子。如果在他离衙期间能够派遣若干士兵守护衙署，他将非常感激；他的出访为期约在15天左右，也可能略多一些。巡抚大人还告诉我们，那天清早，他已派遣他的副官携带着他的3颗官印，等黄进入广东省时，立即移交给他。此外，康已带着总督的官印到花县去了。因此，柏贵手中现在已没有任何官职的信凭[20]。这时我们辞出。

在叙述过程中，我忽然想通了，马蒂诺是想要恶作剧，所以他装出这样一副非常和蔼亲切，镇定自若而又不动感情的面孔。

1858年4月29日

早餐前策马至科利尔街去看看黄大人的公馆是否已备办就绪：当即看到那里的大门油漆一新，关得严严实实；我从侧门而进，看到里面是一片芜秽，满目倾颓[21]。柏贵声称为了迎接黄大人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简直是无稽之谈。

上午在审理于军门被割破脑袋的斯图尔特（一个水兵）一案的军事法庭上担任翻译。该法庭由哈罗威上校任庭长，其他还包括格里登上尉、克罗克上尉、埃文斯中尉和罗克里中尉（?）。

下午与皮姆上尉策马同往一个隐藏武器的地方：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22]。回来时看到两位专员带着大批警卫正准备去见柏贵，我陪同他们到柏贵的衙门，在那里见到了（这是事先约定的）署理按察使蔡某、粤海关监督恒祺、于和浩官（小）（?）[23]。在商谈中，他们告诉我们，已经有乡勇1,500人由新会（我们早就知道这是一个叛乱频发的地方）开往花县。此外，虽然已经捐募到120,000两银子，但是实际缴交的仅有60,000两。略经磋商，巴夏礼就开始告诉他们，他们与洋人的明显接触，已经引起了他们自己老百姓的愤怒；并说使他们取得权力和赢得尊敬的最好办法是要使得他们在老百姓眼中显得像是含冤受屈者；因此，少将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把他们全都关在柏贵的衙门里，这样他们便可以在那里执行公务，其方便程度不亚于在西郊。那3位大人一听之下大吃一惊，火冒三丈。恒祺说，我们可以立即砍了他的脑袋，但要他对这种建议让步是一刻也不能想象的。蔡说，他不愿被关押起来。结果是决定对该衙门进行军事占领，并由军人担任警卫。

1858年4月30日

上午，我去瞧了一下这3位贵人是如何度过这一宿的。他们说，武装人员们的脚步噔噔，以及为了维护他们的身份而采取的其他安全措施都使他们无法成眠。他们恳求让海关监督和浩官回到各自的衙门去；并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要执行公务根本是不可能的。蔡说，他夜间气得无以复加，恨不得自刎而死算了。

下午与哈罗威上校一同去见柏贵：各位官员都拒绝派遣刽子手去给肖阿巧行刑。[24]

1858 年 5 月 1 日

今晨去看了各位官员：他们都说没有什么信要带给二位专员。他们都痛切抱怨受到如此的对待，似乎已经对英国人毫无信心。他们冷嘲热讽，真是玩世不恭，可恶已极。

中午时分，判决肖阿巧于星期一上午 10 点在东便门被处以绞刑。

然后与两位专员一同去看监禁中的官员们。巴夏礼和他们谈了一番，说得他们气顺了。他们说，把他们关在那里，什么事也办不了。但是巴夏礼告诉他们，我们不会给他们设置任何障碍；人员信札一概可以往来如常；如果有事不理，那么必然是因为他们不愿理事；如果他们不愿理事，那么两位专员就一定会推断说，其中必有某种邪恶的意图或目的。经过如此这般的一说，那按察使和海关（监督）就被牵着鼻子走，只好乖乖地说，他们可以办事，并且答应一定做到[28]。他们又说，如果在正当的办事过程中碰到什么困难，一定告诉二位专员。

把恒（祺）监禁起来以后果然一切贸易都停滞不动了。长官在非法的拘禁之中，他的下属就既不查验货物，也不收敛税款。现在这种局面改变了，我估计贸易将会和以前一样顺利地进行。

我们从衙门内出来时，看见塔兰特和另外两个上等人进去，是警卫所把他们抓住送到衙门里去的。原来岗哨上已经通知警卫说，这些人可以进去，因此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少责难。

高恩在水里面打了个喷嚏就把门牙给弄掉了，现在那副样子真够滑稽的[29]。文极司脱坐的驳船已经溯江而上，现在停泊在“大黄蜂”号近旁。

1858 年 5 月 18 日

军事法庭今天首次开庭审讯皇家海军陆战队中的 S·比林斯、

T·威尔福德和约翰·布赖恩等3个人。告发他们的案件总共有17起；其中包括殴打、强奸未遂、抢劫和谋杀等案由。看起来这3个人应该分别受审，而如果把他们分开审讯，则那些对他们3人作为一个团伙来说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又很可能是无用的——法庭的成员包括克莱福德中校（曾力争释放勒克努），庭长，莱蒙中校，沃尔什中校，另外有10个军官是从海军、第59团和炮兵部队来的校级和上尉级军官；第59团的布希担任军法官；由警察所长皮姆上尉担任检察官。我则应召在刘先生的帮助下担任翻译[27]。

威尔福德首先出庭受审：首先让几名证人出庭证明；5月11日下午7点3刻晚点名时克劳福德是无假缺席的。接着第一个谋杀案的证人到庭，其中有二人指明，在谋杀发生的当时，克劳福德是3个在场者之一。但是两个证人之一说，他是根据犯人眼睛下方有一个黑色标记来认定他的。犯人方面也有证据，可以证明他在当月11日间归营后，在一次格斗中被打伤了那个眼睛。邵医生出庭就伤势的性质做出说明的时候，我感到颇为好笑。他把检查伤势的日期给忘了：他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他也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人们告诉他，今天是18号，他做检查是一个星期以前的事，他简直糊涂得连他确实是在几号做的检查都推算不出。开庭时间从上午8点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其间1点到两点休会。

马蒂诺和巴夏礼去拜访了柏贵。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据说新任钦差大臣黄大人终于到了潮州[28]。来自佛山的最新消息说，那里的老百姓估计英国人就要向那里进军，因此他们正在招募乡勇。他们已经把（西）江堵塞，以致本地的帆船不能通航；他们已经向蛇口派驻了600名士兵和几百名乡勇。从花县来的消息说，罗已经命令第四营的官员们离开佛山去见他，并听他下达关于如何布置他们的兵力的命令（原文如此）；苏和龙即将

把他们的兵营开到花县以南的康昆（江村）去[30]。最近半个月以来，霪雨连绵，我的住处阴湿不堪。

蔡按察使差人来通知我，叫我不要把他吸鸦片的事告诉任何清朝满族官员。

1858 年 5 月 19 日

今天上午 9 点，军事法庭再次开庭，下午 1 点至两点休会，然后开会到 4 点。今天审查的证人几乎全是中国人，因此，我这个翻译的发言任务就不小。最后审查的一个证人是唐志忠，是看门人（赫德写出了中国字)。他于 11 号晚上在外边街遭到 3 个军人的殴打和抢劫[31]。他从被劫的那天晚上（那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犯人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在把他带到庭上以前，先把 4 个穿着相同，而且无须的年轻人带到了庭上，和威尔福德一起，排成一行。然后把该证人叫到庭上，先让他讲完案情，然后问他是否能够认出袭击他的那个人。他说，他想是能够的。“他们现在在这里吗?”“有一个在这里。”“他在哪里?”“他是站在那边的 5 个人中的第一个。”“把你的手放在他肩膀上。”于是证人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手放在威尔福德的肩上。我从未见到过比这更确凿而无可置疑的认证。法庭上每个人见到这种情景似乎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们对过去几次认证时都没有指出威尔福德的那些中国人是否正直无私，是心存怀疑的。但是这一次，问题就一清二楚，无容置疑了。迪克森医生和皮姆上尉和我们一起吃了中饭，大家就出去骑马了，一直到晚上 8 点才回来。今天晚上，第三警察局的理查兹警官带来 13 个有抢劫嫌疑的男子。今天的天气颇为晴朗：阳光普照，我的好运道来了，总算有机会可以把我的鞋子等拿出来晒一晒，消消霉迹。

1858 年 5 月 20 日

今晨 9 点，军事法庭复会。成员之一，59 团的乔伊中尉缺席，他因病未能到庭。因此，在斯特劳彭齐不在的情况下，成员们给史蒂文森上校（A.A·S·）写了一封信，问他该怎么办。他的回信于 11 点前后收到，其中指示后备的军官之一宣誓取代缺席者。这样一来，迄今已经掌握的证词都得给新来的成员再读一遍，使他得以理解、掌握。

唐志忠再次被叫到庭上。在他进来以前，已经让 3 个犯人和另外 8 个人排成一队——其中两个有胡子，剩下的不留胡子。他毫不犹豫地挑出了威尔福德：再细看了一下，又指出了比林斯，然后说道，此人是抢劫者之一，他就满意了。第 3 个人他挑不出来了。

1 点休庭，两点继续开庭。讯问了第二个谋杀案中的两个中国证人。然后在下午 4 点退庭。

今天布希上尉和我们一同吃了午饭，他是个特别讨人喜欢的朋友。饭后策马至中南门，察勘了一个谷仓。据了解，前 4～5 天内广州公仓内有大量谷物被运走。

今天阿志告诉我，昨天晚上 6 点钟前后，有两个军官来到我家，经过了一番周折他才把他们弄出去。阿姚躲到后房内，总算没有被他们看见。当他们被告知这房子是属于我的时，他们就说，回头找我给开个条，让他们什么时候想来就能来。真该死[32]！

今晚回来时，我们发现柏贵衙门旁边的一个巷门关着，弄得我们无法进去。我们就找旁边的店主把它打开。另一边有个店主却哈哈大笑，幸灾乐祸，大喊“不开门”。巴夏礼进得门去，冲进那小店铺，挽住那人的辫子便把他往街里拖（遇到了一点抵抗）。我就抓住那辫子，把它绕在我的手腕上，牵着他往衙门里

走。他在街上大喊大叫着“街坊”，让人来救他。但是谁也不愿意出来，只是把店门关得更加紧了[33]。

什么消息也没有。花县的老百姓很平静。他们根本不像会发动骚乱的样子。广州人都是笨蛋，胆小鬼！

1858 年 5 月 21 日

军事法庭照常开庭。

1858 年 5 月 23 日

在“大黄蜂”号上吃午饭。

1858 年 5 月 24 日

走访斯特劳彭齐将军。与皮姆上尉一起循着 3 个正在受审的士兵所走过的路途走了一遍。从他们逃离布鲁梅尔上士的总部开始，中间经过他们进行抢劫和谋杀罪行的现场周围，一直到他们进入营房的地方，我们作了一次毫不含糊的寻踪追迹。在弹药库山脚下的校场上痛痛快快地打了一阵猎。与皮姆和（塔巴?）一起吃晚饭，一同饮红葡萄酒，长谈到将近午夜。

1858 年 5 月 26 日

今晨巴夏礼先生指示我去照顾二位专员的事，而不要去军事法庭。因此法庭就因为没有翻译人员而暂停了诉讼程序。法庭因此休庭，并诉诸哈罗威上校。埃利斯上尉来到办公室，并以哈罗威上校和马蒂诺上尉的名义命令我去法庭出席。这时巴夏礼先生出面了，并命令我勿去法庭。然后哈罗威又来，告诉我要去，并说，一切后果由他负责。我请他去找巴夏礼说话。与此同时，军法官又发来了传唤。巴夏礼一看这东西便大为生气。他说道，“除了二位专员以外，谁有权来向我们的下属发号施令?”最后，

上校和马蒂诺上尉好不容易才使他平静下来，并且一致同意，在讯问中国人的时候我应该在场，其余时间则回办公室。于是我就整天在两头没完没了地跑来跑去，累得要死。

昨晚聘请了张先生来当老师，并开始了工作。威尔福德的审问还未结束。

孟甘升任汉文副使，年薪400英镑。

阿姚两个月（原文空白，下加横线）[34]。

1858年5月27日

今天据报，土著军70团有一个印度兵或称随营人员在上星期日被乡勇们绑架走了。告密者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被带往花县去。（下列字样是事后用另一种墨水写在括号内的：）（根据林的命令在江村问了斩。）

1858年5月28日

浩官今天给巴夏礼先生看了一封友人的来信，信中称属于林福祥派的乡勇200或300人已经进入城内和近郊，并已藏匿起来，他们企图在那里劫持洋人[35]。由于印度士兵的失踪，以及有关乡勇的种种谣言，少将决定对城市及近郊进行巡逻。于是6个巡逻队便同时开始巡逻。我是属于肯尼迪带领的那个巡逻队，（70团的300人）在东郊一带巡逻。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事物。虽然大家都热得汉流浃背，但逛逛也是很有意思。

1858年5月29日

今天去看了柏贵。失踪人员仍然杳无音信。蔡按察使给在花县的周司库写了一份非常强硬的通知，请他把那个人放出来。柏贵应允出一个告示，悬赏缉拿林手下的乡勇：他最初不打算明说要林的人；但最后还是屈服了——实际上巴夏礼会自己执笔起草

告示的。

巴夏礼夫人今晚到达：巴夏礼先生在他的旧宅里安下了家。

1858 年 5 月 30 日

今晨 6 点前后，有武装人员 20～30 人对在太平门（西南门）值勤的两个警察进行了袭击。其中一人头部被砍破数处，另一人的左手差点与手臂分离。有个小商人把这两个伤员之一弄到自己家中，当时此人正被推推搡搡，似乎有人要把他带走。商人把门关上，把伤员送上了楼，帮助他越过几家房子的屋顶，最后跨越了城墙逃回警察所。此消息传到衙门内时，官员们估计有人在进攻城门，于是立即派了 100 个人去。巴夏礼先生赶到现场，把街上的人们招拢来，向他们承诺悬出赏格：凡能缉获凶犯归案者赏银1,000元；有通风报信，因而缉获凶犯者赏银 200 元。然后他在洋人居住的郊区巡查了一遍，并找浩官和于协助他搜查，但一无所获。柏贵也发布告示，悬出赏格（金额与前述相同）。晚上，我和皮姆上尉乘骑出巡洋人住区；并无异状[38]。

1858 年 5 月 31 日

6 时起床。此后直到下午 2 时，始终埋头工作，从事于翻译有关绑架和侵袭案件的各种告示和信件。被劫走的人员仍无消息。我预料几天之内必将赴白云山查勘，而且必然要我随行。鉴于妇女一概不准前往，看来那里有好玩儿的。

我有了一种非常糟糕的习惯，就是每晚一到 7、8 点钟就要打瞌睡。昨天已经穿上了白色裤子，这还是今年第一次（5 月底到 9 月底可以穿着白色裤子）。

（接下去是一连串空白页，日记到 7 月 1 日重新开始。）

1858 年 7 月 1 日

昨夜“阿克大勇”号的詹金斯舰长（以前是“科莫斯”号的舰长）在黄埔附近受到乡勇的伏击。他伤势颇重，还有他手下的 8～9 个人亦然。

皮姆的传令兵布洛里昨晚得霍乱丧命。得病仅几个小时。

1858 年 7 月 2 日

詹金斯受伤的地点，黄埔附近的一个村庄被彻底摧毁。

1858 年 7 月 3 日

今天上午 11 点钟有 4 个属于“卡汀纳”号的法国水兵在水师门（永靖门）外大街上游逛的时候，受到三四十个乡勇的袭

副脸色平平的样子等待命运的判决：

要，好在你虽偏却在少年，无妨；

“十三到十七岁伤官——官怕伤，被伤则祸，其时你患过

今天忙于抄写和翻译黄给蔡署理按察使的一封公函，函中通知他，皇上批驳了对他的任命，并说将由现在佛山的粮官王某来接他的任，而候补道李某则将顶替王的职位。

我知道柏贵以及蔡和恒祺都降了级，并撤了职。

今夜很不舒服，并且很不自在。

1858 年 7 月 4 日　星期日

中国警察报称，昨晚在花地的一条船内发现了那个法国人的脑袋；而且到今晨 6 点为止，该船仍然在那里。派出一个包打听，去看看那船是否仍在那里（上午 11 点）[41]。

昨夜乡勇们试图焚毁粮秣处：他们向该处发射了 60 枚火箭。但只烧了一个厕所，其他什么也没有烧。

勒克瓦说，在盐塘和榕树头，前者离东门 3 英里，后者 6 英里之间有乡勇3,000多人，有的住在庙宇和宗祠内，有的住在帐篷里，都由何、唐和金桂齐指挥。昨天杀害法国人的就是金的部下[42]。

下午 3 点，奉专员之命去见蔡按察使，告诉他，联军总司令已决定对住在永靖门外的老百姓科以罚金4,000元；并已指定他去征收这笔罚金，限他在星期一即 5 号下午 4 点钟以前把罚金交到专员手中。就是说，限他在 24 小时内办完此事。按察使的答复是要求我去回禀：第一，自从联军进攻广州城以来，有钱的老百姓都已经离开县城逃到乡下去了；第二，该处从来不是特别富有的地方；第三，在法国人遇害的地方附近拆毁了不少房子；并且为了给一个死难的法国水兵报仇，已经枪杀了五六十个中国人，如今还要求征收偌大一笔罚金，这未免太离奇，欺人太甚；第三（原文如此），他无力征收这样一笔款项；如果派人去向老百姓要这笔钱，那么谁去谁就会挨揍，挨骂。鉴于这些原因，蔡按察使深恐无法使将军如愿以偿。我对向他提出征收罚金一事颇

感羞惭，我根本不赞同征收这种罚金，因为这样会使中国人把我们看得比他们本国的官员们更贪婪，更见钱眼开。

下午4点前后，中国包打听回来了。他说，藏有法国人脑袋的那条小船没有离开，曾、白和刘3个绅士都在船上。法国人准备在晚上前去踏勘一番。

粮秣处附近的一些印度兵枪杀了6～8个中国打手，并拿走了几个火箭弹筒。

晚间在哈罗威家度过。

1858年7月5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收到一张东方汇理银行的支票，面值为493.46元，其中116元是车马费，其余377.46元是6月份那一季度的薪金。

昨夜河南发生了几起盗案，喧嚣甚剧，等等。巴夏礼太太今日乘“广州”号去香港。

有一种谣言在流传着，说是已经草拟完成了一个条约，此条约将在天津签订[43]。

另一个谣言说是乡勇们将在8号，就是星期四，7月8号对我们进行夜袭，那天没有月亮。我估计，如果他们不在本星期内的某一天来袭击我们，那就根本不会来进攻。

上午拟就了一封信，是准备教训柏贵的。信中通知他，在联军占领广州期间，中国人不准使用“凌迟”这种刑罚来处死犯人[44]。

法国人派遣的人在潘定官的花园上岸进入现场，当时毁坏了许多东西，估计损失在30,000元以上[45]。他们没有抓到那条船，因为看到河内横着阻塞物，无法通行。

下午4点到蔡处，通知他，关于征收罚金的事，法国人给他宽限24小时。

负责守护柏贵官邸内我们住处的官员们奉旅长之命，在我前

往柏贵家中时要为我配备一支包括1个下士和5个列兵的卫队[46]。

我回来时，科尔维尔上校和一个朋友由几个水手侍候着在衙门内呆着。他已无法把剑从鞘内拔出来。他们一行于下午5点经由西郊回到了“卡米尔”号[47]。

1858年7月6日　星期四

今天浩官过来说，今天上午第二批约六七十个人又到潘定官家大肆破坏。他还说，昨天晚上约6点钟有六、七个洋人经过西郊时，被一帮身佩抬枪大刀的乡勇追赶。后来不知怎么的，那些乡勇们看不到那些外国人了。于是就被浩官的部下瞎指点一阵。他说，那些部下告诉乡勇们洋人是往这边去的，实际上是往另一边去的。那些洋人一定是科尔维尔一伙，他们差点儿逃不脱。

翻译了一段秘密消息，其内容是乡勇们要杀外国兵，并要发射火箭，以便使英国人扒房子，把老百姓赶到城外去。他们的目的是使英国人疲于奔命，好让他们撤退。如他们拒不撤退，乡勇们就要前进，并要消灭我们而不伤害他们自己人。这些人当然都已经离开县城了。英国人则接到通知，要他们贴出告示，声明不再扒房子，这样来诱使老百姓留在城里，以挫败乡勇们的计划。——啊咳!

今天清晨，马蒂诺上尉带着一帮人搜查了湖秀东街，带回来8个犯人——天晓得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说不定里面连一个乡勇也没有[48]。

昨天有两个人得霍乱死了。

今天赫利亚特和雒魏林医生与我们一起吃午饭[49]。饭后和埃文斯一起策马去找两所房子的地址：一所在寒宁里，另一所在城隍庙对面的洪盖街。将军听说这些房子里有些乡勇：结果找到了，并把这些房子的位置也牢牢记住[50]。我们后来骑着马沿城墙

回家。和雅洛布斯喝巧克力。巴夏礼练骑回来后找我去，喝了一大杯香槟和凉水，真过瘾。他告诉我，接到一封天津来的信，信中说，条约已经签订，俄国人在海南开辟了一个商埠，美国人在台湾开了一个，英国人在汕头、镇江和通州各开一个；派公使驻在北京或随时可以去北京：洋人凭护照可以走到全国任何地方。

九点半与埃文斯中尉带着警察外出，并有赫里奥特中尉和水兵同行：搜查了前述两所房子，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一所房子内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另一所内有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夜间11点回来。抽了一支方头雪茄，喝了点啤酒，然后就寝。

1858年7月7日　星期三

据报今夜有人要袭击粮秣处。哈罗威上校接到琼斯先生（?）来信，证实了巴夏礼的消息；并说海军陆战队可望于10月份回国。

今晚与巴夏礼先生乘马外出。我们（共5人）路出东郊，在马上手执左轮，以备万一。大街小巷尽是些邋遢家伙。他们看见我们就跑。到那边去练骑，真是傻透了！归途中我们在粮秣处碰上了将军，就和他一同策马去东门。

1858年7月8日　星期四

今晨2:48便起床——通宵未成寐。3点1刻，与巴夏礼、埃文斯，另外还有5个传令兵，士兵60人乘马去粮秣处，在那里又加上了30名警察，然后开始往东郊进发。到达离小东门约1英里处时，我们发现巴夏礼少校那一行60人没有跟上我们和粮秣处来的警察队，因此我们还得派人回去找他们。等了差不多有一个钟点，巴夏礼忽然想起要乘马回去看看，派回去的人们怎样了。他走了约有10分钟，那一行人就打另一条路径赶来了。这样，我们又得等待巴夏礼。真它妈的过分多事了！老是纠缠不

清，这些乡下人呶！我们出了城，把东山庙包围起来。我们到那里时，正好看到那些据说是藏在那里的四五十个乡勇越过后面的群山逃跑[51]。抓了几个人：都是倒霉的老头儿和男孩。看到盐塘有一簇狼烟（好似一杂小蘑菇云）。所有任务都完成后与海军队伍汇合，他们共有100人由东北门而来。返回城时于七点半前后到达。今晨居留地开门时警察受到攻击。他们射死了3个，射伤了两个来犯者。两个警察被用便桶烧伤：阿尔森下士和列兵赫林费尔德由于表现良好，分别获得1个月和20天饷银的奖赏。

到蔡按察使处：告诉他马蒂诺上尉要把他没有征收4,000元罚款的事报告给总司令。下午5点，和将军率领一队65团的孟加拉土著步兵去了离北门约两英里的地方，到了那里的一座庙宇，据说马霍梅德的母舅就埋葬在那里。这是一座精美的方形古建筑物，里面古木参天、香花遍地。那里有幽美的农村。策马由东北门而归。我们在城外的时候，向我们周围的农村发射了许多发火箭和炮弹，以确保我们的安全。我的小马可真是吓得要命。

我正在经历一次心理变化：与往常不同，对异性的要求非常淡漠；对想象中的私通不感兴趣。

今天收到雅妥玛来信。

1858年7月9日　星期五

英国邮件到达。

昨晚西南门外有一个中国男子被枪杀。他是关城门时用便桶攻击门卫的一伙人之一：他不愿让警察搜身。今晨该城门口又有一个人被击毙。

今日潘来访[52]。辛先生讨回去10支矛。他说已经去过永靖门，但是无法检查街道，那里的许多死尸臭气熏天。我把此事告诉马蒂诺上尉时，他大发雷霆，认为潘太无礼，不可饶恕。

下午，我受托把潘陪送到马蒂诺上尉处，这使我深感意外。

后者非常愤怒，正千方百计，寻找正当理由，以便向潘发泄。但是我极力排解周旋，使那怒气冲天的大块头老先生尽可能摆脱尴尬局面。

饭后与埃文斯一同乘马外出。东郊起了大火——在西南警察所。弗朗西斯上士告诉我们，他在下午巡逻中枪杀了一个中国人，当时此人在他们面前挥舞双剑。

五仙门和联军登陆地之间的房子，现在几乎已经扒光了[53]。

今晚颇感不适：必须节制我的饮酒量，包括啤酒。从利得尔那里弄到几包药粉。

1858 年 7 月 10 日　星期六

皮姆上尉搜查了曾先生指称为有许多坏人的区域。金库据说是 100 多个坏人的巢穴，但里面只有两三个看守人[54]。那天逮捕了约 55 个人，带到衙门里去了；现在（下午两点半）他们正在受审。我并不十分相信我们的谍报人员送来的报告。但是如果对这种报告置之不理，那是不聪明的。关于曾，据说他的任务是把最不切实际的计划告诉我们，以使我们迷失方向。今天他警告巡逻队不能通过东郊的太和街[55]。

从收到莱勒尔别墅的奈特大叔发出的一份文件，我看出来他的姊妹安娜·塞西利亚死了（边上有一个大 X）。

今天颇感不适，今晚无法外出骑马。

1858 年 7 月 11 日　星期日

今天巴夏礼先生和他的传令兵单独到联军登陆地放狗打猎。我担心伙计们会把他抓起来。

今天病了。

今天奥地利分舰队司令官，男爵什么的（原文如此）和军官们拜访了蒙古将军。他们和巴夏礼共进午餐。我没有过去，因此

没有见到他们。

昨天夜间有人企图纵火焚烧正南门的营地[56]。打进来5颗炮弹，火药爆炸，火箭乱发。警察有时放几枪，但没有击中什么人。

1858年7月12日　星期一

昨夜粮秣处再次遭到袭击：10点到12点时分火力很猛。前天夜间，岸上也向“大黄蜂”号开了炮。

今天早晨阿礼国乘坐他的驳船来此，准备在巴夏礼家小住数天，他是星期六来到的[57]。他看来很健康。

今天见好多了。

今天拆掉了3个得胜坊（叶和徐），第三个牌坊在东门附近，我看着它塌下来的[58]。先是捶掉几块地基石，然后用一根绳子使劲拉——要由50来个壮汉来拉——然后牌坊就倒塌了。

听说约有24个乡勇在东门附近的一个寺庙内。9点，和皮姆、埃文斯，还有20名警察一同出去，搜查了那个地方，但毫无所获。

1858年7月13日　星期二

今晨，中国苦力劳动队和徒手的军运铁路看守一起，在4名印度兵看守下，由军需部门的两名军官指挥着在东郊粮秣处附近拆房屋时遭到了袭击。一大群乡勇向他们开了火，杀死了一个法国水手长、两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两个印度兵受了伤。铁路苦力们和看守人员赶紧跳过矮墙逃走。有一个陆战队士兵大腿上中了子弹，他对军官说，“先生，希望你不要把我撂在这里。”他们的反应很义气。他们把乡勇们顶住了，直到法国和英国的卫队开来。然后他们就向乡勇们开火。乡勇损失了四五十个人。

今天收到星察理于5月13日从埃克斯小教堂发来的信。他

将于本月结婚，10 月份来这里[59]。

饭后乘马去西南（?）城，看到一个得胜牌坊被拆掉。这种活计不好干，人们忙了足有一个多钟点。有沙氏芭蕾尔（?）乐队到现场演奏；这种音乐很好听；在中国听到这种音乐是终身难忘的。

整个晚上都忙于处理一份信件。据说花县的绅士们把这封信写给各区地方官，指示他们贴出告示，号召受洋人雇佣的和与洋人做买卖的老百姓立即和洋人脱离关系。

1858 年 7 月 14 日　星期三

晨 5 点和埃文斯、卡林顿及夏普一同乘马外出，沿着城墙转了一圈。7 点回来，着手翻译那“奸逆”信件[60]。

西南门警察所的警察巡逻队正在福利大街（叶名琛的旧衙门前的大街）上巡逻，乡勇们向他们开枪了。这支巡逻队共有 14 个人，向他们开了霰弹枪。其中 2 人立即被击倒，另外 7 个多少受了点伤。这些倒霉家伙由几个中国人扶持着好不容易回到了驻地；那些中国人是被迫效劳的。还有 5 个没有受伤的开枪打死了几个中国人。在驻地素来表现良好的勒尔森下士——中了致命的一弹，回到驻地没几分钟就死了。有一个必须锯掉一条腿，另一个则是一条腿再加上一个手臂。总而言之，情况是骇人的。想来那枪筒里面一定是挤满了子弹，一直装到枪口为止；因为我看到从一个人身上取了 3 颗子弹。这是沉重的铁珠子，直径约有 1 英寸的 3/4。为了回敬他们，早饭后派出去一帮人把长达半英里上下——或者还更长些——的一条大街烧个精光。

文件的翻译工作还没有结束。晚间和埃文斯，还有克罗克的几个部下到西郊去找一张告示。据说南海县的行政官华某已经把这种告示张贴在西郊。这是执行番禺绅士的命令。告示号召所有的仆役人等一概离开洋人，并禁止中国人以任何形式同我们做买

卖或是发生联系[61]——告示中说，如果没有内奸帮助，我们根本就没法过日子。我们在西门以北不远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这种告示，并把它从墙上摘了下来。这张告示带回去以后，我还得把那些扯得零零碎碎的小纸片拼成一整块，这又费了我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

1858 年 7 月 15 日　星期四

翻译告示。

“羚羊”号汽船从北方来到广州[62]。条约已于 6 月 26 日签署。(赫德在页边注有星号) 中国的整个海岸线都对贸易敞开了。战争的费用要由中国人负担。广州则被占领，作为付款的保证。

今晚骑马外出，去看看福利大街。除其中一个属于江西人的庙宇外，其余已全毁[63]。

今天听说，有个名叫邓肯的商人和他的葡萄牙仆人在前天被乡勇们抓住后带走了。他们不懂事，是在西郊登陆的。邓肯当时似乎有些喝醉了。

前几天，粮秣处发生战斗的时候，有两个少女帮助一个受了伤的法国人渡过一条小河回到了他的朋友处。这两个少女被乡勇们抓起来并被带到元塘；而且我相信她们今天被“凌迟”处死了。

“士绅们现在是出了赏格，在城内每抓到一个中国士兵赏 20 元，抓到一个蒙古人赏 30 元——”闹得很[64]。

今晚厄普顿上士报告说，他的驻地遭到了袭击，并且有 200 个乡勇住在离他们驻地不远的一所房子里。这消息是军事后勤部队的坦普尔上尉告诉他的。而坦普尔的消息则得自一个中国间谍，这个间谍愿意为他领路，带他到那房子的所在地。警察就集中在厄普顿上士的警察所（小南门)[65]。夜间 11 点钟，皮姆上尉带着总部警察，从贵德门出城，沿着城墙一直到厄普顿的警察

所[66]。我也跟他一同去了。然后我们又去找坦普尔上尉；他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人。然后我们和那个间谍一块出发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但是鉴于他带我们去的那个衙门里已经空空如也，我怀疑那里曾有些什么事一直在进行着。凌晨两点半返回。

1858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五

精神萎靡已极。

曾报告说，昨天有两个外国人乘坐着一只由中国人拖的英国船被乡勇们带走了。他并说，邓肯和他的仆人在西郊的十三浦被人砍了头，尸体至今还在那里——派他去，如果可能，就把那两具尸体找回来[67]。

榕树头的6,000乡勇据说已来到了元塘：这就是说，离城垣又近了三四英里[68]。元塘离东门仅 3 英里。据说6,000人中有一部分已经散开，并进入了郊区和城垣，随时都可能出乱子，什么样的乱子都可以闹得出来。

在福利街向警察开枪的乡勇们是青标乡勇[69]。

今天下午有消息说，有一个洋人刚在东北街遇刺身死。埃文斯带了一班人去调查。经过一番搜索，（他）发现弹药库山脚下的一条街上有血迹，而且从这里到东北门之间也有。循着血迹在这条街上走下去，就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在这死胡同里搜索了半个小时，最后在一口井里发现了那尸体[70]。结果这尸体还是兰顿下士的。他原是医务部门的，但在军事后勤部队服务，是个下士传令兵。他的头颅已经不知去向。右手已经和手臂分开，只连皮而不带骨。左手则被用乱刀砍得很可怕。胸部心脏区有两三个刀切口。看来他是惯常要经过这条街传达命令的。据说参与这次凶杀的凶手有 12～14 个人，为首的两个叫阿干和阿开：据传这后一个人曾有一次或两次作为一个嫌疑人物落入我们手中。

昨夜，有几个 9 磅的炮弹和一些弹片咯隆隆地打到城内和第

70团以及飞来寺中，是由乡勇们设在山头上的大炮打出来的[71]。他们还在那里干。有一个抛掷物曾打衙门上空飞越过去。但到底是一颗炮弹还是一枚火箭，则不得而知。

1858年7月17日　星期六

今晨4点起床——5点带着一支130人的巡逻队去到西郊。转了一大圈，到8点方回来。在长寿寺和华林寺附近的几条大街上看到成群的人在游游荡荡，好像都是乡下人。没有问题，据说乡勇们就是聚集在城郊各处的[72]。店家开门的很少，许多饭馆和茶馆都挤满了人。长寿寺里的假山庭院很好看。后面有个小池塘，满布着无数精美绝伦的水莲花，真是媚人。

夜间1点左右，城外有两门重炮轰鸣起来。我想那第一门炮打出来的炮弹是从我的寓所附近飞过去的，因为我让炮弹的声音给吵醒了。

今晨收到休士来信：我的400元的期票安然送到了帕特里奇手中。

昨天兰登被暗杀所在的那条街道被纵火烧了，火势一直延烧到今晚，许多邻居的房屋也尽毁于一炬。人们不禁要说，那些中国房主们对各路乡勇一定是感激不尽吧！我相信现在若投资于房产，一定会获利颇丰的。但是风险也不小呵。

晚上在哈罗威上校家度过。

1858年7月18日　星期日

昨夜炮火甚烈。火箭就像泼来的暴雨。

今晨3点左右，一个警察巡逻队沿着城墙从正南门走向小南门。在走近文明门的时候，一包火药在他们脚底下爆炸[73]。这是中国人放在那条路上的，他们估计巡逻队在夜间某个钟点要打那里经过。他们把一端点着的香系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穿过火药

包，又越过新城内一座房子的墙壁，穿过屋顶。估计屋顶上有一个看守人，在巡逻队到达适当地点的时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因为就在那个时候，有人把绳子一拉，爆炸就发生了。当时曾听到有哨哨的异常的敲击声。有两个巡逻队员被烧伤得很厉害，需要立即送到医院去。我估计，凡是与牵线的那座房子相邻的其他房子，而且实际上是与警察所附近的旧城墙相连接的所有房屋都会被烧着的。后来巡逻队去搜查了那一带，他们枪击了1个人，另外还逮捕了14个——但是我猜想，那次和往常一样，真正的肇事者都已经走了。

全城的老百姓都开始希望乡勇们不要再闹事了，他们对龙、罗和苏都毫无好感：现在人们称这3个人为海龙王、阎罗王和苏城隍（?）：这是统驭魔鬼的3个神灵[74]。

要不是天气出奇地凉爽的话，那就是我对炎热的气候已经习以为常了——除了每天1～3点前后就感到昏昏欲睡而外，我不觉得炎热对我有在宁波时那么大的影响，连一半也没有。

上个星期内洋人的死伤数字：——

两个被劫走；3人被枪杀；14人受伤。

1858年7月21日　星期三

昨晚1点前后，我被一阵可怕的爆炸声惊醒了。这声音来自160磅火药的爆炸，我的住房受到了震颤。该炸药是乡勇们放在西南城墙脚下的。爆炸发生后，他们接着就对城垣发动了进攻。两点，集合号响起来了，我立即起床，并赶赴沃尔什上校住所前面，在那儿一直待到4点。战斗一直持续到六点半钟。两点多的时候，我和利得尔先生一同走向办公室去，刚步下台阶，砰的一声，一颗火箭从屋顶上飞过来，正好落在我们面前的地上，砸得火星四溅，差点儿送了命。乡勇们从西、北、东三面发射大炮、抬枪和火箭。他们在西北方向则设法登上了城墙。据说我们的枪

弹和大炮杀伤了约有 200 个来犯者。我相信我方的人一个也没有中弹。到 7 点钟的时候，我们看到进攻队伍向北开拔离去。队伍约有4,000到5,000人[75]。

四点半钟，乡勇队伍进入了太平门的旧警察所，并从那里向在城内西南角的新警察所开火，一直持续到六点半钟。有一颗炮弹从西门沿着城墙射出来，最后落在北门的法国人所在地，在那里爆炸，但没有伤着人。

巴夏礼先生今晨去香港见卜鲁斯先生，他要把条约送回英国去[76]。

刻字工匠们今天为了发布告示而忙碌异常，这张告示要向老百姓宣布已经签订了一个条约。

1858 年 7 月 22 日　星期四

昨夜平安无事。今晨南海县监狱中的犯人（们）越狱了[77]。当时博伊德上士正走过南街，碰上了这群犯人——约莫有 100 个，他们正在用竹板抽打他们的狱卒。他们用砖头砍砸博伊德上士。于是他就开枪打死了一个犯人，然后把另外七八十个赶回到牢房中去。那天在南门又逮捕了另外 27 个犯人。其中有用棍棒、石子攻击岗哨的，又被击毙了一两个。在这里被捕的人中有一个叫牛阿四的，是个叛逆头子。已经悬赏1,000元缉拿他。他正坐着轿子走出城门，胡子刮得光光的，衣着很富丽，并有一个仆人随身侍候。他非常迫切地恳求释放他，并拿出 300 元向上士行贿。

11 点，我和埃文斯去到西南郊张贴了 60 张安民告示。另一帮人在城北张贴了同样多的告示。我们浑身都湿透了，到两点半钟左右方回来。埃文斯和我一起吃了便饭。

1858 年 7 月 23 日　星期五

昨晚约 6 点便就寝，一直睡到今晨七点半。昨夜稍有交火。

今晚埃杰尔送来一份告示，是文极司脱拟稿的，要我翻译：该告示昭告黄埔的老百姓不要害怕乡勇等等。——弄好了 20 份，于晚上 11 点交给了埃利斯。

1858 年 7 月 24 日　星期六

收到比利·哈特 5 月 1 日的信。

巴夏礼先生和将军昨夜从香港回来。条约于 7 月 4 日由清帝批准，22 日由香港送回英国去。

今天拜会柏贵和鞑靼将军。从我们谈话中可以觉察到，英中之间的麻烦短时期内不会休止。前几天有几个鞑靼人被乡勇们劫走了。乡勇们说，22 日夜间的事要不是鞑靼人向我们伸出援手的话，他们本来有可能重新占领广州城的。鞑靼将军说，对方认为鞑靼人和洋人太亲近了，这是由于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被逮捕过。因此，蒙古人不便接收英国人的任何东西，如粮食或米谷之类的东西。

饭后和巴夏礼先生在花园内做了长时间的散步和谈心。我觉得他似乎有些呆头呆脑的，而且又特别唠叨。

1858 年 7 月 25 日　星期日

（页边有一个星号）到今天为止，我到中国已经整整 4 年了。

整天忙于翻译“醒世短文”[78]。

传闻黄不是自己到花县去的，而是被那里的绅士集团裹胁去的。他在那里待着，就足以证明，我们的安民告示是伪造的。各处的老百姓都已把我们的告示扯掉或是销毁掉。

下午骑马去西北城角和弹药库山一带。西北棱堡的一角已在

前几天夜间的爆炸中崩塌殆尽。从曼上尉的炮位看去，景色很好。

1858 年 7 月 26 日　星期一

今晨埃文斯来到河南，在河南张贴告示——警察上士们说，各区有更多的商店都开门了。

今天把阿志派往澳门；给阿姚送去 20 元钱，并给他 10 块钱买两顶帽子，一瓶白兰地酒和一匣方头雪茄烟[79]。

今天上午很热。

下午柏贵派他的翻译来此，带来口信说，乡勇们已经指示他们在西郊的人，今夜天黑后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外出，因为他们打算对城西北区防守最薄弱的区域发动进攻。尽管这几天是月满的日子，但他们仍然希望能够得到云和雨的帮助。事实是最近几天以来，招募登记一直在积极进行。浩官去了杭州，是新任钦差大人叫他去的。他到了那里，就被扣留了。钦差大人要求用 200 万两银子（原文如此）赎他的身。（后加）（后来是答应给 35 万两后获释的）

今天下午乘马上山，坐在海军陆战队的临时军营旁小憩，和风拂面，颇感怡然。

1858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二

昨夜月色皎洁，万籁俱寂。

今晨到柏贵处，告诉他由于都司等自愿给几天前在福利街打死和打伤的警察人员捐助些钱，并考虑到死了两个人，另有几个受了重伤，因此他们打算接受2,000元，并把它分给死伤人员的家属[80]。

在办公室内忙于整理我的翻译记录本。

1858 年 7 月 28 日　星期三

昨晚有一个炮手，名叫鲍威尔，由于醉酒，在东北门附近的一个炮眼里掉了出去，让乡勇们抓走了。

今天柏贵派人来说，今天夜间或是 30 号以后的某一天，有两千个火绳枪手要进攻东门，同时西门还有人手较少的轻炮手给予他们声援和支持。

今天上午宗对我说，应对试院里那个小工头儿杨贵修加以监视，因为他跟乡绅们是串通的。小工们（1,000多人）到某天夜间将会缴印度兵的械等等。奇怪的是宗所报告的和昨天夜间我收到的孟甘和罗存德的信中所说在意思上不谋而合，他们在信中提醒我们要注意杨贵修。

今天上午 3 个榴弹炮队巡逻了西郊，并在长寿寺汇合——我随其中的一队走到绸缎街尽头：在长寿寺盘桓了一个钟点，观赏了它的各种美术品并与和尚们闲聊了一会。

1858 年 7 月 29 日　星期四

昨夜无攻击。前天法国人抓住了一个真正的乡勇，他袖内藏着一把匕首。

今晨在南郊逮捕了 250 个犯人。该地的某些老百姓打了“大黄蜂”号旁货郎船上的人[83]。

今天翻译了黄钦差发来的两封公函。其中有一封是第一封的修正本；另一封中说，如果被激怒了的老百姓杀洋人等等，那么这位大人为洋人深感遗憾，因为众怒难犯呵。他在致柏贵的私人信中说，他已如此这般地答复了二位专员，因为在没有接到朝廷诏书之前，无法制止目前的事态；而且他是分别应付，“答复各个具体问题而不涉及全面性的敌对问题”。

今晚在花园中跃马时摔了一大跤。

1858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五

收到考克斯、高尔和威尔逊的来信。

香港和澳门的老百姓都在外逃。由于缺乏供应，那里的洋人们不久将严重受困。

巴夏礼为他的夫人在澳门租了一所住宅，年租金 800 元，要先付 400 元。在动乱的日子里，英国夫人简直是个累赘。

业经审查的 250 个人，今天大部分释放。

今天与潘长谈。他的妹妹是嫁给有名的龙的一个小兄弟的。他说苏很穷，但势力很大，是全省的老师，他击败了叶，现在正在考验龙。都司等送给福利街死伤人员家属的2,000元今天交款：其中 3 个已死[82]。

从林赛上士处得到 10 多瓶白兰地，（空白）元（页边有 * 号）。

1858 年 7 月 31 日　星期六

今天很热。3 点在沃尔什上校处吃饭。

西门有一个人由于曝晒过度，中暑而死。

1858 年 8 月 1 日　星期日

今天实在太热。整天读“Woh to mei”（?）。乡勇们想尽一切办法向城的周围集结。因此，我估计说不定哪天夜里我们就会受到攻击。

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都在纷纷离去，供应情况变得很紧张。香港的人大声疾呼，以致将军不得不在今天到那里去进行商讨和决定该怎么办。

阿志，真该死！还没有回来。

又从西门带进来 5 个人。中暑和发烧。倒霉的赫里奥特病得

很厉害：是发烧。

1858 年 8 月 2 日　星期一

今天比昨天更热。赫里奥特病体见好。

（在日记中有一块信纸，赫德在上面写道：）8 月 2 日。到现在为止，乡勇们仅作了一次坚决夺回此城的尝试。上月 20 日夜间有5,000到6,000人前来，用火箭和抬枪弹把我们打得够呛——（小纸片上就写了这些）。

1858 年 8 月 3 日　星期二

今天潘来，带来一封钦差大臣给前按察使蔡某的信，命令他去杭州；并说钦差大人收到了朝廷诏书，通知他和约已在天津签订。因此按察使就想要离开。联军方面称，他们要黄通知他们以后，方能考虑蔡的要求[83]。可是他们有个主张，认为在其他应该住在城内的官员们回到各自的衙门去以前，把我们“心爱的鸟儿”放出去，或是让他们离城是不妥当的。

柏贵让潘送来一封信，内称大约在 4 月 25 号（大约是他被拘禁的时候），他曾奏请皇上给 3 个月病假（狡猾的坏蛋！）；但是他现在身体很好。因此，虽然还有 3 个多星期的假期，他还是立即要把在杭州的官印请回来，以便复职。多狡猾的老先生呵！他不说身在囚室[84]，却向皇上上书称病乞假；现在和议已成，他眼看着即将获释，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复职，重当他那“任人愚弄”的巡抚。

潘告诉我们一处某流氓集团的啸聚之所。最近，我们要找个夜晚，搜查他们一下。

今天有袋火药送进了衙门，放在桑普森宅后的一个竹林中，后来爆炸了。现在中国人没有通行证不能出入了。本来就应该这样。

今晚在西郊尽情地驰骋了一番。

1858 年 8 月 4 日　星期三

今晨巴夏礼先生去澳门为他夫人布置住所。我估计他四五天内不会回来。

今天日出前揣着一支手枪前往西郊。归途中搜查了一个庙宇和一个大当铺，因为估计那里藏匿着一些枪支。在一些屋顶上爬来爬去煞是有趣；所有屋顶上均有阶梯——没有发现什么。8 点到家。埃文斯来，和我一起吃了早点。

下午一点半钟，收到黄钦差致总司令及两位海军提督驻广州代表的信函，告诉他们，他已经接到通知，获悉和约已在天津缔结，因此他这个大臣不会与我们为敌；这点两位总司令完全可以放心；他们最好把军队仍旧掌握在手中，否则衅端可能重起，等等。黄大人本人现在正在来广州途中，只等外国大使回到广州并接到他们的信件时，即派代表和士绅们去安排一切。把此信译完后交给勒奎斯（?）抄写。利毕斯由于拒绝抄写某一文件而被拘禁，并已被革职。

今天上午，由几名中国人率领的南门警察巡逻队发现新城墙上有一支枪，枪口对着联军大街，枪内装着 83 颗弹丸，是昨天夜间才放到那里的。赏给每个中国人 25 元。

十点半带着 50 名警察到大石街（橡树子街）的一些房子内去逮捕乡勇。据说他们藏在那里[88]。街的转角处有一对双门，很难打开。我们通过了大门，蜂拥进去时，发现有 10～12 个人在屋顶上奔跑（?）。逮住了 10 个，但深恐其中没有一个是我们所要捉的。午夜时分回到家中。

1858 年 8 月 5 日　星期四

宗告诉我，苏在他的同伙罗和龙的眼中成了个可疑的人物，

因为他们和我们的李先生是互通消息的。李（据说）从前是他手下的人[86]。

从街上捡来的一张纸是黄给候补道韩某的信，通知他和约已订。

1858 年 8 月 6 日　星期五

下午到柏贵处，把黄钦差命他转交的致总司令的信函退还给他。两位总司令阁下认为此信语含敌意，根本不予收受。从四点半起到六点半钟，经过一番折冲，颇费唇舌，才使柏贵等人承认，将军有（许多?）充分的理由认为此函用语极为侮慢。于是柏大人收下了该函，并说他将附函解释，予以退回。我想黄将感到很不高兴。但是一开始先来个气势汹汹总是有好处的，大可以防止在往后的交往中受到傲视和愚弄。柏贵希望在 10 或 11 日把门卫撤除，他将于 14 日把官印请回来。到那时他要举行“拜印”仪式[87]。

从柏贵处回来，李告诉我，昨夜有人看到有几个人在文明门附近把火药和剑等从城墙顶上送出去。这消息传达给皮姆上尉后，他派了一队士兵埋伏在那里。十点半钟，他们听到有号角声，同时新城城门附近有人讲话；另外老城内有人把堵塞城门的砖头搬走的声音。这时他们就脱去靴子，走下来，用枪射死一个人，逮住了 12 个，其余的 20 多个则逃跑了。

薄暮时分，坦普尔上尉在法院抓到几个人，这些人正在向他的小工们行贿。每个人都佩着一个徽章，上面写着（东江义勇队）等字样，并且盖着一个红印章（钦差官办团练总局）[88]。当夜他们被送到厄普顿上士的驻地关押起来。他们的辫子被捆绑在一根梁柱（?）上。半夜死了一个，大概是吞鸦片死的。

总司令部下来了一个通报说，南门有受到某种猛烈攻击的危险。皮姆、埃文斯和毕格内特先生都赶到那里，守了一夜。

1858 年 8 月 7 日　星期六

昨夜 1 点到今晨拂晓，火箭如暴雨般飞入城内。今天上午宗告诉我，入夜本来要发动一场进攻，但因城内配合工作没有组织好而推迟了。

整个上午都忙于整理有关昨天与柏贵闲谈的冗长记录。

接家信：是 6 月 5 日发出的。全家都好——收到巴夏礼和休士的信，埃杰尔上尉处来了一个官员。上星期二，孟甘带领 3 个人打着停战旗在临安登岸，并在那里强贴了一些告示。当时有大批士兵和乡勇冲出来向他们开火。他们一行中有一个被打死，另一个受了伤。为了报复这次暴行，分舰队司令官斯图尔特准备炮轰临安城，这是金桂齐的故乡。他派人给我送来一份通告，要求译成中文。该通告警告老百姓要离开该城，并说明了要炮轰该城的理由[89]。我希望这些炮艇能够好好干。

联军代表和海军提督们都没有来到南方，他们对广东的事漠不关心，否则就是害怕自找麻烦[90]。

今晚骑马顺着跑道漫步了一回，很悠闲。

1858 年 8 月 8 日　星期日

今天很忙。

给巴夏礼写了一封长信。

逮捕了两个人，他们属于旧城内的艺文堂[91]印书局，现在从事于为番禺县知事黄某印刷（不可辨认）谴责洋人，并号召中国人离开他们的告示。在店内的印刷品中发现了悬赏捉拿洋人或其头颅的告示。饭后搜查了梁头村内的范家祠，什么也没有发现。骑马绕城墙一段缓步而行。回家后翻译通告，布置缮写员抄 50 份。

1858 年 8 月 9 日　星期一

写家书两封，一封致父亲，一封致玛丽；另外还寄了 5 份报纸。又给巴夏礼写了一封长信，给休士和孟甘也写了信，并给前者附寄了一张 22 元的支票，给后者一张 20 元的。又给前者寄了一张文极司脱的 493 元支票，请他兑现后存入远东银行我名下的账户。把昨夜写成的给临安居民的 50 份通报送交埃杰尔上尉。

与埃文斯和几位炮兵军官绕新城转了一圈。

到柏贵处告诉他，如果收到黄的经更正的公函，并发布了和平宣言，则两位总司令将考虑他的要求，也就是可以允许蔡前往广州，另外他那衙门的门卫也可以撤走。柏贵的言辞非常尖刻讥刺，那按察使怒气冲冲，和往常一样“不怕死”。

1858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二

忙于撰写昨天和柏贵谈话的备忘录。

潘来告诉我说，柏贵之所以希望先把门卫撤走后再接印，其主要原因是不甘心于就这样把权力交到黄的手中。

1858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三

鞑靼将军拜访了两位专员：他拒绝为他的部下接受存贮在官仓中的谷物，因为这谷子已经败坏得不堪食用。今后他必须重新贮存同样多的优质谷子，他的部下由于缺乏口粮，正经受着深重的灾难：饿死的人很多。前几天这位大人派人到佛山去要1,000 两银子。派去的人仅收到了 500 两，而且返回途中被盗 200 两；因此他得用 300 两银子办成本来需要1,000 两才能办的事情。这位大人也极力辩护，主张柏贵必须撤除看守以后方能重掌官印。许多下级官员都跟着官印走，只要柏贵还没有重掌官印，他们就不回来。目前高级官员的官印似乎处于一片大混乱之中[92]。

忙着翻译番禺县知事的告示：一篇教条化得令人捧腹的文章。

晚间与皮姆一同骑马外出。

1858 年 8 月 12 日　星期四

仍然在翻译告示：同时还在翻译一份敌对性的公告，是出自从香港和澳门回来的人们之手。

下午参加了赛马。

1858 年 8 月 13 日　星期五

临安远征队传来了消息。舰队司令马登受了致命之伤；上校轮机官兰伯特意外地被水兵射死了；海军情报官丹佛斯是我在文极司脱家见到过的，他曾身历过勒克努事件，这次也中了一个印度兵的流弹死了。士兵总共死 1 人伤 30 人左右。据史蒂文森上校估计，中国方面约损失了 500 人。城是毁了，但四郊无恙。

翻译另一份敌对性的公告，是以全省老百姓的名义发布的。它号召中国人离开我们，并且提到了得胜牌坊的毁坏。还翻译了一些其他的中国文件。

乡勇们的口令："你是钟"；应该回答："我是鼓"。

参加了今晚的赛马。"广州"和巴蒂一起跌倒了，并把他抛了下来。"翻了个筋斗"[98]。

1858 年 8 月 14 日　星期六

今天翻译塔蒂（?）。

今晚凉爽。今夜巴夏礼回来了。香港和澳门的老百姓纷纷离去，仆役和小工几乎全走了。巴夏礼夫人在澳门与哈里斯夫人作伴。

1858 年 8 月 15 日

收到休士来信，他已收到我的支票无误。

昨夜大雨，颇凉爽。西郊那个矮个儿小女孩姓李，今年 17 岁，她已许配于“[93]（?）村庄。”婚约并未破裂，已近在眼前。刘对一切全清楚（页边有一处涂抹）。

阿姚羞怯地开口要 700 元，至少要 200——“不行”（此句旁边页边上有 3 个感叹号）。

据说当时的花县（?）士绅已经解散了他们的乡勇——4,000 人[94]；这些人拒不交出武器，并且因被解散而愤怒到纷纷开小差，投入叛乱队伍——嗨！这些士绅们简直是在点火，这火将烧毁些什么？——天知道，将蔓延到什么地方？——天知道。

今晚与埃文斯骑马出巡旧城的东南区。东大街的情况大见好转，各种店铺又开门了，各种摊贩逐渐露面，街上的人也多起来了。

今晚是路易·拿破仑节，因此法国人都兴高采烈。达巴维（海军）上校举行了很有排场的晚宴。法国人驻地城墙上一片灯火辉煌。衙门内有小提琴演奏，有唱歌，还有跳舞会等等。每个法国人的姓名前面都冠有一个“圣”字。这个圣徒的纪念日就是这位“幸福”的天主教徒的节日。

1858 年 8 月 16 日　星期一

上午大雨，天气确实是比前几天凉快。

下午与巴夏礼骑马出巡，通过新城和旧城。扯下了几张敌对性的招贴。

七点半到第二营驻地，在那里呆到深夜。那里正在演戏，演的是“爱尔兰邮报”和“一件大事”。听到几支很好的合唱，放量狂饮白兰地酒，并抽了过量的方头雪茄烟。

1858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二

今晨醒来感到头重脚轻。

下午两点半，送来黄的公函的修正本。早先那封公函中所用的若干措辞业已删除，其他的修改都很精当，甚至含义上有些反躬自责。还送来了他致柏贵的信。他在信中说，等他收到两位总司令的回信后，打算发布一张告示。那时，他可以把两封公函——他的和复信——的内容综合在一个告示中——从而使老百姓放心。用完茶点后进行翻译。

晚饭后与巴夏礼一同骑马到飞来寺（赫德写出了中国方块字），第 70 团驻在此寺内。听到了他们的鼓声和笛声[98]。然后上山回家。

今晚将军由香港返回。

1858 年 8 月 18 日　星期三

今天大部分时间写记录。

克利福德上校即将回国，他的职务由旅团少校特拉维斯接替。埃利斯升任少校，小特拉维斯为随从副官，霍基则为副官。

今晚骑马出巡穿过西郊，四周很宁静。街上的各种店铺都已重新开门，老百姓的害怕情绪已有缓解。

潘告诉我，高兴的小于已去杭州；黄在那里攻击他，因为他穿着一种他无权穿的制服。黄然后告诉他，必须向金库缴纳 10 万两银子，方准出城。

今晚与雅各布斯辩论了半天：他说基督教要通过迫害才能兴旺发达，而不是通过信仰自由或是加惠施恩。

1858 年 8 月 19 日　星期四

正在发烧的沃尔什上校带着满身疖子，于今天离开了，他要

回英国去。

今天接到黄的一封公函，其内容是关于最近从东南门附近被劫走的一个士兵。另外还有一篇短告示的10个抄件。这两种文件我都在今晚译出来了。

将军未经与巴夏礼先生以及另两位专员商讨便草拟了对黄的求和书的复函，信中表示非常“高兴”，并用了一些爱抚之辞。真他妈的！他把巴夏礼办的事都给弄砸了！蠢驴！这里的事他知道些什么，他又为什么不问问就迫不及待地（?）真是狗屁不如[96]。

与皮姆骑马到新城和城墙一带巡视。我的船娘回来了。到联军登陆地去看她。

1858年8月20日　星期五

将军对他起草的致黄函稍做了一两处小小的改动，但坚持他自己的计划，不愿让巴夏礼插手。柏贵未经取得联军的同意，就把告示贴了出去。为此，两位专员对他不客气了。将军提议把柏贵释放。未免太早了——太早了，先生！

今晚骑马上山，归途淋得通身湿透，躲在曼上尉炮兵阵地上的火箭炮筒下避雨时，闪电打得雪亮，真是骇人。紧接着就是一声霹雳般的惊雷。

和雅各布一起进茶点，并用餐。

1858年8月21日　星期六

今天没有什么事可记。雨太大，无法骑马外出。

1858年8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照常无所事事。什么地方也没有去。

1858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一

今天桑普森去香港接布里克登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布夫人是琼斯素来十分痴恋的一个妇人。现在桑普森就要和她结婚了。

今天上午接柏贵来信，内称他将于 18 日重掌官印。他是想用不痛不痒的言辞来实现他关于看守问题的目的。他现在让步了，说是不管有没有看守，都要重掌官印。

石街铺和藏兰街的人质今天都获释了，这是一种仁慈之举，罚金则已赦免。法国人至今还没有豁免那4,000元，它仍旧是永靖门老百姓头上的悬案，而我们却豁免了。我觉得这样事办得很好[97]。

今天给佩恩、艾德金斯、密迪乐、琼斯、康普顿（订阅《北华捷报》）、休士、马吉、明厄·哈特及布雷热等人写了信。（页边上有括号及×号）

今晚与皮姆骑马出巡：各处街道都很热闹。

本月 19 日的中国邮件中出现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在一个叫萨维奇的中尉寄出的一封信中，宣布了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校（?）兰巴特上尉的死讯。

收到邮件：我的信还未到。

1858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二

今天付给刘先生 17.50 元，这是他为我花费的钱。另外，为了同一原因付给罗札里奥 10.78 元，是用于购买汽水等等的。

今天读了一篇有趣的奏略，中国人称之为（至诚奏告），是（监察御史石宝谦大人）写的。他用很通俗的语言打动了皇上和老百姓。

桂良是参与条约谈判的钦差大臣之一。据说他很可能继黄出任两广总督。他是以前地位很显赫的怡良的弟弟；他们兄弟共

10 人，其中 9 个可以用红顶戴，只有第 10 个用蓝顶戴。桂良有一个女儿，是嫁给皇帝的一个兄弟的[98]。

今天与皮姆骑马出巡。埃文斯与我一同吃茶点，吃完后我演奏了小提琴。

1858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二

最近 3 天以来，总是时不时地酷热难忍。不过，每当闷热到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天公就会油然作云，继而雷声隆隆，沛然之雨挟凉爽俱来，倾盆而注！在寒冷而气候多变的季节，人们都认为雨是“一种讨厌的东西”而加以诅咒。可是在酷热的季节，一旦下雨，人们却对它感激称颂不已。

今天上午，一个叫“水兵”的侦探告诉我，南区的士绅在设法招募大批乡勇。自动参加者发给“两钱银子”，打仗时每月给饷银 6 元[99]。这些人要到需要时方加以召集，开始时发给的钱仅是一种聘金。这次招募的目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水兵”把这事和临安的一种谣言联系起来。就是说，临安人对我们非常恼怒，因为我们毁坏了他们的城市；并且下定决心，要向我们报仇[100]。他们的计划是先按兵不动，等待广州重新繁荣兴旺起来，并摆脱一切惊扰。然后，等到我们疏于防范，或者毫不提防，放心大胆地在城内尽情享乐的时候，临安人和他们的朋友们就一拥而出，把我们打个全军覆没。

今天柏贵提出要求，希望把衙门前面的那块木牌拿走，还有明天是他重掌官印的时候，希望把看守人员布置在一个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我相信，这第二项要求是可以加以考虑的，第一条不行。

今天写了一封信给黄，要求他促成两个洋人获释一事；据说这两人在大江桥的村民乡勇手中[101]。

今晚骑马出巡南郊。

1858 年 8 月 26 日 星期四

今晨七点半前往柏贵处，告诉他，两位总司令为了对他重掌官印表示敬意，已决定于 8 点从他的衙门撤走看守队伍。二位总司令对他的信用抱有充分的信心。他们希望他随时随地执行清朝君主的命令。柏贵喜不自禁，谈笑风生。就这样，看守部队撤走了。我怀疑两位总司令是否“错走了一着棋”。他们现在对黄还毫无把握，或者说基本还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他去完成有关我们长远利益的事情[102]。

十点半和皮姆以及另外几个人一同骑马去永靖门，然后回到正南门。约在 11 点前后看到给巡抚送官印的仪仗队穿过该门。然后策马经加尔各答大街返回衙门。进得衙门就到大堂入坐。巡抚大人的公堂就设在这大堂内。两颗印鉴也端端正正地放在那里，一颗在面向东北的一张桌子上，另一颗在坐南朝北的桌子上[103]。周围都是穿着全副朝服的满清官吏，出席典礼和观礼的人也数不胜数。柏贵出来了，他没有穿朝服，踱着方步向前，然后转过身去，面对着西北方向那桌子上放着的一颗官印。桌子后面有一块木板，上面画着一条龙；接着，按照赞礼官的司仪口令(赞礼穿的制服是浅蓝而带浮白色的）笛子开始演奏起来。柏贵在一个软垫子前就位，跪下，并叩了 3 个头：他跪而又起，起来又跪，共起跪 3 次，每次都叩 3 个头[104]。然后他又走到另一颗印鉴跟前，重复了前述的跪拜礼。他站起来的时候，有几个出席典礼者很快地走向前去，拿起印章就走。巡抚大人则紧跟着他们。接着其他官员也都跟上去，一直跟到一个内厅里，他们在那里向柏贵打躬作揖致以敬意。衙门内所有的人在一个新官面前走一遍。这是不常见的事，但巡抚大人并非新人——他只是复官而已——有些人说，他那天没有穿朝服，是因为朝服要从佛山取来，现在还没有送到；另一些人说，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身在军营之

中。

今天整理了一下中文档案。

今天在西郊扬鞭驰骋一番，直到泮塘，颇感自得[105]。

1858 年 8 月 27 日　星期五

我看到“奇袭”号炮舰在香港[106]。

今晨与两位专员同访柏贵——仅用洋泾浜之华语略申贺忱而已。因潘在场，未便谈正事。

今日接柏贵来信通知二位总司令，他已重掌官印，并起草告示。

候补道回自己的衙门，按察使则回西郊的公馆。

今日中国人祝贺者络绎于途。

今晚自东北门驰骋至东山寺，颇感舒畅；由小东门而归[107]。

1858 年 8 月 28 日　星期六

今日命令士兵一律将来复枪退膛并不再装子弹。估计他们都以为就可以回国了。

据报道，桂良正在南下途中，准备接黄之任。如果是这样，则我相信这是中国人的诡计，其目的是诱使联军重新以广州为一切谈判的基地。我听说约翰·包令爵士已经迫不及待地把这一点作了正式宣布。

该报道还称《中国之友》的塔兰特被处罚金 200 英镑，并以诽谤罪被判徒刑两年。

今天仍很热。

1858 年 8 月 29 日　星期日

今天给威尔逊写了一封长信，把柏贵重掌官印之事给他作了报道。

下午“大黄蜂”号的布朗和福克斯来访。

与巴夏礼先生一同骑马外出，在观音山吸方头雪茄。北风微拂。今天非常闷热。

听说由两三条快速帆船和几艘炮艇组成的一支远征队已经出发前往九龙，要对那里的200条海盗船给予一次打击。

“奇袭”号停在码头边，进行好望角之行的准备。前些日子该舰消灭了25个海盗，干得真漂亮。

1858年8月30日　星期一

今早柏贵和候补道来访。后者服饰华丽。就总局和总督的事进行了长谈。最后这位大人（倦于辩论）说总局权限不同，并另有其独特的职务，谈判遂告中止[108]。

中午前任按察使蔡某来访，至下午3时离去。今日浩官也来，他于昨日由杭州回来。

今天翻译致柏贵信，请他勿忘诺言，把各级官员找回来。

1858年8月31日　星期二

今天傍晚在东山寺周围尽情跃马奔驰了一番。回家后看到6月和7月份的杂志邮包已到，非常高兴。

早晨访柏贵，把审查各路官兵的结果告诉了他。这些人员据传与本月26日他的船上被劫走某些物件一事有关。那天衙门内有许多官员。

今日午饭时，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及其随从进来了。这位大人对我说，“我听说，你在这里担任翻译，作用很大”。因此，我估计我的工作使得额尔金勋爵和威妥玛先生都感到满意了。

1858 年 9 月 1 日　星期三

今天翻译了柏贵对我昨天写给他的中文信的回信。我在信中说，如果巡抚大人能够全面保证洋人的安全，则我们就会重新打开城门，交通上的限制也将取消[109]。巡抚大人在复信中避开了这一点：他没有保证不发生坏事，但承诺如有坏事发生，即予惩处。

饭后只有我的表兄弟、“奇袭”号的汤姆·埃德加来找我。他看起来苍老得厉害，言行举止粗鲁得不能见人（。）他要呆到后天——他喋喋不休地谈些往事。这次见面彼此都很冷淡。我把自己的床让给他睡，自己睡在椅子上。

1858 年 9 月 2 日　星期四

上午海军上将往访柏贵。柏贵没有给他鸣礼炮，也没有开中门迎接，仅说是适逢国丧，不能尽礼，还望原谅。我本来希望海军上将不要去，但是这些并非是被迫驻扎在中国进行外交战的部门首脑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考虑。

三点半与两位埃文斯骑马前往“大黄蜂”号，并在舰上晚餐，10 点回来。今天见到苏易里茨。他告诉我，他曾和威妥玛评论过我，他听说我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使用方言[110]。

今天汤姆·埃德加走了。表兄弟俩离乡万里，阔别 4 年，他乡相逢，亦属奇遇。

接孟甘及桑普森及帕特里奇来信。

1858 年 9 月 3 日　星期五

柏贵和鞑靼将军到“大黄蜂”号上拜会海军上将。

今天雅各布斯、皮姆、肖特和赫里奥特和我们一块吃中饭。饭后与皮姆小骑片刻。回来后从 8 点睡到 12 点，然后起床读书，

从 12 点到三点半，再次睡觉。

非常热。

1858 年 9 月 4 日　星期六

上午很热。东西两城门重开。

与吉尔福德勋爵和科尔维尔上校及另外八九个军官绕东山驰骋，兴高采烈。

1858 年 9 月 5 日　星期日

黄来信，把鲍威尔，皇家炮兵部队的炮手送了回来。他们是 7 月 26 日被乡勇抓走的。黄说，他曾被带到花县（?)。后来委员会听到签订了和约才把他送回江村的[111]。鲍威尔自称从未被送到比江村更远的地方，一直呆在那里直到获释。他被抓住时受了几处伤，但总的说来，他受到的待遇是公平的。与皮姆同来到内钦，接回鲍威尔。他显得颇虚弱，但是考虑到他曾落入中国人之手，情况还算不错。从下午 6 点到十点半记录他的叙述——有人特别着重询问了有关巴夏礼先生的情况。

1858 年 9 月 6 日　星期一

写信给兰普森了解一些事情。

接柏贵来信：对东西城门重开表示感谢。

今日二位专员走访了海关和柏贵。我未去。

与埃文斯和巴克一同出骑。

1858 年 9 月 7 日　星期二

翻译拟定的柏贵与候补道的会衔告示稿，号召商人和通译人员们都回来。

与邓肯先生一同被掳走的仆人是个宁波男孩，手臂上刺有

“维多利亚”字样，不是葡萄牙人。邓肯已死。

据说今天南海知县要回任所；番禺知县也即将回任所。

1858 年 9 月 8 日　星期三

今日傍晚与吉尔福德勋爵、汤贝少校（他对假山庭园作了素描画）以及其他几个人一同策马至长寿寺。然后去内钦。两位专员走访了浩官。

1858 年 9 月 9 日　星期四

与埃文斯和一个传令兵在东郊骑马，这么几个人走了这么远，真太傻了。

茶点以后，翻译黄于阴历 7 月 29 日给联军总司令的信。我认为此信侮慢无比：其中每句话都隐隐含有不敬之意。我猜想他已听到我们的全权代表不打算来广州和他谈判的消息，因此备感恼怒。

暗探王某告诉我，黄于初六日接到将他调任云贵总督的敕命[112]。从那天起他一直激动非凡，谢绝见客。这就说明为什么他的信件如此侮慢。

1858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五

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因此尽管天气很热，身上还是发冷，出冷汗，身体发烫，夜间感到空气是凉的，嗓子疼，流清涕！

与阿尔伯特·史密斯骑马外出——就是登上朗山的阿尔伯特[113]！想想看，竟在广州见到了他。在华林寺拜访了张州。他微胖，肩圆，形似文极司脱，而声若塔兰特，有一个钩形的犹太鼻子，面貌和少校的传令兵班通不无相似之处。我一想到他就有一种喀莱尔式的英雄崇拜之感油然而生。现在我对他的神秘感已经消散殆尽，“这是疏远使然——（笔迹逐渐模糊不清）。”

今天浩官来访。

1858 年 9 月 11 日　星期六

没有做什么事。有报道说，满清全权大臣已到达上海以南——我想，这话是要洋人的。

今天给黄发了信，通知他鲍威尔已回来，并答复他 29 日的信。

星期三得萨拉信和老史密斯寄给我的账单，家中大小均安。

烈日炎炎，但北风微拂，颇觉凉爽。刘先生因有某种敲诈行为而入狱。

坐骑由西门出，绕行北山后由东北门入城。

1858 年 9 月 12 日　星期日

整日无所事事。与埃文斯一同骑马出西郊；由南门返城。

现在江面上又出现了一些货运帆船，小摆渡船都回到了联军登陆地。

1858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一

上午去柏贵处，向他引见阿尔伯特·史密斯，然后领后者在衙门内转了一圈。

1858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二

今日黄来信，同时把邓肯先生的小厮送回——他是个宁波人，名叫王阿二。他和邓先生是被邓先生的厨司和另外 14 个人抓起来的。所有这些人一同从邓先生家结伴出发。那孩子在江村被拘时是受林太守驱使的。此人是林氏乡勇首脑林福祥的弟兄[114]。频繁地见到苏和龙，没有见到罗。还有一个钟大人[115]。他们在江村的时候，曾把 5 个洋人的头颅拿给他们看过。

今天下午和另外25个人骑马到潘定官的花园。

1858年9月15日　星期三

昨天下午，有人看到一个形似醉汉的英国兵走过元塘。今天上午收到从山里来的公函说，有一个疯了的水兵从医院逃跑了。勒克瓦派了两个警察去找他，未找到。晚上，厄普顿上士带了几个人出去找他，但也未找到。

今天到柏贵处：他正在国丧期中，所以没有鸣礼炮，而且我们是从边门进入衙门的。谈的是，第一，昨夜盗匪进窥北城门的事；第二，他本人和候补道所提出的发布告示的事；第三，失踪士兵的问题；第四，他告诉我，他逮住了郭彪或称没耳之头。此人只有一个耳朵，是一帮乡勇的头儿；这些乡勇正在等着洋人们漫不经心时，伺机而动。他还说，将要“打死他”[116]。

今晚与埃文斯在新城内骑马。回来时在东大街见到勒克瓦和几个士兵押送着郭彪前往番禺监狱。他被装在一只篮子内，满身是血，似乎已经半死不活。柏贵对他进行了审问，他背上挨了600下藤条，大腿上挨了200下，面颊上挨了200下嘴巴子，脚踝骨上挨了200梏跪[117]。他已招认，自己参与过谋杀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印度兵的事。明天还要对他进行审问。给我送来他的那份口供中，没有提到他曾杀害过外国人。

今天上午巴夏礼先生去澳门了。他是秘密离开的。没有人知道他往哪里去，以及什么时候回来。

1858年9月16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独自出去，这是4个月来的第一次。我是去看阿姚的。她于前夜从澳门回来。她向我要200元，我一定要和她断绝关系。

妙哉！巴夏礼先生的密探王某或是邢某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

我做妻子。他说，他感到今后洋人在广州一定要高人一等了，他希望能和洋人结成亲戚。他先是要把女儿嫁给巴夏礼，巴对他说，要稍等。他又关照我要极端保守秘密。真是个无赖!

今天接佩因来信；还有一封是北方行会的张先生发来的。

今天下午郭修理牧师和我共餐。我几乎让他喝醉了[118]。

今天哪儿也没有去。

没耳之头（?）由于昨天所受的笞杖，今天已死了[119]。柏贵素以严厉著称。在中国非这样不行。

1858 年 9 月 17 日

今天忙于整理记录等等。

鞑靼将军来了一封信，要求归还去年叶名琛被俘时副都统丢失的各种东西!

大雨，不能外出。晚：读《刺客自白》片断；与肖、撒切尔（?）及卡林顿等打牌，赢一局[120]。

1858 年 9 月 18 日　星期六

柏贵夫人将于今晚到达西郊的公馆（石街铺)[121]。张告诉我，这位大人的如夫人是一个渔贩之女。这位大人不向两位专员请示，擅自发布告示，看来是自找麻烦。

忙于翻译各种告示和“钟鼎铭文”。

1858 年 9 月 19 日　星期日

给桑普森一张远东银行的 100 元支票，领出本月薪金 50 元。给阿姚 125 元。我的意思是，这就了结了关系。

读《刺客自白》。

与埃文斯一同骑马外出。他将接替特拉维斯任随从副官。

1858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一

翻译柏贵的司法程序告示 3 件和黄的公函。

昨天早晨到河南去找邓肯的伙伴惠廷。他没有给邓肯写信，似乎对邓是死是活也并不关心。问特勒是谁告诉他邓肯还活着。他说是一个中国人，不过他并不知道这个中国人的姓名或地址住处。真叫笨蛋！

今天给阿志 8 元、阿寇两元，并花 10 元买了一套蓝色法兰绒上衣和裤子。

今晨埃文斯与我共进早餐。两位专员就柏贵最近的告示，写信给两位总司令，这告示是未经咨询联军即发布的。

今天阿姚去澳门。

骑马穿越东郊。与埃文斯同用茶点。定制法兰绒内衣 6 件，每件 3.5 元。

1858 年 9 月 21 日　星期二

今天法国人接到报告说，临安爆发了某些麻烦。

没有多少事情可干。

与皮姆外出，穿城而过。

今昨两天，颇感不适。

今天下午收到了我的报纸和杰米的信，其中有一些玛丽的话。全家都好。欧洲传来了和平消息：通往美国的电缆终于放入了海底！好哇！

今晚还收到了巴夏礼先生的信。

1858 年 9 月 22 日　星期三

钟鼎铭文译完。

译注解，并把译件送给将军。将军邀请我今晚去吃晚饭。不

想去，因为我有些不舒服——

整个晚间工作都很紧张。到东北门附近去看阿依（此句划掉）[122]。

1858 年 9 月 23 日　星期四

（此行也是划掉的）已谈妥给阿依 100 元，给池 22 元；池的受让人鹭宾！

今日上午巴夏礼由澳门回来。法国人占领了交趾支那的沱濃港[123]。

鸬鹚游泳，不是好兆头。

今天桑普森把他的夫人带来了。一个娇小的继女。

非常冷。昨夜盖了两层毯子，今天第一次穿上了法兰绒衣。温度表的读数 5°%1.（?）今夜与布伦南同饮混合热威士忌酒。

1858 年 9 月 24 日　星期五

有趣的婚礼：我的厨司的代行婚礼。

（一行用交叉线划去了：）把阿依带到宝塔街的住处。

王某（密探）警告严防麻疯病。

今天崇给我买了几本书。

已付给卖地图的人 6 元，还欠他 4 元。

1858 年 9 月 25 日　星期六

（第一行划掉：）今天上午外出，回来时见到巴夏礼先生，吃惊不小。[124]

今天上午收到了我的杂志包裹。

1858 年 9 月 26 日　星期日

（又一行被划去：）又是阿依。骑马穿过南郊和西郊。

1858 年 9 月 27 日　星期一

各种谣言又传播开了，说是英国人又进攻了南投，并被打败，在战地上遗下死伤人员 900 个[128]。还有赞昆和里门的乡勇们就要来向将军桃衅。如果将军不予打击，他们就要进攻香港。还有一个报告是有这么一个人，死了 7 天又复活了。中国人的商店由于惊慌恐惧，10 月 4 日那天全部关门。

今晚收到星察理的卡片和《北华捷报》。

中国钦差大臣还未到上海，甚至上海还没听说过此事。

与将军和几位妇女同到西郊各寺庙。S 太太是位非常讨人喜欢的妇人。

1858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二

有报告说，有许多从前的（?）乡勇正在下列临安、黄山和东昆各县潜来躲去，很可能要肇事[129]。我担心又要受惊吓。

今天看到 8 个人在大友庄前面被斩首。有一个掉了脑袋还在跑，毫不害怕。但是所有的人在被摆好位置以后，似乎都有闪避这一刀之意，或是等着挨刀。有人告诉我，其中一个人自己走向行刑的地点。所有溃散的乡勇都因在郊区抢劫而被捕。

他们仅知道今天上午要把他们斩首。此事并没有告诉他们，只是给他们供应了上好的早餐，他们这就有数了。如果他们向柏贵说明他们是冤枉的，柏贵就不能判他们死刑。但几乎没有一个喊冤的。

昨夜埃文斯从马背上翻下来，摔了一个大筋斗。

刽子手在砍下刀子前摸了摸获罪者的下（?）颈部，并用他的指甲在骨节眼上做了一个记号。

与巴夏礼先生出骑，穿过新城，经新马路回来。

1858 年 9 月 29 日　星期三

今天又相当热。

没有什么特殊事情。准备中文档案。

中国警察们对我说，他们在街上听到有人在传说有关临安，东昆和黄山等各处乡勇的意图。韩候补道今天送给我们两匹小马。晚间巴夏礼先生和我自己试骑了一下。那马肚带太宽了，马尾鞯一断，我差点翻了下来。

巴达兰比的儿子在我处呆了一晚上。他的名字是阿云——又叫金西[127]。

1858 年 9 月 30 日　星期四

今天伙计们说，美国人和联军开战了，因为我们要“勒索”他们的船只。还有临安县的知县也被处死了，因为他派到英国船只上去安排事务的两位先生被吊在帆桁上了。副标（600 人）已经从西江回来[128]。

据说罗、龙和苏都到北京请战去了。他们自称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完成，而且我们也再没有后备兵员了。因为我们的印度兵已经全部都叛变，等等。

今天从香港买来 6 件上等法兰绒衬衣，每件 3.5 元。

今天傍晚骑韩送的第二匹小马到隆山庙。归途上看到了彗星。此星在 4 点 1 刻到 7 点可以看到，其仰角似乎有 80 的样子。(一小张彗星的简图:）中国人对彗星很害怕。罪星，也叫扫帚星[129]。

1858 年 10 月 1 日　星期五

整理书籍。参观今晚的赛马。加斯廷独赢 3 个项目。有些人摔得很厉害。

今天非常热。

1858 年 10 月 2 日　星期六

今晨 8 点将军和两位海军上将的代表拜访了柏贵。埃杰尔和他的副官——是个身材矮小的海军少尉候补官——和我们一起用早餐。今天够热的。

今晚又去看赛马。有两个人在看台前摔得非常逗乐。加斯廷是惟一的好骑师。他赢得了一切。

晚间在旅长处度过。

今天上午收到海军登陆地一家商号的请愿书。昨夜有 3 个水手闯进这家商号，抢走了约 30 元钱。其中一个人把束发带丢失了，上面标有“大黄蜂”字样。可能有人会跟踪这些恶棍的。当然，他们把劫掠来的东西看作是战利品。

1858 年 10 月 3 日　星期日

整天未出门；无特殊事情。

1858 年 10 月 4 日　星期一

与将军及其夫人一同乘马外出。游览了东山庙那边的登陆地，然后寻径到林氏要塞。S 夫人着实受了一番颠簸。将军在一块稻田里摔了一跤，差点被粘在那里。在黑暗中做此颠沛之行，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吃了点苦头。

今日陪同将军的弟兄访问柏贵。柏贵摆出了庞大的午餐场面，约有二三十个座位，似乎他预计着我们会随带一大批扈从的。他说，他事先对州官的告示一无所知，并将（?）对其真实性置疑。说得真不错!

1858 年 10 月 5 日　星期二

今日在将军家吃晚饭。晚餐后打了一局牌。我和将军搭档，并赢了皮格上尉 5 先令。

1858 年 10 月 6 日　星期三

翻译黄下达给广州财政委员会的一份稀奇古怪的通令[131]。有关官员似乎希望使老百姓对洋人问题是否已得到解决一事始终持怀疑态度。我估计，他们认为这是向老百姓诈取钱财的惟一办法。又翻译了一份藤黄：一种皇上的诏书（用藤黄色纸书写或印刷——译注）作为告示张贴，以表扬咸丰四年（出力）的各方人员[132]。

晚饭后与巴夏礼骑马出行了一小段路。听他说，他估计对广州的占领时间至少要延续到 3 月份。

1858 年 10 月 7 日　星期四

今天 A·史密斯写来一个便条。用 8 元订阅了《中国之友》。又付给炊事长 15 元，以偿付啤酒款、侍役费等等。

今天翻译秦至福的预言性揭贴。几天来吹起了北风，又下雨又寒凉。现在夜间要盖两条毯子了。

今天又得到一位新的老师：李的朋友何。（边框上有一个惊叹号和一条波状线。）

傍晚与巴夏礼先生一同出骑。街道上很滑，沿着城墙踱马，从第一警察所踱到第三警察所。

今晚浏览了一个叫坎贝尔的少校写的一本书：《护林老人》。其中谈的是有关猎虎和射野牛等的各种惊险故事[133]。

1858 年 10 月 8 日　星期五

上海传来了消息。到 9 月 28 日为止，钦差大人们仍未到来。上海的一些聪明人不仅认为他们仍然是和以前一样遥不可接，甚至想得更远，认为一旦他们露面，还会设法摆脱他们已经对额尔金勋爵作出的各种让步，我希望他们会抓住一个鞑靼人[134]。

巴夏礼对将军非常恼怒，因为后者在一封信中抱怨英国专员们没有做到像法国专员对他的总司令那样，频繁而详细地向他提供情况；同时将军对巴夏礼先生和哈罗威上校也很恼怒，因为他们把上述信件给马蒂诺看了。

塔兰特今天来了。

今晚下雨，不能外出。肖·利得尔和伯顿来了，我们打了一局牌。

1858 年 10 月 9 日　星期六

闷热，潮湿，天气寒暖剧变。

桑普森躺下了：发热加新夫人。那小小的继女前几天告诉好几位官员说，爸爸和妈妈每天要上床一个来钟点。

今天给玛丽和亨利·穆尔思德写信。又给杜鲁门（?）少校写了一封长的便函。

今天炊事官给我半打白牌和品氏牌（?）白兰地酒。

短骑至登陆地。

1858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天

今天忙于收拾房间，因为我打算明天就要开始读书。

收到上海和英国的邮件。没有什么有关英国的特别新闻。上海来的消息是华、桂、宁和端等几位大臣已于本月 4 日到达。

1858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一

今晨我梦见密太太。我想着她已成了罗马天主教徒，而神学博士则拿不定她到底是不是圣母玛利亚。我被一阵敲门声闹醒时，才知道原来是杰克送密妥士的信。梦境与实际巧合一致[136]。

早餐前与何读（孟子）若干片段：必须尝试，身体力行。

今天去看将军。真该死，我完全忘了，那是非常忙碌的处理信件的时间。今晚去戏院看了戏：《埃米恩斯的罗恩》及《我的宝贝贝特西》[137]。巴茨在后一出戏中演得非常出色；在前一出中则是雷维里表现得很卓越。戏院内挤满了人，灯光照得一片雪亮。

去戏院以前，我去看了塞马萨姆·杜克和福斯特（?）博士两马赛跑。后者超过了前者，前者摔倒并伤了加斯汀。这场比赛发生了争议。

1858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二

整个上午都忙于翻译广州樊阔给番禺知县的一封信。其中有一份密旨，对英皇陛下很不尊重，对我们也没有好感[138]。

走访海关监督，并祝贺其升迁。他现在成了大臣，并且是 6 位内大臣之一[139]。骑马穿越南郊。

1858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三

翻译昨天的文件。今天有 12 个人被斩首。

1858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天

今天骑马出游甚畅，越盐塘，上布雷山也颇顺利。从东门小骑我的“小猪”，然后也试骑了一下候补道的小黑。走得很好。

1858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一

今晚对所有部队进行了总检阅。我和审计官肯尼一起去看阅兵，接着在炮兵部队食堂用膳，然后去剧场看戏。工兵人员演出了愤怒的名角（?）、烧炭人和枯萎了的人[139]。第二个节目演得很好。

1858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二

巴夏礼今天到澳门接太太去了。我开始和皮姆一伙一块吃饭。今天将军下了一道命令，让柏贵的人在水道城门上安装铁栅栏。今夜骑着候补道的二号小马逗着玩了一会。

1858 年 10 月 20 日　星期三

我不知道应该欢呼呢还是忧虑！但是不论你是为之高兴还是为之遗憾，事情就是这样。有消息说上海发生了外交上的决裂。中国专员办的第一件事是向额尔金勋爵郑重宣告，关于设置使馆的事虽然在天津已经予以确认，但是要让英国在北京设置一个使馆的事，现在连想都不能想。最近几天以来，海军上将一直在准备派遣一些水兵到万科伦岛上去，忙碌异常。但是，今天他又说，这些水兵很可能要派到北方去。在中国的事情充分安排妥当以前，不能另派人到别处去了。

今天写信给约翰爵士，把黄的密信给他作了个说明。又给孟甘写了封信，请他把我的钱（空着）元存入银行，用以办些别的事情。

收到罗存德介绍贝先生的信。他的官话说得很可以，但是我不喜欢他那仪表，因此要等一两天才能决定是否用他[140]。

几天前，顾斐德夫人（前文极司脱的女管家基丘姆小姐）去世了。死于小产。

参观了南海监狱和关押所：见到 337 个犯人。全都是一副讨厌相[40]。

1858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四

给孟甘送去一张 577.66 元的支票，请他代我存入远东银行。还给约翰爵士写了信。

1858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五

与找到的姓张的老师（赫德的字）谈话。他是杭州人，仪表很好，但是讲的官话不是北京味，而是南京味。

今天到南海朱知县那里，与他和浦庭一同去找狱卒夏庄。他说，犯人们情况很可怜，但是他们犯了法，不能指望受到很好的待遇。

（下面一行似乎是后来写的，页边上有常见的×：）有上海来的消息，一切事都在完全令人满意地进行着。

1858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六

整个下午都和莱蒙上校以及其他几个官员（和我们一起用膳的）一起在西郊。

1858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日

今天赫利亚特宣讲了一段绝好的教义："祈祷"。

傍晚与伯顿及传令兵骑马到盐塘：遛了一回马，很不错。

我听说伯顿和皮姆为了莱蒙的伞发生了口角，真傻。（后来写入的：）27 日重归于好。

接约翰爵士的通知。

1858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一

今天收到一份钦差大臣从上海发出的中文告示，其中宣布大清帝国和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已达成和议等等。这告示是由一艘火轮送来的，该火轮（扬子号）上载着由钦差指定给黄送信的一个委员——我的那份来自南海左堂[142]。我不能断定柏贵是否收到北方来的什么公文；但我知道该委员昨天去杭州之前到柏贵的衙门去过。

今晚巴夏礼和太太一起回来了。

1858 年 10 月 26 日　星期二

最近两三天来牙疼得要命——因此昨晚未能去看戏。

邮件到达：父亲和星察理的来信，都是 9 月 3 日发出的。父亲病得很重；可怜的杰米也病了，并且可能有一个耳朵已经聋了。

（赫德日记的原件中本页末尾和下页之间盖有一个他的中文图章，其中刻着他的中文名字赫德。）

1858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三

今天大体痊愈了。

今天有 60 个皇家步兵第一团的士兵在汤普森中尉率领下来到广州加入警察队伍。皮姆现在有两个少尉和 180 个士兵：很不错的一支部队。汤普森将用皮姆和伯顿之间的那个房间，我们大家都将在离我这个地方很远的大厅内用膳。

今天在钦差大臣的公庭上忙了一整天。柏贵的警察抓获一大批木材，我就是在做这一案件的记录。经过审理，证明这批木材是从恭衙门内的一个官员手中买来的，并付给他价款 160 元。我估计做这买卖的是坦普尔上尉。说实在的，我要是他，就不干这

个。

与伯顿一同骑马外出：制服候补道（候补道的马）真费劲不小。

1858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四

往英国的邮件发出。给父亲写信。通过孟甘发去。

今天皇家步兵有了指定的住处。

下雨；气候闷热。

1858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六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上海的报纸说，一切顺利。今天收到休士从宁波写来的信，以及布雷热 7 月 7 日发出的信；还有一封是 B 夫人的，内附她们的结婚请柬。孟甘的短信中说，几天之内，我将被任命为驻广州的翻译。今天下午忙着翻译候补道致阿礼国的一封信，该信要求他回广州。

1858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日

格雷先生念祈祷文，休利阿特讲道。前者念得特别装腔作势。他说话的字眼似乎是在嗓子里形成，而后又稀奇古怪地从嘴巴里挖出来似的。

昨天骑马到眺望山并经过盐塘。在盐塘（?）有一个从沙头来的人。

今天下午与皮姆、汤普森和柯林斯到所有的警察所去看了一遍。

1858 年 11 月 1 日　星期一

今天给约翰爵士发了一封信，日期为 10 月 30 日。今天与汤普森在番禺监狱外骑马，看到 218 个犯人。他们的情况比南海县

的好一些。接着策马去东山寺看戏，看的是《显赫的陌生人》、《埃米恩斯的罗恩》及《诺丁山之夜》[143]。

1858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二

最近几天相当冷，夜间盖两条毯子根本不够。

在东城门与西城门之间骑马游逛，一直逛到高夫氏要塞以东一带山头的后面。孔布尔格少校和我同往，玩得真够痛快。今晚翻译致阿礼国先生的一封信，其内容是有关洋人方面有一个名叫（两个中文字，可能是该洋人的中文名字）斯科特的，他进行了某种走私活动[144]。

1858 年 11 月 3 日　星期三

早晨冷，中午很热。在西郊作长骑。

1858 年 11 月 4 日　星期四

今天上午我接到约翰·包令爵士的信，任命我为驻广州临时翻译，并指示我要接受阿礼国先生的指挥。两位专员非常恼怒，因为信件直接发给了我而没有通过他们。

下午 1 点——到总部去见阿礼国先生，他立即给了我许多工作：有许多船只要报进，有几封信要接着写下去，以及关于访问候补道和为访问柏贵及候补道做安排的命令。4 点钟拜访了候补道，谈了很久——6 点前后方回。

晚上 9 点半～11 点翻译信件。

1858 年 11 月 5 日　星期五

把中文档案移交给巴夏礼先生。巴夏礼和马蒂诺二位专员带着恋恋惜别之情把我送到门口：他们给将军的信毋宁说是一份充满了对我的溢美之词的证明书。就这样，我在这里担负起了驻广

州翻译之职。归根到底，我的运道是不坏的吧。

今天拜访了候补道和柏贵。由中门而入，并按惯例鸣放了礼炮。广州的领事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如此隆重的接待。那两位中国官员都谈到了领事未来的住处问题。两人都说，他们认为领事应该住在城外，因为在那里进行贸易业务比城内方便。阿礼国仅回答说，他相信这一问题——进入城内——已经完全明确，无需再谈了[145]。

1858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四

我在衙门内的住所一直保留着，直到今天上午。巴夏礼通知阿礼国说，他们无意让我保留我的房间，因此我就得悄悄地搬走。最近一两天来，我又捆扎行李，又整理东西，真烦死人了。我现在已经登上去黄埔的有照船，和黑尔副领事呆在一起。阿礼国先生已经回香港，该船暂时要为领事馆所用。

黑尔这个人天真朴实，是个乡下士绅派头的人物。他和亨利·穆尔黑德十分相像。我听到过福州的艳闻，他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人。

1858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二

在黑尔的船上度过了一个星期。

今晨 83 号炮艇从香港拖来了一条载着文极司脱的驳船，然后把黑尔的船拖回黄埔。因此，我又得再一次卷起铺盖，搬到那新的“领事包”内的一个房间去。瓦契（?）的旧船非常脏，而且有时似乎还臭气冲天。但是我希望就这样安顿下来，至少过一个月再说。

8 日，阿礼国拜访了鞑靼将军。10 日拜访了法国领事特郎瓜里男爵（,）由我担任翻译，在各处转了一圈[146]。

22 日，我给休士送去一张 250 元的支票，请他买一张开史

密斯·埃尔德公司台头的汇票。我又提出了关于出钱使罗伯特·弗雷德里克·莫里斯解除职务的诉讼程序。莫里斯是属于皇家海军的一个青年，我想把他留在中国做仆役。

1858 年 11 月 24 日　星期三

夜间被蚊虫咬苦了。

温哥华志愿军今晨在联军登陆地上了船。一片欢呼声和乐声。我是坐 87 号炮艇去的。

1858 年 11 月 26 日　星期五

文极司脱今天回香港去送别他的妻子。她将在一两天内乘“爱洛特公主”号离开香港。文极司脱是个自高自大的小人物——他有事急于要求见候补道。

1858 年 11 月 27 日　星期六

真该死！休士来信说，国内来了一封公文，任命密妥士为驻广州翻译官，从而使我失去了这一职务！密妥士和我在工作上似乎是注定要作对的。

这次带回国内 575.10 镑，给 S.E. 公司。

1858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二

阿礼国回来了。

1858 年 12 月 1 日　星期三

一整天都与水师提督在外面：在将军家吃的中饭，与提督同进晚餐。

1858 年 12 月 3 日　星期五

往静波寺野餐，然后骑小马奋蹄飞驰，越野而归。昨夜高尔来和我作伴。

1858 年 12 月 4 日　星期六

今天下午拜访了柏贵，谈了好几个小时。他说，听到我有可能要离开，他感到非常遗憾等等，并对我非常恭维。把汽船管制办法草案交给了他，他说将予以考虑。把斯特的问题和埃尔拉希姆的箱子问题都告诉了他。他请我星期一再回来和他继续会商。

1858 年 12 月 5 日　星期日

今天到河南的教堂去了。商人们请我把赌博者从防波堤上赶走，并赶到红炮台（红王炮台）去[14]。

晚间和高尔来了一场拳击（?），把我的胳臂累坏了。

在这艘船上只能住如此狭窄的房间，还有另一个人合住，实在太不舒服。

给文极司脱的仆人付了 8 元，记在他账上。

1858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一

阿礼国先生今日赴黄埔。定购了两顶蓝轿子，供领事馆使用。费用要到 100 块美金。

今晨感到肝部有些不适。

第七章

赫德与19世纪60年代的中英新秩序

赫德日记所反映的广州曲折变化的情况，标志着西方列强势力已进入中国清政府的内部。外国对清帝国权力机构的参与，在19世纪的其余年份里稳步扩大。各种因素——英国的海军，中国从印度进口鸦片，以及中国对西方的丝茶出口贸易的持续增加——都使英国处于占优势的领导地位。19世纪60年代，赫德由一个出身寒微的英国人，发迹成为在这个新秩序中作为中心人物的独特角色。他的成功来自他看准和抓住时机的能力。

作为广州委员会（指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组成的联军委员会——译注）的翻译，赫德曾和一些清朝官员交往。这些官员那时正苦于一方面为英法所掣肘，而另一方面又须继续履行其职责。作为翻译这样一个中间角色，赫德的成功来自他懂得怎样在极端尴尬的情况下，适当保全这些官员的面子和维持他们的尊严。他已经在扮演构成他全部生涯的角色：那就是以英国的强大力量为后盾，避免表面施压的倾向而在实际措施方面提供真诚意见的任务。为了这样做，他必须对汉人和满人的情绪很敏感，必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利益，还必须经常避免抛头露面。这就是要有按中国方式行事的能力，首先在中文方面要能说能写。在这方面，他的上级威妥玛曾批评他在汉语中使用方言过多。

在这种文化敏感性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赫德日记的第二段空白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个因素。这段空白从1858年12月6日到1863年6月6日，整整四年半。这个时期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毫无疑问，这段空白表明，赫德之所以销毁这部分日记，是由于其中记载了他和阿姚的关系以及他们的3个子女的出生。后来赫德把这3个子女作为他的“养子女”负责供养。已经发表的资料表明，安娜生于1858年末或1859年初，赫伯特生于1862年，阿瑟生于1865年。20世纪初，在赫德一生事业的最后阶段——估计从1859年到1863年中期，这一段日记就是在这期间销毁的——这著名的总税务司显然不愿意有关大约40年前，在他1866年结婚之前发生的这种暧昧关系的记载使他的家庭难堪。

然而自1911年赫德死去之后又过了3/4的世纪，我们生活中的写作规范和以前的已经不同了。现在的历史学家如果不关心一位历史人物一生的所有的各个方面，就会被认为是不忠于他们的职责。亚洲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恋爱关系和两性关系会被恰当地认为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接触来考虑。在赫德时代按照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的双重标准被称作放荡和见不得人的事情，会被20世纪末叶的传记作者视为是富有意义的经历。我们只能遗憾地说，旧时代的道德标准和实际需要使我们看不到赫德作为中国居民长大成人的记载，包括1859年初期在广州领事馆工作和1859年中期到1863年中期在海关工作的开头几年。

关于上述年间赫德的家庭生活，根据资料推想，情况基本如下：赫德20岁时，于1855年7月1日在宁波迁入帕特里克船长的住宅。后来他销毁了在宁波居住的其余两年半的日记，大概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日记记载了他和中国妇女的关系。保存下来的从1858年3月～12月在广州期间的日记写道，5月20日，当两位不期而至的官员进入赫德的住宅时，“阿姚躲入后堂，未被看

见。”5月26日，“阿姚两个月了——。”7月8日，“我正经受一种心理上的变化：对异性比过去想得少了，不喜欢那种想象中的私通了。”

他在7月26日前就把阿姚送往澳门，因为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本日派阿志去澳门，给阿姚送去20元。”1858年8月1日，他写道，“阿志，该死的！还没回来。”8月15日，他写道，“阿姚羞怯地提出要700元，至少得200元——‘不行’!!!”

阿姚的怀孕显然使她不仅销声匿迹，而且失去了这位年轻英国翻译的关怀。8月19日有这样的记载：“我的女船娘回来了，在联军登陆地点见到了她。”接着，9月16日：“我是看阿姚去的，她于前夜从澳门回来。她向我要200元。我一定要和她断绝关系。”9月19日：“给阿姚125元，我的意思是这就了结了关系。”9月20日：“今天阿姚去澳门。”9月22日：“整个晚间工作都很紧张，到东北门附近去看阿依（此句划掉）。”9月23日：（此行也是划掉的）“已谈妥给阿依100元，给池22元。池的受让人鹭宾!”9月24日：（用交叉线划掉）“把阿依带到宝塔街的住处。”9月26日：（又一行被划去）“又是阿依。”

上述记载使我们看到一位年轻的领事馆官员在他的前一个同床的当地妇女怀孕期间，又去弄一个新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十分符合19世纪50年代亚洲殖民地的风俗习惯的。但是日记又中断了。其原因我们不得不设想为早在5月份就已怀孕两个月的阿姚生下了安娜，而当上父亲这个事实对赫德来说使事情又有所不同。对这段记载不可能作其他解释，因为他和阿姚恢复了关系，而且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他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对小女孩和年轻妇女充满深情，几乎达到了溺爱的地步。可以想象，他的女婴安娜必定使他欣喜若狂。总之，他在中国的秘密家庭生活使他取得一个中国人的资格，同时还说明他融合到中国社会文化中的能力。

对公众来说，最终为赫德创造机会的世俗环境是更为明显的，尽管最初看来这种环境对中国与西方的合作是相当不利的。清朝虽然为相互助长的内忧外患所困扰，但在1858至1859年，仍然坚持整个19世纪50年代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州所表现出的战斗精神。清朝政府的方针就是要消灭叛乱和拒绝同外国人交往——同他们交往也只是为了消灭他们。例如，叶名琛被降职和放逐后，到广州接替他的新任钦差黄宗汉，据赫德4月28日日记的记载，已于1858年4月动身南下就职。但他耍弄了和解与拖延两手交替使用的惯技。当时柏贵、鞑靼将军穆克德纳和蔡按察使3人，为联军委员会所迫，勉强在过渡时期管理广州政府。他们急切等待黄宗汉的到来，却总也等不来。12月，当赫德写他在广州的日记的最后部分时，黄宗汉依然没有露面。这种迟延是武装袭击广州外国人的重要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而在华北还有其相应的行动。

天津条约的条款之一是允许外国公使驻扎北京。这是西方列强长期想要得到的让步，而清朝政府只是于1858年6月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才屈从的。这一要求在损害中国形象上确实是要害的一步。中国一直有自己的地位高于外部世界的观念。因此，外国的全权公使一走，抵制就加强了。北京决定，1858年的条约安排终究是不能接受的。1859年6月，当英法公使连同一支舰队到达天津海口并准备前往北京互换批准书时，他们受阻不得通行。这对于他们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与最高负责当局谈判的企图，似乎只不过是又一次的断然拒绝。英国舰队司令决心强行沿河而上。他的判断力显然很不高明。他派小炮艇去制服大沽各炮台并突破河防。当各炮台以熟练的集中炮火还击时，他的自负又使得他命令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穿过无法通行的泥滩去猛攻各炮台。结果是一场大败，4艘英国炮艇被击沉，伤亡惨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撤退，等一年以后再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远征。具

有典型意义的是，由于中华帝国如此辽阔和分散，北方的这些战争行动并未搅乱东南沿海通商口岸的中外关系的平稳进程。

海关机构的扩大

天津条约于1858年6月订立后——这个条约表面上已由1858年7月4日收到的清朝皇帝敕令批准——外国各全权公使离开了天津，李泰国也重返上海海关工作。1858年秋季在上海商订的通商章程规定，“各口岸应建立相同的（海关）机构。”李泰国开始筹划相应扩大海关的外国税务司的职责范围。两江总督兼新任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何桂清于9月奏称，李泰国——在天津谈判中曾为额尔金的“桀骜不驯”的助手——现已“恭顺如常”。1859年5月，何桂清委派这个年轻人为“总税务司”(李泰国把中文的“总税务司”职衔译为Inspector General)。

在此期间，在广州，赫德结束了联军委员会工作之后，曾被提升为阿礼国领导下的英国领事馆的二等助理兼——如他自己所认为的翻译。尽管后来这项任命由于伦敦选派密妥士担任此职而作废，阿礼国却有机会于11月致函包令，极力推荐赫德。他在信中写道：“赫德与当局高级官员的熟识以及他所保持的这些官员之间的私人性质的良好关系，使得他在当前形势下在办理公务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或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种有利地位是任何其他翻译所不能给领事馆带来的……我只愿补充一句，我十分重视赫德先生当前作为翻译以及在逐步建立一个与全体中国官员往来新体制方面所起到的帮助和桥梁作用。”

广州的外国航运由于几年来遭到城内和城周围动乱和战斗的破坏，迫切需要这样一个新体制。候补道恒祺既无力处理江轮的贸易，也无法制止与新近合法化的鸦片销售有关的臭名昭著的走

私。当向阿礼国领事求助时，阿礼国表示同情，但是指出，外国的解决办法是一种以有效的海关管理方式进行预防的办法，也就是按照上海模式进行改革。在过去5年间，广州海关缴交北京的税收额从白银30万两下降到18万两[①]。这对于一位候补道来说，事态是严重的，因为他必须在限定的3年任职期间弥补他在任的巨大开支。恒祺和他的同僚、新任巡抚劳崇光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一致认为应要求他们都认识的这位年轻的领事馆翻译赫德在广州建立一个和李泰国在上海掌管的机构相类似的海关。他们在1859年提出了这个要求。赫德运用了外交手腕，以超越权限为理由予以拒绝。由于他知道整个海关机构未来的管理问题正在上海进行讨论，就提出如果邀请李泰国的话，李泰国一定会为此前来广州。与此同时，他就广州的情况主动写了一个长篇的备忘录，作为李泰国的指南。

事情的结局是1个月之后，即1859年5月29日，赫德向继阿礼国之后在广州执行领事职务的文极司脱提出辞呈。他指出，他准备在“女王陛下的特命全权大使与中国钦差大臣最近缔结的条约所批准的体制”中接受一项职务，希望他的行动不会遭到本国政府方面的反对。当时作为全权公使已返回中国的卜鲁斯（曾带着天津条约赴英），认为新建立的海关机构只有录用有品行、有能力的外国人才能生存下去。他建议赫德接受担任海关工作的意见。因此，到了1859年6月30日，赫德便把英国领事馆汉文科的事务移交给阿拉巴斯脱，腾出手来开始执行他作为广州海关副税务司的新任务。(从8月1日起，税务司为吉罗福。)[②]

在李泰国于1859年10月到达广州前的3个月期间，赫德虽然没有被分配多少具体任务，但是他处心积虑地研究了即将面临的问题。在广州，如粤海关候补道所深知的那样，中心问题是鸦片走私。由于附近有香港和澳门这样两个繁荣的存贮地点，广州的税收，如果能有效地加以控制，是一个潜在的巨大财源——首

先是对于中国政府，其次是对于粤海关候补道。后者最初提出一个由两名以上的洋行商人专办的计划。但在李泰国到达后，候补道被英国人说服同意把征收鸦片关税置于新式海关管辖之下。于是他于10月13日宣布，他将于24日依照上海海关的模式在广州和黄埔开设海关，并为此任命吉罗福先生为代理税务司（在税务司费士来抵任之前代理，但费士来始终未来广州就任），赫德先生为副税务司，马西森先生为黄埔海关副税务司。[③]

1859～1860年整个冬季，李泰国都在南方逗留。卜鲁斯曾发出通函责成各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向新任总税务司提供帮助。这位总税务司“即将巡视各主要口岸，以便开创海关管理的划一制度。”1860年1月，李泰国在汕头又开设了一个海关。为了增加海关新机构的国际色彩，他委派美国公使之弟华为士任汕头海关税务司。1860年3月31日，李泰国回到了上海。

这样，尽管内外都有困难，海关新机构仍在取得进展。这一年的冬天，联军正准备远征，以达到在北京换约的目的。在澄清国际局势之前，继续开设新海关的事推迟了。由于中国官员与海关之间以及海关与外国商人之间在管辖权限方面的具体冲突，还产生了其他困难。外国商人普遍攻击外国税务司犯了多管闲事的错误，是为中国人效劳而有损于英国人的利益。还有渊源于海关机构扩大本身的其他问题。例如，召聘能干的外国人员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从列强间的抗衡看，尤为如此），正如缺乏足够的码头、检查站、堆存和保管的公共仓库等设施条件造成严重问题一样。人们还必须记住，李泰国本人也为他的机构造成了困难。尽管他很严厉和不动感情，他的管理技能可能与他的扩大了的职责范围并不相称。

1860～1861年间清朝政策的变化

尽管1859年在大沽取得了对外战争上的胜利，北京清廷于1860年被迫改变针对叛乱的政策，把指挥权交给了中国各省官员④。太平军在强有力的指挥官李秀成统率下，于1860年5月在南京城外摧毁了江南大营。这个灾难迫使清廷于8月加强其镇压行动，把行动置于曾国藩的统一指挥下，委任他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长江中下游各省的文武最高权力。他的得力幕僚之一是李鸿章，署理了江苏巡抚。在赫德后来的日记和书信中，人们将反复碰到李鸿章的名字。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全权公使带着一支规模更大的远征军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军事优势。他们在大沽和天津的北面登

批外国军队于11月9日离开北京，几天后河流就封冻了。额尔金乘船回国。他把事务移交给他的兄弟卜鲁斯。卜鲁斯新任英国驻北京公使。当年冬季，他在天津安置下来，以等待在北京准备一处合适的公使馆。1861年3月，他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就要在京城的官邸安置下来，而赫德应卜鲁斯的邀请，到6月就要在京城和他会合了。

英法用武力实现的外交新关系促成了清朝领导力量的明显易手，其标志是皇弟奕䜣——在外界以恭亲王闻名——的得势。他在清朝的对外关系中上升到显著的地位始于他在1860年北京谈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咸丰帝从北京逃往长城外的热河后，留下恭亲王同文祥和桂良与英法议和。咸丰帝和他主要倚重的肃顺（侍卫内大臣，户部尚书，力主严格的排外政策）实际脱离了北京的事务，这个事实日益象征他们自己的孤立观点与恭亲王及其比较务实的同僚的观点之间的距离。咸丰帝由于蒙受与列强新订和议的耻辱，迟迟不回京城，结果却在1861年2月病倒了。他于8月22日病死，死前指定他的独子载淳继承王位。

咸丰帝之死触发了肃顺的政治势力与恭亲王的政治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新皇帝的生母慈禧（叶赫那拉氏）和已故皇帝的正室慈安（钮祜禄氏）起了关键作用。在以慈禧为主的这两位皇太后的幕后支持下，恭亲王及其同仁在肃顺等8人刚刚率领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行列完成从热河到北京城门的送葬行程后，于1861年11月逮捕了他们。在逮捕的同一天，一道上谕（叶赫那拉氏在咸丰帝死时掌握了玉玺）指控他们僭越、欺君、阻碍外患的妥善解决和企图挑拨离间两位皇太后；肃顺问斩，赐其支持者两人自尽，其余5人为其参谋者革职。恭亲王获得了议政王的高贵爵位，以及军机大臣、侍卫内大臣、宗人府长官等重任；慈禧则开始成为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事实上的统治者。（值得注意的是，在10月和11月的决定性的日子里，赫德——如他

的日记所表明的——经常在总理衙门会见恭亲王，尽管他当然是事后才得知这一政变的。)

在这个新势力的领导下，清朝没有像许多西方人所预言的和不少中国官员所担心的那样，在内部叛乱和外部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崩溃，而是重申传统的中兴，把统治延续到20世纪的整个前10年。

随着清室的这次中兴，政府内部出现了许多变革：北京建立了处理中西关系的正式专门机构（总理衙门)；组建了一个扩大的海关部门，作为那个机构的一部分；在主要城市和各省都涌现了一些新的有权势的满族和汉族领导人；以及列强在中国的所谓协作政策的早期阶段——这一事态发展迅速导致了西方卷入中国内政程度的加深。

当联军兵临京城以及以后的政变在北方出台时，赫德曾在广州逗留。然而北京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1861年1月，一道上谕宣布成立一个处理与即将驻扎北京的西方各国公使的外交关系的机构，即总理衙门，由恭亲王主持，桂良（死于第二年）和文祥辅助；同年下半年又任命了4位大臣（他们仍在其他地方保留他们的主要职务)。在行使职责方面，这个机构像一个外交部，如与各使馆进行正式互访和通信，以及批准海关的方针政策等；但是它的活动是非正式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灵活的，因为它不是新设的一个部，而只是军机处下属的一个机构。

这个新机构的最初行动之一是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虽然李泰国已有何桂清于1859年5月作为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发给他的委任札谕，但办理外交事务的权力现已被取代，因而仍需由总理衙门确认这项委任或者遴选他人。总理衙门显然是没有考虑其他任何人。威妥玛于1月由卜鲁斯自天津派往北京。他对文祥说，清政府如果想知道怎样能最好地实现各口岸的各项安排并保证税收，就应当召见李泰国。经过商议，文祥通

知威妥玛，总理衙门已决定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而且他本人相信，李泰国的“录用对政府的益处，不仅在通商和海关方面，而且在全面外交事务的机要谘议方面”——正是作为这样一个角色，李泰国铸成大错，但由赫德继承下来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5]

于是一份委任李泰国并概括他的职责范围的札谕，由恭亲王于1861年1月21日交给了恒祺（原粤海关候补道，现为直隶总督，并且是总理衙门成员之一），然后由恒祺交给了威妥玛。随同这份委任札谕，恒祺附上了他本人的一封信，转达恭亲王对李泰国前来北京与总理衙门进行商讨的邀请。札谕和信通过清代的陆邮于3月2日到达上海的李泰国手中（因农历新年而耽搁）。李泰国从来也没有正式确认收到过札谕。他认为这只是迟来的对早先委任的确认。他对来信的答复则是以健康不佳为理由申请休假。他履行了申请休假的手续，但早在可能收到正式答复之前就乘船离开了上海。（恭亲王于4月7日函复暂准所请，而李泰国和他的妻子则于3月已离开上海。）[6]

卜鲁斯在即将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驻节时，于1861年3月15日知道了李泰国的决定，并为此大发雷霆。邀请李泰国前来京城，本来是他自己提出的，因而他发誓，如果李泰国拒不来京，他决不宽恕。恭亲王尽管批准了李泰国的休假，也强调他应先来北京的重要性。但是李泰国自行其是，既不前往京城接受任命，也不请求总理衙门在他离职期间派人代理（按规定他本应这样办），而是由他自己选定费士来（原作为额尔金使团的随员来华，当时为上海海关税务司）和赫德在他返任前会同署理总税务司。新任巡抚薛焕予以批准，并发给了必要的委任书。接着，李泰国通知总理衙门，他已委派赫德为代表前往北京听候恭亲王的差遣。魏尔特在他的书中写道，“那一天标志着赫德作为一个主要角色登上了中国的舞台。”[7]

1861年4月和5月期间，费士来和赫德在上海共同行使职责。尽管费士来官阶较高，居于领导地位的却是比较年轻的赫德。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精通汉语（费士来一点也不懂），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在广州3年使他透彻地了解了中国当时的事态。卜鲁斯作为一位外交官，知道天津条约引起了总理衙门缺乏处理经验的问题，而且知道总理衙门本身在施政方面受制于不同的意见，因此断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派一位可靠的舵手去征服险滩。如果李泰国不肯北上，赫德就应当到京城来。于是他在5月下旬写信给赫德，敦促他访问北京并邀请他住在新开设的英国公使馆。赫德于1861年6月5日到达北京，途中在天津曾作短暂停留，把李泰国指定的克士可士吉安排在新设的天津海关；天津设关是恭亲王要求的。

1861年赫德初访北京

赫德把登上北京舞台的时间选择在中英关系刚刚发生转折的时候是幸运的。19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英逐步走向交战，而且1860年为获得新条约批准而派遣的远征军规模甚至比1858年的远征军规模更大。但是，一旦北京于1860年接受了新秩序，英国的政策不久就转变为帮助清朝打败叛军，因此接着而来的是一个中英合作的时代。赫德的前辈巴夏礼和李泰国，作为翻译者和谈判者，都是1856～1860年英国发动进攻的代理人。他们坚持要求建立新秩序。赫德仅于1858年才在广州成为一名上层翻译，得以在那里的傀儡政府中为中英合作工作。当他于1859年进入海关时，他成为一名清政府从前不久的敌对国队伍中吸收过来的中国雇员。但是他与敌对国使用武力反对中国的策略并无持久的联系。到了1861年，他就能作为一位经受过考验的朋友和雇员

在北京会见他的清政府上司了。

当时已经在英国公使馆住下来的人中有一位年轻的医师，名叫芮尼，是使馆卫兵的军医。经卜鲁斯嘉许，他天天写日记，记载有关西方势力在北京的重大开端的各种事情。他每天晚上匆匆记下赫德在餐桌上所谈的当天在总理衙门的见闻。（当日记于1866年发表时，赫德又惊奇，又恼火；他曾把芮尼日记的全部内容都看作是不宜公开发表的，但实际上这些内容并未涉及任何有失检点的言行。）[8]

赫德最初正式接触的只有文祥一个人。文祥43岁，精明而善于进取，是总理衙门的推动力量。在有时长达一整天的交谈中，赫德由于充分准备了文件和统计资料，能够向这位清朝官员摆明商务情况的基本事实。和李泰国不一样，他善于说明情况而不教训人。人们可以想象，他和文祥都以晤谈为乐，而且都从中获益。例如，6月13日，芮尼医师在日记中写道，赫德“与文祥在一起长达7小时，文祥对海关事务很感兴趣，作了详尽记录。”

赫德到达北京之后10天，才见到恭亲王。这位亲王才28岁（赫德26岁），而且是第一次置身于复杂的政治事务之中。他是一位有点怯懦的年轻人。由于担心和外国人的接触会使他面临仇人的攻击，他确曾上书皇帝，建议由户部而不由总理衙门受命制定各口岸的海关章程（这个建议遭到坚决拒绝）。因而在初见赫德时，他拘谨地保持尊严，但当他发现赫德熟悉各项条约和各口岸情况，而且掌握着统计数字以说明他的建议（并针对反对者进行答辩）时，他就开始变得从容了。芮尼写道，“亲王就海关事务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而且说，他（赫德先生）一定会因这么多看来是非常简单的问题而觉得他近乎幼稚了；但实际情况是直到后来，他不仅完全不了解这些专门事务，而且也完全不了解一般商业事务。当时的事态发展迫使他担任了目前的职务，但

除了消遣以外，他很少真正过问。”而另一方面，赫德对亲王致力于了解情况却印象很深；他在使馆跟芮尼谈论道，“说来奇怪，亲王觉察到低税率很可能给贸易带来好处，而经验较多并且很精明的文祥却看不到这一点，他顽固地坚持高税率。”

在其后的奏折中，亲王评论了和赫德的交谈情况，还提到了赫德就鸦片以至长江沿岸通商事务面交总理衙门的禀呈9件。这些禀呈也送请御览，并在奏折中称，“其所交禀呈虽不必悉予照办，但不无可取之议，臣等谨奏请圣裁。”

赫德偶尔在各大臣之前早早来到总理衙门，并看到只有恭亲王一人在那里阅读公文。6月29日早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亲王正准备呈送上述奏折。他们一面等待卜鲁斯和文祥的到来，一面进行了亲密的闲谈，谈了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例如，他们谈了吃同类的动物，还提到了烈性的高大洋马，这种马昂首翘尾，而不看去向，和敏感的中国小马不同。也就是在这次闲谈时，亲王“看了赫德的西装，称许西装的口袋，认为很方便。”

文祥来到后，和亲王谈论了中国的官员。他们认为政府雇员中几乎无一人可信，并且声称他们有幸在他们的雇员中有“肯讲真话”的外国人。实际上，在接受赫德告别的第二天，他们对威妥玛说（威妥玛告诉了卜鲁斯，卜鲁斯又报告了陆赐勋爵），他们把赫德称作“我们的赫德”。在即将离开北京时，赫德收到了恭亲王的札委，正式任命他和费士来为署理总税务司。

7月1日，赫德动身前往天津。他将在天津度过1861年的7月和8月。他肯定经常以愉快而满意的心情回顾他对北京的初访。这不仅对他个人来说，是一次辉煌的成就——在生活方面也无疑是愉快而兴奋的——而且在7月7日，一道圣旨谕令负责管理通商事宜的5位大臣实行他建议的初步办法。同一天，卜鲁斯就赫德的访问给陆赐写了一份充满喜悦心情的长篇报告。他写道，“赫德先生是一位有教养的人，精通汉语，谨慎而聪明，而

且自广州海关管理实行改进后，曾在该地工作，因而通晓海关事务……第一次接见时，恭亲王似乎有些冷淡，而且似乎担心和一个下级外国雇员交往有损他的尊严……但是文祥……显然急于获得有关财务和商务的一切情况。赫德先生有准备地提出了用以支持开明见解的文件和数字。他通过书面形式和往往长达一整天的谈话使文祥掌握这些资料……恭亲王本人变得极为友好和殷勤。赫德先生的诚实和率直所造成的印象如此良好，以致他被敦促留在北京，以便协助中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但是他不得不出发照料各口岸事宜，待巡视各口岸后再回北京。”

诚然，赫德在北京的一个月的最大成就可能是无形的，那就是互相信任的可能性——或许仅此而已。卜鲁斯甚至指出，对赫德的接待可能对所有外国人的处境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写道，“给予一个3年前北京还可能看作是‘蛮夷’的人如此的地位，这样异常的变化，其全部意义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是很难理解的。甚至6个月前，当威妥玛先生初次提及此事时，恭亲王还很不愿意接见李泰国先生，甚至不愿意允许他前来北京。”而如今，他指出，对任何合理而难以实施的建议，通常的回答总是：“我们如果有一百个赫德，就可以采纳了。”⑨

1861年夏季，赫德在天津料理了新海关的事务，与三口通商大臣（牛庄、天津和烟台）崇厚进行了商议。然后他于8月30日返回北京。在此之前一周，咸丰帝死于热河。因而总理衙门的议事是在即将来临的政变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赫德对政变尚无所知）。恭亲王有时不在，有时心烦意乱，然而总理衙门作为一个机构需要决定新海关的一些主要问题：沿海贸易，扬子江的开放，对外国轮船沿岸航行所载土产品的征税，过境通行，以及最主要的鸦片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同时与各国公使馆磋商，因而赫德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中间人。如果说，在李泰国看来——据说如此——他休假回来后，赫德已篡夺了他的职位，那

么，只能指出的是，不断地共同艰苦工作必然会建立一种很难避免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未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两年时间形成的共同观点，共同面临的困难，得来不易的和解，以至成功的共同决心，所有这些都不能轻易撇开。把情况概括起来的又是卜鲁斯，他在给陆赐的报告中写道，“我向阁下再说一遍，没有赫德先生，没有他以他的官方身分所掌握的对中国财务安排的了解，我认为我就不可能在北京详细制订天津条约，而且我现在必须依靠他和他的欧洲助手，以战胜中国地方官员的愚昧无知和刚愎自用。”

当赫德于1861年秋季返回上海把各项决定化为行动时，他所离开的北京具有新的政治气氛和新的战略问题，后者是清政府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引起的。如前所述，自1860年6月以来，对起义者的军事行动就置于以曾国藩为统帅的统一指挥下。1862年初，北京派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几个月之后，皇帝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曾、左、李3人不仅在1864年镇压太平军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如赫德在日记中所记），而且都接着成为中国“自强”运动的主要人物。这个运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旨在建立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力量，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内外挑战。作为总督，他们在各自的地区都起了主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北京，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恭亲王为首的总理衙门的重要职责范围开始得到扩大，不仅包括处理对外关系的官方事务和管理海关的任务（以及全部对外贸易），而且包括管理中国和西方合办的新式事业，诸如同文馆（即译员学校，成立于1862年）及常胜军（1862年正式予以承认）等。总理衙门的许多开支，以及许多中外合办新政的开支，都直接由海关税收支付。赫德忙于处理各通商口岸开设新关的大量问题，于1862年夏季才返回北京。关于他回到北京前往总理衙门会见上司的情况，并无记载。但确知1862年全年，赫德在南方的工作很忙。

防卫上海问题

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在防止江苏东南部和浙江北部的富庶地区落入叛军之手方面一直是相当成功的，这也是由于当时太平军不以该地区为战略重点和1856年起义者内部灾难性的权力斗争。但是到了1860年年中，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太平军由于急切想与外国进行有效的联合，以及由于缺乏补给，便向通商口岸上海大举进攻，并在进军途中占领了江苏省会苏州。

上海是一个必争之地，1860年时已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和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由于处于扬子江口附近的战略位置，上海已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商业中心和中国与西方外交的广泛联系地点。它有良好的港口设备，有避风港，而且通过广大的内河航道网便于进入内地。它位于中国内陆贸易与沿海航运贸易的汇合点。对国际贸易来说，从广州、天津和日本都很容易到达上海。因此，它既是长江流域及华中的贸易中心，又是整个东亚的集散地。上海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不断增长，从1846年的16%上升到1861年的50%。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上海的《北华捷报》就声称："对外贸易的心脏是上海，其他口岸只是血管而已。"

对外贸易带来了外国的补给品，包括武器弹药和船只。尽管英国在中国内战中坚持"中立"的努力限制了军械流入交战双方，但仍有机会购买西方的武器。同时，双方都认识到上海的中外贸易所带来的海关税收在财政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1862年4月4日的上谕把本地海关税收列为防止上海落入太平军手中的主要原因。

列强——特别是英国——在上海日益增长的贸易中有既得利益。因此，当太平军于1860年夏季逼近上海时（当时额尔金和

噶罗正在直隶湾集结兵力，准备进军北京)，英法准备不仅防守外国租界，而且防守中国城及城墙周围的狭窄地区。8月中旬，李秀成率太平军进攻上海，为联军强有力的防御所击退。

远征北京的成功及随后于1860年10月签订的北京条约，为清政府与列强更加紧密合作以对付太平军的威胁，铺平了道路。几周之内，俄国人就提出愿以武器、顾问以至用于在长江下游一带作战的几百名海军的形式提供军事援助。清政府接受了武器和顾问，但未接受海军。与此同时，尽管清政府再三要求英国援助，英国却坚持中立。1861年春季，卜鲁斯作为公使在北京的最初日子里曾写道，威妥玛作为汉文正使，发现最大的困难在于无休止地“搪塞……那些（用以对付太平军的）直接物质援助的请求。”

在这方面，和大多数其他有关太平天国起义所作的决策一样，英国是带头的。卜鲁斯通过各种方法试图坚持不介入政策。他一方面敦促清政府要自立，另一方面又敦促各国克制。虽然两年之后赫德仍记载有这样的谈话，其中威妥玛私下里思忖着改朝换代（例如，曾国藩的朝代）不是会更好一些的念头，但是外国的介入确实被防止了。再者，英国人于1861年4月获得了太平军在该年内不靠近上海周围30英里的保证。与此同时，他们齐心协力阻止了各种国籍的外国人——除英国人外，还有美国人、法国人、菲律宾人、丹麦人、挪威人等——向太平军出售军火或在义军中服役。1861年卜鲁斯和他的伦敦上级之间的通信证明了这种避免卷入中国内战的长期愿望；但是1861年后期和1862年初期的事态发展使得英国政策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

1861年11月的政变无疑是一个因素；北京出现的一个新的而且能力较强的领导集团给列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真正促使英国介入的因素是太平军重新威胁了通商口岸地区的外国利益。1861年12月，太平军长驱直入浙江，劫掠了重要的供应地

区，并于12月9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宁波。12月下半月，英国设法获得太平军不靠近上海周围约30英里的延期保证，但无成果，而且其后几个星期，数以万计的叛军部队开始袭击上海。英国对此的反应是以反对太平军的态度，和法国人一起，并得到由美国人统领的、号称常胜军的、中外联合组成的军事力量的及时援助，共同进行干涉。[10]

这支独一无二的杂牌军产生于1860年中期。当时李秀成第一次逼近上海，美国冒险分子华尔招募了一支外国人组成的雇佣军，用以与叛军战斗。这一初期尝试失败后，华尔开始把中国士兵编入这支部队。到了1862年初，他就拥有一千名以上训练有素的中国武装人员，由他的外国军官训练和率领。在中国商人的出资下，这支部队在1月中旬取得的胜利足以证明尝试是有效的；它提供了把英法直接干涉减少到最低程度的保卫上海的办法。卜鲁斯同意了这一安排，清政府也一样。1862年3月，北京正式批准了这支部队的成立，并授以常胜军这个吉祥的名称。

1862年2月～9月，常胜军在上海地区和宁波地区对太平军的战斗中，均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清军与英军于5月收复了宁波）。和法国人一起，英国人开始按照华尔的模式招募其他由外国军官指挥的部队。与此同时，常胜军的教官着手用西方武器和战术训练李鸿章的淮军。许多外国官员，其中包括卜鲁斯和威妥玛，把这些外国军官训练和指挥的部队看作不仅是通商口岸的防卫力量，而且是西方训练的新式中国军队的核心。然而清政府却另有看法；认为这些部队以及李鸿章的淮军都只是权宜之计。

1862年9月华尔之死使常胜军陷入6个月的衰退和士气低落时期。华尔的后继者、另一个美国冒险分子白齐文，以及白齐文的后继者英国海军的奥伦都未能阻止这种局面。最后，1863年3月，皇家工兵团的戈登担任了统领，并给部队带来了纪律约束。然而常胜军仍然是一个不稳定的和前途未卜的军事工具，为

财政困难、士兵叛变及重大战斗损失等所苦，而现在又加上了新统领的喜怒无常。所有这些人物——华尔、白齐文，特别是戈登——都出现于赫德日记中。

与此同时，在北京，卜鲁斯为英国干涉中国内战而引发的外交和行政问题，以及为英国在常胜军中不断增加的作用而感到烦恼。他热衷于加强清朝的中央政府，但又迫切希望不要在这过程中引起外国之间的竞争。他认为，英国在这些事务中所形成的突出影响是使人为难的。不管是在海关（以英国人李泰国为首），在常胜军（以英国人戈登为首），在天津及其他各地的外国训练计划方面，还是在其他新政方面，都是如此。因此，只有使其中至少一个方面的紧张形势暂时有所缓和，他才能感到宽慰，而那个严厉得招人讨厌的李泰国的离去正是如此。虽然赫德在李泰国休假期间的成就是显著的，虽然他曾不止一次周游中国，但他不像李泰国那样大吹大擂。在1861～1863年期间，他开设了10个新的通商口岸海关，担当了所需的全部筹划和组织工作；他提出了对海关雇员给予足够薪金的问题；他忙于扬子江的开放，忙于沿海贸易、转口税、食盐走私及船舶吨税等事务。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伴随太平天国起义而来的分裂情况下进行的。

例如，说“他开设了10个新的通商口岸海关”，听起来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以汉口为例，它是长江北岸的一座城市，由上海乘船，需航行约585英里。为了实施赫德与总理衙门于1861年10月商定的修订长江章程，必须不仅在汉口设关，而且也须在位于长江沿岸的九江设关。但是湖广总督官文由于惟恐失掉地方权益，反对开办这种在洋人税务司管辖下的新关。为了设法使他改变主意，赫德于1861年12月乘江轮沿长江上溯，沿途需经太平军控制的芜湖和南京，而且需在芜湖停留，以领取船照。船长劝赫德藏起来。他说，“叛军习惯于登船，如果他们发现像你这样一个办理公务的政府工作人员，就一定会把你带到岸

上去。他们通常查看大厅，但不检查客舱，所以你如果呆在你的客舱里，就平安无事了。”赫德照此办理，坐在铺位的边上，直至听到叛军离开轮船为止。

然而到达汉口后，他又遇到了其他阻力。总督虽然以礼相待，但在反对新章程方面则坚定不移。最后，他派道台为代表，向赫德重申他的反对意见。明显看出总督和道台对咸丰帝之死和新皇帝的即位都一无所知——消息尚未沿江传到汉口——。赫德则能够向他们出示有关改换皇帝以及海关改革新计划的最近上谕抄件。官文在表达了他的异议并在某些要点上消除疑虑后，撤消了他的反对意见并接受威妥玛为税务司。这样，汉口口岸便“开放”了。[11]

舰队计划

然而这些行政问题，尽管是难办的、令人疲惫不堪的，但比起为中国获得一支舰队而带来的拖延很久的谈判来说，给赫德造成的麻烦，还算是较少的。这支舰队便是那出名的而又倒霉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这个计划原来是李泰国的想法，他想购买一支由外国船只组成的舰队。这个计划对他这样一个既注重实际、又好大喜功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样一支舰队既可用以镇压海盗（海盗是对一切航运频繁而又代价高昂的威胁，也是海关官员理所当然要关切的事情），又可用以平息叛乱。早在1861年夏季，赫德在卜鲁斯的支持下，就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他使总理衙门相信，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应当购买十几艘英国轮船，由满汉水手操纵。他估计费用不到100万两银子。他论证说，这笔费用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关税和对鸦片销售征收货物税来筹措。1861年7月，清廷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是直到1862年

初，在宁波和杭州先后落入太平军之手后，才提供了足够的款项，并授权赫德通过李泰国采购这些船只。[12]

赫德和李泰国原曾就这项计划互通信件。1862 年 2 月 24 日，赫德从广州向李泰国发出急件，内称两广总督劳崇光已接到北京指示，要他为配备舰队支付分派广州筹款额的第一期款项。李泰国于 4 月 15 日得到这个消息，并立即转告阿思本海军上校。阿思本是李泰国和赫德一致选中的这支舰队的指挥官。他和李泰国事前已达成过临时协议。于是李泰国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认为阿思本可以（向英国海军）“无忧虑地立即申请停职了。”他还催促赫德继续寄钱；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所有你能寄来的钱。”

1862 年 5 月 14 日，赫德从香港给李泰国发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明了有关舰队问题的谈判情况，恭亲王方面促成此事的情况，以及由于清帝国内部动乱而造成的筹款迟延的情况，并在信尾指出，终于已行文各有关地方当局，“命令他们在 4 个月内备妥60 万两，由我支配；亲王殿下也已向我本人发出指示，命令我尽快获得该款并应用于我所建议的用途”。他随信附寄了第一期款项约31,000 英镑的汇票，估计了以后各期付款的金额，并根据观察作出了如下的结论：“亲王殿下迫切期待他现已批准建立的舰队的到来；而且由于你完全能理解的各种原因，最为重要的是不失时机地迅速遣送所采购的船只。”

原来的计划要求购买 6 艘炮艇和 3 艘快艇，总值约 75 万两。赫德建议每艘炮艇的欧洲籍官兵编制如下：指挥官 1 人，军官 2 人，轮机员 2 人，炮手 2 人，水兵 10 人，另加中国水手 30 人。每艘快艇的欧洲籍编制包括指挥官 1 人，军官 1 人，轮机员 3 人，炮手 4 人，水兵 30 人，也另加中国水手 30 人。这样，在构成上，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就被设计为海军的常胜军，由外国军官指挥，由中国人操纵。

然而二者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李泰国和赫德都竭力反对华尔的队伍，理由是这支队伍是地方性质的，是由流氓配备起来的，而且是以声名狼藉的美国冒险分子为首的。李泰国于1862年5月9日致函赫德称，“我还要在我们的总司令的‘条款和条件’中列入另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这样的：中国政府除其（指中央政府）授权下的外国人以外，不得有任何军事职位的外国人。我的目的是排除道台的船队和‘华尔上校的部队’。我们必须在岸上没有敌对的武装力量。”

在取得英国政府对舰队计划的批准后，李泰国和阿思本于1863年1月16日签订了一个十三条的协定，旨在使他们自己掌握这支海军力量以及事实上的中国其他海军和军事力量的最高权力。根据这个文件的条款，阿思本应成为这支“欧洲的中国海军”的惟一欧洲人总司令，任期4年，并完全控制“全部欧洲建造的船只，以及受雇于中国皇帝或其授权下的由欧洲人操纵的本地船只。”另外还有一条——使整个计划失败的正是这一条——规定：阿思本只服从直接传达给李泰国的谕旨，而李泰国方面“对于任何谕旨，如其合理程度不为其本人认为满意时，可拒绝居间传达。”这个协定不仅措词笨拙，而且是对中国主权完整的明显威胁。赫德写了一封长信进行规劝，但毫无效果。

1863年初春，随着舰队8艘船只分阶段出发计划的完成，李泰国由英国启程前往法国，并于3月12日携眷自马赛登船。他于4月24日抵达香港，5月1日抵达上海。和他从英国乘船同行的有他的新任秘书金登干；这个人的生涯很快就和赫德联系在一起了。同行的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年轻的海关新手，叫做包腊；他从上海继续前进到天津，就任他的首次职务。由于他的有利地位，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李泰国、赫德和金登干在前往北京途中抵达天津的情况。[13]但那已经是6月初了，因为李泰国在上海度过了5月。赫德的1863年第18号通札（日期为5月9日，分

送当时已开放的13个通商口岸的税务司）宣布李泰国返回中国。赫德本人于那天中午刚从汉口回到上海，并立即到办公室与李泰国会晤长谈。他在日记中——这是1858年日记之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篇日记——写道，“他变化极大；事实上，他变得如此英国派，以致我担心他同中国人共事将是非常艰难的。他不会迎合他们的意图；他一定会坚持己见。他一定会说教，而不做解释。天哪！如果所有事情都变得一团糟，所有的人都吵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真是有先见之明！

5月底，包腊（当时22岁，赫德28岁，李泰国31岁）在日记中写道，李泰国先生及其一行在从上海到北京的旅途中正在天津停留。他写道，“他是乘‘皇后岛’轮到达的。这是一条定期往返于此地与上海之间的简陋的小船。他由赫德先生和金登干陪同。赫德在李泰国休假期间，一直代理总税务司”。金登干是李泰国的秘书，他从英国出来时所乘的船就是我乘的那条邮船。看来李泰国很不健康，显得过于虚弱无力，不足以行使赋予他的权力。如果体格是成功的必备条件，那他肯定不应当是他现在的这个角色——众所周知，这个角色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但是在他的炯炯而深沉的眼光中有一种意志坚强的镇静神色，双唇和挺直的鼻子显示着力量，这些都会使人立即明白，他之所以处于这样的地位，并不是环境偶然造成的，而是由他自己的意志力和果断决定的。

“赫德——于李泰国在英国期间代行其职责——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人，约28岁至30岁之间。他之所以担任重要职位是由于他是清帝国的外籍官员中惟一通晓汉语和商业事务的人……”饶有趣味的是：给包腊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的，是赫德的而不是李泰国的年轻有为。

两天之后，包腊记下了一行人的出发情景：“一队牛车，共12辆，另有3匹马，供牛车坐累时骑用。当一切备妥——牛车

在外面等着——的时候，他们成了一支古怪的旅行队。牛车看起来和我们祖先时代经常来往于约克郡和伦敦之间的大篷车完全一样……去北京要4天路程；由于天气酷热，沿途尘土飞扬，一路没有客栈，这种旅行实在不令人羡慕。”李泰国那天早晨吩咐包腊给他买了两匹马，赫德则已有自备的马。“这些马跟着牛车……当他们因牛车令人不舒服的颠簸而感到疲乏时，就可以上马。他们带着食品。有一辆牛车在出发前1小时装满了面包、啤酒、葡萄等等。”

北京谈判：李泰国的覆没

他们于6月1日到达北京，并于6日在总理衙门举行首次联席会议。从赫德日记的记载中，人们可以看到形势的日益恶化。如赫德所预见到的，清朝当局拒绝接受李泰国与阿思本所订协定的主要条款。清朝当局的设想一直是舰队和常胜军一样，应受地方当局的节制。

面对这样的抵制，李泰国求助于卜鲁斯。这位英国公使和李泰国的观点一致，认为英国军官只应对中国中央政府负责，而不能对诸如李鸿章等那些反复无常的地方官员负责。他于6月16日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恭亲王。他在信中写道，“除非依照下列条件，否则我不能批准雇佣英国海军军官或陆军军官：(1)帝国政府必须把海关税收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保证定期支付这支队伍军饷的方法，以便维护军纪；(2)这支队伍应直属帝国政府，只接受帝国政府的命令，只对帝国政府负责，并据此与地方当局协同动作，但不受地方当局的节制。”

恭亲王却另有看法：“准许（英国）军官为中国效劳与否，自属英国公使决定之问题，如公使阁下不予允准，则此事即行作

罢；但如允其提供援助，则此等军官由何人统领以及其饷银由何项开支，自当由亲王自行决定。”

清政府在与太平军交战中的处境已有所好转。应当根据这一情况来理解恭亲王的态度。戈登任统领后的最初几个月期间，与李鸿章扩编的淮军协力作战，在几次值得注意的战役中获胜，收复了重要地区，同时也恢复了对常胜军的信任。左宗棠所部和曾国藩的湘军也分别在浙江和南京战线获胜。于是到了1863年中期，清政府的军事命运就比较看好了。因而恭亲王有条件采取不让步的态度。然而更重要的是卜鲁斯本人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戈登近期取得了胜利，常胜军内部依然困难重重，而卜鲁斯认为只有戈登能对付这些困难。如果把戈登撤掉，卜鲁斯担心这支队伍可能对英国利益构成威胁。因此，当问题成为必须使戈登及其他英国军官离开中国部队以证明他有关中央政府权力的论点时，卜鲁斯就畏缩不前了。而他的这种立场遭到了李泰国的极端蔑视。

1863年6月和7月，赫德一直在北京。他几乎每天都参加总理衙门的会议；李泰国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多么令人惊异的场面！清帝国6位最高级的官员花费许多小时和一位谦逊而年轻的外国小人物交谈，而这个人恰好是帝国岁入的主要供应者。这些交谈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讨论会——如何进行，如何征税。有些同赫德对话的人曾有在广州和上海同西方人交往的经历，但他们远远没有掌握更广泛的国际情况。然而尽管对于市场交易一窍不通，这些官员却是通过十分复杂的官僚政治制度的等级提升的。他们对体制——赫德译为“国家的尊严”——的意识极强，这是构成帝国秩序的道德——心理原则。他们的声望基于体制，而声望又是体制的主要维持者。这种对尊严的关心，认为尊严比税收更重要，对于作为广州联军委员会翻译的赫德来说，那时已经变得很明显了。他通过在广州时与处于英法侵略者的监禁下充

当傀儡的清朝高级官员的交往，已经学会了外柔内刚的策略。

通过总理衙门的这些讨论会，赫德还开始弄清清朝的国家活动方式。皇帝在形式上的权威是无容置疑的，正是这种权威导致西方列强要求在北京接近朝廷。然而赫德现在看出了这种权威是受严格限制的，起限制作用的是京城与各省之间习惯上和程序上的均势。皇帝对其官员的监督管理是在事后。地方政府包括对外事务在内首先是由这些官员掌管的。因此，任何由北京支配的海军，除非置于在长江一带负责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指挥下，都不可能沿江作战。

中国政治的另一个支柱对赫德也一直是明确的，那就是忠诚的无上价值；忠诚是构成中国个人之间的关系的凝结力。赫德从一名英国官员成为一名中国官员时，正是和平与秩序以及贸易与税收是两国共同利益的时候；但当利益不同时，他却为中国效劳。例如，当那位喜怒无常的英国公使卜鲁斯因对白齐文处理不当而大发脾气，并称英法将不得不接管上海以及“他决不为支持清王朝而提出另一个人”时，赫德立即向他的上司李泰国作了汇报，然后又到总理衙门向文祥汇报并提出了补救办法。他十分明白他自己的职分。

李泰国则与此不同；他对他自己身分的观念是混乱不清的。由于未能认清自己是一个中国官员，他对中国人对尊严、均势和忠诚的想法是麻木不仁的。日复一日，他的傲慢态度引起了他清朝主人的反感。他们十分厌恶他，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赫德竭力收拾残局。他确实显得是他的傲慢而粗暴的上司的忠实拥护者，甚至达到敦促清政府信任李泰国的程度；他对清政府说，他们一定会“发现他（李泰国）的全部意见和计划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然而李泰国本人与各大臣的议事总是在互不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尽管赫德在多少修改一些李泰国原来的要求方面，确实取得了成功，他却无法改变李泰国在谈判中的个人作风。他在6

月29日的日记中不得不承认："李泰国绝不是一个成功者。他一直非常傲慢。他过多地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然后又过于频繁地用英国公使的不满来恐吓他们（指清朝官员——译注）；他告诉他们，他只是不信任他们；而同时他又要求得到他们的安全信任。"

恭亲王只会晤过李泰国一次；例行程序是由总理衙门各大臣向恭亲王汇报议事要点，并接受恭亲王有关策略及要旨的命令。赫德和各大臣几乎每天会晤，李泰国则在他认为不得已的时候才和他们会晤。当总理衙门拒绝接受李泰国和阿思本所签订的协定而陷入僵局时——这是意料中的事——赫德集中全力协助恭亲王和各大臣起草一个"折衷"意见。按照这些新章程，阿思本将在一位中国海军指挥官之下担任助理指挥官（帮助总统）。同李泰国的规定相反，这两位指挥官都将受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节制；李泰国本人既不能控制帝国的指挥权，也不能控制除维持舰队外的帝国税收的转移。李泰国曾多次参加议事，他虽然没有反对把章程定稿呈送皇帝批准，却断然拒绝接受新协定，甚至在得知诏书已予认可时依然如此。赫德则发出了不现实的自我宽慰的呼声。他在7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好哇……解决舰队的事情成功了。"现在所差的只是大家等着阿思本率领有8艘舰只的舰队到达中国了。

从1863年7月9日到8月8日，李泰国离开北京1个月。他奔赴上海把他的眷属撤走，因为那里再次发生流行性霍乱。在他暂去上海期间，赫德致力于海关业务的细节和翻译惠顿的《国际法》。在炎热的7月里，他整天在家从事翻译。7月下旬，上海传来了税务司德都德逝世的消息。李泰国在英国休假期间，德都德曾和赫德共同担任署理总税务司的职责。李泰国在致赫德函中称，他打算任命威妥玛为上海税务司。但当他于8月返回北京时，却宣布他已把马福臣留在上海暂时负责并将由赫德接任税务

司。于是赫德于8月21日离开京城前往就任“上海税务司兼管长江各口及宁波关务”。据说这种多项职责是恭亲王特为赫德安排的，以便使他比仅仅担任税务司拥有更大的权力。在天津停留之后，赫德于9月8日到达上海。当他靠近港口时，首先见到欢迎他的是升火待发的“北京”号和“中国”号，它们是阿思本舰队的两艘轮船。赫德在日记中推断：“因此我设想阿思本即将北上。”

舰队的第一批船只已于8月1日到达长江口，阿思本率领第二批于9月上旬到达，最后一批则于10月6日进港停泊。在把大部分船只停泊在烟台后，阿思本本人前往北京，并于9月25日与李泰国会合。李泰国立即交给他一份新协定的草稿，附有李泰国表示不同意的注解。在没有赫德起缓和作用的情况下，他们联合起来对总理衙门采取强硬态度。经过3天激烈辩论之后，阿思本书面向恭亲王提出了正式异议。他断然拒绝接受恭亲王和赫德所制定的6月30日协定。他在信中写道：“这些指令直接违反我和李泰国先生的正式协定……我到这里来是为皇帝效劳……而不是仅仅充当地方当局的仆人……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论点是，‘恭亲王所议之办法系中国之常例。’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以及我的追随者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中国水兵或士兵所受的通常待遇，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在对待欧洲雇员或一般欧洲人方面执行一项倒退的政策。”阿思本在用词上和李泰国一样不讲分寸。他用未经斟酌的语言咒骂了中国整个行政措施，特别是李鸿章给戈登的待遇。

在其后3周内，李泰国在总理衙门当着阿思本的面并在恭亲王引人注意的缺席情况下，“诱骗，争论，和咆哮”。10月6日，李泰国的秘书在前往会晤戈登途中，给在上海的赫德带来了一封信。李泰国在信中宣称，“指挥权问题”再次成为突出问题。他不现实地断定，有“希望一切予以适当调整。”赫德则由于了解

总理衙门而并不乐观。10 月 15 日（赫德直至 24 日收到李泰国的另一封信时才得知），阿思本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最后通牒：限 48 小时内批准他和李泰国签订的协定，否则他就立即解散舰队。恭亲王及其同僚毫不动摇。文祥直截了当地说，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屈服于阿思本的要求。由于未得答复，阿思本于 10 月 19 日将全部有关文件送交卜鲁斯，并附函说明他打算解散舰队，但要求对船只的处理给予指示。由于这些船只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担心如果交给上海地区不可靠的地方当局管辖，就可能会构成威胁。接着是某种混乱状态，其间总理衙门各大臣与英美两国公使都进行了磋商。最后双方同意在阿思本的统辖下，遣返舰队的船只，并通过与印度英国当局及英国本土的当局磋商予以处置。过渡期间的经费安排妥当之后，阿思本于 1863 年 11 月 6 日离开北京。作为对他工作的酬报，中国政府要求他接受10,000 两银子的特别慰劳金。

在这个最后阶段，李泰国的作用只是计算遣返费用及其分配。随后，他声称要辞去总税务司职务，但是总理衙门的官员强烈要求他不要辞职。然而对于旁观者来说，他的免职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从引起摩擦的天津谈判起，他给中国自尊心造成的伤害，大得不容宽恕。他所要求夺取的权力，任何主权国家都不会交给一个拿薪金的外国雇员。他不仅想要指挥舰队的行动，而且还指望控制海关税收的支配。总理衙门认为这样大的权限无异于允许他支配国家政策。更有甚者，他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两个高级官职（北洋大臣及南洋大臣）；他要求拥有像只有皇亲国戚才有的那样一座府第供他居住；他摆出和总理衙门各大臣平起平坐的架子，只对恭亲王负责；而在实际办事中，他在提出舰队开支账目方面总是拖延的。因此，在和蒲安臣及卜鲁斯商量之后，总理衙门于 11 月 15 日免去了李泰国的职务。与此同时，像对阿思本一样，给了他一大笔钱作为在财务上的了结，包

括他在北京布置住宅的开支，一直到1864年3月15日的月薪，和临别馈赠6,000两银子（总共约合14,000英镑）。

在免去李泰国职务的公文下达的同一天，即1863年11月15日，恭亲王写了另一件公文，任命赫德填补李泰国的空缺。但如赫德在日记中所记，他直到29日星期日早晨上海道台送交他一件总理衙门的公文时才正式得知。这件公文用汉字总税务司称呼他。当时他大概并不感到惊奇。早在6月11日，他的这项任命就有先兆。那时文祥曾提醒他，一位“署理”的官员很可能成为一位正式的官员；并称，如果李泰国离开海关，他（赫德）是惟一可能的取代者。再者，在前一周，许多从北京来的旅客都曾过访并告知舰队的遣散，其中也有阿思本本人——赫德于22日和他共进晚餐并进行长谈。还有金登干乘坐舰队的一艘船返回英国。以及星期五，赫德收到了李泰国16日的一封信称，“中国人免除了他的职务，并任命我接替他。”

赫德12月7日的日记概括了他对李泰国和阿思本的失败的看法。“李泰国的缄口毁灭了一切，也毁灭了他本人，从而结束了一系列的灾难。然而他的消失不会使我们感到很悲伤；因为他缺乏机智，他办事独断独行，这些都使人感到不安全和不稳定……但我为李泰国感到十分惋惜，因为他长期为中国人服务，而且我认为他办事始终非常认真，在他所办的一切事务中都努力工作，他相信他是在为所有有关人员的最大利益而工作。但是认真的行动需要辨别力和实地判断能力以及机智和对掌权人的理解。他缺乏机智；他不给中国人考虑的时候；他以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断送了日后经营规模的扩大。”

据说，赫德在后来的生活中很少提到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李泰国和他于1864年1月4日签订了决算账目。5天之后，李泰国由上海出发前往英国。1864年初，赫德对卜鲁斯说明了他此后40年为清政府效劳所坚持的一般宗旨：“对该政府的指望

应当是它将致力于忠实地履行它所缔结的条约；而且除按这些条约的条款和平行事外，如果它能倾听外国公使的申述，我认为这就于愿已足，即使在25年中并无其他明显的成效，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立即变革；事实上，任何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速有益的变革。经验终将使该政府相信，除了忠于诺言并以开明的态度付诸实现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与列强相处得更好。但是取得经验需要时间；如果在给该政府考虑时的同时，我们准备进行导致它从经验中得益的积极尝试，那么，我们必须依靠合理的经营管理，而不是依靠命令。”如果说，赫德的弱点之一是过分的乐观主义，那么，他的优点之一便是基于常识的现实主义。幸而和李泰国的独断主义大不相同的是，这两种态度对在中国工作都是有益的。

全部记载都在他的日记中。现在让我们翻回到1863年5月9日的日记。那一天他作为代理总税务司从他的长江之行回到上海，以欢迎他的上司从英国归来。

第八章

日　记

北京和上海 1863 年 5 月 9 日～11 月 29 日

1863 年 5 月 9 日　星期六

由汉口乘“鄱阳”轮于本日中午返抵上海。在办公室见到李泰国，他看上去比过去瘦了。到他住处长谈。他变化极大。事实上，他变得[1]如此英国派，以致我担心他同中国人共事将是非常吃力的。他不会迎合他们的意图；他一定会坚持己见。他一定会说教，而不做解释。天哪！如果所有事情都变得一团糟，所有人都吵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

（接着有两页空白。）

1863 年 6 月 6 日（北京）

李泰国和我按照约定时间于 1 点钟前往总理衙门。到达后，发现只有文祥一个人在那里。和他谈了几分钟后，李泰国按照我们两人之间原来的商定暂时离开了谈话的房间。[2]我立即利用他不在的机会指出，有几件重要的款项事宜不便在各大臣到齐时首次提出，因为这些事宜所引起的议论会使人难于加以详尽解释；

因而在其他各位大臣在场并向他们提出之前，有必要先私下里使文祥有所了解。为此，可否请文祥走访李泰国先生，使他有机会详尽说明他的看法和建议。对此，文祥答称，此刻进行这种不受干扰的交谈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薛焕不到总理衙门来，而恒祺、董恂和崇纶都到俄国公使馆向即将离开北京的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先生话别去了。[3]这时李泰国走进来，我用汉语把我对文祥讲的话告诉了他，并告知文祥已同意在当着若干人的面讨论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准备提出的建议的性质和目的。于是李泰国提到了星期四出现的场面，并且对文祥说，薛焕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家伙，这一点他（文祥）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不久就会发现。比如说，薛焕为答复反对长江章程的法国人所拟的文稿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薛焕）的愚蠢以及没有提出正确意见的能力吗？李泰国还解释说，他对薛焕发怒是因为薛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上海共事时，薛焕对李泰国言听计从——并且后来因为理洋务有功而得到提升；如今他在北京，竟如此骄傲自大地翻脸不认人，并且假装什么都懂，以如此幼稚、苛刻和琐碎的反对意见来妨碍公务，这难道能予以容忍吗？“例如，”李泰国说，“他反对配备两名轮机员，并声称1名就够了，这只会使人以为直至细枝末节，他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我之所以提到这一情况，只是为了向你说明我为什么在星期四的时候和他那样谈话。只要盯住他，让他处理公务，以后你自己就能做出判断。”[4]

李泰国接着进入正题。他说，海关征收和移交给各省巡抚的款项，都被他们滥用和侵吞了；他决不同意继续征收款项以供这些人这样可耻地滥用；为此，他已决定保留征收的款项，听候总理衙门支配；除非有总理衙门的指示，否则他一个钱也不给各抚台。[5]说到这里，文祥打断了他的话。文祥指出，第一，抚台不可能侵吞该款，因为总税务司的季度报告使总理衙门和户部（原文如此）能够知道实际征收的金额。而且除这种季度报告之外，

作为赔款的2/5税款也使总理衙门能够知道总额是多少；第二，各抚台无权自行拨出该款，而必须按照户部的指示分配。户部则在与总理衙门商讨之前并不就涉及与外国通商税收的款项发出分配的指示。他概括起来说，“因此你此刻提出的建议和现行的实际程序是一致的。”于是李泰国重申他只为总理衙门征收款项的决心，然后接着指出，假定他的意见得到批准，中国政府就能获得一笔贷款，而贷款在当前的紧要关头对中国政府大有帮助。对这番话，文祥回答说，他几个月之前所说的有两点意见和威妥玛先生是一致的：第一，借款对国家是一种耻辱；第二，利用外国人的援助是一种耻辱。[6]对此，李泰国回答说，根本不必把利用外国人的援助视为可耻之事。一个人病了，就得找一位大夫，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就得交给别人去做。中国开始和外国人交往而又不理解外国人的习惯、思想方法或性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雇佣外国人，就不能恰当地处理对外事务。在今后50年内，如果中国人不想陷入各种不幸和圈套，就必须继续雇佣外国人。不求救于大夫的病人是糟糕透顶的。“对，”文祥说，“可是如果大夫不了解病人的体质，给他服药，虽然使他免于一死，却使他大伤元气，那又如何呢？”[7]

李泰国说，至于说借钱可耻，这根本谈不上耻辱，各外国政府都是不断借钱的。文祥说，“恐怕是的。”[8]李泰国接着说，可耻的是各处的地方官员求助于商人，以过高的利率小额借款。至于政府，则可以合法而无丝毫耻辱可言地把借款作为一项政府的行动。“现在，”李泰国说，“我所要求的和我所必须掌握的是征收税款。我为你们征税。你们担心人们因你们批准这一步骤而责备你们，但我为你们想了一个办法——一种办理方式。你们政府手头拮据，你们想要取得一笔巨额贷款。这笔贷款可以采取这个方式——就是出以允许我征收税款的方式——而不以其他任何方式，而且所涉及的税款来自与外国通商。这样，我达到了目的，

你们则通过这样的方式防止了人们的议论。与此同时，你们手里有一大笔现成的钱可应付需用。这难道不好吗?”

文祥眼睛发亮，他的面部表情说明他对此事的想法不是不赞成的。“但是”，他说，“你从哪里去弄到这笔钱呢？谁会借给我们呢？我们是否不得不放弃某个地方，以作为还款的抵押品或保证金?”为答复这些疑问，李泰国解释说，不要任何地方作为担保；只要允许他征收税款，存入一家英国银行，并掌握该款听候总理衙门支配，他就能兑现这笔贷款。他说，他在英国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得到1,000万两贷款的全部安排，这笔钱10年还清，利息按8%或9%计算，每年付款若干，税收的余额则凭总理衙门指定支付。[9]在文祥看来，这件事似乎更加切实可行，因而他就更感兴趣。他说，他担心如果他自己或者李泰国死了，那些人还肯贷款吗？如果全部款项在1年之内都无益地花掉了，他们不会陷入困境吗？或者，如果中国与任何一个政府进入战争状态，结局又会如何呢？李泰国对这些作了答复，并对文祥说，金额将足够两三年之用，而且他会使中国在4年之内平静下来。

于是文祥说，他将向亲王说明此事，他似乎显出有意接受这个建议的样子。[10]

正好在这个时候，崇纶进来了。于是李泰国转入了另一个话题。他说，他正在写信给亲王；他不上呈，而只是陈述。他不是中国官员，是一个中间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帮差，是中国请来代办某种事务的。这种事务是重要的，涉及巨大的利益，因而他的地位很高，有权得到所有人的尊重。由于他和知县平级，所以他和制台也是平级的，等等。文祥和崇纶愉快地就此事大谈特谈，说明差役是无权的；总税务司如果打算有权，就必须担任职位，而担任职位就包含一定的官阶和称呼方式等等。[11]

由于崇纶问李泰国觉得他（李泰国）的住宅怎么样，李泰国就重提他希望有个花园。他说，他不想要一所府第，但是他想要

个大花园。文祥说，在北京恐怕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要府第当然办不到，因为现在没有空着的地方。崇纶开玩笑说，“为什么不让你的家属住在西山，你可以每星期天去看望他们嘛。”李泰国说，这根本不行！崇纶笑着说，“啊！离不开家。”李泰国脸红了。[12]

接着，李泰国提到他给恭亲王去信的内容。他说，他每月要收30,000 两银子，从中国农历正月到六月之间，广州、厦门、福州、九江和汉口缴纳的税银各占一定比例（每处6,000 两），5 个月共150,000 两；此后，从六月初一起，每月要收100,000两，其中广州和汕头25,000两，福州和厦门35,000两，上海20,000两，九江和汉口20,000两。他解释说，士兵在英国应先预支 3 个月的费用，到达中国又应再领两个月的费用，因此手头必须有钱以支付最初的开支。[13]

谈话然后转入上海的状况，以及对经过操练的中国士兵加以整顿的必要性和整个租界的问题。[14]

李泰国提出，一切对外问题，不论涉及谁，都应当接受他的意见，并且在一切情况下在采取行动之前都要和他商议。看来文祥认为这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

最后，李泰国说，他在给恭亲王的信中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本人、阿思本和我为办理舰队等事应获得的酬劳问题。[15]

然后我们走了，并在丹麦公使拉斯勒福和包令爵士处留下 3 张名片。[16]

总的看来，我认为事情进展顺利：文祥理解了贷款问题，而且由于如此急需款项，我想他一定会像钓鱼人所说的那样“上钩”。

4 月 10 日的英国邮件今天到了，有玛丽的信，还有玛丽姨妈以及伊莎贝拉和夏洛特两位表姐的信。

1863 年 6 月 7 日

张深今天中午 1 点来访，询问乘轮赴汉口等事的情况。他的弟兄（张清）是四川（遂宁）知府，因丁忧将回北京。[17]

1863 年 6 月 8 日　星期一

恒祺今晨来访。他的谈话使李泰国得到的印象是，他被派来劝他放弃各项要求。但是李泰国说，他做事之前必须有权。我呆在我们交谈的房间里时，恒祺和平常一样，大讲陈旧的伦理道德，背诵他的旧时代的道德滥调。

11 点，我前往总理衙门，一直呆到下午 6 点。我见到了庆、蔡、夏、李、志和方等诸位老爷，[18]我经常与之办事的是前两位。

1．贵州问题：他们对我说，正当田提督袭击一个有很多叛军的城镇时，那位法国传教士却被意外杀害。他们给我看了法国公使的最后来文。大意是事件发生之后，长达 1 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清政府对此事却尚未采取任何行动，罪犯尚未予以惩罚。如果恭亲王继续拖延，此事就会牵连到皇帝，而情况这样一变，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来文最后要求恭亲王立即告知法国公使，他究竟打算采取行动与否。来文的内容就是这些，但在信封里还有一个文件——尽管来文中没有提到——其中要求：第一，在贵阳或阿希旺处决田提督；第二，贬黜并惩办戴鹿芝；第三，在谋杀地点以4,000两银子的代价建造一座教堂；第四，对每个遭受损失的基督教徒家庭支付 400 两银子；第五，由中国政府为贵州传教团建造一所房子并赠送4,000两银子；第六，颁发谕旨，在各省公布，把处决田和贬黜戴以及其他补偿措施公之于众。他们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说，他们处在严重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首先，如果他们不照要求办理，就会发生一场战争，而战争很可能使清王朝覆灭；其次，如果他们按照要求真的把田处决，政府

就会招致百姓的不满，而且还会在今后任何时候都被要求照此办理，以致官吏人人自危。接着，我说，规避此事的一个办法是使田在了解政府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后，自尽身亡，也就是为国捐躯。他们对我的意见先是说，“那不公平”，但后来又说，田并不了解政府处于何种境地。[19]于是我说，由于柏尔德密只是新近到任，他很可能不了解中国人为适当处理此事已经采取了哪些步骤，也不理解妨碍行动的各种困难；他的前任罗淑亚，此人懂中文，可能没有翻译有关这个问题的公文；他们（指总理衙门——译注）应当行文给他，列举所有已经采取的措施，并说明采取行动是何等困难。看来，他们不信任那位翻译；如果他们知道他是如何最终离开广州的，他们大概会更加不信任他。我接着对他们说，除了上述行文外，政府应当立即派一位钦差去法国。那是至关重要的！接着，我们在桌子旁边坐下办公。他们给我看了许多公文，并询问应做何举动。[20]

2．再出口的商品：我向他们建议把期限延长到1年。

3．费士来关于禁止200吨以下船只从事长江贸易的建议，法国人对此已表示反对。我还告诉他们，现在太晚了，一两个月内他们什么也不用办，到那时我们就有自己的船了。他们给我看了克米特先生（?）写来的一封非常有趣的私人信。信中说明：少校和美理登在分别处理“欧仁王子”号和“珍珠”号事件方面是何等出色；难道法国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吗？法国1853年在上海没有提供援助吗？费士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其真实目的是损害法国贸易，在华商人不是大资本家等等。我猜想他之所以写这封信，是为这位少校要求休假两年准备条件。[21]

4．由汽艇搜查通过镇江的商船：我说，卜鲁斯提出的章程是行不通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打开每一个箱子，而不这样做，搜查就只是一场闹剧。他们应当有两艘汽艇，在南京两边各置一艘，这样就可以抓住所见到的与岸上联络的任何商船。但由

于我们自己的汽艇不久就将到达中国，所以没有必要采取任何行动。

5．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意废除免重征执照，并代之以退税；法国人反对这样做。我向他们建议把对再出口实行退税定为规章，但对申请免重征执照的任何人都予以签发。然而此事需由李泰国决定。[22]

6．宝顺洋行想要从福州出口茶籽，但地方当局不予准许。我对他们说，茶籽不在禁止出口货单之列，因而应当允许出口；又由于不在税则中列名，因而只应交纳5%的从价税。福州当局担心外国人种植茶叶，从而危害福州的交易。我对他们说，在过去10年间，茶叶种植一直在印度阿萨姆邦扩大着。尽管如此，中国的茶叶出口还是与年俱增。卜鲁斯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来文中抱怨中国政府贬黜劳崇光和提升瑞麟。劳崇光和外国人相处很好，瑞麟则不好。卜鲁斯是在谈到星察理的抱怨时提出这种怨诉的。星察理抱怨福州知府秦被革职，秦是一个很了解对外关系问题的人。[23]

7．福州方面抱怨鸦片不是运到港口，而是沿着海岸出售了。他们要求各国公使吩咐商人不要这样办。我的意见是指示地方当局降低税收。地方当局现每箱征税158两银子。这样高的税，走私的增加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要求各国公使行事，这只会使他们嘲笑我们，因为除非以武力作后盾，否则他们的命令是毫无用处的，而指望他们来办理我们自己的税收工作，那未免太过分了。

8．九江关在计算到1863年3月底为止的季度赔款时，误将向本国船只征收的税列入计算。必须致函哈蒙德。[24]

9．牛庄海关监督要求命令美国领事注意按照章程办事。这是海关监督自己的错。有一艘商船尽管事前没有报关，却曾由他准许持续卸货达20天，然后他又要求船长因不报关而交罚金。后来，在事先盖了大印之后，他又要求指示领事强制处罚。

10．船钞：4个月的证明书是按英国的月份还是按中国的月份计算？

11．汉口煤：应当在汉口装船时交纳出口税，上岸时交纳进口半税。

12．汉口米：不应当交纳半税。

13．购买木材的人如果申请，汉口必须发给转运证，但很可能没有人申请。

14．镇江：没有商人在左河口从事营造业。我返回上海时，发现李泰国已经到达，因此我就不再办任何事情。

15．汉口目前对本国船征收船钞，而不征收关税。九江最好也这样办。[26]

在一般交谈中，他们提到了李泰国多次和薛焕发生口角。他们说，文祥要办的事太多了，恭亲王曾召见薛焕，为的是使他和恒祺（两人都是或被认为是有经验的）把文祥的全部（税务）工作都接过去。[26]我对他们说，当他们更好地了解李泰国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感激他，因为要不是李泰国在英国，英国人此时此刻可能已经和太平军缔结条约了。他们说，李泰国什么都很好，“但是如果他继续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像他一直企图的那样，那么，对他以前效劳的回忆就会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

回家路上，我的小马把我摔了下来；该死的畜生！

恒祺今晨告诉我，劳崇光已受任为云贵总督。[27]

田提督是湖南人。如果他们对他不公正，曾国藩和他的一伙人必定“知道个中原因。”[28]

致函威妥玛，就丹麦条约的某些条款提出意见。

1863年6月8日　星期二

今天刚过中午便前往总理衙门。李泰国带着他对各件公文的复文稿以及就有关舰队购置费给恭亲王的上呈。整个交谈过程不

很热烈，而且是一般而不是具体事务性质的。为了获得关于贷款等的一些消息，李泰国询问文祥是否已把他的有关由总理衙门向每个口岸委派一位监督的建议提交恭亲王。文祥说，他已向恭亲王提出此事，但在实现此事的方法方面还有许多障碍——掣肘地方（原文涂改，不清楚）。他主要担心仅仅一位没有任何地方权力的监督是不可能完成其工作的，因为地方官员会把他的指示当作耳边风，也就是呼应不灵。文祥争辩说，没有什么必要采取这一措施，因为目前充任监督的地方官员，在征收外国税款方面，完全听命于总理衙门。对此，李泰国说，有一件事情他已经下了决心，那就是在规定日期之后，他将为总理衙门而不是为各省官员征收款项；如果总理衙门不同意这一点，他就不再担任总税务司，而且将使英国公使撤走海关的所有英国人。他接着说，他将再写一个上呈，向恭亲王提出此事。但是他希望他们向恭亲王说明，他不是在向恭亲王发号施令，而只是确认他能继续效劳的条件。文祥说，最好把意见以节略的形式提出，而不要作为上呈提出。[⊗]。

随后不久，法国公使馆翻译丰大烈来到。他突如其来地走进了房间，既未通报，又出人意料。桌上放着一件法国公使的来文和李泰国刚刚起草的复文。文祥立即把他的扇子放在文件上，然后叫一名听差把文件送交蔡老爷。在没有人让座的情况下，丰大烈自己就毫不客气地在高台上坐下来。于是我们走开了。

如果李泰国能够把税收掌握在他手里，那对海关是件好事；但是他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没有向中国人表明这对他们来说会有什么好处。他如果解释说是由于地方官员滥用这笔款子，所以必须这样做，文祥就回答说，总理衙门通过各税务司是了解收入即每季度实际征收额的多少的。他如果解释说这样做可以使这笔款项在更大程度上受北京（原文如此）的支配，文祥就回答说，不是这样，因为目前这笔经费只是按照谕旨的授权才予使用。他如果

说官员应予委派，因为他们将由总理衙门管理，文祥就说，他们受总理衙门管理的程度，不可能比目前更大，而且他们不会拥有像现行制度下他们能拥有的这样大的地方势力。现在，李泰国所说的是："如果你们不这样办，我就不干了"；他们当然不愿意说"那就别干了"。他们如此讲究礼貌，所以不会这样说。但是他们对这样颐指气使地提出条件，不能不感到恼火。他们也不可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他们屈服的话就等于把这笔款项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同时他们也许不是不可能说，"他如果不干，别人——赫德或美理登——就会干。"总之，他能吸引他们的只有这样一件事：如果他们依从他的计划，他们就可以弄到一大笔贷款，然后如果他们听从他的建议，他就保证他们在几年之后看到这些建议的价值。当然，如果他们说他们不想要钱，而且宁愿按照他们自己的计划办事，那么，他的要求就没有基础了。如果他撒手不管，美理登就会抓住机会上任，而且会得到法国政府的热情支持，其热情程度将足以使所有列强都在其间和谐一致。可是：我们还得看一看。我叫李泰国等一下，等到恭亲王答复他对款项要求授权的上呈时，他就能看出"风向"了。[30]

1863年6月9日　星期三

今天到中午才开始进早餐，因为整个上午工作毫不间断。早餐后，拜会了法国公使柏尔德密。他说，在这里，一位公使的处境决不惬意，因为一方面不得不支持中国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猛烈攻击他们。他又说，所有各外国政府的利益，除细节以外，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中国应当安定和治理得当，而不是变得强大并且转而反对外国人。他相当详尽地询问了我们舰队的启航和可能到达的时间。我希望他不是在考虑拿舰队作为抵押品来解决贵州事件。随后，前往英国公使馆，见到了威妥玛、瓦特斯、柏卓安、俾斯麦和默里。给迪林哥留下名片。默里看来是个聪明的家

伙。

今天发出了一批邮件，有给马基、阿卜脱、马福臣、密妥士和路森的便函。[31]

1863年6月10日 星期四

今天拜访了恒祺。他的房屋布置得很高雅。他的餐桌使外国人坐下吃饭时没有任何厌恶的感觉。没有谈具体事情。但他说，威妥玛曾到他家，给他留下了丹麦条约的草稿，其中有一个条款使他惊愕。这个条款的大意是公使可以驻扎在“任何地方”。坐马车去他家绝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路途遥远，烈日当空，马路很差。回家时，我路过北海与南海之间的玉带桥，那里的景色非常优美。

和威妥玛共进晚餐，在座的有：德尼克，柏卓安，瓦特斯和金登干。陆的兄弟今晨来访；把陆的肖像画交给他。[32]

今晨我交给李泰国一份备忘录，摘要如下：李泰国提出该款(指为舰队筹措的款项——译注）应交给一家外国银行，监督应由总理衙门任命。如果恭亲王同意，他就供职；如果恭亲王拒不同意，他就辞职。为了得到恭亲王的同意，为了支持这项措施，提出正面理由如下：第一，地方官员将不会受损害；第二，各监督会更好地了解和进行工作；第三，对于商人更为有利，特别是在退税方面；第四，北京政府会得到好处，它所需要的款项将首先得到照顾，而且这使它能弄到一笔贷款，从而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并支持它；第五，外籍税务司署的地位将更加稳固，从而会因得到更合适的人员而提高效率；第六，各外国政府会得到一个保证，即外籍税务司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顾问。在消极方面则争辩称，如果李泰国辞职，清政府就会瓦解，或者总税务司就会毫无用场。因为：首先，如果英国公使承认另一位总税务司，就会招致总税务司署的不稳定，而且不论好坏都只不过是中国人的工

具；如果他不承认另一位总税务司，总税务司的规章就无法执行；而他很可能不承认另一位总税务司，因为他很可能会撤走所有英国人。其后果将是：全面走私；在军队无饷可发（两个字不清楚）时税收减少；士兵反叛；各方骚动；各外国政府与比较强大的一方达成协议；以及清朝的覆灭（赫德在页边空白处划了一条竖线，并由上而下打了3个问号）。

李泰国也许会通过不再坚持由总理衙门任命监督而谈妥把款交付外国银行。他不对中国人详尽地或适当地说明自己的意思。控制这笔款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由于该款全都是由外国人交纳的，交付给一家外国银行，看来也不是不合理的。但是迄今为止，看来中国人所理解为最后通牒的，不是银行问题，而是监督的任命和为总理衙门征收该款：这将置总理衙门于难以忍受的境地，会冒犯（?）并妨碍现存的权利等。他应改变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此外，他必须记住，他会使海关所有人员处于困境；他的节略出现之后尤为如此，这个节略会有力地制止任何人从事商业活动。

恒祺今天说，今年是甲子的最后一年，即甲子下元；明年是上元，恰逢大旱（1860年无雨）。他担心这对中国不是好兆。事实是今年是清朝的转折点，或者失败，或者开始好转。[33]

1863年6月11日　星期五

昨夜梦见可怜的克洛弗（指马？还是指吉罗福）死了。

早晨吃完鸡蛋后，做了如下的收支估算，前提是李泰国的意见得到采纳：从1864到1870年，总税务司的开支将分为四项，即第一，海关，每年约1,000,000两银子；第二，海军，1,000,000两；第三，陆军，士兵假使为1,000名，1,800,000两；第四，清偿贷款，第一年1,860,000两，以后逐年减少。

1864 年	贷款 关税	10,000,000 5,000,000	总税务司开支：	5,360,000 两：	膳食 3,000,000：	结余 6,640,000
1865 年	结余 关税	6,640,000 5,000,000	总税务司开支：	5,300,000 两：	膳食 3,000,000：	结余 3,340,000
1866 年	结余 关税	3,340,000 5,100,000	总税务司开支：	5,200,000 两：	膳食 2,000,000：	结余 1,240,000
1867 年	结余 关税	1,240,000 5,500,000	总税务司开支：	5,130,000 两：	膳食 1,500,000：	结余 110,000
1868 年	结余 关税	110,000 8,000,000	总税务司开支：	5,100,000 两：	膳食 1,500,000：	结余 1,610,000
1869 年	结余 关税	1,610,000 8,000,000	总税务司开支：	5,000,000 两：	膳食 1,500,000：	结余 3,110,000
1870 年	结余 关税	3,110,000 8,000,000	总税务司开支：	5,000,000 两：	膳食 1,500,000：	结余 4,610,000

(每年第一栏两数之和减去第二、三栏两数之和等于最后一栏，如 1864 年：(10,000,000 + 5,000,000) - (5,360,000 + 3,000,000) = 6,640,000。据此，1868 年的结余似应为 1,510,000，而 1869 及 1870 年均略有误差——译注)

从现在起，再有 4 年，赔款就偿清了，因而 1867 年以后，就可以按每年8,000,000两银子计算海关征税额了。

十二点半去总理衙门，目的是和恒祺审阅丹麦条约。到达后，见到了文祥。和他谈了几分钟后，恒祺、崇纶和薛焕都来到了。根本没有议论丹麦条约。

文祥说，恭亲王对李泰国的上呈一点也不满意，首先是因为其中用了“大英”两个字，其次是因为从中不能看出他究竟要多少钱，而且在陈述舰队需要那么多经费和需要配备那么多中国人后，他夸大了他和恭亲王所处的困境；现在必须把这些看作是撒谎。我说，听到他的批评，我很遗憾；当初我提出这个计划时，要是我知道在筹款方面我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并且随后我会屡次受到责问，我肯定决不提出这件事情。文祥说，恭亲王担心 3 件事情：第一，舰队到达后不受中国节制；第二，舰队的军官不服从命令；第三，维持舰队和总税务司署会把全部对外税收花掉。恭亲王强烈而公正地谴责李泰国曾在不久前的一天威胁要把舰队的船只卖给叛军。我全面地说明了李泰国的观点，并使他们确信，他们最好相信他，而且他们将会发现他的意见和计划都是在为他们的利益着想。我说，一个“署理”官员是有难处的，他在仅仅作为代理的期间决不应当倡议任何事情。文祥说，“你这样说就错了，难道你没听说过‘署理’成为‘实授’吗?”然后他说，李泰国有朝一日总是要走的，到时候就“非你不可”了。[34]接着，薛焕把恒祺叫到一边，耳语几句后就走出了房间。我猜想他是走进了旁边的房间，以便如果他们有机会能重新请他进来和李泰国一起坐在桌旁而又不失尊严时，他就在附近。我料想总理衙门的人这时候都会因薛焕被排除在外并丧失了出头露面的勇气而嘲笑他。

两点刚过，李泰国到了。他带来了一件节略，其中包括把款项交付一家英国银行的要求，同时论述了由总理衙门本身委派官

员任职的合理性。节略还提到了贷款，他用我计算的结果和他自己的计算（由他掌握贷款并在为期4年的时间里每年度用去2,500,000两）为贷款提供论据。节略最后暗示，如果恭亲王不同意他的建议，他除了辞职之外别无办法。他还提交了另一份文件，其中包括他和阿思本签订的协定的译文。[35]文祥从头到尾看了这个文件，然后交给了我，并问我曾否见到。我接过来，并且说，我曾见到英文本，但不曾阅读过李泰国的中文译文。文祥于是吩咐我把恭亲王担心的3点告诉李泰国，我照办了，但是李泰国说，他没有更多的东西要解释了。不过根据我的建议，他终于做了一些解释。看来，这些解释使文祥大为宽慰。文祥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恒祺，并且说，应由恒祺考虑，因为海关和舰队事宜已由恭亲王交他处理。于是我对文祥说，文件中也许有某些地方表达得不恰当，或者他们可能会不理解、误解或不喜欢，这些他都应当予以指出，以便在会见恭亲王之前充分理解每句话的意思和意图。他说，他主要是发现了船只不接受命令这一条规定。我说，“船只当然会接受命令，但所有这些条款都要经过商量。”最后，他把这些文件拿回去归他自己掌握，这说明他本人是真正必须解决此事的人。还谈了些家常，其中恒祺因老年得子而被恭维为老风流，布尔布隆夫人因冬天耕作而被称为老小姐。大约6点钟光景我们离开了总理衙门。[36]

威妥玛于晚饭时来访。他和李泰国交谈，其间威妥玛有时似乎相当激动。随后，李泰国和我进行了商讨。他因中国人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同他会谈而吹毛求疵，并且非常生气地谈到中国人不肯办他要求他们办的事。我则对他说，他必须体谅别人，而且应当把事情解释得更为详尽。关系到如此重要的事情，说“就这样办”是不行的；不办就发怒，也不做解释，这也是不行的。威妥玛说得对：李泰国的长处是讲究效果，而他的短处在于不容忍中间步骤。我认为文祥和其他人一直是十分善意的，而且看来他们

正开始理解这些事情，但李泰国确实对待他们非常粗暴，毫不体贴。然而，如果他达到了目的，那么这对他、对我、对海关都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不过如果我个人能不受约束的话，我将倾向于避免会晤。我在会晤中不能附和他的工作方式。我同意他关于需要假装（原文如此）某种（?）的看法，但我不喜欢他作为处事方法所采取的手段。

柏尔德密来访。

1863 年 6 月 13 日　星期六

今晨到总理衙门去了几分钟，把给威妥玛和马福臣的两封信交给张深，信中要求他们给他的弟弟张清以一切帮助，他的弟弟将从四川返回北京。[37]

买进一匹小马，付定金大洋 20 元，试骑一周，如果好，将给 25 两银子。

收到“汕头”轮带来的上海的一批信件。没有什么特别消息，只是哈蒙德在九江抓获了“埃尔芬”号轮船，该轮没有长江通行证（?）。

蒲安臣来访。[38]

1863 年 6 月 14 日　星期日

布里特和我“唠叨”了大半个下午。密妥士来信称，上海大米售价为每百斤 2.60 两银子，因此他不能承办按 1.50 两买进 10 万担的任务。[39]

1863 年 6 月 15 日　星期一

好啦，事情现在到摊牌的时候了！再过两三天，问题就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决定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接受或拒绝李泰国建议的问题，——而是影响清朝本身的问题，尽管恭亲王没有领

会到这一点。

我们按照约定于下午两点到达总理衙门，这是上星期五文祥本人确定的日期和时间。今天我们到达那里时，却只有恒祺和崇纶两人。他们说，文祥和崇（?）另有差事，是有关权力的一些审查事宜，而且很可能在四五点钟之前来不了总理衙门。当然，同这两位守旧派是办不了什么事情的，他们既无头脑，也没主意，和他们交谈纯属浪费时间和口舌。[40]李泰国给他们几件文稿，要求予以缮发：第一，关于“埃尔芬”号轮船事件；第二，把3个月延长到1年；第三，“达特和鲁比”；第四，法国驻上海领事不承认长江章程。

我们看到了一件法国公使的中文照会，是答复不久前给他的关于长江章程的发文的。中文差得无以复加，我们无法看懂准确的意思。我们正阅读时，又来了第二件照会，其中附有第一件的法文本，从中得知第一件是公文而不是照会。很明显丰大烈并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他没有翻译能力。非常有可能的是，贵州问题之所以变得像目前这样严重，是由于翻译人员的过错。这个翻译真该死！美国公使关于白齐文的来文也写得无法理解，他的翻译施约瑟名不副实。至于卫氏本人，他在口译时总是漏掉要点，在笔译时则不求简捷，故弄玄虚，以示学问高深；他过分渲染主题，把事情弄得越发难办。[41]

大约4点钟的时候，我们又一次询问文祥是否会来。恒祺说，他认为不大可能。他接着说，“我们已将那些文件面呈恭亲王，看来他对那些文件有点不乐意。他说，李泰国先生能够处理海关事务，在那方面应当完全信任他。但是现在，当他写其他事情时，他似乎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他的话里必有某种隐藏的意思。皇上问，难道总理衙门没有人能看出来吗?”然后，恒祺从他靴子里拽出几份文件。第一份是薛焕的笔迹，大意是恭亲王的命令已经接到，命令称李泰国处理海关事务极好，他的其他主张

则不能令人满意，并指示恒祺和薛焕同他商量此事。第二份是答复不久前交来的节略。复文称，军务的指挥权不能交给李泰国，款项不能存放在银行，总理衙门不能为海关委派官员，以及不得仅仅因购买6艘汽艇而改变本国的旧例。第三份是对阿思本协定的连续评述，对协定的全部内容都反对——我没有仔细阅读。看完这些文件之后，李泰国说，由于恭亲王已做出这样的决定，他除了关闭总税务司署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他将到英国公使处去报告这一措置。他问可否把这些文件带走，恒祺说可以。但当李泰国把文件放进公事包时，恒祺又说，“最好不要拿走，还需和文祥商议。”李泰国于是把文件交还给他，并且说，他希望恭亲王把决定写成札子，以使之成为正式文件。但是他警告恒祺说，“这件事一旦这样办了，就永远改不过来了。”恒祺仿佛有点吃惊，但也生气了；他说，“啊，当然！如果一位先生不办他同庚要他办的事，当然”，然后他又喃喃了几句。于是我们起身走了。[42]

现在来评论一下上述情况：他们在退让之前要做一番猛烈的争斗，这是十分自然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办，那倒非常奇怪了。因此，在决定之前，他们要采取一切策略。比如，不久前的一天，确定今天下午两点会晤的是文祥自己，而今天在约定的钟点他却不在那里，而且恒祺说他约在四五点钟来。然后恒祺拿出了这些强硬的文件——李泰国拒绝予以讨论——并且说，文祥很可能不来了。在看到李泰国决心怎么办之后，恒祺借口必须同文祥商议（这老家伙是何等会说谎的人！就好像文祥没有看过以至很可能没有起草这些文件似的！），不让他把文件拿走。看来，恭亲王曾命令恒祺和薛焕出头进行一番小争论，以试探李泰国的虚实，或者引起一场争斗，也许他会在争斗中退让。出乎意料的是，李泰国毫不理会，而且就要自行其是，于是又嘱他等一下，等到和文祥商议之后。这样，文祥就将接着出场，进行争斗，李

泰国则不会退让——或者他们将做出让步——于是又该说还需和恭亲王商议。但是，再过几天，整个事情必须结束。实际上，李泰国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把款项交付一家英国银行。如果他们拒绝，后果是：

1．他不再为中国人工作。

2．由卜鲁斯命令把关税交付英国银行。

3．很可能把舰队移交日本。

4．撤回戈登等人。

5．上海的前途将听天由命。

6．将与叛军谈判。

7．大清王朝将于这一甲子的最后一年覆灭（在页边空白处，赫德在第7项旁划了双线，并注明日期为4－3－199。)。[43]

威妥玛今晚和我们共进晚餐。李泰国说，他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而且坚决赞成瓦解清王朝。

德尼克和斯托贝来访。

清晨5点骑新买的小马出去。它走得很快，但如果只是为了骑着玩，它是没用的。它很笨，即不会小跑，也不会飞奔。

1863年6月16日　星期二

阴历五月初一。清晨5点出去骑马，回家路上，烈日炎炎。

下午3点到总理衙门同蔡和庆长谈，先在司官堂，后在客厅。很多司官在司官堂闲坐。[44]我去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米价并请他们给我往天津寄一封信，但是谈话自然扯到了李泰国的事情。他们普遍抱怨李泰国不说明自己的意思，反对研究事情的细节，以及按他们的意见商量得不够。我对他们说，他们要记住的首先有两点：其一，设置税务司是为了赋予所有商人同等待遇，而不是为了协助政府；其二，我们军队在上海向当局提供的援助等等，是为了我们作为一个贸易国本身的利益，即中国应迅

速安定下来，而不是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但是，我说，各外国政府起初非常乐于提供这种帮助，因为各条约已被批准，还因为各外国政府认为他们从总理衙门的设立看到了中国方面确有公正处理对外问题的决心。然而前两年的经验说明总理衙门在各省没有任何权力。现在，积极支持恭亲王的愿望很可能演变成决定听任其自然发展的态度。我说，李泰国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款项应交付一家外国银行；第二，除通过他之外，不得雇佣任何外国人。他要求第一点（否则他就不敢办），是因为他担心他没有正当支付所雇佣人员的保证；他要求第二点（否则他就不敢办），是因为如果随便雇用外国人，好人的好名声就会受到坏人胡作非为的损害，还因为由个别官员这样雇佣的冒险分子最终只会对一切有关各方有害。[45]他们问道，他为什么要担心第一点？我回答说，白齐文的事例以及我凭着谕旨试图在福州拿钱的情形说明他的担心是正确的。他一个人能辨别所有外国人的好坏吗？我说，不能，但他不会雇佣他不确知是好人的人。他们说，可是他应当说明这些事情，并且允许充分讨论这些事情，也就是说，他应当同他们商量。我说，对，而且他愿意这样办，但是除非你们同意这两点要求，否则他就不干了。他们说，可是他说不干，这不会是当真的，因为他要把他们置于困境！我使得庆自己承认从海关撤走外国人会产生不利影响：第一，关税收入会减少；第二，他们将没有钱支付军费；第三，上海的外国军官将撤退；第四，和南京的贸易将立即兴旺；第五，上海将陷落；第六，外国商号将不得不同强大的一方打交道来照顾他们自己的利益；第七，政府——现王朝——将发现其处境日益危急。我还解释说，李泰国不可能和他们谈这些详情；如果他详谈，他的要求就会形成威胁，但是他不能不看到这种后果将随之而来。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要由他们自己考虑后果和研究应该怎么办。我还更为详尽地向他们解释了贷款问题，这个问题他们还不理解。庆说，恒祺对李泰

国昨天这样突然离去和拒绝做一切解释十分生气。是否现在由我见一下恒祺，向他解释，并将文件带回去供李泰国仔细阅读？我说，不，我不能拿这些文件，因为李泰国昨天没有拿走，而且这不是我的事，所以我不必和恒祺商讨（这时候，恒祺、薛焕和文祥正在接待俄国代办的来访。)。文祥没有要求见我，所以我没有表示急于要见他。

谈到长江章程，我要求看一下给官文和其他人的一份关于盐务的发文，其中把我（说?）成乞丐！他们不敢拿出来，说一时难以找到，等等。6 点 1 刻离开总理衙门，临走时我对庆说："你说多奇怪：你我相距如此遥远，现在竟会在一起商量公务。你对调和这两种意见有何想法？现在办的这件事情不仅和皇上有关系，而且还影响银行业！"当他们要我同恒祺谈话时，我说，这有什么用呢？如果有 1 位在这里，5 位不在，事情就能办；可是如果有 5 位在这里，而那 1 位不在，就什么也办不了。他说，"同我心。"[46]

今晚和威妥玛共进晚餐，同丹麦公使拉斯勒福上校会晤。他谈起了丹麦条约。他说，恒祺推迟了会见，因为我还没有看条约！他还反对不得设商务领事的条款。他说，中国人应当发给许可证书，然后从根本上解决此事，而不要实行令人反感的差别对待。他还说，比利时公使不肯批准去年所订的条约。我不愿意对这位公使阁下说他是来寻求缔约的，他无权坚持某些条件。[47]

1863 年 6 月 17 日　星期三

整天在家。下午主要忙于和李泰国起草致林赛公司函，以及仔细阅读丹麦条约的英文本。

1863 年 6 月 18 日　星期四

按照约定，9 点到威妥玛家与丹麦公使拉斯勒福会晤。拉斯

勒福要求我同他一起仔细阅读丹麦条约，并指出我认为可能会遭到反对的所有地方，我照办了。

早餐后，走访蒲安臣，同他一起坐了几小时。谈到白齐文；考米特的秘密行动；4位公使之间目前的联合；贵州事件（附带说一句，该事件曾在两国内有引起战争的危险，但看来目前已解决）；舰队；各公使对李泰国的支持；以及布雷克领事——这位领事以极其轻率的笔调写信给他的公使，信中说，“如果你看到美国的天空出现惊雷和闪电，不要感到惊奇。”蒲安臣把一件很长的发文念给我听。这是一个密件，是关于中国政策的。他刚刚把它发给国务卿西华德。他支持并钦佩卜鲁斯先生，或者更确切地说，卜鲁斯爵士；这种钦佩只能来自一个美国佬。他说，几天前，他曾同恒祺和崇纶会谈，他们完全答应撤消对白齐文的指控。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办，而是给他发来一件比以前更为强硬的公文，因此他给他们发去一件公文，限他们两天之内撤消指控；如果他们今天不答复，他就要采取行动了。天哪！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先是同法国的交战迫在眉睫。摆脱困境之后，同美国的冲突又迫在眉睫。这次他们能摆脱吗？还有同李泰国的翻脸也已迫在眉睫，这又将出现什么情况呢？[48]

接着前往总理衙门。在那里，我和文祥平心静气地谈了3个小时。文祥以及其他人对李泰国的意思和愿望完全误解了。我重复了原来的意见，解释了所有问题，在各方面都使他得到满足。可是他说，李泰国为什么不这样讲呢？他——文祥——并不是什么都能办的人，还得说服军机处和内阁。除非文祥透彻了解此事，而且有理由以及有书面授予的兵权，否则就什么也办不了。我对他说，李泰国并没有说他们必须办一笔贷款。他只是说如果他们想要钱，他知道有个办法使他们弄到贷款。他并不要求他们扩充军队，但是如果他们要扩充，他就需要那么多人和那么多钱。舰队属于他们所有，兵权也是他们的，军官也由他们使唤。

李泰国所坚持的确实是这样：所有外国人都要通过他雇佣，以及全部关税都要交付给一家外国银行。他要求前一点是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名声和他们的好处得到保证；他要求后一点是为了他自己以及所有被雇佣的人都得到经济保证。[49]文祥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外国人只通过李泰国雇佣，但他们希望减少而不是增加岸上人数；不把钱交付给一家外国银行，但海关征收的税款首先用以满足李泰国所需的金额。我认为文祥是有道理的，而且我认为不应该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但是我没有对他说这些，因为我不想破坏李泰国的策略。与此同时，我感到非常不自在的是我们已成为提要求的一方，却又没把提要求的充分理由向中国人提出。我对文祥说，如果李泰国离去，某些我不愿提出的后果将随之而来。他说，作为和商而不要作为威胁提出来，我（指文祥——译注）听了不会害怕。于是我（指赫德本人——译注）详尽地谈了，并要求他把一切都告诉恭亲王。他说，委派恒祺和薛焕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薛焕和李泰国曾长期共事，而且缮写委任李泰国办理舰队事宜的札子就是根据恒祺的意见。我对文祥说，你把这些人弄到这里，是因为你认为以他们同外国人交往的基础，他们应懂得如何处理工作。他们的确应当懂得，但他们并不懂得。而如果我或其他人说他们不懂，我知道那只会使你以为我们害怕他们，而且你相信他们很了解我们。他笑了，并且说，不错。但我对他说，他们是没用的。他说，恭亲王所需要的是3件事情：第一，得到舰队是中国财产和供中国使用的保证；第二，阿思本接受命令和为中国效劳；第三，舰队的开支不会把全部海关税收用光。而我本人所需要的是李泰国不要只考虑自己，他应该适当体谅其他人的难处；他的短处是不接受商量。我商定明天3点到总理衙门，并为李泰国安排次日两点前往。文祥说，他不能从恒祺和薛焕手中接办此事，但他将在场听一下双方说了些什么。[50]

给蒲安臣的有关白齐文一事的发文据说已送交给他，因此我

希望他们已摆脱那个困难。

我对文祥谈了那份盐务文件的词语问题，并指出，决不应当用那种词语。

我问文祥，为什么内阁一些人不能来商议公务？他说，他们不能打扰总理衙门的工作。

回家时，看到隔壁有庆亲王的马车。他是恭亲王的哥哥，他的家眷（指妻——译注）正归省她的父亲、前伊犁大臣桂良。[51]

把所讲的话告诉了李泰国，看来他认为满意，但是他的忧虑和猜疑不断地占上风，他的命令式的口气又来了，这是我非常憎恶的。啊！这可真是艰难的工作，但愿我知道怎么办。

1863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五

广州的办事人员王今晨来访，我把岳诺的信给了他。

从一个美妙的梦中醒来：梦见把 M.M 搂在怀里，亲吻她——这样甜蜜！——紧贴她的前额。

按照约定，于 3 点到达总理衙门，并立即被引到花厅，在那里恒祺很快同我坐在一起。文祥不久来到。又过了一些时间，崇纶、庆（?）和薛焕都来了。然后拿出了一些文件，其中包括恭亲王因李泰国的节略而提出的议论，以及对阿思本协定的评论。恭亲王的议论是一般性质的，从总体上摆明了这件事情的道理，即海关官员不应拥有兵权；该权属于中国人；基于呼应不灵的理由，没有必要委派特别监督；款项必须交付中国的银行；最后，仅仅由于中国买了 6 艘汽艇就指望中国更改其原有制度，这是荒谬的。我看了这个文件，但未加评论。然后仔细阅读了评论阿思本协定的另一个文件。首先反对的一点是合同本身。[52]他们说，李泰国未曾受权订立我认为他曾受权订立的协定，我说去年给他的札子特别规定了这一点。他们都说，他们肯定札子里没有合同的字样，特别是薛焕坚决断言如此。于是我叫人把文稿取来，并

立即驳倒了他们。然后我把13条协定逐条过目了一遍。我发现他们对每一条的含意和目的都有十分错误的想法——这几乎是不可能避免的。当我解释时，他们都没有异议，但有一条例外，那就是颁发谕旨那一条。他们说，他们不能颁发谕旨，因为阿思本没有成为一名中国军官。还说，在华尔和白齐文的事例中，谕旨是在这两个人签署了大意为他们已成为中国臣下等等的文件后颁发的。[53]我说，戈登的任命是由谕旨批准的。我想他们之所以反对是由于害怕曾国藩。[54]我对每一点的解释看来都是令人满意的，因此这些解释将呈送恭亲王，但在全部写出来之后，将先由我本人过目。为此，我决定于21日前往总理衙门。李泰国将于22日前往。

薛焕和我在桌旁进行了有趣的臂力比试。他自夸是武官（出身），说我当然比不过他。他谈到了他和李泰国的“龃龉”，言外之意，是希望此事了结。我说是他先挑战，然后李泰国开了火，而他又首先退却了。我这样一说，他脸红了，其他人轻蔑地笑了。崇纶这时不再沉默，他说，他曾一度在大沽与李泰国有过一番争论。[55]

交谈过程中，我对薛焕谈起了庆，作为昆山的攻克者，戈登对这位指挥官十分赞许。薛焕说，他是湖南人。于是我说，曾国藩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推荐的所有人都是好人。文祥有点激动地打断我的话说，“不，他们不是。”然后他又冷静下来说，十之有二，或者更确切地说，十之有八确实是好。[56]

1863年6月20日　星期六

整天在家。给玛丽安写了一封信，不知道该不该寄。

今晨李泰国走进孙的房间时，发现他正在写一个文件。他和明福看来急于想把文件藏起来，但是李泰国把文件拿到了手，并发现文件的开头是“夷人李泰国拟议六条云云”。查问之下，孙

犹豫一番之后说，这是为他自己日记写的记事，但是最后承认这是写给上海道台的，他不得不使道台随时了解情况。天哪！孙受雇于李泰国已达8年，而仍然完全是一个密探。我对他汇报情况并不感到惊奇，但他把李泰国写作“夷”太过分了！这要么是说明了在某方面的器量非常之狭小，要么这就是地球这一边称呼外国人所用的正当字眼。[57]

1863年6月21日　星期日

下午3点到总理衙门。文祥已在那里，他有点不舒服。在那里的还有薛焕、董恂、恒祺和崇纶。[58]我发现在把我对合同的议论全部写出来的过程中，他们漏掉了我的部分解释，把有些解释放错了地方，并且把有些意见说成是有关阿思本协定的，而这些意见只在中国水手登上舰只时才适用——这种情况是合同所没有规定的。因此我不得不握笔，亲自就每条写上几句。

他们所关心的是体制，这是一个相当难译的词语，意思是国家的尊严。[59]他们担心李泰国的计划会有损于中国的尊严。然而他们现在开始对问题有较好的理解，而且我认为李泰国道路上的障碍正在逐渐清除。他们说，他们将授权各税务司从征收的税款中扣除足够的金额预支，以维持舰队。我对他们说，通过对其他人的观察（?），我担心他们的授权毫无用处，正像吴道台的协定为黄所诘问那样。他们试图让我制订某些章程并写下（会议）。但是我说，这方面的事务与我无关，我只是向他们解释他们曾误解的文件。既然船只已经买妥，阿思本及其他人服役的章程也已拟妥，那么，这部分事情就结束了，现在需要（商量）的是（善后章程）。他们说，一切必须按照中国常例和制度程序：恭亲王不能僭取我们想强加于他的权力，他的地位是明确规定的和为所有人所了解的，他不可能越权而不自陷险境。事实是——尊敬的先生和你们其他各位——你们只是对中国情况的真实性质开始有

所领悟：它并不完全是一个专制的政府，而是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在这个混合体中，君主（原文如此）有按制度规定的专制权力，而制度却又允许民众废黜君主。政府依靠民众的自愿，它并不靠恐怖来统治。在杀头是合乎制度的情况下，它用不着什么繁文缛节就可以砍掉一个人的头。外国人会认为这是残暴的，但是政府知道民众是赞成的，并不害怕执行。然而如果政府不正当地杀头，民众就不会屈服。

今晚威妥玛和我们共进晚餐。他走后，我和李泰国长谈。谈话中，像往常一样，他起初非常讲道理，但过了一会儿他就突然转变到他的“决不容忍”、“我要不——就不是人”等狂暴作风。他确实是不接受商量。然而他正在降低他的要求或主张。看来，卜鲁斯只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的意见。我让他小心，否则，在他表态之后，卜鲁斯可能拒不帮忙。[60]

1863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一

下午 3 点到总理衙门。李泰国坐着轿子到达时引起了一点骚动：听差们匆忙带上帽子（?），并且到处跑来跑去喊着“哪一国的人?”[61]

首先和文祥、恒祺、崇纶及董恂交谈。过了一会儿，派人去请薛焕。下午主要由李泰国解释合同。他在解释过程中，态度既不是善意的，也不是情愿的。其间文祥曾生气地对他说，“如果你说船上不得用中国军官，我就得说我确实怀疑你，你必定是对我们的兵权有某种不轨的图谋。”我成功地使李泰国开始商谈某些细节，并同意指派一名中国（总统）；然后我让他叫人拿来纸笔，由董恂立即着手就各条款写出一些批注。我希望这些批注会使恭亲王满意，并便于此事的进行。[62]

李泰国曾写给他（当指恭亲王——译注）一个上呈，其中提出 3 条意见：第一，由他征收税款；第二，由他征收茶、丝、及

鸦片的税款；第三，他有权从每月的第一期付款中扣除他认为必须的金额。文祥说，第二条是非常合理的意见，但是薛焕对3条都反对。我对他们的查问以及对他们在不了解这3条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不愿行动，并不感到奇怪。但是李泰国认为他受到了极坏的对待，因为当他说“这样办”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好吧”。

1863年6月23日　星期二

整天在家写舰队备忘录，近期可能需要这个材料。

李泰国今天说，他再也不能容忍他所受的待遇了，他要辞职，或者参加领事馆工作，或者回国。我劝他更加平心静气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还劝他考虑到这样一点，那就是他现在提出的所有要求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我说，只有双方都让步，事情才能有进展。

不认真替别人着想是他性格上的一大缺点。

晚饭后，威妥玛来了。

1863年6月24日　星期三

黎明前4点3刻出去，感觉相当好。

亲爱的日记啊！天天为同一话题争论，而使你成为天天收藏这些乏味的叙述的地方，你不觉得非常厌烦吗？目前的情况是：在北京已3周，我们几乎一步也没有前进！我们放弃了许多要求，改变了计划，而对方才刚刚开始懂得应该做什么！李泰国并不完全符合我过去对他的才能所形成的印象；我既没看到机智，也没看到才干。但是我们正在逐步接近一种安排，这种安排——如果我对这件事情有发言权的话——我在第一次议事时就能做到，而且在进展中，我最终能一个一个地做到目的所在的其他各项，而不引起疑虑。事实上，是李泰国使他们警惕起来了！我敢说，今后他提出的任何事情，没有一件不会引起很多猜疑。英国

人的直截了当的方式不是用来对付中国人的方式。你得用他们自己的手段去对付他们。天哪!

我们今天在1点钟到达总理衙门。通常在场的5位都在那里。薛焕这次对李泰国非常客气。提出议论的只有两点：第一，阿思本须受督抚的调度；第二，款项的提供。李泰国立即说，他决不同意第一点；至于第二点，他们必须答应他的要求。他们说，值得听一下恭亲王今天所说的话。恭亲王说，你李泰国坚持许许多多要求；讲了许许多多的话，他愿意知道你是否允许他本人对这件事讲一点点——只讲几句？李泰国说，他必须掌握这笔款项，否则他不放心，——其他任何东西他都不能看作是担保。好啦，这是他们很难听进去的，因为这是对他们完全的不信任。而与此同时，李泰国对他们说，他对他们完全不信任。他说，“让我自行其是，不要提任何问题，完全信任我：这样你们就会一切都好!”这难道是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方式吗？事实上，他们一提问题，他就感到烦恼并绷着脸一言不发，而他们则毫无怨言地予以容忍，尽管文祥偶尔发出一声讥笑，这种讥笑表明他已准备退出（?)。薛焕说，关于款项，他有某种打算，但在向李泰国谈以前，他首先要和恭亲王商量一下。关于第一点，我对李泰国说，不管他是否认可须对此作出书面规定，效果都会是一样，因为中国当局决不会有命令阿思本做任何事情的想法——他们肯定要同他商量。于是李泰国对我说，他愿意在这点上让步。随后，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在款项问题上满足他的要求，其他所有事情他都答应。[63]

明天下午我们还得到总理衙门去。

晚间，威妥玛前来。从他的谈话中，我确信卜鲁斯不会也不能把李泰国在不久前所谈到的那种支持给予他。事实上，威妥玛对此事持公正的看法。他认为李泰国必须谨慎，必须仔细考虑他所提出的每个步骤在多大程度上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脚。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距离（我们）原来的要求有多远：

1．李泰国要求控制所有外国人：不再要求了。

2．李泰国（要求）征收全部税款：（同上，写在上条“不再要求了”下面）。

3．李泰国（要求）任命监督：（同上）。

4．李泰国（要求）掌握款项，凭总理衙门的指定使用：（同上）。

5．李泰国（要求）中国人不得作为水手登船：（同上）。

6．李泰国（要求）中国军官（同上，写在上条“不得作为水手登船”下面）：（同上）。

7．李泰国（要求）阿思本只受总理衙门节制：（同上）。

8．李泰国（要求）他应拥有一座府第：（同上）。

9．李泰国（要求）他不需向恭亲王上呈：（同上）

10．李泰国（要求）由他办理一笔贷款：（同上）。

总之，他一开始所提出的要求是荒谬而过分的。我和他有同感，如果他能争取到这些要求，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我说，这些要求是中国人毫无准备的。现在他不得不全面退却，而他们则在很长时间里不会忘记他的傲慢的口气和他的恫吓。他的乞灵于英国公使，他的自称为大英！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对他抱有怀疑。[64]

今天收到4月26日的邮件，有查理和莉齐的来信，还有埃玛的短笺。

传闻太平军已撤离苏州，好样儿的，戈登！[65]

1863年6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我们于两点前往总理衙门，6点才离开。讨论的惟一事情是提供维持舰队所需的资金问题。李泰国要求：第一，每月要给100,000两银子；第二，支付方法要使他感到完全放心。他

们答复说，他们将允许他和每位监督——汉口除外——做出一项安排，根据这项安排，各银号将奉命自每月1日起（逐日?）支付商定的金额。关于金额多少，他们进行了争辩，因为他们认为金额过大。他们说，每年年终——在腊月——研究预算，计算来年的收入总额并量入为出地批准支出。[66]至于本年，距年终还有好几个月，他们不能从此刻起安排12个（?）月的支出，而只能安排本年其余7个月的支出。根据我估算的每月30,000两银子，他们先准备了本年度的舰队开支400,000两；除此以外，他们不能再多做花费了。但是如果李泰国坚决要求要1年的经费，文祥说，他们准备12个月支付600,000两。薛焕对李泰国说，如果他同意这个数字，那么，除这个数字外，他们就再付给他所要求的270,000两。他们说，他们将于明天清抄，并要求李泰国也这样办。他说，在所有其他各点上，都是他恳求他们，但在这一点上，他不能让步，他们必须恳求他，他已经下了决心。他们说，“可是考虑一下我们的困难。”他说，不，那与我无关。我认为他这样讲是错误的。今天他曾闹到几乎要和文祥关系破裂，而且他曾说，最好卖掉两三条船；他们说，不，最好遣回一些人。

统统该死！真是伤透脑筋了。幸而我并不为任何事而伤脑筋，我怡然自得。

今天我对文祥说，当你责备我的时候，你认为我就没有困难吗？首先，这件事情是由我首创，现在却看到它这样演变，我是不够有面子的；第二，是他做的这些安排；第三，这件事情并不是掌握在我的手中。[67]

1863年6月26日　星期五

整天在家，无所事事。看报，抽烟，混时间。找我的人一个也没有。

1863 年 6 月 27 日　星期六

今天下午两点到总理衙门，见到了通常的那 5 位大老爷。事情没有迅速进展。到我们走的时候，距离解决问题并不比 1 个月前更近一点。他们说，恭亲王批准了每月的60,000两银子。李泰国说，他现在只要求90,000两，但再少他决不接受；如果他们决不支付这个数字，他就卖船，他有权扣留800,000两的一部分作为保证金。由于已经全部花掉这个数额，而且他们又不再给他更多的钱，他的惟一办法是处理一些买进的船，付清水手应得的工资后把他们遣散，解散这支队伍，然后把剩下的船交给他们。看来这番话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文祥显得很恼火。当我们起身离开时，李泰国说，“听着，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是答应，还是拒绝，让恭亲王决定好了。然后我按我的决定办事。”[68]

他们让我明天再来与恒祺会见，在此期间他将见到恭亲王。恒祺显得十分害怕，我相信恭亲王稍微有些严厉地斥骂了他。

董恂有一条长辫子。今天他的一番话把我们逗乐了。他说，咸丰帝曾问他，他睡觉时把辫子放在被单下面还是上面，而由于他过去从不注意，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他注意了这件事情，但是发现无法睡觉，因为把辫子放在被单下面或上面都是不可能的。[69]

1863 年 6 月 28 日　星期日

12 点（?）去总理衙门。见到恒祺及崇纶，谈了一个钟点。他们说，无法每月供给100,000 两。我问道，要是在60,000 两以上，亲王最多能给多少；但是这个问题他们无法答复。我问他们是否能张罗75,000 两；恒祺思索了一下说，他们每年能安排800,000两。我又和文祥谈了一会，他说希望这事快定下来，因为他有病，想要请假，如果事情悬而不决，他就不愿请假，因为

怕别人会说他回避此事，溜之大吉。我们围绕着相互间的困难做了长谈，他们充分理解我的（为难）。威妥玛到来时，我们就散了。今天，13日，是他来的日子；法国人也在那里。[70]

和李泰国嚷了一阵。他逐渐地平静了下来，并说，他愿意同意下列这些事情，我想这样就能成。1．戈登部下所有的洋人军官都由他来发饷。2．阿思本暂时有权使用委员会在上海的各条轮船（?）；而且在这以后，这些船只能留作商用。3．270,000两（系120,000和150,000两项）要预付。4．海关的开支定为700,000两。5．轮船的份额为每月75,000两。如果明天我能使上列各点通过，则斗争就可以结束一半。[71]

1863年6月29日　星期一

今天兴高采烈地去总理衙门；由于双方关于轮船队的辩论可望成功地结束，从而为本月末增辉，因此我满怀喜悦。可惜时运不济，虽然我们又已前进了一步，但是情况仍然令人不悦，并且不可捉摸。我来到的时候，威妥玛和他们在一个房间内，法国人则在另一个屋内——后者强迫他们同意购买大量的军需品，其中包括制服4,000套。这些制服看来是早先在绍兴被杀的买忒勒订购的。[72]一开始，恒祺和董恂跟我在一起，我用《笨拙》画报等跟他们逗乐。后来威妥玛进来了一下，只和我说了一句话，告诉我不必为海关垮台而担心，他有把握可以给我在领事馆找到一个位置。我说，今天的情况我想看来是好一些。他说他感到“非常高兴”。我看他有些令人难于理解：昨天已经开始收拾行李，打算一星期内就要回国了，而今天又决定留在中国。我从李泰国处了解到，如果他回国，那他就会提出建议，要求在政策上做出一项改变，并说明改变的理由：就是说，不再支持满洲人，而另找对象，例如曾国藩。今天他决定留下，这对当今朝廷是有利的。他走后，我们就着手工作了。恒祺说，现在亲王怒气冲天，根本

无法和他说理：他告诉陛下已经提出每年提供800,000两时，亲王先火了，对他说，既然他已经超过了每月60,000两的限额，他就自己找钱去吧。恒祺说，实在无法作到每月75,000两：他感到朝廷正处于困境之中。失去舰队将是一个至为沉重的打击：因此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以取得这一舰队。关于第一、二两个建议，即戈登的军官们和同业行会的轮船，他们说，这应该和在上海的李抚台去谈——他们不想干预省当局的细微末节。我自己认为在这里提到他们是一个错误。[73]

我们说，立即要270,000两；他们说行，但他们似乎不知道从哪里能取得这笔钱。对于第四笔，75,000两，恒祺似乎对此事很着急。他明天上午就要去见亲王，我则要在1点再去总理衙门听听结果如何。第四个问题，就是提高海关的费用，似乎还没有触及，但已经隐约地提到。

文祥和我就我们个人的困难长谈了一阵。他说，看来无以名之，只能说是难事。今天他说了个小小的谎话，让我抓住了：几天前，他说亲王对李很生气，因为李在第一个上呈中，在他的头衔前面写了（大英）两个字；今天他提出该文件末尾漏抄的一段说，“这里说的就是钱：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不敢把这给亲王看。”因此，他不是在这边，便是在那边撒谎。[74]

李一点也没有胜利：他素来非常骄傲，一味过分地依仗英国公使，动不动就用公使不高兴来吓唬他们。他对他们说，他丝毫也不信任他们，而同时又要求他们完全信任他——毫不置疑地信任他。他把自己称为（大英），自称可以和任何人平起平坐，好发号施令而不与人商量，要求有座府邸，出门就要坐轿子，和各地方官有过多次争吵，老是指手划脚地开条件，自以为对他们来说，他就是一切的一切，没有他，他们就无法过日子等等。我敢说，他的打算是错了。如果我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他会满足于现在这些要求的话，那我在一个星期内就可以办到，而不会引起

任何不快。我不知道站在那一边好：个人的利益要求我支持他，但是公平和正义却说，我应当采取独立的立场，而站在另一方面——他们没有什么后盾力量。[75]迄今为止，我出于忠诚意识而支持了他，实在远非我的本愿，而且有时还含垢忍辱。但是，如果事情的发展有损于我的理想，而且有陷入困境的迹象，那么我就一定要重新考虑所应采取的步骤。与此同时，这个朝廷是如此之脆弱，各省多事，亲王又如此地害怕采取勇敢而有决断的措施，因此，看来让它沉沦下去就不可能指望会有什么好处。“那该怎么办?”

今天文祥说，“是的，你所建议的做法很好；但是跑得太快就会喘不过气来，到达目的地时也就无所作为了。夸父追日，终将渴死。”

1863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二

谢天谢地，事情似乎终于得到解决了！今天在总理衙门内，我发现亲王听到了有关昨天谈话的报告后说，“很好；现在就去办，把体制问题解决好了，我再看看钱的问题怎么办。”于是我们就草拟了 4 条：1．规定任命一位中方总统，俾阿思本与之行动；给阿思本授予顶戴都抚衔，他应就上禀奏折问题进行面商。2．总理衙门应给予阿思本委任状，阿思本使其所属遵守纪律。3．中国人在形式上应上船学习。4．每月应向李泰国支付若干银两，用以维持舰队。这些条款草拟完成之后，由我校改，于翌日送交亲王；翌日两点，我将再度前往总理衙门，届时希望能听到解决办法。[76]

今天恒祺、文祥及薛老爷和我一起把中丹条约的中文本读了一遍。他们看了威妥玛那支离破碎的文章，装腔作势的文件，都不禁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笑得对不对。不过他们提出的各种修改意见确实把许多句子改得言简而意赅。他们似乎不赞

成把有关沿海贸易和豆饼的各种条款纳入条约的主体。

今晚和李泰国进行了谈话，报告了进度情况：我希望他不要提更多的要求，以致把事情弄糟。他说，他提了这样一些堂而皇之的要求，结果又被迫一一放弃，自觉“人微言轻”。现在他明白了，他始终按照和卜鲁斯爵士初次见面时商定的办法，依靠爵士的支持行动，这是何等的愚蠢啊！他对各方置使节们于不顾颇有怨言，显然感到自己在人们眼中“降低了一二级”。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因为他出来的时候骑着“一匹异乎寻常的高头大马”。

1863 年 7 月 1 日　星期三

（赫德用中文写的日期是“五月十六日”）

今天从两点到 6 点在总理衙门。事情似未定局。没有一个大臣去见过亲王。文祥说，他病了。他估计其他人肯定会去见殿下，他就没有想到必须要去。其他人则说，他们感到文祥一定会去的，就没有一个认为自己必须在场。事实似乎就是，他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敢于出头，因此大家都躲躲闪闪地回避自己的职责。

李泰国责成我不要在 a. 戈登的薪金和 b. 行会的轮船两个问题上催逼得太厉害，而要要求他们和李抚台通气，告诉他这些安排是李泰国提出来的，并要求他就这些安排的实施问题和李泰国商量。这是对一项不必要的要求的另一种变通办法：该项要求只能使问题趋于复杂化，而干扰更重要问题的解决。我毫不怀疑李泰国的心境总处于一种不快的境地，他自己把自己提出的要求一项接一项地废弃掉了。尤其是因为他原来提出这些要求时是毫无讨价还价余地的；并且威胁说如不予满足，则将如何如何。问题是他打一开始就采取了错误的立场：他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和他们同舟共济；而是以一个英国官员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并且威胁说，他将去找英国钦差，来为他的要求撑腰。他始而说得其势汹汹，现在却置自己的种种主张于不顾，步步退

让。[77]我打一开始就不相信他会把他所威胁的任何事情付诸实行：1．尽管各国公使之间存在着联盟关系，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不在看到别人采取敌对态度时捞取政治资本的。2．所有的威胁说法都不符合公平原则，而且是与条约的各种规定相抵触的；3．指望出现另一个政府的想法是荒诞不经的，而且危险万分。

中国与欧洲大不相同：政府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中央的作用。所有各级官员都由京中任命，并可对他们任意撤换；但是一旦任命下去，就再不考虑对他们处理地方事务的细节进行干预了。只有在总督或是巡抚提出报告，说是他做了些什么，或是监察御史对某些官史提出参劾时，北京政府才会采取行动。如果要改变为由北京来统治，那是不好办的。

英国由陪审团进行审判，有时会惩及无辜；而让真正的罪犯逃脱罪责，则是屡见不鲜的事。中国的审判，罪犯逃脱罪责的事是很少有的；无辜者受害的事则不时发生。从政府存在的目的考虑，到底哪一种制度弊病最少呢？

在总理衙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应允明天去见亲王，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了。文祥说，他将设法去要更多的钱——使拨款能应付一切——他将设法取得每月75,000 两之数。他们是在进行一宗非常艰难的交易。像中国这样傲视寰宇的一个国家居然沦于贫贱，真要贻笑万邦了。[78]

1863 年 7 月 2 日　星期四

谢天谢地！今天两点到衙门，六点半前出来，总算把轮船问题定下来了——但是也颇费了一些唇舌。在谈判中，我觉得李泰国不太机智，因为（字迹不清）他并没有把对方的主旨弄清，就做出了某些承诺；结果是被对方利用，而使他自己陷于被动。谈判中做出的安排是协议有效期为 4 年：总共要为维持这支舰队拨款3,600,000两，或者说是每月75,000两：此款由下列官员缴付：

广州10,000两；汕头5,000两；厦门6,000两；福州34,000两；上海100,000两；九江10,000两。李应在海关职员内指定一个人，每月初几天内到银号去等着把收到的款项都交给他，直到所付的钱全部交足为止。如果有哪一个单位没有缴款，李泰国就有权从收到的税款中扣除；扣款的方式方法悉听李的尊便。

为了某种目的，李需要一笔120,000两的贷款，由他设法筹借；至于另一笔150,000两，则在1个月内由下列各地缴付：广州30,000两；汕头22,000两；厦门20,000两；福州30,000两；上海20,000两；九江30,000两。每月75,000两的大笔款项应从阴历六月十七日，即公历8月1日开始缴付。今天是阴历五月十七日，中国历本中注明是个安排规章的大好吉日：这是文祥指出来的，他言下颇为得意。[79]

文祥力劝李把手头现有的海关存款120,000两放弃；但是李不为所动。

需用的札谕要在明天写出来，以便他们可以随第一艘轮船发出。李现在就要去接受另一种经历——也是最近18个月以来我自己的经历——那就是受命筹款的难处。

今天老董奋笔疾书，干得比平时李给他口授时快得多。看来他们都很称意，为事情得到了解决而心情舒畅。文祥在一定程度上有取消歇病假的打算。

1863年7月3日　星期五

今天两点去衙门，与恒祺把中丹（麦）条约看了一遍，并作了一些改正，以便使问题易于解决。

退税问题提出来以后，我提出了去年阴历九月份致薛焕的信。其中江海关接到了关于退款问题的明确指示。

看到了有关轮船问题仍要求150,000两一事致两广总督的信。

仅恒祺、董恂和薛焕3人在衙门。威妥玛今晚与我们一起吃晚饭；就“阿拉巴马”号问题进行了冗长的辩论；——他真健谈！[80]

1863年7月4日

给杰弗里·杰米和查发了信。

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为这个伟大的共和国三呼万岁，这是一个永恒的，永不分裂的国家！是一切国家的楷模，是被压迫人民的避难所，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去年今日，我搭乘“奇袭”号泛游扬子江顺流而下，曾为“美国总统和人民”举杯祝酒！

我们今天两点到衙门去。下年度的海关费用700,200两很顺利地就定下来了。几位大臣流露出来的惟一焦虑就是向牛庄派驻税务司的问题。这地方如果不设这样一个官员，则纠纷仍将层出不穷。

我们今天谈到（通商大臣）衙门。文祥似乎认为应该予以撤销，他认为这个衙门不仅无用，而且是个累赘。[81]

初次提出了把上海的收税制度改为其他港口的现行模式这一意见，并得到了支持。他们将向李函告此事。

各位大臣今天都很和悦，一如前年和去年与我相处时一样。李对他们也颇满意，并说，如果他们永远这样和悦，那么虽赴汤蹈火以效犬马之劳，亦在所不辞。他的希望抬头了。他琢磨着他所为之灰心丧气的那套“活计”，犹有可为。我说，这事本来就不在话下：只要我们沉住气，假以时日，把我们胸中的愤懑，教条式的颐指气使和凭仗洋人势力等思想意识代之以惨淡经营和自信就行了。

1863 年 7 月 5 日　星期日

今天如约于 1 点去衙门，与总理衙门常值的 5 位大臣谈了众多的日常事务。威妥玛带着中丹条约来了。他走时，似乎对一切有争议的问题都已谈妥。因此我估计拉斯勒福上校将在一星期左右离去。[82]

国内 5 月 10 日发出的邮件于今天到达。收到 4 月 30 日的家信。

上海来了阿诺德的死讯。这是我们各关中第一个死者；当前很难找到能替代他的人。[83]

见到一封戈登致威妥玛的信，其中抱怨了中国庆将军给他造成的许多困难。[84]

1863 年 7 月 6 日　星期一

今日上午下雨，寒冷：需穿法兰绒衣，即使穿上后仍有凉意，因此略有腹泻。

两点到衙门。大街小巷泥泞不堪，到处是坑洼积水。该办的事顺利办完，人人皆大欢喜。支款所需的命令有指示立即缮写，因此李指望着几天之内就可离开。

马基发来的通知说“南京”号将在星期天上午起程，因此李已决定在星期五上午离开。文祥下令要求在 23 日，即星期三给他做好一切准备。[85]

今天上午威妥玛到衙门去了一下，和恒祺一起把中丹条约草案浏览了一遍。一切已经安排就绪，该条约将在 24 日，即星期四下午 1 点签署。

1863 年 7 月 7 日　星期二

按常例于下午两点去衙门，见到必在的 5 位。恭（原文为

Seih）似乎情绪颇佳——其他各位其实也是如此——但他过于自吹自擂。我阅读李的没收程序节略的时候，他走开了，这使我感到很快意。他边走边说，“我全知道。”李问道，“你看完了吗?”他说，“没有，我只看了一半，我看得很快，因为我知道其内容，他还没有看完一半”（他指的是我，并且认为我不像他那样了解这一问题)。这一备忘录过了一段时间就以通报形式作为所有海关监督的指导性文件，其中包括对户部律例的各种补充条款。该律例可供解决各种争议事项之用，并赋予海关以迄今尚未有的权力：当然，这些补充条款决不能以任何形式违犯条约的规定。今天的谈话极泛，办成的惟一事情是纠正了阿思本的任命等等。旗帜问题通过了，要把它发送到各港口和军营去。[88]

今天收到天津来的6打香槟酒，半打醋和半打色拉油。

1863年7月8日　星期三

今晨起床以前，克隆根先生、卜鲁斯爵士和拉斯勒福上校来了；上校并来到我的卧房，对我帮助使他的条约得以通过表示谢意。

新任两广总督毛鸿宾，原来是湖南巡抚；薛焕说，“他是我和曾中堂（曾国藩）保举的”。

5点到衙门，但并未办什么值得记述的事。威妥玛来问有关条约的情况。他一听说有几部分抄错了，立即暴跳如雷，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直顿脚，又是拍大腿，又是骂娘，吹胡子瞪眼，大叫大嚷地骂着恒祺——“脱了底的瓶子”，“戴眼镜的呆子”……。但是，事实证明，他自己的抄写人员也出了错。他自己在前一天急于求成，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等到文祥和我在我经常占用的那间屋子里，而别无其他人时，他应允我的所请，给李从亲王那里讨一份体面的信函。他把成林叫来，让他去问问恭是否已经把“那个”告诉了李；这使我

多少感到有些不解。所谓“那个”指的是什么？十之八九和我自己有些关系。[⊗]

1863 年 7 月 9 日　星期四

今晨 6 点到总理衙门，李所待之事，悉予办妥。文祥在李的请求，也是要求之下，就取来纸笔，致书于李，把有关戈登的员兵以及行会的轮船等问题一并列入。这些都是昨天薛焕狡黠地加以回避的。10 点进早餐，中午时分出来。李对文祥说，他在北京住了 40 天，亲王竟未接见一次，如此无礼，令他不悦。于是文祥便宣读起我昨天所要求的那封信。但是李插嘴说，晚了晚了。说得声色俱厉，焦躁之情，溢于言表，以致文祥面有愠色，就此打住。如果把他比作被人吐着唾沫追赶得无处躲藏的一只小猫，一条狗，倒是绝妙。[⊗]

我提请大家注意，如果在中丹条约未经批准换文之前就允许丹麦船只进入扬子江，那么葡萄牙在法国支持之下，也将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样下去，扬子江行将充斥洋船，其害无穷。于是恒祺就想从自己的承诺面前缩回去。事实上他是未和任何人商量就这样承诺的。我建议他给威妥玛写封便函，并答应他去找威妥玛把这事谈一谈。

去找威妥玛。他提出中国人不应该对丹麦人食言，而应冠冕堂皇地主动通知葡萄牙人，如果他们能够同意某些为了抑制不良行为而做的安排，他们就可以享受同样的特权等等。接着，拉斯勒福来了。我向他提出，为了保住他已取得的果实，他应该把进入长江的特权限制在某些舰船、汽船和帆桅固定的船只之列。他先是主张限制在 100 吨以上的船只。但是我说有些三桅帆船比这还大得多，他妥协了。我竟有这么多的事情要管。

（这一句页边上有一个⊠号）

关于旗帜问题，拉斯勒福上校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意见——就是所有在中国发放的航行证书必须取得中方的确认（?）。

威妥玛似乎精疲力竭了。

迁入我的新居，在城门附近。李于一点半乘轿子去通州。他行前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昨天薛和他私下谈起了我，亲王指示薛了解一下，我的待遇是否优厚，亲王希望把我提升为副总税务司，或其他什么相当的职位，不希望我屈居人下，等等。还有是他，李，对薛说，即将给我加倍支薪。真不错，每月 800 两，到中国还不满 9 年哪！（后来赫德在此段加了一条红色波纹线）

1863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五

今上午带着就扬子江问题致拉斯勒福上校函的草稿到总理衙门去见恒祺。准许兵舰、轮船进入扬子江，但下列船只不得进入：1．中国式三桅帆船；2．改装得似轮船的三桅帆船；3．中国式船；4．宁波式船；5．单桅小船。并说，如果发生未预见到的问题，中国保留随时收回这种特权的权利。

恒祺告诉我，薛已把我的事向李做了嘱咐：他们希望把我提升为帮办总税务司，但李不同意用那个“总”字，因为这个字将赋予我干这干那的权力，等等。我的薪金将加倍：已经责成薛把此事嘱咐于李而未让文祥出面。因为如果文祥亲自出马，他们生怕李看到我受到如此高度的器重而感到难堪。[90]

（上一段也划了红色波纹线）

收到拉斯勒福上校的便函，对我在中丹条约问题上给予的支援表示感谢；但是他不喜欢该公函的最后部分。

卜鲁斯爵士要我明天和他同进早餐：看到他从不征求李的同意，感到奇怪。

今天到总理衙门，把有关“埃尔芬”号的公文改了一下。

把“南京”号的邮件托威妥玛转交给李。

还未听说条约的签字进展得如何；但从威妥玛到衙门的时间推测，我想他们进行得不那么顺利。

1863 年 7 月 11 日　星期六

下了一整天雨！根本没有出去，在家也无事可做。整天无所事事，无聊之极。给“德臣报”的肯普写了一封信，给妈妈一封短简。[91]

1863 年 7 月 12 日　星期日

今日分别给美理登、休士和肯普写了短简。[92]

下午两点应卜鲁斯先生之邀，往访，谈了一小时。他说戈登干得很出色，中国人最好把他任命为军事首脑。他还提到了扬子江沿岸的 3 个未开放港口，并说现在没有人提这些港口了，他估计商人们并不真正想要这些港口。他对台湾也提了几个问题，看来对打狗和基隆的安排是满意的。泛谈了各项事务。他说，没有任何理由要灰心丧气，总的来说，事情是顺利的；威妥玛和其他一些人认为一无是处，他不同意。他说，李不该先去访他，并已向李本人说明此意。他似乎是从已经发生的种种情况的角度来看待此事的，李的处事并非不公或无礼。他还谈到了会讯公堂等问题；他说，他无意于干预中国人的权利，或者说是管辖权；但是他认为不妨成立一个由税务司和领事组成的调查法庭，以便使各种案件都公开化，同时对任何情况都可以进行深入的调查。我本人认为这是可以办的，而且是应该办的。我告诉他，我认为我们干得很好，而且我们在公使不给予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也可以照常办事。谈到舰队问题时，他说，只有在中国人不信守协议和不支付有关人员薪饷的情况下，他才会出面干预。他提出在我哪天有兴致时，和我一同到西山去玩一天。[93]

晚间，柏卓安和瓦特斯与我同进晚餐，谈了贝尔法斯特和学院的一些人士。

今天收到张深的便函，请我明天下午2时到衙门一趟。收到给李的札子，还有文祥给李抚台的札子一份。[94]

1863年7月13日　星期一

下雨，阴冷。把天津条约的中英文对照校对了一下，其中有许多小出入，但没有非常重大的差别。

下午两点去总理衙门，见到董和薛。与薛把条约英文本通读了一遍，对中文本进行了改正；和薛一起整理了有关舰队的各种文件。薛已被擢升为工部侍郎。我看到，今天送来由他签署的文件，有一张红纸条，就是供他在上面批签用的。他同时又被任命为造币局主事。[95]

今天我给董讲了一段关于《笨拙》漫画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小男孩喊道“你年轻时一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年!”董一下就明白了，他说，几千年前，有个青年对一个当时的名人（日记中是空白）作出了非常相似的答复，结果被曹操杀了。[96]

今晚让阿方守夜。西姆（?）说，邻里间多的是。[97]

今夜，二子（?）欣喜欲狂；我不禁管他叫我的干儿子。他急于要“挑个好日子”，好“磕个头”。[98]

给利姆（?）一张100两银子的期票，其中70两是还给李泰国的，另30两是我借给利姆的。

1863年7月14日　星期二

两点到总理衙门。先和文祥谈了一会，他情绪很好；他说，九袱州和基里州都已经由清军收复，南京城东北角附近的大炮台亦然。这一消息来自杜将军而不是曾国藩。奇怪的是上海报纸对此事竟只字未提![99]如果中国人以近两月来的进军速度继续向前

推进，则不待阿思本到来，他们就可以重据南京城。这样对清廷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但遗憾的是对舰队来说，眼巴巴地就将失去一显身手的大好机会。我对文祥说，我对最近以来（清军）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并不感到意外：这证实了我在各省的所见所闻，据传各路将领并不努力作战；他们不欲结束战乱；只有战乱频仍，他们才有用武之地，升官发财之机。他说，这些传说不为无因。正因如此，所以朝廷才把各路大军的统帅权委诸文官。我隐约地对他说，外间对曾国藩是否忠贞不二产生了怀疑，他嗤之以鼻，认为纯属无稽之谈。[109]

董、薛、恒祺和崇纶都来到后，我们便开始议事。首先研究的是鸦片烟土问题。他们主张不论进口出口，各港口一律收银30两。接着研究了美理登和暹罗船只的事。我指出将军的信件中有些事情我认为对发信人本人是不利的。他们急于要我把惠顿的国际法至少是其中有些对他们可能有用的部分译成中文。在中俄条约中，似乎在条文的措辞上发生了困难，但是他们仅有一份俄文本可以和中文对比，所以我无法为他们效力。

今天把我的《笨拙》画报和《插图》杂志给董看了。《插图》中他们最喜欢的就是那几幅好画的复制品。他们对各种表现日常生活的图画、一般作品的插图几乎毫无兴趣。《笨拙》使他们非常过瘾，使他们连声叫好。[110]

薛似乎坚决要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从卜鲁斯先生处借到了惠顿法，从A. 威廉斯处借到了领事手册。

1863年7月15日　星期三

整天大部分时间在家，忙于写一部关于出入上海的各种土产品的小志。还为惠顿氏国际法写一个摘要，准备译成汉语。

下午四点半外出，过法国公使馆，给赫伯特和马罗克（?）

留下了名刺。

五点半起了一阵异乎寻常的旋风：大雨倾盆，惊雷闪电。

1863 年 7 月 16 日　星期四

早起，用中文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评论了福州将军就美理登意欲充公的暹罗船所写的信件。也进行了惠顿法的翻译工作。1 点去总理衙门，与恒祺和崇纶谈到 3 点：无甚特殊事。我发现任命恒祺与葡萄牙人谈判的上谕原来仅限于通商事务。由此引申，我认为可以断定，他在工作中僭越了他所接到的指示，从而使他自己所订立的上了当的条约没有得到批准。[102]

午后将中法条约的中、法文本做了对照：我还没见到过比这更差的中文。

收到李泰国的两封信，一封日期为 11 日，另一封为 14 日。他退回了给两广总督的有关汕头的信，以及他本人就海关开支所下的命令，要求改正。

开始与好博逊及西布尔德共同翻译中国的公文。西布尔德比好博逊要强得多。[103]

1863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五

上午草拟致李函，其内容是用退税的办法取代免税证的问题。这项办法后来经薛作了一些措辞上的改动后，总理衙门予以采纳了。另又草拟了就汕头问题致总督函中应更改的某些部分。把这封信定了稿。与董一同审查了中法条约中的若干章节；前四、五条译得很糟糕，那中文实在难于理解。

在总理衙门见到李抚台。关于扣留在福州的暹罗船只问题的来文，其中纳入了美理登致鞑靼将军的若干信件，这就使案情较为明白了。但还不足以据以做出决定，有待进一步了解。

又收到了福州将军的来文，内称厦门已为轮船基金支付了

30,000两。决定由福州应付的150,000两（最后批准的一笔）中扣除10,000两。

谈论了船钞问题：估计我能使他们同意各税务司通过总税务司送请认可的三成船钞。[104]

7点离开总理衙门。今天下午热得可怕。

（此处最后一行赫德事后用另一种颜色的墨水笔划掉了）

1863年7月18日　星期六

3点到总理衙门。除董外，仅薛和恒祺在。我和董审查了中法条约中的若干章节。

今天吃了许多西瓜。我说以前吃过一小块，差点儿泻肚。但是他们都说，吃一小块就是要泻肚的，多吃就好了。薛说西瓜这东西是“有益而无损”的。听来真是离奇。恒祺说，这天气就是要吃这东西，否则老天为什么要让这种人人喜爱的尤物在这炎夏季节从地上长出来呢？因此我就尽情地吃，但心中还是害怕。恒祺说，“不要害怕，你越是害怕，它就越要找你。”[105]

把关于海关费用问题的致李的函件交出备校改。董红起了脸说，当然啦，这不是一年半载的事，而是永远如此啰。恒祺也是一样，他说，“怎么办？”面有愠色。我就把函件留给他们。

交出一份函件初稿供他们写函件给李，其内容是指示各地税务司报告三成船钞的数字：我希望他们照办，因为这是告诉他们如何全面控制洋税之道的第一步。[106]

接崇厚便函，内容有关暹罗船问题。

热得吓人，很不得劲，太恼人。

1863年7月19日　星期日

整天未出门；因而也未脱睡衣。仍然热得惊人。还是不得

劲，但见好，倒不是泻肚，这下一定是西瓜有益了。

收到给李的3份札子："1．福州问题，暹罗船；2．退税证，不用现款；3．退税，不是免税"。

(接下去是5行字，用7月17日所用的同样的墨水涂得完全无法辨认了。)

1863年7月20日　星期一

实在太热。3点到总理衙门，和董一起又审查了一部分中法条约：他们对这项工作有些厌倦了。

文祥、薛和崇纶也在。他们说，最近南京战事的胜利是确实的。据报扬子江上已无敌军踪迹。他们居然已经占领了基里州，这使我很惊讶，因为我以为该州是处于狮子山上大炮的控制之下的。[181]

给我看一封崇厚的来信，内容是关于暹罗船只的。我告诉他，这种船只，如果是外国制造的，就应把它置于外籍税务司管辖之下。[182]

今天除了热茶外，什么也没有喝，酒和冰都没有沾口。感觉好得多，但还没有完全复原。恐怕我要害眼病。

布雷特上山去了。

1863年7月21日　星期二

今天眼痛；将要害睑腺炎。

3点去总理衙门，见到了董、恒祺和薛。和董一起把中法条

《形式逻辑》、《中外演讲名篇》、《社会心理学》……

请几天假。

在家读了几章“Reliqio Chemici”（拉丁语，意义大概是化学的宗教——译注），其内容是关于星辰的化学和化学与自然神学的联系等。

给李写了一封便函。

晚间颇凉爽：10 点睡觉。

1863 年 7 月 23 日　星期四

眼疼，整天足不出户，疼得可以。右奶头近旁有一些小疖子，肿痛。我想这些疖子及其他症状一定都是我吃西瓜引起的。今天文祥给我送来了些水果；来人回去时不肯收赏钱——可能是嫌少吧。

把我为即将译成中文的惠顿法中的一段写的引言译成中文。此段是供总理衙门各位启蒙之用的。

今晚头部贴上了一张膏药。

1863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五

昨夜膏药的效果良好；“睑腺炎”好了，希望一二天内能复原。

整天未外出：把惠顿国际法的说明译成中文。

收到李和汉南 20 日的来信，其中报道了德都德先生于 13 日在上海暴卒的消息。李把上海的职位给了汉南，但他由于健康关系，不能接受，只得谢却，并留在芝罘。李现在打算把威妥玛放在上海试用。[109]

1863 年 7 月 25 日　星期六

我踏上中国的土地已经 9 年了。因此我现在已经赫然排在老中国之列。

1854 年，我的年薪是 200 英镑。
1855 年，我的年薪是 270 英镑。
1856 年 7 月，我的年薪是 270 英镑。
1857 年，我的年薪是 270 英镑。
1858 年，我的年薪是 500 英镑。
1858 年 3 月，我的年薪是1,500 英镑。
1860～61 年，我的年薪是2,500 英镑。
1862 年 4 月，我的年薪是2,500 英镑。
而现在，1863 年 7 月，则在3,300 英镑以上。

(在 1854～1858 年的几项下面，赫德画了一个括号，并在括号内写道："要扣除所得税和养老基金")

收入真不错！最近 4 年来，我已作为赠礼寄回去3,094.15.10 镑给父亲，461.12.3 镑给姐妹和堂兄弟姐妹，总计是3,556.8.1 英镑。[110]

整天未出门，校审了惠顿国际法 20 段，都是关于公使馆权利的。

昨天收到 5 月 20 日的邮包的一部分。今天寄发了我给李、各港口及家中的信，给妈妈和玛丽写信。

1863 年 7 月 26 日　星期日

通宵下雨，现仍在下，但不大。早晨颇凉快。

译惠顿法：公使权利部分译毕。与孙长谈基督教义。他说，他认为我们一定有充分理由相信耶稣确曾在世，一如中国人相信孔子确有其人。必须把这作为不可移易的信条。这一信条在教导世人尊敬上帝和启示人类有一个来世方面胜过孔子的信条。不过他鄙夷圣经的中文译本，认为翻译如此拙劣，则信仰者寥寥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可以肯定，中国终究是会接受基督教的。不过

现时罗马天主教各路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世俗事物的干扰，都使得别人的工作无法展开。

1863 年 7 月 27 日　星期一

上午柏卓安来呆了 1 小时。

3 点去总理衙门。我到时施约瑟在，我就和司官在他的房里坐了一会儿。[111]成林来了，他本来知道我在这里。他问听差赫德来了没有。听差说，赫老爷在，但是他装作没有听见，再次高声喊道，赫德来了吗？接着就摆起面孔，走进来了。我总有一天要回敬他的这一手。[112]

把大赛马会图带来给董。施约瑟走后，我和董一同走进客厅。但是法国使馆的秘书和丰大烈没过几分钟就来了，我们暂时退了出来。后来我们又去那里坐，直到恒祺和其他人来到，我们就回到司官堂。在那里见到了文祥，一直呆到六点半。法国人走后，几个人就打算写给他们的一封有关德克碑的离职，以及另派一人接替他的信件，展开了一场极度狂暴的争论。丰大烈在口头上和在公使的信件译文中都让他们知道，“新来的将军不会遵守中国人的命令。”他们当然要回信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想要他服役。因此，他们请我把法文本和中文本对比一下。我看到公使写的是，“你们可以指派任何人来取代德克碑，——我都不会干预；——他似乎已经犯过违抗命令的罪行。”[113]“浅薄的知识是危险的东西”。丰大烈这个人，以他的汉语知识而论，确实就是处于这种状态：他就是浅薄得比彻底无知还危险。[114]

今天把惠顿国际法的译件读了一遍，其他什么也没有干。他们说对译文很欣赏——特别是那引言部分。

长期以来，一直转战于四川省和陕西省边境的太平军大将石达开被骆秉章所俘，并砍了头：今天方得此讯。[115]消息传来，令人额首称庆，这也是理所当然。有鉴于此，以及南京也有可能早

日攻下，我就写信问李，在我离开中国前的几个月中，是否可以把我指派到上海去。目前那里由威妥玛代理。[116]

1863 年 7 月 28 日　星期二

整天未出门。大英轮船公司董事的儿子小阿仑（总经理）来访，他于 4 月份和我一同乘“北京”轮北上。

今天给李、怀特、哈蒙德、凯恩和斯科特分别写了便函。

1863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三

上午柏卓安来访。

3 点去总理衙门。先见董，后见到恒祺，再后见到文祥。我带去了伦敦方面致高级官吏、兵部尚书的信。

拆封后，发现原来是兰普公司（?）兜售军火的信。信中说，另外发过两封信，一封是在 1 月 15 日发的，另一封是 2 月 4 日。董立即说道，用法文写地址的信件一定已经送到 F. 雷茨那里，并且在那里拆封后被扣了下来。于是他们都把前面的两封信联系上，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就是（法国人）最近以来，一直在以某种价格兜售军火武器！我让他们给兰普公司去信，告诉该公司从没有收到他们的信，并要求他们进行查问。我首先要给他们翻译这封信。他们还把布腾普（?）关于德克碑的信让我带回家翻译。[117]

我和董一起审查了中美条约：没有什么可改正的。

告诉文祥，在对外交往中，除非向欧洲派出一些公使，否则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称心如意地办事。中国的大臣并非仅有一个问题要做安排，他有自己的政治资本。而且个人的前程要从大臣的职位上找到出路。如果他们派遣大臣出使欧洲，这个大臣就要远离乡井。而欧洲的大臣们处理问题时，主要是以本国的利害关系为转移的。

文祥频繁地谈论基督教。他今天说，“你们总说上帝如何如何仁慈，我永远也不会信奉你们的信条。你们如何来解释《蛇》呢?”

收到马基27日的便函。他说，在来的路上张皋（?）把他的腿弄断了。在总理衙门给他写信，告诉他，让已到的两条暹罗船到老关去缴税。

气候颇奇特：不能说冷，也不能说热。人的感觉是半出汗来半发颤。

（本日记事的最后一行用线条划掉了，其颜色和7月17及19两天记事中线条的颜色相同。）

1863年7月30日　星期四

上午派明福到银行去把两张100两的票据兑现。

用英文草拟：1．召回各领事的信件；2．反对设置商务领事的信件；3．有关中国船只悬挂外国旗帜的证件的信件；4．给阿穆恩的信件。

今天没有办什么其他具体事。

（又是一行仔细划掉的字迹。）

今晚到陆家走访，但陆不在家。[116]

1863年7月31日　星期五

7月最后一天：还只剩8个月了，我希望从香港回国。

上午柏卓安来访。草拟关于船只证件的信件的中文稿。把兰普公司给兵部的信译成中文。还有柏尔德密关于德克碑等的信件也译了。

外出和伯郎及默里会餐。

1863 年 8 月 1 日　星期六

今上午给公馆人员发薪34,000 两。

3 点去总理衙门。把译件及有关证书的草稿交给他们。文祥删去了由总理衙门“盖印”两字。[119]薛、董、恒祺和崇纶等都在。泛泛交谈，未甚涉及业务。6 点 1 刻出来。

军机是皇上的仆役：内阁对上谕进行评论，上谕发出前要交给他们进行斟酌。

柏卓安、西布尔德和我一同用餐。

(又是细心划掉的两行。)

1863 年 8 月 2 日　星期日

昨天柏卓安给我看一封卜鲁斯爵士致恭亲王的信，要进行翻译。信中要求，凡属充公没收案件，即使不设会讯公堂，至少也要公开审查。卜鲁斯就此事另外给我写了一封私人信。我在下列各点上和他一致：

1. 现行的没收程序似乎没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可能会因此产生不公。由于执行中缺乏公开性，商人们认为他们在无理扣押等等事情面前没有保障。

2. 公开审理能使商人知耻而走正道，并可使海关免受非议。

3. 由中国主动提出联合审查的办法，这完全无损于中国的主权。

4. 现行制度下的申诉案件不符常规；因为公使必须提出许多问题，方能对许多要点达到了解。

但是李泰国不主张设置会讯公堂。

整天未出门，没有办什么具体事。把一份有关领事许可证书的通函译成了中文，另外又译了一份反对某些个人参与贸易的回

信。

近半月来很不舒服：多痰、睑腺炎、疮疖、耳痛、喉痛等等，看来是要回国一次才好。

1863 年 8 月 3 日　星期一

今天又译了一些惠顿国际法。3 点去总理衙门，带去有关领事许可证书和商务领事等信稿。这些都是我建议缮发的。薛深恐这些信件中提到了国际法，将导致列强各国在任何事务中都要求接受国际法这一宝典。他也没有理解信中的要点，并且似乎认为这并非那么重要。还是董来解了围。他说，显然，办这些事不容易，磨难不少，就是写这点文章也颇费事。文祥坐在那里一如既往，沉思良久。他说此事必须实现。于是我就把这两封信和关于中国式船只悬挂外国旗帜的信件留给他们，以便他们细细阅读，随意修改。我居然胆敢写成一道诏书，这使他们都哈哈大笑。到归结时，我把它划掉了。此时此际，我才第一次懂得，凡是诏书结尾处通用的（钦此）二字并非皇命的内容，而仅是军机处加上去的一个尾巴，用以公布诏书的。这点我想中国文人懂得的也不多。

在总署吃到一种很美味的西瓜，名为三白：它的皮、瓤和子都是白色的。[120]

在总理衙门时，有一个来自天津的脚夫给我带来了玛丽、黑兹尔顿先生的信，还有一份报纸，我想是布雷迪大叔给的。李也来了一封便函：他和他夫人及孩子都在大沽口，不几天就会来到北京了。

1863 年 8 月 4 日　星期二

今天没做什么重要事情。没去总理衙门。孙先生请假外出。晚访柏卓安，得 6 月 10 日“快邮”。估计我的邮件将和李同时到

达。得威妥玛便函。天甚热。

1863年8月5日 星期三

5点起床，已连续3天如此！整天未出门，忙于译惠顿国际法。把海事法规中的“补偿”和“捕获奖金”等二章译成中文。

把柏卓安译成中文的卜鲁斯爵士最近致亲王的信函审查一遍。该函建议，凡遇充公案件，如果中国政府不打算按照柏尔德密的建议设置会讯公堂，至少会同意由税务司和公使进行联合公开审理。鉴于柏卓安在中国还不到两年，他的译作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的句子并不流利，信的“表达方式”也不尽得体。今晚他来呆了几分钟。

白天很热：7点有雷雨。阿方正开着香槟酒，忽然觉得不好受。我估计是肚子疼。

还没有收到李或梁的信。“说谎的”营造商报称马厩今天完工。我让他不要忙，因为李泰国先生即将到来。我宁可让他自己来定夺这项工作。他签订合同的时候自己作过指点。房子的其他部分进行得很快，但是糨糊、油漆等使苍蝇麇集，为患无穷。

1863年8月6日 星期四

6点前起床！整天在家，忙于“惠顿”和“美国领事手册”。

给布雷热写了一封长信。

下午6点收到天津来的邮件，其中有我6月10日的报纸，还有妈妈和查6月1日发的信，以及林纳6月10日的便函。

马基也来了一封便函。内称李于4日拂晓离开天津，要我派送两乘轿子和1匹马到通州去。李带着“王牌之王”。这是什么意思？他要在北京住下来，而把我派出去吗？别管它，走着瞧罢，反正一两天内就明白了。[121]

1863 年 8 月 7 日　星期五

5 点 1 刻起床。安排轿夫们于晨 6 点起程赴通州，共 30 人，轿两乘，马 1 匹，带有致李的信。上午热。

3 点去总理衙门，带着惠顿国际法内有关条约一章的译稿。董毫无困难就看懂了。他说，他们宁愿我留在北京，不要现在就到各口岸去。辞出时，我说“我的母亲在最近的一封来信中问我，是不是忘了回家了?”因此我说，明年一定要回家。文祥说，“那么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让你走了”——我离开他们的时候，听到他们说“他有道理：普天之下，人性略同。”因此，在他们这方面，我预计就不会反对我明年回国了。[112]

1863 年 8 月 8 日　星期六

5 点 1 刻起床。上午 11 点，李忽然来到，李太太则稍晚一些。

布雷特从山上来报称，他的漂亮小伙子带着他的钱逃走了。写信给庆和张要求把他逮住。

已经定下来让我去负责江海关；因此我估计在半个月内就将卸去现职。

1863 年 8 月 9 日　星期日

5 点 20 分起床。

默里从公使馆来，询问关于“南京”号附加费退款一事。

给威妥玛写了封便函。

整天有些头痛：我想，一次轻微的晕船会使我好转的。

1863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一

上午头痛：直到 8 点才好。上午闷热，透不过气来。

3点去总理衙门，李跟着在4点来了。没办什么具体事。对于小船悬旗的问题，他们似乎更倾向于采纳我的建议，并且急于要立即通过那关于领事许可证书的信件。

查问了（赫德写的中文方块字南京）附加费的问题，知道是指定由宁波海关退款的。长期以来，商人们都申请在上海退款。江苏当局当然不会同意为其他省（浙江省）办的事花钱。[123]

1863年8月11日　星期二

竟日未出门，忙于整理轮船账目。安吉来访，他正取道俄国，准备归国。[124]

与李长谈会审公堂事。我劝他同意由税务司进行公开审理。

今天给布雷热、马吉、萨拉、夏洛特、母亲和父亲发了信；给威妥玛和马福臣也发了信。

1863年8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陆带着一封广州来函来访：毓清（?）再留任候补道1年。

文祥带来口信说，他今天另有要事办理，不能到总理衙门。奇怪，他是自己送信来了呢？还是受那几位之托，来试探一下李是否会守在家里？

3点去总理衙门。李带去致卜鲁斯先生函稿，其中对宁波代理领事富礼赐对我们的海关总巡贝克处以罚款一事表示不满。[125]谈论了暹罗船问题，但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1863年8月13日　星期四

今晨我还未下床，听差便送来几封信，是“皇后岛”号邮来的。其中一封是戴维斯小姐发来的！另有一封是米勒的便函，他想求职了。

编成一份由税务司公开调查的充公案件规划。取得了李的同意。

下午忽然来了惊雷暴雨。

1863 年 8 月 14 日　星期五

两点去总理衙门。文祥在关于富礼赐事件的函稿上做了几处修改。他说，关于领事许可证书的信件，他们必须大改，并且决不能提到各国通例。这是薛的高招，真该死![126]他们把威妥玛搬出来为他们撑腰。威妥玛告诉他们，外国的王室宫廷是可以任意出入的。他们老是这样，用威妥玛那些稀奇古怪，七零八碎的说法来反对我们的各种“进步”建议。

今天李谈起了暹罗船的事，但是一点也站不住脚。他既不善辩，又不能反驳。我所认识的人中再没有像他这样的。他总是把自己的要求赤裸裸地摊出来，然后坚持要办而不会说明为什么应该办到。他不准备让对方提出反对理由；一旦提了出来，他也不予答复或解释。

今晚李带着他的家眷在城墙顶上巡游了一番。城墙上中国人拥挤不堪。晚 8 点才到家。我以为他这次登上城墙会引起一场物议，尤其是因为他在那里出现引来了那么一大群的人。

阅读费希尔写的中国和福钧的新书，两者都是平平之作。[127]

耳痛，手指肿了——可能是蜈蚣或大蚊虫咬的。我感到自己的身心日渐颓败，实在需要回家一次了。今天文祥说，我明年回国前务必再来京一次。

……

1863 年 8 月 15 日　星期六

谢天谢地！这一个月总算已经过完了一半。

上午 D. H. 考德威尔来访李泰国，谋求给他就读于英王学

院的儿子找个职位。其子年方16。对他说他儿子太年幼，不过几年之后可能有机会。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考德威尔先生。第一次是在1854年8月份。有一次休士、郇和、孟于和我与包令爵士同进早餐，爵士把我们向他作了介绍。约翰爵士说，我们应该把他作为榜样，如果我们能像他那样把工作做好，那对我们就会有好处等等！从那以后，他经历了考德威尔大事件，不得不离开政府公职。今天我们再次见面，情况不大相同了！

有位叫H.科恩的也来找我。他持有霍尔基特（?）的介绍信。在信中，他“不揣冒昧”，请我把当地的大亨告诉他等等。行！

整天无所事事——把一叠泰晤士报浏览了一下——耳痛特别恼人。

今天把账册和账项等移交给李。

1863年8月16日　星期日

耳痛为患，苦恼之极。此种小恙之令人熬煎，远甚于卧病。

今天默里来访。布雷特也从山上来。他讲了一段为一个蓝宝顶戴军官的夫人治前额伤的故事，颇发噱。[129]

1863年8月17日　星期一

今天上午耳痛好得多，但代之而来的是神经性头痛那样的感觉。我食欲颇佳，消化旺盛，脉搏平稳，而这些小毛病却接连不断，真是奇怪。我估计这一定是由于不锻炼而造成的。

3点独自去总理衙门，李因结算木工账，太忙，不能去。文祥和其他人把他夫人的账记了下来。他们劝我不要结婚，因为结了婚就“被拴住了”。他们把他们草拟的领事许可证书的信给我看。我认为不如我拟的那份。他们又谈论了黄畹的事。[130]我和他们一起呆到6点1刻，但就办了那么点事。薛讲了几段他当道台

时所作所为的故事。他说，他曾把一个天主教徒从一个天主堂内诱骗出来吃饼，然后把他杀了。曾把一个正在挑动叛乱的土司请到朋友家中，然后把他逮起来杀了。另一段故事是他曾把属于吴道台衙门的一个人砍了头。看来下令逮捕黄畹的也是他。当时黄正在吴（道台）保护下的墨海书馆（伟烈亚力的?)。原来他是一个血腥的讨债鬼！看他讲自己故事时的那付狞笑的嘴脸，所有这些都是（天是好生为德）啊。[130]恒祺讲述着佛教教义和轮回果报之说，一时也颇逗乐。他说，每个人生来都有一定的财数，打个比方说10,000两。如果你这辈子花 10.000 两，那么你下辈子还有 10.000 两；如果你这辈子花 15.000，则下辈子可以有 5.000；如果你这辈子花 5.000，则下辈子可以有 15.000，如此类推。他说，蒙古人总信佛！佛家说“以德报怨”；而儒家只能做到“以友报怨”。[131]

董给我一本我摘译的惠顿国际法，竟然已经是厚厚一大册了。

今晚布兰登（?）和学生们在我们这里吃晚饭。

1863 年 8 月 18 日　星期二

上午天气阴沉：凉爽而没有雷雨。近午较暖。给候补道写了些短简。给秦和陆也写了。并把我起草的“税务司调查充公案件规划”译成中文。

孙就要回上海，梁也要回去。李的两个苦力也急于要回本省：这里吃不上米饭，他们没法过日子。

李买了我的小马，给我 20 元。

今天衙门派听差来请李和我明天早晨到那边吃早餐。

1863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三

昨夜豪雨，整个上午凉而多云。北京的夏天可以说是差不多

过去了。不知道上海的9月是什么样的气候：热、潮湿，还是什么？等着瞧罢。

上午派梁到银行取广州给学生们寄来之款，共期票9张，每张100两。把该款交李。

上午10点如约去总理衙门：他们一定要我在去南方以前和他们一起“吃一顿饭”。文祥甚至不客气地说，他已经吃过早饭。我怀疑他是否真吃了，因为他给我夹各种小点心。我想他是在驯服我的“野性”吧？我又和董干了3杯。文祥说，今天的“早宴是为李接风，为我送行。”接风之说，未免晚了些。

处理“领事许可证书”信。看了几封李和左的来信，其中说的是宁波分遣队和叛军的给养，等等。[132]

4点1刻出来，文祥和其他几位把我送到大门口。

据报，白齐文带着200个欧洲人加入了叛军。[133]

1863年8月20日　星期四

上午黄和陆来访。黄仍在此等待安排经费问题，希望能在阴历十月内动身。[134]

去公使馆向伯郎和默里告辞。伯郎说，卜鲁斯先生已从西山回来，要去看我，因此我就去爵士家中。他和我说话时对局势非常激动，似乎他认为白齐文的行动已经使事情复杂化到无法执行他原定的政策了。他问道，他们为什么不听他的话，把白封为北方军队统帅？他们为什么不给他奖赏，用好言好语把他送走？为什么要侮辱他，使他投敌？爵士先生自称对局面绝对不满。他说已经指示领事，如果中国人不解决问题，经过一定时日便采取行动，并已派了一艘炮舰到厦门去推动一些要求。他并说，英国和法国人完全有可能要办他几年前就预言的事，就是把上海的官员们撵出去，占领该地，等待事情平静下来。他再不去劝别人支持清廷了。往后他对清廷要采取大不相同的路线等等。[135]

在回家的路上，我本想去衙门和文祥说一声，但后来决定不去。这事我对李说了。他劝我去衙门，因为“我离开后的日子里，他又得重新出面捍卫一切。到那时，他将处于何种境地！”我去了，并找文祥，但他刚回家。董和薛都出来了。但我没有告诉他们听到了什么，只是说，有些重要事要通知一下，我必须亲见文祥。薛一听不告诉他，便显得很粗野，董则看来很紧张。

1863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五

10 点去总理衙门。文祥与薛和董一同进来。我故意盯着薛，让他感到自己是多余的一个。结果他没有来到桌子边，而在一个侧座上坐下来。我开始谈问题，接着薛来到桌子边，但什么也不说。文祥做了几点提示：

1．卜鲁斯爵士看来没有自知之明；

2．英美两国公使推荐白齐文这样一个人，清廷有理由表示不满；

3．叛军不会对白齐文太信任；

4．他的叛变没有造成多大破坏；

5．如果他确已造成损失，有关各省的督抚将抱怨总理衙门在他违犯军律时未予处死；

6．外国公使们使用这种措辞，只能使中国人感到对不可思议的洋人离得越远越好。[136]

我催他们立即给厦门写信，指示那边的人解决债务一案；写信给李，督促他及时给戈登的部队发饷。[137]今天我没有用昨天本来可能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来谈问题。确实，我今天认为卜鲁斯爵士的话语不过是发发脾气而已。

昨天卜鲁斯爵士说，柏尔德密到这里来时对中国人怀着最友好的意向，但是经过了 3 个月，现在对他们已经深恶痛绝，恨不得要离开了。还有，不管他对不对，中国人肯定会看到，法国政

府是支持他的。他说，其原因就在于“往来函件的调门。”我暗示说，莫非法国的翻译译得不对吧。卜鲁斯爵士说，“很可能，丰大烈先生可能是不胜任，否则就是他有反政府情绪。”

文祥让我看了一些给我的札子。其中1份就是委任我为上海税务司并兼管长江各口岸及宁波税务；另1份则是禁止在扬子江上拖运（?）盐船的。我表示这些札子如不由李转达，我一概不收。

然后我向他们辞行，并许诺他们在回国之前还要回北京来(赫德用蓝色铅笔写道：这是确实的！1864年8月21日，在北京)。

下午1点3刻乘肩舆离开北京到通州，途中（字迹不清）历时20分钟。6点立即上船，并启碇。一路顺风。船小，只有两个船夫，船行速度约每小时4英里。至天津有水程440里。[138]

1863年8月22日　星期六

沿运河顺流而下：中午吃5片饼干，1瓶香槟。早晨天气晴朗，阳光灿烂。

1863年8月23日　星期日

上午8点前后到达天津。船家告诉我，他的船约值50两，他岁入约22两，每月生活开支约8吊钱。

住进了巴德往常住的房间。有个荷兰公使来了，他叫樊德霍文。此人是乘一艘荷兰快艇来的，还给李带来了一个邮包，上面写着他的尊称C.B.[139]

1863年8月24日　星期一

散步至紫竹林。

1863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二

散步至紫竹林。

1863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三

与密妥士共餐。

1863 年 8 月 27 日　星期四

到紫竹林读“生平言行录”、“邓迪尔岩的丹尼尔”等等。天气凉爽宜人，着羊毛衫。前几天晚上，在密妥士家见到俄国领事。他以开玩笑的方式暗示有一个俄国保护国——蒙古。[140]

1863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五

仍旧在天津。

1863 年 9 月 1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点登上“南京”号轮。

1863 年 9 月 2 日　星期三

上午 10 点从紫竹林启碇，在炮台下遇“骡子”号。船上有西巴尔德医生和劳伦斯先生。

1863 年 9 月 4 日　星期五

早饭前出大沽口。乘客有：伊担及夫人，比索内特，托布勒，另一个法国人，奎斯明（?）及我自己。

1863 年 9 月 5 日　星期六

上午 7 点以后到芝罘。整天与汉南在岸上。他看上去很不舒

服。[141]

1863 年 9 月 6 日　星期日

上午 10 点又启碇。增加了慕稼谷牧师和两位女士等乘客。[142]下午慕稼谷牧师讲道，引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 24 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他提醒的有一点使我思想上受到了猛烈的震动：“钉十字架是慢腾腾而折磨人的死法，但是一种靠得住的办法。”

今天我再一次下了很大的决心，相信这次一定能实现。

1863 年 9 月 8 日　星期二

晨 4 点到上海。“南京”号很快，还算舒服。看到“北京”号和“中国”号都在锚泊处的边上，后者在冒汽。我估计阿思本正准备启碇北行。

1863 年 9 月 12 日　星期六

下午接事。“厦门”号刚到达，见到了布高英和莫里亚蒂。未见阿思本。访英布君（?）西华和马安。[143]

1863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三

派人在“纹银”号值班，因为据报白齐文即将把它带走。

1863 年 9 月 20 日　星期日

“厦门”号的萨尔威乘着一只小船正在去吴淞途中，船上有 10 个外国人和 1 个中国人，还有 110 件武器。外国人中有平德和巴特勒，以及美国领事馆的警官和航运代理人。[144]

进城，收到给英、美及法国领事的信。信中要求发给逮捕白齐文的授权书。据信他就在上海。在逮住了一条小船后，“厦门”

号在追逐“玫瑰花”号过程中陷入了泥潭。他们似乎看到白齐文就在“玫瑰花”号上。还收到了道台给西华的信，信中要求他把“厦门”号上发现的任何美国人都送到船上运走，并照例办理。回寓时，看到西华先生。我把案情性质告诉他。他就决定当夜把平德等留在船上。后来从马安处取得了搜查英国租界的授权书，另又得到他搜查塔兰特住宅的授权书，接着去美国领事馆索取虹口方面的授权书。9点，萨尔威来到时，坐下吃晚饭，把各项授权书交给他，还有一件给他自己的一份盖有道台大印的授权书。(边上有很不清楚的字样，看来是后加的：后来听说白齐文呆在萨尔威的姐妹那里（?）。我向萨尔威要授权书时，他几乎要向我献殷勤了！)[145]

1863年9月21日　星期一

把道台的信发出，以便取得授权书，还附带给英布君先生(?）写了一封私人信。

对在被扣留的船上发现的中国人张华进行了侦讯，并把他送到城内看管起来。

莫里亚蒂来找我。他说，“巴勒拉特”号后面的一条三桅帆船据传满载着武器。我派他到船上去搜查，并要求他，如果船上确有武器，就把该船上所有的外国人都扣留下来，有一个扣一个。原来该船就是“玫瑰花”号，在19日是只装着压舱物来的。现在船上满载货物。发现一份租船契约，是由平德和巴特勒签署的。契约中申明，万一该船被扣，则应付给2,000两银子！萨尔威说，他所追逐的便是该船，白齐文就在该船上。船上所有的中国水手都已逃逸无踪，仅有一个小男孩。他说，该船遇到“厦门”号的时候，船上有7个外国人。把“玫瑰花”号带到码头边。[146]

1863 年 9 月 22 日　星期二

今天把“玫瑰花”号上的货物卸入仓库：全都是日用必需品，但装载方式显得似乎船上还有其他货物。

在美国领事馆进行初步侦查。

1863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三

在美国领事馆预审 6 名犯人。其中有一个叫威廉·兰杰（?）的说，他是白齐文的仆人云云。

1863 年 9 月 24 日　星期四

在美国领事馆审讯平德和其他人等——关于“玫瑰花”号上发现男孩的证词我没有记下，因此我得自己出庭。但是没有把我掌握的对这事的证据提出来。顾裴德先生为被告辩护，检察官埃姆斯则代表美国政府。张华认定巴特勒就是那个会说中国话的人。

1863 年 9 月 25 日　星期五

审理结束：认为“一切控告都证据不足。”

报信人威廉非常恐惧。法官布里奇似乎把他的名字泄露出去了。

今夜“厦门”号出海：萨尔威的小艇被冲击得粉碎。

1863 年 9 月 26 日　星期六

今天的《北华捷报》上刊出了审判的情况。前几天，22 日，英布君来访，他不同意道台发出的非关海关事务的信件都由我转递给他。我把为何授权书的申请要通过我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说，“好吧”，他已经命令警察行动了。他又说，他从北京听到，

李泰国先生的政策是要使清政府同外国的一切交往统统经由海关来办理！（赫德在这句边上加了一道波形线。）

1863 年 9 月 27 日　星期日

今天冷而有风。自从到上海以来，我一直在读“沃特利”的著作，希望今冬能全部读完。他是何等的才华横溢啊，切实而洞察一切，广袤而犀利非凡。

昨天由“汕头”号给李带去6,000 两银子。今天是（阴历八月十五），而舰队还未全部到达。[17]

1863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一

今天，奥利佛（?）为他的“玫瑰花”号船的事来访。我告诉他，道台已把此事交给领事，我们就得等领事的答复。见梅辉立，他认为对平德不利的证据是“无法反驳”的。[18]

天气阴寒，下雨兼冷。

1863 年 9 月 29 日　星期二

今天轮到马安来碰碰运气。但是，当然得把他们全部释放。[19]

1863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三

在美国领事馆听巴特勒与克里默对质。推迟作出决定，因为要等我对审讯中出现的一个问题作出答复：“海关是否愿意承担海关人员同与海关有业务关系人员间产生的争论，进行审理，并加以裁决。”

在“美国起诉平德”案中代表被告的律师库珀先生今天来访。他要求我放弃那些日用必需品。他说，如果这样办，就可以避免诉讼等等。

1863 年 10 月 1 日　星期四

今天答复西华先生，写信给库珀先生，谢绝作出关于交出“玫瑰花”号上抄来的日用必需品的建议。——因为 1. 我坚持认为我们做得对；2. 如果我们不交出，他们只能起诉而已；3. 如果我们交出，他们仍然可以起诉；而且由于我们放弃这些货物，便承认了自己的弱点，从而使他们更有理由。

1863 年 10 月 2 日　星期五

库珀先生再度来访。我给他写了一个通知，内称，如果西华先生给道台写封信，说他认为该批无照运输的日用品不应充公，我就愿意劝告道台把该批货物交出。发还兰杰（?）的东西。

1863 年 10 月 5 日　星期一

上午“天津”号到达，“江苏”号应在明天到。有 4 个人乘昨天到达的那艘法国邮船来了。他们是在“江苏”号把他们撂在岸边的地方被送上该邮船的。领事馆把他们送到我这里来了，我要他们去“巴勒拉特”号，他们不肯去。

今天得广州来的通知，可怜的佩恩在厦门死了。

库珀先生今天来打听另一案件的情况——告诉（姓名不详，可能是怀特）让他知道。

今夜“极北”号到达，包腊乘该船来了。[19]公事繁重得惊人。

1863 年 10 月 6 日　星期二

上午，阿思本的秘书查普曼带着李泰国的信来访。“指挥”问题在北京又提出来了。李满心想着要好好“调整”一下。我并不乐观。如果中国人不让步，而坚持要有个中国官员共同指挥等等，则阿思本将回家。那么如果阿思本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李就

得辞职——到那时候又该怎么办？

默塞尔·查普曼和尼古拉斯与我共膳。[151]

1863 年 10 月 7 日　星期三

今下午“江苏”号到达。接皇家海军上校默里的便函。内称叛军火轮“高桥”号正使戈登苦恼。还有是，如果与白齐文同伙的许多洋人能够得到赦免的保证，他们就会倒戈。[152]

1863 年 10 月 8 日　星期四

致函戈登。

1863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五

西华来问赦免（?）问题。查普曼乘“厦门”号缴获的小船前往戈登处。去那儿只有这种办法。

1863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六

伯朗、平章（?）、李及怀特来此吃饭。曾请莫里亚蒂同来，但他不能来。

据报戈登受伤了。[153]

1863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日

上午外出时，有一个坐着法国医生马车的老先生向我欠身。逼近地看，原来是英布君（?）。变化真不小啊，他准是得过大病。

今夜去教堂。慕维廉讲道。从“光荣的福音书”讲起。李弹奏风琴。但是，虽然人们唱的是耶稣基督和光荣归于您，他却没有弹出那古老而熟悉的调子。我想这是一个大错。

下午尼古拉斯来谈话。我想，如果阿思本离开部队，他不会

反对去担任指挥职务的。

天气渐寒。

1863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一

今天哈蒙德自镇江来。

1863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二

今天米德自厦门来，威妥玛自汉口来。“（船名不清）”号和“南京”号船从天津来到。阿思本谢绝接受亲王任命，而且几位公使都还支持他。李对“厦门”号的所作所为非常粗野，而对白齐文的脱逃则感到非常庆幸！又将引起一次剧烈的争吵！事情的结局会如何呢？[158]

1863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三

今天雷德由福州来到。

1863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四

今天“广东”号到达。

1863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五

艾仑·扬来访——宁波（字迹不清）相遇。[159]

1863 年 10 月 17 日（原文如此）　星期六

（星期四和星期五的记事显然不对。）留尼古拉·曼、和（赫德在此处留下空格）共餐。

1863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六

今天接李 16 日来信；他解决了暹罗船问题！但认为“舰队

很可能要解散!”我的一切工作和艰辛——尽付流水!

莫顿，曼、怀特、香克一家（原文如此）和查普曼一起吃饭。[156]

最近10年来，白齐文和他手下的约70个人离开了苏州。今天的《北华捷报》刊登了他们的全部声明。

哪一方有理？太平天国呢，还是清廷？

1863年11月5日

给李写了长信。

1863年11月8日

在今天的邮件中我寄出了（字迹不清）汇票：

1,000镑给父亲，1,000镑给母亲，100镑给杰米，100镑交卡西给女孩们，100镑给利齐·斯特拉尼（?），100镑交H. 麦考尔给（不清）；9镑给史密斯·埃尔德公司付账。

还有柏卓安给A. 默里的66.1.4镑的汇票。

出票人是（记事中断）。

1863年11月14日

今天“萤火虫”号的勒德拉姆到我处说，他没有煤了，并说是戈登告诉他的，煤没有了就来找我。他说，“萤火虫”号抛锚在大帆船上游，一俟煤送到船上，他就立刻要开船。我给他送去1.5到2吨煤，并给戈登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阿思本的处境和要求。煤和信的收据上有W.A. 马丁的签字。[157]

与此同时，将军通过默里通知曼——旨在让勒德拉姆知道——他要乘该汽船去苏州。

1863 年 11 月 15 日

今天下午 1 点前后，默里来告诉我，昨夜有 30 个左右的欧洲人登上“萤火虫”号，把船开走了。该船满载军火，并装有一尊 24 磅的炮；是供“扎特礼”号用的。当时勒德拉姆不在船上，但有一个士官跳入水中，带来了这一消息。

伍德受命于中午乘小马赴崑山，去给在外跨塘的“希森”号和“扎特礼”号以及在洛口的戈登传送这一消息。该地在苏州西北，戈登在那里经过激烈战斗，已经又攻下了几个据点。[158]

马格里正在松江的一艘有照船中，等待“萤火虫”号去把他拖走。他可能会遭流氓抢劫。[159]默里去找贾米森给马格里写信，给予警告。

将军和勒德拉姆找梅辉立去了。后者将与抚台办理所需之一切。现在，有一桩妙事！我致戈登的信将被拆开，阅读，还可能要作为“截获”的文件公布！

“萤火虫”号很可能会立即开动，粉碎一些清廷的据点和戈登的前哨站，并占领另两艘火轮。[160]

白齐文和另一些人玩的是一套卑劣的圈套：我希望琼斯没有插手才好。

事情将如何了结，我不知道：阿斯本不理不睬，真该死！

8 日我收到（?）的李的信，他告诉我部队“要解散，那些火轮则要送回国内去”！

我的麻烦很快就要来到。

1863 年 11 月 16 日

上午金能亨来访，最后谈了保税仓库的事。

查明星期六晚白齐文和汤森深夜离家后迄今未返。他们无疑是到“萤火虫”号上去了。几天来本森一直在扬言将去日本。就

怕马格里已经被劫了。昨夜道台已派出一艘火轮进行追击。

今上午收到蒂尔比的道歉信。曼说，低声下气的回话可以息怒，这次确然如此。

一位名叫切希尔的先生来控告A. 坎贝尔先生的下流行为。切希尔先生在星期一即9日晚上带着他的太太出去散步。他是“厄勒克特拉”号的主人，作为病人一直住在岸上的“克拉伦敦”公寓。他的太太说，坎贝尔先生把她带到自己的卧房，说“丑话”，等等。经过询问，坎贝尔先生不承认曾把她带上楼去，但承认曾和她出去遛过弯。另一方面，巴特勒说，他听说过，这女人确是被带上楼的，但他不愿透露这是谁说的。我比较相信那丈夫的说法，因为他说时泪流面颊——我们必须慎重并秉公处理。[161]

本星期我收到下列邀请：

1. 星期二到鸿芳楼赴中式宴会；
2. 星期三到金能亨家；
3. 星期四到沃登家；
4. 星期五出席志愿军舞会。[162]

1863年11月17日

今晚伍德回来了。已经给在外跨塘的火轮和戈登提出了警告。没有见到“萤火虫”号。白齐文和汤森于星期日被府台的人抓住了；他们以某种方式对火轮进行了贿赂。接着汤森逃走了。昨天西华去把白齐文释放了![163]今天上午各缔约国领事们和将军开了个会：星期四还要举行一个大型会议。

上午为“切希尔——坎贝尔”事件找了马安。倒霉的家伙自己也来找过我。

狄克现在开始工作，因此我就比较轻松了。

1863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五

阿思本于赴英途中今夜乘“江苏”号到此。所有人都起床迎接!

1863 年 11 月 21 日

今天李的秘书金登干来访。他已辞职，将乘“中华”号经好望角回国。他告诉我，总理衙门给卜鲁斯爵士写信诉说李逼着他们要一所府第，还在舰队问题上对他们发号施令，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也一样，因为当李做某事的时候，我总是在说别的事情。把我致李的信交给阿思本过目。[16]

1863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日

下午 4 点上“江苏”号，与阿思本同进晚餐。

他原以为李泰国有权力实现那些条件。当他发现李没有那种权力时，就提出辞职，并让一个部下来执掌指挥任务。李泰国不听那一套，而卜鲁斯爵士则予以劝阻。于是他又提出放弃这些船只，留给中国人用，——法国公使说，他要把这些船只抓过来送回法国。英国和美国公使反对把这些船只留在中国，因为怕这些船只会落入流氓地痞手中。接着，他要到南京去办些事。——但是，几位公使都说，如果他采取这一行动，他们就要谴责他。并说，戈登在苏州的所作所为，每时每刻都在干扰他们的政策。在几位公使中，卜鲁斯先生是反对在中方的条件下承担指挥任务的；法国公使反对他进攻南京；美国公使则反对他深入到内地去。

中国人说，那么舰队还有什么用处呢？于是他们就要求卜鲁斯爵士把舰队送回国去，并写了一封信，对阿思本大加恭维，还打算赠他白银 1 万两。[17]

这样，舰队便该回国了。从 11 月 1 日起，一切费用就记在英国政府的账上。中国号、北京号和天津号要开到英国去出售，其他船只则开往孟买。

阿思本认为我给李的信颇为离奇，——就是关于他在 7 月份接受了“各条款”的那部分，并希望我俩能在他面前碰个头。他认为如果我们俩闹分裂，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害怕中国人要捣毁海关。他告诉我，——关于中美条约中的某一条：其中规定中方仅有惩罚之权。北京方面谴责我不该把不应告诉他们的事告诉他们。说话很带感情，十分憎恶，眼含泪水。一位和蔼可亲者。我使他免于一切谴责。李的缄默使一切都毁了。他曾劝李从事海关业务。[赫德在页尾用小字写着：道台写道：每月的（船银）停发。][166]

李抚台去苏州了。

1863 年 11 月 25 日

今天审理 A. 坎贝尔案件（切希尔诉坎贝尔案中的被告[167]）。

1863 年 11 月 26 日

今天巴特勒告诉我说，坎贝尔自己对他说过，曾把切希尔太太弄到过房内，但央求他不要把这事往外说。现在：坎贝尔在我面前否认有此事。

尼古拉斯来吃晚饭。前几天晚上阿思本说，我一直在调查尼古拉斯和白齐文。曼渴求和戈登合伙，我说不行。必须在北京李处呆着。

1863 年 11 月 27 日

今天，“吉拉德”号到达。李泰国 16 日的便函称，“中国人已将他免职，并指派我接替他的遗缺。”我终于登上了顶峰，非

常高兴，但是前途艰险苦多。[168]

坎贝尔被判徒刑 3 个月或处1,000元罚金。他申请辞职：可怜虫！

接布雷特 16 日便函。

里德夫人 12 月 2 日约，霍夫上校 4 日约。

1863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日

今晨我正坐下吃早餐，忽接道台的名刺，他给我转来了总理衙门的公函，信封上写着致（总税务司）。我照常吃早餐，然后按常例念圣经做早祷。（这整个一页上有一个巨大的红色花体字。）

打开公函，第一件是卜鲁斯爵士的信，劝我接受总税务司一职，并保证我能得到各国公使的支持。第二件是柏卓安的长信，证明北京方面对我的深切信任。第三件是总办庆、夏、车、辛等几位的中文长信，写得极端华丽，非常悦人。第四件是衙门的公函，任命我为总税务司等等。第五件是总理衙门发出的一封公函，内容是关于由李借375,000两银子的问题。这我还看不太懂。第六件是一份公函，其中指示三成船钞今后和以前一样要由一个中国委员（指中国海关委员——译注）转交。[169]

第九章

赫德仕宦生涯的影响

赫德开始仕宦生涯，时年 29 岁。其后 44 年间，所经历之事，诸多出人意料，亦有不少可以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危机，但所作所为很少偏离其原有的风格或目标。赫德在 1863 年以后的生涯，实际是清帝国海关建立及中国在现代世界中成长的史话。任何事情都未能使这位总税务司偏离其惟一的中心：不论是婚姻或子女，金钱上的得失或是荣誉，均无足轻重。从 1863 年的现实，已可以看出其未来。他已经开始走上他的一生所要追寻的旅程。在他身任清朝官吏的生涯中，婚姻和家庭是次要的因素。事实上，在他成为北京所信赖的顾问之前，他甚至未曾试图去发展这些方面的享受。

在对赫德如何得以掌权进行评价之前，让我们先看一看他的私人生活中的一些片段，那都是以相当偶然的方式出现的。

1864 年 10 月，赫德在北京度过夏季后，回到上海的总部重新工作。1865 年的夏季，他又去北京。返回南方一事因接连不断的事件而屡被推迟——由于文祥不在，由于公函需要准确的翻译，以及由于华工出国等等原因。1865 年 9 月底，他还在忖度是否能在 10 月最后一周离开，或者他是否真的应当离开。“说实在的，我想我最好还是下定决心继续留在此地。我可以使他们（总理衙门）摆脱不少困境，只要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与我坦诚相见。”几天后他写道“亲王说我不应现在就想离开”。而赫德完

全敬服的威妥玛则告诉他，“各国使馆对我抱有如此好感，他认为我可以（在此永久定居）而完全不会危及任何利益。我们等着瞧吧!”

终于，到了1865年10月28日，按他的记载，当他在总理衙门为“没收调查章程，华工移民规定及中国航运安排”诸事忙了一天之后，他“决定应把北京作为他的总部，并得到亲王的一心认可。”他指出，李泰国曾要求住在北京，但“未能处理好，”因此那位新任总税务司奉命驻在上海。“他们现在对我和我的待人处世方式已经有了两年的经验。他们已经命令我——这有些违反我的意愿——长住在这里!”他最后用他那典型的谨慎方式说，“我千万不要自鸣得意。事实上，我越是成功，我就越该谦虚谨慎，不然我就会被认为是何等的软弱和愚蠢!”

但真正的原因是，在京城这里，通过经常与总理衙门，以及间接地和恭亲王保持密切接触，他可以尽量利用他作为受到信任的顾问的身份而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他一向对他的中国雇主的心情和需要至为敏感，这样他就可推动那些他认为有关键作用的计划（像同文馆之类），或减轻一切压力而等待时机，或可做长远打算以播下某一想法的种子——聆听，吸收，作出反应。他的日记记录了这一过程，每天所记均以下列词句开端!“今日去总理衙门”；“整个下午均在总理衙门”；“去总理衙门，见到亲王也在该处”；“昨日在总理衙门进早餐”；“一点钟时被召去总理衙门。”

1866年初的几个月间，赫德经恭亲王勉强许可请假回国。此行有几个目的，公私均有。赫德曾力促总理衙门派遣中国代表前往外国，意在最终在主要国家设立中国使馆，及寻找机会向西方人士解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他指出，“只要中国没有其他途径使外国君主听到其声音，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们就会一切事均我行我素”。[①]作为第一步，总理衙门于2月4日召见赫德并向其宣

告，由一位低级清朝官员斌椿以总理衙门总办身份率一使团，正式出国观光及作考察报告。此一行人包括斌椿之子及同文馆的3个学生，并有两位海关的外籍年轻人作为译员，随同赫德乘船前往欧洲。

婚姻和家庭生活

就个人方面而言，赫德的“私人急务”涉及他要带回一个妻子的决定。他感到已经到了成家的时候。不论就他的心意还是就他的地位而言都有这种必要。虽然在他的心目中尚无人入选，他感到在家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肯定足以办成此事（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开始进行准备。比如在1865年12月22日，在总理衙门进早餐后，他用一整天时间，从早上10点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处理一个又一个问题：天津的每月经费，准许中国人拥有洋式的船舶，由他在欧洲为同文馆物色教习，以及在列有十八项的单子中的第十一项所记“如我结婚，我妻子可乘轿外出。”

1866年3月2日，他在总理衙门用了告别早餐，虽然在他日记中记有这时他还没有拿到准假的“文件”。如果威妥玛这时送来一份“有关中国局势”的备忘录，也许会吓得总理衙门不准其启程，他对此是不会感到吃惊的。不过5天之后，他在暮春的风雪中离开了北京，“当我的一切行李都装上车后”他写道“我忽然意识到我是要回家了。而在我喉咙梗塞，两眼充满泪水时，我一时感到难以和学生们见面道别。”

在天津和上海停留后，此一行人，包括斌椿和他的7个仆人，由香港起程前往马赛，并于5月2日抵达。在巴黎和伦敦只各盘桓一日，赫德即前往都柏林，又从那里去里斯本他妹妹玛丽的家，并在最近处转道拉文纳脱，这是他父母当时居住的地方。

他写道，到家了——又回到了亲爱的家——时间约是7点钟。不过，透过他的梦想，人们也可看到不久他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的现实。天下雨，他着凉了，在贝尔法斯特呆了几天之后，他“不久就对这个城市感到厌倦。”

但是，在回伦敦两周为斌椿安排正式日程及沉湎于他个人上剧院及过夜生活的行径之后，他就高高兴兴回到拉瓦那特去办理他原来所想办的事务。在离开中国之前，当他还在上海时，他就从他的姑妈布莱黛那儿收到海丝特·简·布莱顿的一张照片。她是新近故去的医生之女。这位医生曾亲自为赫德接生。显然他的姑妈们是在为她们家庭中这个出色的有资格的单身汉作媒。“她是位漂亮的姑娘，”赫德这样评价，“要不是我请假回家，使我有机会亲自选择的话，我会很愿意回寄我的照片，以完成这桩“安排的”。

然而，他“亲自进行的选择”在短得令人吃惊的时间里便和他的姑妈们的意见取得一致了。他和布莱黛姑妈喝了茶，见过了玛丽姑妈，和爱德加姑妈吃了饭，于5月31日拜访了布莱顿夫人，5天后就向她的女儿求婚。海丝特·简答应了，她的母亲也同意，他的哥哥罗伯特（代表他的父亲）也同意了。他们于8月22日在都柏林结婚。在有着“浪漫情调的凯拉尼湖”度过蜜月后，他们于9月13日乘船回中国。这时赫德31岁，他的新娘19岁。

这该是一桩不寻常的，但并不是不愉快的婚姻。求婚的速度表明，除了一直到老的某种程度的恩爱之外，双方都具有对方想要得到的东西。有了海丝特，赫德在远方的家中就有了经管一切的妻子。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对她的描述是：“她是一个聪敏的，活泼的，不矫揉造作的和清醒的少女——说她‘清醒’即是说她对大多数来访者都能持重自如。”对她来说，在已经对北爱尔兰感到乏味，而变得烦躁不安和厌倦之后，赫德打开了她通向世界

的大门。她符合维多利亚式夫人的条件。她在挺过了头一次过长的分娩期和那个婴儿的夭折之后，为他养育了3个子女。她在北京为他经营了10年的家务。北京的好客之风也有她的一份作用在内。

到了这一阶段的末期，除了那些异国情调的但现在已是熟悉了的中国海岸以外，她也想看一看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她那总是说要在“明年”休假的丈夫，由于过于埋首工作而毫不在意地一次次推延行期。因此，在1876年3月，她和她的两个孩子（第三个要3年以后方出生）离开北京回国去了。说好赫德在1878年夏去巴黎博览会时与她们会面。中国引人注目地参加了那个博览会。在波塔当把孩子们交待给她的母亲后，海丝特开始了她一生中长时期的独立的和旅行的生活。金登干，当时已是海关驻“伦敦文案”，不时报告她的行止，但主要是听别人说的。

赫德于1878年夏天在巴黎和妻儿会面。博览会后，他们有一段时间曾去奥地利的巴特伊霍，再由那里去巴登——巴登。赫德正在忍受着令人无法工作的头痛症——一种全面的衰竭，其原因一直也没有弄清。他是否工作过度，过于毫不间断？是不是在中国事务中有什么不可预见的危机使他烦恼不安？是迅速扩大的中国海关业务已非一个人所能管理？是越来越看清楚他的婚姻从来也未能成为一种亲密的伴侣关系？——而这也可能只能归咎于他那传奇式的天真的求婚及作为一个丈夫只是徒有其名。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无法得知。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这些问题是否提得正确。当然，在他以后留在中国工作的年月中，他也要同样卖力地工作，毫不懈怠。虽然人们也可设想，他已不复年少，在体力上没有那么大的耐力了。但是，在那些年里，他得以心情舒畅，一帆风顺地把他的全部精力灌注于他的第一爱好——海关。

在接二连三的耽搁和延长假期之后，赫德和他的妻子带着6岁的儿子于1879年5月回到中国（长女文米被留在爱尔兰上

学)。秋天，他们迁入在他们离开时为他们建造的新居，一直到1900年义和团将其焚毁前，这里成了赫德的家。他的第三个孩子梅布尔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但是，这时已32岁的海丝特不再是1867年来中国时那个毫无经念的乡下女郎了。她的目光已超出了在北京的西方人的有限小圈子。这些人所进行的狭隘的社交游戏比她在别处看到的要差劲得多。两年的旅行和在像巴黎、伦敦和日内瓦这样的首都结识的老练人物，向她展示了她在生活中缺少什么，以及如何利用其社会地位来得到这一切。不到两年之后，她和她的子女们就在1881年离开中国到伦敦定居。尽管从理论上说赫德要定期休假来和他们团聚，而她也有时考虑去中国，但事情的发展结果则是，一直到24年后的1906年3月，他们才又相聚。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寻常的，但对他们来说则看来是可行的。他们经常互寄亲昵的信件。赫德提供了一所在伦敦的上等地区的房子，另加一份数额相当大的补贴，并不时送些礼物。赫德夫人（她后来成了爵士夫人）很会招待宾客并到各处去旅行（除了中国，哪里都去)。她的照片显示出她是一位坚强的人，一个习惯于自以为是的人。但她的孙辈后来都亲切地记得她是一位好主妇和一位讨人喜欢的健谈者——有些过于使人敬畏，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但却是风趣的。也许人们可以这样下个结论，那就是从所有的情况看，这是一桩足够好的婚姻，而在赫德看来，这婚姻显然已经给了他所希望得到的一切。而事实的确如此。

赫德很想念他的家庭。1876年海丝特第一次离开北京时，他写信给金登干说，当她启程的日期快要来到时，“我忽然意识到这次分离的到来，接着就有一种‘走跳板’或被吊死的感觉!”但他很容易恢复他那老一套的单身汉生活——吃饭时不被谈话打断，不间断地在案头工作，有需要时招待一下别人，而这都按他自己的主意安排——比如说，他的出名的游园招待会。此外，他

还不像是完全没有家庭。说实在的，赫德天生的爱尔兰族阀主义传统和他在各方面看到的中国榜样一样强烈。他的弟弟赫政人很聪明，但喜好游乐，不太喜欢长时间的持续工作，是他在海关内的被保护者，就像他的内弟裴式楷一样。裴后来成为副总税务司。他的女儿文米前来看他，嫁给了英国使馆的一等秘书（海丝特未来参加婚礼）。他的儿子布鲁斯，是被他母亲娇惯坏了的癔想症患者。1893 年他 20 岁时回到中国，一意孤行，使他父亲的一切努力均不得成功。既未能阻止他那被人们认为是不可取的婚姻，也未能引起他认真在海关内干一番事业的兴趣（他确曾在金登干属下于伦敦办事处任职，但好心的金登干向赫德隐瞒了他的缺勤情况和总的说来是缺乏兴趣的工作态度。）。

待到 1906 年，赫德爵士夫人带着赫德梅布尔，这个他仅在她的婴儿时期见过而时已芳龄 27 的女儿，回来暂住时，他发现自己很难适应“已婚生活”。他是这样告诉金登干的。当然，有他们在是很令人高兴的。而他在地震后“怕让她们单独去弗里斯考”。但他希望在他次年休假前她们就已经离去，“因为我要独自料理‘结束工作’所涉及的各种各样的事务。”也许这许多年来形式上的婚姻所带给他的全部影响一直到他在 1908 年回到英国以后才显示出来——那时他已体弱多病，整日无所事事。在他生活中那些忙于海关事务的年月中，他未曾介意家人不在一处。在伦敦，他的妻子已经建立了她自己的生活和性情投合的人际圈子，并且在此过程中已变成了一个对他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人。这时，他才终于面对现实体会到家庭的真正意义。

赫德的二元文化的成就

但是，此时，他在职业成就方面则有不少事情可以满意地加

以回顾。1863年他开始担任总税务司时，海关还是个在13个通商口岸中的立足未稳的机构，而当他离开去英国时，已经发展为囊括43个口岸的大型机构。它每年向中国政府支取的经费开始时为748,200两，待到1898年已增加到3,168,000两；同样，其职员人数从1875年的洋员424人，华员1,417人，增加到1906年的洋员1,345人，华员10,625人。仅仅这样一个机构的管理工作，就是令人生畏的巨大任务，而赫德则是充满热情地全力以赴的。

作为总税务司的鹭宾·赫德，不仅掌管海关总税务司署时手腕非同寻常，效率卓著，而且不时成为满清政府几乎不可或缺的顾问。他的顾问意见有时扩及中国政务问题的几乎所有领域，由财务到铁路邮政，以及对外关系和国防，几乎无所不包。在19世纪的中国，没有一个外国人有赫德那样持久的影响，也没有一个外国人曾受到中国更大的信任。例如：清代作家陈炽19世纪90年代曾提到赫德行使着极大的政治权力，他的意见在朝廷中压倒一切。“内外大臣均尊而信之”。[3]从1864年开始，一直到他死去，他受到过朝廷的各种褒奖，从赏给他三代正一品到太子少保的头衔，极尽吹捧之能事。

赫德如何能如此成功？答案可以从两个方面觅得，即历史的和个人的。

一方面，从历史着眼，赫德生活与工作在英国的商业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近代化的交叉点上。这些变化多端的力量构成了20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基础。这两种力量在各通商口岸的作用，只有与赫德在北京的事业联系起来，才能被人看清。通过保证满清朝廷从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中获得税收，赫德帮助清朝继续成为中国的统治者。通过以一个可资信赖的雇员身份，向朝廷大员提出顾问意见，赫德促进了近代化的各种进程。虽然他为中国购置火轮并建立炮艇队的最初计划未能实现，但他继续努力尝试着

不仅要为中国创立中外合一的文官制度，而且要为中国建立初期的大学、现代海军、现代邮局、外交部门和政府的出版机关，更不用说他个人在外交上的成就了。1861 年后，他是英国——清朝友好关系的主要代理人。通过这种关系，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英国试图把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推入现代世界，同时从英国用炮舰逼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中为自身获取好处。商业帝国主义是 19 世纪末更为明目张胆地强迫中国租借土地，租让铁路、矿山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先行者。外国领事们及赫德的海关外籍税务司们就是在这个商业帝国主义的势力之下，参加了对中国主要城市的统治。不管如何下定义，帝国主义和近代化是一起来到中国的，是 19 世纪席卷欧美和俄罗斯进而至于全世界的工业转型浪潮的双生子。

还是让我们提供一些常规以外的看法，而不要去为这些包罗一切的名词下定义。正因为它们的不准确性，才使得它们被如此经常地按一般用法来使用。如果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定义界定为一个民族把他们的统治强加于另一个民族，那么满洲在 1644 年后征服中国，就使他们与 19 世纪 40 年代的英国侵略者有些共同之处了。满洲人和英国人在文化上都属于外来者。他们都是通过在中国寻找某些中国人并与之合作才在当地取得了统治地位。1861 年，当鹭宾·赫德开始为北京政府的首脑恭亲王工作时，这两位都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很重要的一个共同之处——他们谁也不是汉人。

他们这样互相认同，并在一起用汉语交谈，在 19 世纪 60 年代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由于前此 30 年的英——清冲突终至达到平衡。英国 1834 年在广州取得了外交上的平等，加速了西方迫使中国在贸易、交往和传教诸方面对外开放的斗争。1850 年后在中国各地爆发的 4 起反清起义，迫使清廷统治者采取绥靖手段对付西方列强，接受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进行对外贸

易。随着英国贸易的扩张，特别是在上海，它在维持清政权方面的利益终于占了上风。

英国侵占印度的事实在北京是人所共知的。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以及印度与中国的鸦片贸易都是以印度为基地的。但就是因为英国全力贯注于印度，才使其没有尽可能地致力于征服中国。1834 年之后，每一个对侵略者作出估计的清朝外交官都报告说，“他们所要的只是贸易。”1861 年后，伦敦和北京都能同意，满清帝国的和平和安宁可以促进贸易，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从那以后，赫德所经营的独特的中外（共管的）税收部门就被证明是清朝的主要经济支柱了。

在中外关系的制度化架构中，海关总税务司署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因素。直到赫德在中国的最后 10 年间新的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兴起之前，满清王朝一直出于本身的需要与头号帝国主义大不列颠进行合作。像洋式武器加强了清朝的新式的各省地方军队一样，英国海军协助保持了中国海岸和航道的安宁。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几十年间，在日本于 1895 年打败中国，加速促成 1898 年的帝国主义瓜分狂潮和 1900 年的义和团战争之前，英国处于在中国参与权力结构的领先地位。这不仅是体现在各通商口岸的管理上，也体现在插手国家的中央行政中枢上。正像治外法权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前的这一阶段便利了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活动，并保护了他们的公民自由一样，海关便利了对外贸易并帮助中国处理了由于对外接触而发生的各种问题。在每一个通商口岸，同样等级，并常常是关心同样问题的外国领事和海关税务司们，各自都在关注外国和中国的利益。赫德的成就在于，他看到了必须要有这样两套官员，领事们和税务司们，协同动作，以便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海关调和了中国主权与近代化的需要和外国从不平等条约中强索的特权之间的矛盾。在维多利亚陛下的帝国主义时代，赫德是非正式的不列颠帝

国的主要首创者。在他眼中，英国和中国一般来说在利益上很少矛盾。有时他能为英国的现代进步事业做出英国公使本人所做不到的事情。

作为个人，鹭宾·赫德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然而从他那中等身材和不惊人的外表看来，1854 年的观察者或许很难在他身上找出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迹象。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出，在他身上的一个主要事实是，他具备成长的能力。他在中国的最初几年中，有几件事是学到了家的——如何成为一个官僚，如何取得、保持和使用官府的权力；如何用中国话与满汉官吏来往并注重礼仪、耐心和策略；如何理解正在冲击中国国家的商业帝国和现代发展的各种势力以及如何与他们一起工作。

赫德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所达到的兼具二元文化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他已中国化了。这就是说，他已学会如何按中国的方式行事和参与中国的公事议论。这得益于他在文化上的那种敏感特质。这在 19 世纪末欧洲殖民主义全盛时期的通商口岸外国商人中，是非常少有的。

在赫德的时代，和在中国历史的早期一样，中国官府的权力只有那些愿意接受和遵守中国社会和官僚行为规范的人才能掌握。这些规范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的特有组成部分，包括文字修养，合适的礼节和思想上的顺从。在帝国统治的两千多年中，对外国雇员都是用这些标准来衡量的。凡是符合这些标准的，往往能享有很大的影响。鹭宾·赫德就是其中之一。

赫德从来没有完全“降华”。他没有娶中国女人或是成为中国臣民，也从未失去对大不列颠的忠诚或对西方“进步”的信仰。尽管如此，到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他已学会说中国话和写中国字，熟谙中国社会习俗的精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了真正的理解，并证明了自己是中国的一名忠诚干练的文职官员。正如他在 1864 年 8 月 15 日的日记中所说：“我站在

中国一方，我一定尽我所能帮助他们。”他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主张进步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为中国所用的人。”19世纪60年代通商口岸商人们的尖锐批评，充分地证实了赫德所作的自我描述的正确性。到了1868年，用《北华捷报》的话来说，“他的感情已完全是中国式的，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了。”这当然是有意作出的非常带有贬意的评论。

赫德19世纪50年代的日记，相当详细地记载了他的“中国化”的过程。而其60年代的日记，则显示出由于他采取了中国文化的作风，使他在个人和官场上都得到了好处。赫德在海关总税务司署的译员同僚之一，庆丕，曾有一次写道，“由于长期在中国，与中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关系密切，大家都知道总税务司有意无意地倾向于运用中国方法。”这并不是有意奉承，但却肯定是事实。

在作为英国领事馆的随习翻译来华之初，赫德具有一腔传教士的热忱，但不知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困扰于对自身的怀疑和不断无情的自责，赫德感到很难适应新的环境。然而，从久居中国之初开始，他似乎就具有相当的文化敏感性。而有些早年的日记也表现出他对许多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不公平和无动于衷的方式感到吃惊和沮丧。赫德在文化上的敏感性并没有使他立即产生对中国的敬仰，但至少使这位年轻的居留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19世纪50年代及以后中国通商口岸外国人居留地里流行的有害偏见的通病。

使赫德早期中国化的关键因素无疑是他在语言方面的训练和能力。他在19世纪60年代中曾抱怨在宁波的“开端是错误”的，说他一来到中国就“投入事务”，因此在学习中文时是从上到下地学，而不是先打下坚实的基础再接着发展。但是，通过不断地潜心学习这一语言，他终于掌握了使他得以进入中国上层文化知识界的语言技能。

到了1864年，赫德已能和清政府的高级官吏进行长时间，甚至是具有哲理的谈话。那年7月，当结束一次这样的谈话时，曾有人评论说，可惜赫德未能生为中国人，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可以讨论中国道德方面的问题了。不过赫德日记中所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对于这个问题是可以“大谈特谈”的。尽管赫德的道德世界与和他交往的清朝官僚有显著的不同——而这是要点所在——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进行哲理讨论的话语世界。到这时，赫德已经开始认识到在谈话中从孔子的经书中“援引一句恰当的话”的价值了。这样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能力来自学习，也出于天性。赫德具有传统教育的根底，并曾在毕业后从事一年的研究。他还仍能诵读拉丁诗人的作品，并且在北京一直阅读伦敦新出版的主要期刊和书籍。

因此，在文化学习方面，赫德能够吸收与西方文化相去甚远的孔夫子中国的文化。这就使他具有和他的前任不同的知识和心理水平。李泰国工作能干，但却是一个在文化上严重固步自封的年轻人。他在伦敦郊外密尔山的学业，于15岁时因其父在福州领事任上故去而突然中辍。虽然李泰国在中国曾师从热情的郭士腊，但所受教育不多，而且不管怎样，由于自身的气质和缺乏训练，终未能和中国大臣们讨论其各种规划。而这些人对赫德，则是颇有好感的。

赫德与清朝官员的谈话，很少是纯学术性的。而且，他虽然急于向中国人讲解西方文明的具体益处，但也愿意受教于人。随着他对中国了解的增进，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社会的某些特征。他对于基督教的信心是动摇不了的。对于文祥所说的他永远不会信奉基督关于上帝慈爱的信条，他只是觉得好笑（这位年长的满清政治家曾问道：“你们对蛇是怎么解释的呢?”）。不过在其他事情上，赫德是比较严肃的。他在1863年7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英国由陪审团进行审判，有时会惩及无辜；而让真正的罪犯

逃脱罪责则是屡见不鲜的事。在中国的审判，罪犯逃脱罪责的事是很少有的；无辜者受害的事则不时发生。从政府存在的目的考虑，到底那一种制度弊病最少呢?”

1865年1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确实难以用抽象的说理来肯定那一种制度是较好的，我们的制度还是中国的制度……在我们，是由人民的代表处理征税事宜，然后对其政策加以贯彻；在中国方面，则是由官吏和他们的那些追随者，在与人民的间接接触中，用各种方式方法取得公众事务或保护地方所需的一切款项。在我们，是由国会来讨论就地筹款问题，在中国方面，是由地方上的有关人士就地提供资金。”有时，赫德把中国人的制度理想化了。但通常，他对于孔夫子理论与中国的实践之间的差异是再清楚不过了。他这种对中国和中国人完全矛盾的感情，或许可以他1864年8月2日所记来最好地加以概括：“除了他们不打仗这一点，我认为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优于任何其他民族：如果他们具有我们的智识和基督教，他们会大大超过我们。”(后来，在这段日记的对面页边空白处加了一个问号。)

从他与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无数接触中——与他的导师，审稿人，秘书，仆役，偶然的相识(包括市井中人和邻居中的年轻女子)，他的情妇阿姚，和各色清朝大小官吏——赫德极好地品味出了中国社会交往方面的个中微妙。待到19世纪60年代，不论是通过观察和直接经验，他都已受到了中国人在礼貌和礼节方面的非常宝贵的教育。

在1854年中，作为一个随习翻译，他头一批任务之一，就是撰文论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对中国社会风俗习惯的一个仔细而有洞察力的观察者。19世纪50年代，他目睹了中国的节日、婚姻和收纳养子的仪式，宗教祭祀和许多其他各种社会情景。在同一时期的领事馆业务中，他反复会见中国官吏。他在日记中相当详细地描述了官场的规矩，礼貌的谈吐

和仪式。如果没有这些初期的经验，尽管有惊人的语言能力，赫德能否在19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在各大都会与官员来往中获得如此成就，仍是值得怀疑的。赫德在1863年5月谈到傲慢无礼的李泰国的一番话，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办公室见到李泰国，看上去比过去瘦了。到他住处长谈，他变化很大。事实上，他变得如此英国派，以致我担心他同中国人共事准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确实如此。后来赫德把问题直接归因于李的缺乏机智和体贴。

除了学习中国社交的方式，赫德还渐渐理解到等级和地位在中国社会和官场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他在19世纪50年代于宁波和广州的日记中，处处提到中国官员的官称和"顶戴"，当然也提到他们掌握的权力。赫德本人尽管不以为然，却屈从于中国官阶的炫耀，这是不足为怪的。例如，1864年8月，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与其中国执笔人关于对他的工作在官面上给与某些奖赏的可能性。"我……向他解释说，"赫德写道，"至于说到荣誉，就我而言，'不为凯撒即为匹夫'——与其给我中等的什么，不如什么也不要。他们要是给我个顶戴，我就只要那一等的。"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他显露出一种准确的地位（竞争）观念。他说，他绝不要在等级上低于以前给过其他洋员的顶戴，如给过华尔和马继业的那种，要是给他三品顶戴，而他们得到的是二品，那就非常不妥当了。

然而，1864年10月18日，赫德得悉，他将被推荐受领按察使衔，这在九品文官中是正三品。当时，中国人一味强调文官等级要比授予华尔等人的武官等级有声望得多，要求他接受皇上所给的特殊荣誉。意味深长的是，清廷还敦促赫德表现出适当的归化迹象，如娶一个中国妇女，在中国永久定居（假定作为中国臣民）和改换中国服制。赫德声称，他大约需要"一两天"来考虑这一切，但显然他对接受这一荣誉是兴高采烈的，而且承认，

文官官阶会使他在中国官场中具有威望和影响。

赫德仕宦生涯的主调

赫德在中国对外关系中所扮演的几个角色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到1863年底出任总税务司时，他在运用权力中的某些态度已经变得非常明显。首先是他对自己的看法，和对他的税务司们作为中国政府雇员的看法。19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北京（外国公使之间以及外国公使和清政府之间）的合作政策时期，赫德已经充分意识到并且认真对待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官的任务。我们不仅在他的日记中，也可在他于此期间的正式海关通令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5]例如，他的著名的1864年6月21日通令，就很显然是作为海关洋员“执行职务”时的指南。它开宗明义地提出“首先要清清楚楚而且经常记在心里的就是，税务司公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我国的机构，而作为这一机构的每个成员，有义务在对待中国官民时，都应一概防止引起反感和敌意。不论其他在华外人认为有权如何如何，不论他们是否出于他们的地位，或是出于想象中的对中国人的优越感，或是，出于偏见而作威作福，以及对于那些和他们本国不同的习俗笼统地加以藐视，借以显示出他们的文明高人一等，那些身受俸禄而且是中国政府臣仆的人，至少应当不去触犯中国人的敏感之处，也不要引起嫉忌、猜疑和憎恨。海关里的外国职员在应付本地官员以及和本地人民交往方面，最好应该记住他们是那些官员的同僚。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中国同胞，因而已经接受了某些义务和责任。”

赫德提醒他的外国雇员们，他们是“一种进步文明”的代表。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雇员）应当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他

是在中国政府之下支取薪金去做指定工作的人，所以把他那项工作做好应该是他的主要任务。随着进步的潮流而向前推进的那些计划和行动，必须从属于那项工作。要使它们有利而又成功，也必须用理智为先导。这就是要耐心守候机会，要能够作出建议而不自命不凡，要竭力去说服而不去强迫命令，并且要能够在不因暴露缺点而引起刺激的条件下提出补救方法。”

接着自然就是第二点，在概述了海关外籍税务司和中国海关监督的各自职责后，赫德的1864年通令接着敦促其外国雇员“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中文上。”这种学习，他认为，“将会使人发现其本身并非是完全乏味的，对这门语言的掌握终将证明它不仅对个人有益，而且会对海关工作有益。学习这种语言，无论如何也可使我们对我们为之服务的政府和我们与之休戚与共的人民有些了解，并产生一些兴趣。”

赫德1869年11月1日的通令，更加有力地强调了学习中国语言的重要性：“人人都学会中文似乎是意在确保这个部门的继续存在，因为，这样一来，海关就有希望能给人以良好印象，令中国官员承认其固有价值；人人都学会中文，就可使总税务司摆脱不时需要将能讲华语的低职员置于不能讲华语但在其他方面都很有资格的高级人员之上的这种易招人不满的工作方式；诱导大家学习中文，就给了每一个人从本质上说是这个国家的最重要的东西，从而在事实上可使海关，并也使中国政府，不依赖于我，我还希望增加这个部门的存在的机会；经验曾经指明，不问当主管的那个人的品级如何，中国官员都非常愿意把会说中国话的人视作需要真正对待的人。”赫德又说，“学习中文的人对中国的国民性一定可以做出一种较正确的估计，对于他们在中国政府下所处的地位以及为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一定可以做出一种较正确的评价；最后，从国际方面来说，有这么多中国雇佣的能干而又受过教育的人学习中文，便有可能希望从中获取好处。”

精通中文又身为清朝文官的赫德，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他和他的外籍职员们必须听任帝国的驱使。与此相反，赫德把海关建成一个由总税务司署直接领导的部门。整个部门都由他个人负责，这是一个从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安排。尽管海关扩大成为一个庞大和分布极广的机构，很少迹象表明赫德在任何时候曾认为使其独立于他本人是可取或可行的。1865 年末，当日意格这位几年来一直卷入法国控制中国事务行动的人物突然宣布，他决定从海关辞职，以便去福州协助管理船政局时，赫德在他的日记中写了如下的话："从此海关开始了一个新时期，我必须把我的全部聪明才智都用来保持我对它的驾驭：更加谨慎，更多的担心！"日意格的目标，按赫德的心意，应该是在海关内部有所追求，而不是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赫德以独裁的方式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署，成了其最具特色和深远意义的特征，其发展与清政府的目标和期望完全合拍。只是在 1906 年，皇上才成立了一个新的管理税务处，旨在将海关行政均置于以中国人为首的机构控制之下。

总而言之，清政府是相信赫德的。除此之外，再加上他个人的机智、能力、通晓汉语以及他有接触高级官吏的渠道，就赋予他以特殊的资格得以与中国的官僚政治打交道。可以肯定的是，他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他 1865 年上呈总理衙门议论改革的说帖，就以"旁观论"为标题。但是他从初期与各军机大臣、各大臣等的交谈中，获得了对高层领导人物个性的有用的透彻了解。1864 年 8 月 14 日，赫德在他的日记中若有所思地写道，"如果总理衙门——它现在是，将来也会是，中国最重要的机关——有更好的人在其中工作，如果在那里的是李抚台（李鸿章），而不是薛（薛焕），如果宝（宝鋆）主事而恒（恒祺）或崇（崇纶）躲开的话，并且如果也能有劳崇光在——那该有多好！"另外，他又说："如果文祥有李抚台的勇气，如果李抚台有文祥的细致入微，在

跳跃之前先能四下环顾一下，如果董（董恂）能更加实际，少些书蠹气，如果恒祺敢于直言，并确信有人支持他，如果董恂可以年老为托词告退，如果薛焕能被打倒——或者无论如何，他能有恒祺的廉洁，董恂的文采，文祥的善良性格和聪敏，李抚台的勇气，劳崇光的稳健，和曾国藩的影响，那么他还是有所可为的！”

从赫德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几个清朝的高级官吏——主要是恒祺和文祥，二人均为满人——在内心感受上至少是有些和他息息相通的。赫德从这些官吏处听到许多官场中的闲谈话语，从中懂得了一些中国和朝廷的派别关系。比如，恒祺在1864年6月曾告诉他说，崇纶在衙门（即总理衙门）中虽属可靠……文祥现已开始对他所说的话半信半疑，而他则对薛焕的看法和意见十有九从。他说，薛不管表面上如何当着我们的面笑脸相待，却经常背着我们说我们是鬼子（洋鬼子），说话时还表现出仇恨和反感。如果恒祺对薛焕的政策说一个不字，他立即被斥为与外国人通气。赫德注意到，在谈话时，“这位老人屡屡满眼泪水，有一次还真的涌出，在摘下眼镜时，他用手捶胸，说他虽然贪生爱财，也会为国牺牲一切”。赫德对恒祺所说虽有些怀疑，但相信也基本上“一定说的是实话”。（“国”在现代民族主义之前的时期，当然可能是指“朝廷”。）

从赫德日记中屡屡流露出来的一个显著的和具有意义的主题是清朝偏执症。将一个英国臣民纳入统制中国汉族的清王朝政府，像经常有人说的那样，是在使用一项习惯上的共同统治原则，或是在一个非汉民族的朝廷中与其他异族人共同管理的原则。在上面所说的讨论中，恒祺（一个满洲人）告诉赫德说，“在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每念及有可能驱逐当今朝廷时，总有一种洋洋得意之感。”他坚持认为皇上的汉人顾问在有可能引起清政府与列强之间发生纠葛的问题上不会心甘情愿地提供意见，而是认为“对清政府的每一次打击都会削弱它！从而使汉族

能有加倍的翻身机会。”恒祺的结论是，清朝的政策因此就应该是“与洋人保持最好的关系，避免任何纠纷，甚至不惜重大代价，也不要引起纠纷。”类似的情绪，文祥在那个月的早些时候也有所流露。这些满人比英国人更加意识到清廷的策略，即利用英国的支持以维持朝廷的统治。

1864年7月，文祥承认在过去15年的反满运动中（主要指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是站在清王朝一边的。”他把这种支持归之于清朝不分种族的政策，对“一切臣民都（平等的）以子民相待。”然而，事实上皇上还是有区别的。尽管汉人官吏的权力和威望在19世纪下半叶确实有了很大的增长，满人还是尖锐地意识到汉人的被征服者的地位，并对汉人称满人为“臭老虎”无疑还是感到恼火的。

赫德与恒祺及文祥等清朝官员的对话，多少缓和了他那源出西方的改革冲动。他开始理解中国朝廷政治机构威望的极端重要性。这是用“体制”两个字来概括的。这个变化多端的词指的就是国家制度的原则，它的基本机构，应有的秩序，国家的尊严，或者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国家的神话——特别是承认朝廷至上。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多么大程度上靠这个基础来支撑，赫德就得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老的“面子”观念与改革这个新问题之间的关系。在1865年7月23日这天的日记中，赫德记下了文祥的哀鸣：“给我们点面子。”“你要我们实行你的铁路计划，电报，等等；我们曾一度尝试了一个轮船计划（那个倒霉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并使我们因此而丢了脸!”1867年1月4日，文祥以同样的语调恳求赫德，和泛泛地对西方人士说，“要对中国有耐心。”他说道，“我们正在采用许许多多的西方发明，这你们很清楚。但是你们必须对我们假以时日，绝不要期望什么都一蹴而就。我们的很少人了解这些事，仅有的那几个确实对此有所了解的人中，有的还不敢说出他们的意见……记住我的话，50年

后……你们这些外国人将会急于要阻止我们去学，就和你们现在要催我们学一样。”

文祥是在对已经改变信仰的人讲道。虽然赫德有时对于中国的维新变革的速度之缓慢变得沮丧起来，他同时还是能容忍的，甚至一般来讲是能理解的。1864 年初，他已经向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概述了他在以后 40 年间为清朝效力时一般要坚持的宗旨：应当指望中国政府去做的是，它将努力忠实地履行它所签订的条约。如果它除了和平遵守那些条约的条款之外，还能注意听取外国公使们陈述的意见，我想对于我们所希望的也就足够了，既便再过 1/4 世纪，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其他效果。我们不能要他们立刻做出改变。而确实，任何这种要求都可能会更加延缓而不是加速一种健康的改变。经验终将使这个政府相信，除了信守诺言，以开明的精神将其执行外，没有什么途径可以与外国列强相处得更好。但是要使其有经验，必须给予时间。并且如果我们在给予这个政府时间的同时，要作出任何使其能从经验中获得益处的积极尝试，我们就必须注意要有一种合理的管理方式。[6]

这些当然是一个年纪刚到 30 岁的年轻人的一些说法。这个人相信那个造就他的条约制度。他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谨慎小心地待人接物的人。他在中国的长期事业教导他一切以耐心为上。但这还是一个有待于讲述的故事。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故事会使我们从中洞悉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扩张活动，因为赫德正是生活于近代化和帝国主义的交叉点上。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帝国主义正风头十足，并使赫德和海关成为其代理人。19 世纪 60 年代的非正式的中英协约最终在 1895 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崩溃，并代之以因英国利益的转移导致的 1902 年的英日同盟。先前北京可用于推进近代化的海关收入现在成了偿付对日战争，尤其是外国为平息 1900 年的义和团起义而入侵后所举外债及赔偿的担保品。当北京的满清政权因此而在财政上

受到奴役之时，赫德对海关的专制式管理一直是持种族歧视态度的，就和与它一样廉洁的印度文职部门的情况一模一样。海关内部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升到高位。在赫德手下，没有一个中国人曾任税务司职务。到1906年，中国的爱国人士已在等待这个老家伙滚蛋。他早已完成他的历史任务了。

然而我们仍须解释赫德的早期事业这件大怪事：他怎么能够，单凭一人，即成为他的中国雇主的卑微臣仆，然而却又是他为他们所建立起来的部门的绝对君王？我们认为，答案就在于赫德参与了两种文化，在每种文化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的说服和激励的能力，使他得以在这个部门维持他的权力。他的貌似不露锋芒的手腕，使他手中的这种权力令总理衙门感到惬意。按照两种文化的标准行事，使他能做到两面讨好。

注　释

（＊注释中凡属对赫德日记中的中文拼音作注解的部分，均略去）

第一章　赫德的家世

① 有关赫德早期生活，见魏尔特著《赫德与中国海关》第六章及其侄女裴丽珠所著《赫德爵士》第一章。
② 美格利斯著《爱尔兰游记（1834年春、夏、秋）》
③ 汉文文案（Chinese Secretary）是西方人的职衔。文案的起始字母均大写以区别于由中国人担任的文书职位。
④ 详见费正清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
⑤ 见魏尔特著《赫德与中国海关》第178页。

第二章　日本：香港和上海

① 日记的开头部分写在记录纸上未加装订，夹在赫德后来再记时（始于10月7日星期日）使用的练习簿中。
② 香港仅在12年前，即1842年，被割让给英国；维多利亚系其城市。驻华公使及商务监督与香港总督之职务均合并在一起。当这块殖民地被割让给英王时，岛上并无一所欧洲式房屋。因此，建造速度虽快，起初的房屋质量却很差。赫德到来之时正值潮湿季节（5～8月）之末，为最热的月份（80～90度）。当地美国驻军中不时发生“类似黄热病症状”的疾病。1853年为情况极坏的一年，共死了56人。（梅辉立·德呢克及金查理著《中国及日本的通商口岸》，第35及36页。）
③ 托马斯·宾内（1798～1874）是著名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牧师，泰因河上纽卡索人，是个强悍的辩论者，激烈攻击英国

国教。他出版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基督教牧师及信心力量实例四讲》

④ 孟甘于1854年4月进入英国领事馆任职，仅稍早于赫德。其后3年间他在上海担任署理二等帮办。直至1856年5月，始调监督署上海汉文文案课任职。1858年2月即在上海担任襄办汉文文案职务。新任命的香港总督，商务监督及驻华全权公使包令爵士也间接地与赫德来亚洲一事有关联，因为他曾向美国外交大臣提出通过考试选拔学生并任命为随习翻译的办法来建立在中国的领事馆业务。

⑤ 太平天国起义由1850年一直延续至1864年。太平军从广西出发向北推进，至1853年已顺长江而下抵达南京，并在该处建都。在进军北京途中受挫。上海当地小刀会起义于1853年9月占领上海城，只比赫德到达的时间早1年。各种不同的反叛集团统称“义军”；政府军队则有时被称为朝廷部队，有时被称为鞑靼人，即满洲人。

⑥ 在1854年成立外籍税务管理委员会前的动乱时期，在未达成缴付关税的协定前，外国船只被准许来上海口岸贸易，交付关税担保，延缓实际支付的时间。包令爵士于4月份以新任英国公使身份从英国返回中国。他自认此来有权就支付所欠中国政府的这部分税款进行谈判。实际上，由于来自英国本土的文翰爵士（包令的前任英国全权公使和商务监督）及英国商人协会的压力，他的观点遭到否定。英王法律官员的决定于1854年7月传达给他。最终，没有一份英国担保兑现。(见本书参考文献中所列费正清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第二十三章，下简称费正清，魏尔特著《赫德与中国海关》第四章，下简称魏尔特。)。

⑦ 略。

⑧ 赫德的妹妹玛丽，时年18岁，后嫁给贝尔法斯特的亚麻布商

詹姆士·梅兹。以后与赫德家在商业上有过关系。

“欢乐谷”是山顶以北的平坦地区，是最早的维多利亚居留地，是外国人的墓地，后发展为跑马场。

⑨ 略。

⑩ 休士在福州只住了1年，他于1855年12月返回香港，先是在监督署任四等帮办，后相继担任三等帮办（1856）和二等帮办（1857）。

⑪ 不知阿婵和阿金是否为华人邻居或仆役之女，看来赫德系由其领事馆中的友人介绍与彼等相识。阿光（阿媛?）既是郇和的“心上人”，可见其与赫德的关系较之赫德原先所接受的尤进一层。

⑫ 祈官可能是一位商人，也许是英国洋行的大班。“官”是官员的意思。是加于洋行商人的称号，显然含有敬意。

⑬ 赫德及其3位朋友被任命为4个新开口岸的编外译员：孟甘去上海，休士去福州，郇和（不是赫德）去厦门，赫德去宁波。广州是另一开埠的口岸；其他6个口岸直到1858年才开埠。

⑭ H可能是休士，S—h—e是郇和，郇和在香港任职直到1855年，调厦门任二等帮办，1858年由该处调往上海。同年随额尔金伯爵使团任译员。

⑮ 赫德侄女裴丽珠在其《赫德爵士》一书中写到，他是乘坐一艘“漂亮的150吨的鸦片贸易小船爱渥娜号”去上海的。

⑯ 定海港在鸦片战争时期为英军所占，直至1846年。该港在浙江省宁波沿岸的舟山岛南岸，距宁波确较距上海更近。

⑰ 略。

⑱ E·布尔沃·李顿于1827年在伦敦出版了《福克兰》一书，共两卷。

⑲ 吴淞在黄浦江口北岸，由此可上溯至上海。接收鸦片的船只

均在吴淞口外的“接收站”抛锚。这里处于上海的港口界限之外，因此不属英国领事的正式管辖范围。

“赛骑”号是一艘装有14门炮的车桅帆船。把包令爵士和法国全权代表由香港送往上海后即将返航。他们是9月16日离开香港的，比赫德晚两日，但运气较佳，已在前几天到达上海。

自6月份以来即在谣传，说有一大队海盗船威胁要攻打香港。11月份，确有一支由10艘英、美、葡舰只组成的舰队，加上两只租用的大英轮船公司的船只，在九龙湾外击溃了一支海盗船队。

⑳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1786～1847）系爱尔兰人，曾参加北极探险。

㉑ 乔治·韦廷汉·凯恩自1850年后一直在香港的总督署和商务监督署两处调来调去，直至1852年方进入领事馆工作。1854年1月担任上海领事馆二等帮办，并作为包令爵士的秘书，在赫德来到后不久随行前往白河口（见下面10月10日所记）。

㉒ 阿礼国（后成为爵士）自1844年起即在英国领事馆工作，1846年继驻上海第一任英国领事巴富尔上尉担任领事。因在此艰巨的关键岗位工作出色，包令在1854年即提出为其加薪并升迁至广州。但因上海的动乱有阿礼国在场便于应对，因此外交部认为“阿礼国留在上海甚有必要”。而中国后来也坚持其继续留任。他因此获得加薪，直至1855年才离开上海去广州。

李氏兄弟此处系指李泰国与李蔚海。二人均为李太郭之子。李太郭为一博物学家、传教士。从1852年至1854年他去世为止，先后担任驻广州、福州及厦门领事。二子均在少年时于其父故去后来华，为进入外交界进行准备。弟弟李蔚海于

1853年开始为英王效力，此时已为初级帮办，在中国曾卓有建树，1876年早逝。

威妥玛约比赫德年长15岁，1838年第一次中美战争时来华，为第98团的中尉。后调领事馆工作。1843年前担任广州最高法庭的粤语译员，1854年准予离职，去上海担任中国政府海关的国际税务（管理）委员会的3名委员（税务监督）之一。以韦一翟氏汉语罗马拼音的创始人而知名。

威廉·亨利·费陶自1844年来到中国后曾担任各种职务——曾任香港审计及政务局帮办（1844），海事署书记（1845～1847），外事司代理帮办（1848）及商务监督署四等帮办（1849）。1850年调驻上海领事馆工作，1854年任署理高级帮办。

史亚实为驻上海法国领事馆译员，为海关国际税务司委员会的第三名成员。与威妥玛及美国领事馆的贾流意共事。他们对海关的管理工作始于1854年7月12日。

㉓ 李泰国长赫德3岁，原在米都赛克司的密尔山学校就读，因父亡接济中断而辍学。因其母为其兄弟向外交部巴麦尊以下的各级官员屡屡请求，李泰国及李蔚海于1847年7月被派往香港从商务监督署的汉文正使郭实腊学习。在港时李泰国潜心学习汉文以作为自立之门径，到1849年未满17岁时即以译员身份担任各种职务。虽在监督署被任命为汉文副使，却于1854年4月被派往上海任副领事，此项任命系应阿礼国坚决请派一能干翻译而决定的。

㉔ 伟烈亚力年约40，在1847年受聘于上海的伦敦布道会印刷所工作之前，曾在英国从师学习汉文。他不仅印刷中文圣经，而且为一全心治学的语言学家，曾学习满文、蒙文、俄文及其他语言。

㉕ 竹签说明与易经或卜筮有联系。

拿破仑的“命书”据传为利普西克战役时缴获，有对各种梦境的解释，19世纪曾在英国有各种版本的重印本。

㉖ 乌龟（王八）是最无礼的行为的象征，因为它据称系与其母交媾。比较：英文中的“狗娘养的”或“日妈”，乌龟蛋（王八旦）是男女乱交所生，不知父母为谁。

㉗ 1853年9月7日，此一中国城市为小刀会所占，但义军分成来自广州和福建的两派，互相攻击。

㉘ 合信是上海圣三一堂的英国牧师。布道会的柯宝德牧师只是来上海访问，宁波才是他的工作基地。他是1848年和他的妻子一起到达宁波的。

㉙ 麦华佗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子。麦都思曾于1848年卷入海盗在上海附近打劫3名传教士的著名事件，仅以身免。麦华佗与威妥玛一样，系于第一次中英战争时开始其生涯。1840年他曾担任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属下的书记。后来成为璞鼎查爵士随员。曾参与攻打厦门及舟山之役。并因此获得勋章。此后在监督署任翻译、副领事及汉文正使等职。此时正将去福州任领事。

㉚ 有关这些题目的某些文章散见赫德1855年日记后所夹之纸页。他习惯于按时完成规定作业。不过，也许由于他的中文知识还达不到就所有这些题目进行写作，他就把“外国人在宁波的生活”和“宁波的宗教”两题拿掉了。他加入了两个包令或许并未提出的题目——“中国的婚姻”和“宁波的妓院”。

㉛ 这3位特使正在按英、美、法三国政府的指示要求修订条约。中国方面不愿让外国人进京，力主在广州继续谈判，特使们则坚持北上。包令爵士及美国全权委员麦莲各自乘本国军舰前往。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则派其公使馆馆员哥士奇持信前往。赫德到宁波后，他们全因未完成使命而折返。

㉜ 清朝官员吉尔杭阿于1854年初来到上海，奉北京之命前来清剿叛军。此人极为能干，不出数月即出任江苏巡抚。赫德所描述的会见似一次社交拜会，甚至部分是出于好奇。首途北京之3位特使则曾于9月30日及10月3日与吉尔杭阿进行严肃的会谈。他们受到礼遇，但得到的信息和往常一样，即只有驻广州的总督才有正式权力进行谈判。（见参考文献中所列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15页；费正清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第421页。）

㉝ 1848、1856及1861年的当代行名录将“福格公司”列为上海的船具和船用补给品供应商。威廉·海斯·福格1817年生于缅因州，1877年与其兄詹姆士在波士顿创建福格兄弟公司，经营对华进出口生意。5年后，总店迁往纽约。其妻伊丽莎白·费浦斯·波金为一热心的艺术收藏家，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建立即缘于此。福格家族中主持上海分支者为希拉姆·福格。

㉞ 见赫德后来于1861年到北京后的日记。他时常与中国的一些大臣们在总理衙门共同翻阅《笨拙》画报来消磨时光。

㉟ 罗伯特·马礼逊博士被称为“基督新教传教士的开山祖和杰出的汉学家”。1834年律劳卑勋爵出使广州时，曾随行任译员，不久即在广州死去。他于1807年开始在中国工作。他所编的字典多年来曾是学习中文的英国学生的主要课本。

㊱ 赫德所开始的旅程为125英里，十几年后被《中日商埠志》一书的作者们列为乘轮船需15小时的路程，船费10元。乘帆船则行程很难估计。一路上主要沿海岸航行，跨越杭州湾，在到达甬江口之前并无多少有趣的风景。宁波位于甬江口内12英里。“厄林”号系由帕特里奇船长指挥，他是怡和洋行的代理。他为驻宁波领事馆办理各种事务，包括提供资金及递送邮件。1855年7月，赫德将搬到他家度夏。

㊲ 福克斯通号为怡和洋行在吴淞口的鸦片接收船，此船的船长是贝利斯。

㊳ 右边，在甬江口上有一200英尺高的岬角，上有炮台，俯瞰镇海。另一岸上，有一高阜名曰“香寺山”，是12年前的战场。当年郭富爵士及派克将军曾率远征军至此攻占镇海，并进占宁波。自镇海向西南方前行11.3英里即达宁波。

㊴ 宁波有3条小河穿过。这3条河有如护城河，将古老的宁波城与新近发展起来的近郊及外国人居留地分开，使其孤立起来。由海边沿甬江而上，系由北面进入宁波。首先到达的是外国人锚地。欧洲人的村落在其右，为一由甬江和余姚河形成的三角地。如继续向右沿后一条河前行，则须再航行1英里才能到达英国领事馆。赫德则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是乘舢板前往的。

宝塔位于城的对面或南里——非常古老，残破不堪，高约160英尺，建于8世纪。

㊵ 赫德在日记中留有空档供加入舢板的中文，但一直未曾填入。英国衙门为在一院落内的官署。

㊶ 密妥士系另一更为知名的领事官密迪乐之弟。1845年1月密妥士到达中国时，其兄正在驻广州的英国领事馆任翻译。密妥士在广州学习中文历史5年，部分时间为广州外侨作翻译，处理商务文件，兼充荷兰、法国、比利时及普鲁士等国代表的翻译，并翻译《北京时报》。1850年8月到宁波担任署理翻译，现在副领事里格离职期间，以翻译身分代理其职务。

㊷ 亚历山大·金雷克，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史学家。于1844年出版了《东方》一书，记述在希腊、土耳其、黎巴嫩、埃及等处的旅程。在从加沙穿越沙漠去开罗时，由4匹骆驼及其仆从等组成的一行人，与从另一方向来的一位英国人相遇。两伙人接近时，他为是否交谈躇踌不定，最后还是“双方都

举手至帽际”，摇动手臂以示礼貌，并尽可能远地就像是在蓓尔美尔大街上相遇一样交错而过。但仆人们是另一种人，他们聚在一起互相交谈，使两个英国人也不得不互相客套一番。

㊸ 福钧，苏格兰人，曾任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主任，是一位知名的植物学家，此次系受东印度公司派遣第三次来华，搜集茶树。他不仅访问了通商口岸，而且身着华服，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四处旅行。赫德后来在宁波任职时曾几次和他相遇。

㊹ 当赫德说到城里去时，他指的是越过余姚河从盐门（正对着外国人居留地）走入这一古城。

第三章 宁波：赫德初次置身中国

① 《1854 年英华一览表》（广州《中国丛报》办公室印刷）。

② 见丘温·唐《清代图书馆的发展（1644～1911）》，第 9～10 页。

③ 对宁波的当代介绍，参看梅辉立、德呢克·金的著作。

④ 俄里范著《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和日本记事》第一卷，第 152～153 页，引文引自第 152 页。

⑤ 有关宁波的经济发展，见苏珊·曼·琼斯著《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第 47～48 页。

⑥ 海伦·S·科恩·倪维斯著《我们在中国的生活》，约翰·L·倪维斯牧师著《中国和中国人》。

⑦ 关于宁波的贸易问题，见费正清，第十八章：宁波的海盗和护航。

第四章 日记：宁波

① 约翰·包令爵士除了是外交家外，还是诗人和语言学家，对传教事务也颇熟悉。他是赞美诗《更夫，告诉我们夜晚的情况》和《我因基督的十字架而自豪》的作者，是和平协会诚挚的

拥护者。而且由于相信人性的仁慈，在闲逛既受禁止又有危险的那些日子里，他成功地在广州城内各处走动。玛高温医学博士是美国浸礼会真神堂的行医传教士，当时40岁。他是在29岁时与他的妻子于1843年到宁波的。

② 卡罗琳·柯宝德是R.H.柯宝德的妻子。赫德在上海时曾于10月8日听过R.H.柯宝德的讲道。当时她一定是20多岁，因为50年后赫德带回英国的纪念品中有一张引人注意的年龄较大的女士的照片，就是1907年的卡罗琳·柯宝德。

合信太太是合信牧师的太太。赫德在上海时在那同一个星期日听到过该牧师念祈祷文。

玛丽·安·奥尔德希是英国人，不属于任何团体，自费来中国开办女子学校。虽然据说生来就“既美且富”，她已决心以传教作为终身事业。但在年老的父亲去世之前不得不留在家中。在爪哇6年后，于1841年40岁时到达宁波，学习汉语，并在城中心租了一所大房子办学校。就传教事业而言，她是宁波传教士中的长者。而且在1850年前，任何人确实都不敢冒险派一个单身妇女来中国。奥尔德希意志坚强，行为古怪，习惯每天早晨5点在城墙上散步，带一瓶治头痛和臭味的氨水，在冬季还由一个仆人拿着灯笼陪伴。

B.H.戴尔小姐和玛丽亚·J·戴尔小姐都是奥尔德希小姐学校中协助奥尔德希小姐的传教士。

③ 赫德没有具体说明他在这个场合下遇到的是哪一个天主教传教士，但是在1855年1月24日他和密妥士拜访了顾主教和田嘉璧先生。赫德在宁波期间在那里的天主教徒还有阿吉涅克（Adjniery）、吉耶尔利（M.E.Cuierry）、蒙塔尼幼（montagneux）和里齐（Z·Rizzi）。

④ 陆赐牧师，和柯宝德先生一样，代表英国安立甘会。两人从1848年以来一直在宁波。美国浸礼会真神堂的那尔敦夫妇是

较迟才到宁波的新来者，是在前一个春天到达的。他们住在美国长老会院子附近，“在城墙下”近旁。那尔敦太太尽管常常生病，根据另一位传教士妻子所说，她已经在教会的妇女中进行工作了。

高德太太是另一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高德的遗孀，从 1849 年以来就在宁波。

⑤ 韦理哲牧师和他的妻子都是早期到达的美国长老会教士，与先行者麦嘉缔先生一起于 1844 年来到宁波。

麦嘉缔家和兰津家住的房子都在一个院内。韦理哲先生是一所教会学校的创办人。

⑥ 约翰·利文斯顿·倪维思和他的妻子海伦·科恩是住在美国长老会院子里的韦理哲先生的邻居。他们于 1853 年 9 月离开波士顿来中国，男 25 岁，女 21 岁。经过 6 个月的航行到达宁波，比赫德只早几个月。他们二人以后都写了书，记述他们在宁波的生活。倪维斯太太的书（书名《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对传教工作的日常工作叙述得特别详尽。麦嘉缔医学博士是来到这里的先驱，是宁波美国长老会传教团创立者。1844 年 6 月 21 日起就在那里，他负责诊所。据说他为人亲切，有才华，特别受中国人喜爱。他的医术在中国人中有良好的声誉。马丁太太，指的一定是塞缪尔·纽厄尔·马丁太太。她和丈夫一起主持附近的男童寄宿学校。马丁夫妇和塞缪尔的弟弟威廉·A.P. 马丁（即丁韪良）以及他的妻子全是美国长老会教士，是 1850 年 6 月到达宁波的。

⑦ 葡萄牙人从 16 世纪开始，就长期住在宁波葡萄牙人居留地。在赫德所记的时期，他们在城内与英国人一样再度参与沿海贸易。J.F. 马奎斯是该处第一任葡萄牙领事（在他之前，葡萄牙人的利益由英国代表），于 1852 年 6 月 22 日到任。他与英国同行不同，被允许从事贸易。他的薪水相应较低。威廉·

戴维森是一个受尊敬的英国商人。他大约在1842年从巴达维亚来到香港，曾于1843年拒绝璞鼎查为开放厦门口岸，任命他为执行领事的提议。不久之后，定居宁波。他从事各种商品贸易，包括鸦片和芒硝。他将这些货物用当地船只运往广州。(见费正清，第328页，344页，关于戴维森，第163页，333页，334页。)

早期传教士按照一种罗马拼音体系实验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话。这样做能帮助不识汉字的文盲说汉语。

⑧ 道台是地方官中品级最高的官吏。

⑨ 即在美国长老会院内，和英国领事馆在同一条河的边上。

⑩ 尼科拉·马莱勃朗奇（1638～1715）是法国笛卡尔派哲学家。对笛卡尔著作研究10年后，在1674年发表了有名的著作《真理研究》。这是一本“推测和引起争论的”书。

⑪ 赫德在学习官话，即与官员们打交道必须使用的语言。一直到12月26日他才有了字典。当时他从上海收到一本麦都思编的《汉英字典》。麦都思是伦敦会的创始人，是赫德在上海遇到的副领事的父亲。他是《新约全书》所谓的代表版的翻译者之一。

⑫ 赫德时代的宁波领事馆，英国人员似乎只有密妥士和他自己。但是在通商口岸开埠之初，英国领事馆建立的规模都过于浪费，甚至宁波一开始就有1个领事、1个副领事、1个翻译和1个医生，加上一批10人左右的中国工作人员（1个文书、通事、信差、门房、两个水手、两个更夫、两个苦力)。经济状况已促使其作了某些削减。(见费正清，第166～167页)

⑬ 托马斯·胡德（1798～1845)，开始时是一个职业小丑。不过他的《费尔曼赛格小姐》(1841～1843）被一些人认为是他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在可怕的外形下隐藏着深切的感情和有效的讽刺”。

⑭ 阿伯丁的布雷热教授，赫德在1866年休假时去拜访他。他的3个儿子全都在赫德领导下的海关工作。

⑮ 夸特曼牧师，自1846年起在宁波，是长老会传教团的一个美国人。他吃住在他的姐姐和姐夫，即韦理哲先生家。

⑯ 顶子，由有颜色的珊瑚、水晶等做的圆球，戴在官帽顶上，是品级的主要标志。一品（最高）是透明的红宝石，二品是不透明的红珊瑚，三品和四品是淡蓝色和深蓝色，五品和六品是水晶和白色，最后三品是金的和镀金的，有各种标志。从一品到五品的官员在脖子上都挂一串朝珠。顶子虽在表明品级上有意义，但对戴顶子人的具体职位，或甚至其真正身分并不提供真实线索。因此，赫德在这里注意到，按职责，地方的知县属七品，戴镀金顶子，但却比省级财政主管人的文案处在更为赚钱和有影响的职位上。文案属六品，戴白顶子。（见密迪乐著《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杂录》，第75～77页）

⑰ 英国布道会的柯宝德在密妥士和赫德第一次拜访时（10月20日）显然仍在上海。

⑱ 马丁夫妇，塞缪尔·纽厄尔和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威廉·亚历山大·帕森斯，连同他们的妻子（都是20多岁），都是1850年以来一直在宁波的美国长老会教士。塞缪尔·马丁夫妇住在英国领事馆附近他们所负责的男童寄宿学校。赫德还未认识威廉，他和妻子在老城中心居住和工作。

⑲ 赫德提到的第一批书是五经中的两种：书经和诗经。其次4种称为四书：孟子·大学·论语和中庸。

⑳ 赫德在中国期间继续订阅这些刊物中的大多数。在他给金登干的信中常常引用它们中的文章。

㉑ 约翰·倪维思在其《中国和中国人》中说“英国各种教会传教士的薪水一般每年都在800～1,200美元之间。这个数目并非

是规定好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服务的等价物，而只是供给他们使用，而他们则将他们的劳动和他们自身，贡献给他们所承担的工作。这些传教士和他们妻子的薪水比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年轻未婚职员来到中国第一年的收入要低得多。”赫德的薪水（见1854年11月25日日记）一年为860元，另加上做邮政工作的140元。（见倪维斯，第336页。他是1869年写的）。

㉒ 戴维·罗斯被S.F.魏尔将（第169页～170页）列为赫德在女王大学时同时代的人，他继续从事卓越的事业，其中包括贝尔法斯特的首席法官，安特里姆县法院法官和国民教育专员。

《幸运的联合》是一个中国故事，常用作教材，在1829年由德庇时译成英文。

㉓ 格兰特先生和华莱士先生似乎是卫理公会教士。赫德初到宁波的日子里曾给后者写过几封长信。

㉔ 卫士（1812～1884）是马萨诸塞州美国教会的印刷商，是1858年条约谈判期间公使馆秘书和高级翻译，协助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1832～1870）。在1848年出版《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况》。

㉕ 萨拉·简是赫德的二妹（在玛丽之后），这时是13岁。

㉖ 罗尔梯牧师是美国浸礼会教士，住在城那边的河上游，有一定距离。根据一个传教士同行所说，罗尔梯先生“虽然是一个好的学者，好的讲道者，好的领事，但却像亨利八世一样，以他妻子的数目出名。”自1847年以来他即在宁波。（见海伦·倪维著《约翰·莱温斯顿·倪维思生平》，第27页；丁韪良著《花甲记忆》第214页；季理斐著：《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1907》第381页。）

弗雷德里克·F·高夫牧师，英国人，英国安立甘会传教士，1850年首次来到宁波，最近刚度假回来（1854年一览）。

㉗ 詹姆士·麦科希，苏格兰哲学家，自1852年以来为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是影响赫德最深的教师之一，以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托马斯·宾内牧师有关宗教的作品卷帙浩繁——布道词、葬礼演说、讲演辞，如《诚心的牧师新教教义》（伦敦1848年）。

㉘《阿尔巴尼的单身汉》是马密昂·萨维奇（1803～1872）于1848年匿名出版的小说。

㉙"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在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赫德和丁韪良在以后的年代里关系很好，后者在赫德的领导和支持下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

㉚ 奚礼尔，任职香港殖民地巡理府多年。他的3个儿子在中国也长期担任显要职务：禧在明在领事馆任职；义理逊任职海关；熙礼尔任职汇丰银行。奚礼尔访问宁波两年后被任命为驻逻罗领事，同年死于任上。

㉛ 赫德举出了游览指南应该收入的游览处所：塔，建于8世纪的古老残破建筑物；桥，由200码长、6码宽的木板建成，系搁在用铁链锁紧的船上；商店，据说商店都以门面大和整洁著称，糖果糕点店尤为有名。的确，其中最大的在欧洲人中被称为"福特朗·梅森行。"

㉜ 包令和麦莲于10月15日到达天津下游的白河口。他们在那里等了几天后才和两位级别不高的官员相见——这是对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有意怠慢。由于看来没有机会进行有效谈判，这些特使在白河封冻南返。白河总是在11月封冻。

虽然到1854年时轮船已在南安普顿和香港之间航行，航期平均55天（有一段跨过苏伊士的陆上部分），但香港与上海之

间的沿海航运是不定期的，而从小港口如宁波到上海或广州更是不确定。例如，在1847年，宁波领事曾要求政府的公文由宝顺洋行的鸦片船送交给他——这是最快、最正规的运输。从宁波到上海的地区公文则偶尔由信使携带。一年后，即在1855年作出的安排是，给宁波领事馆的邮件送往怡和洋行在吴淞的接收站，由怡和洋行的小帆船送往宁波。另一方面，帕特里奇船长的“厄林”号则将邮件由宁波送往吴淞。因此，由“响尾蛇”号把信直接送往香港是意想不到的难得的特殊机会。

埃德加舅舅是赫德母亲（安·埃德加）的弟弟理查德·埃德加，是波塔当的有名商人。

㉝ 有几个从宁波出发的有名旅游点：西南30英里处有天潼山，是著名佛教寺庙所在地。人们从宁波乘船沿运河航行，然后乘山轿就可到达。沿运河还可到宁波南面20英里处的东钱湖，湖的一部分也称梅湖。

㉞ 海盗活动随着内地反叛运动的发生而重新出现，以广东人居多，特别是臭名昭著的浦氏兄弟，一般称为阿爸（浦新玉）和阿郎泰（浦良泰）。1852年道台招募海盗进入朝廷水师，问题暂时得到解决。由此，港口实际上由阿爸和他的亲戚所接管。以福建为基地，在宁波名义上受葡萄牙领事马奎斯统辖的葡萄牙三桅帆船水手反对他们。前一年夏天发生了一起涉及一艘葡萄牙轻巡洋舰和阿爸船队的偶然事件。该舰是马奎斯请求由澳门派来的。在处理各派关系上段道台自始至终表现了相当高明的手腕，不见得他会采取赫德听到的那种策略。杭州是省城和大运河终点，地处杭州湾头上，在上海西南100英里处。

㉟ 马克·谭普来，因其极端幽默而著名，是狄更斯作品《马丁·卡兹尔维特》里龙客店中的仆人。他成为马丁美国旅行中的

忠实仆人。

㊱ 高德太太仅在最近才成为寡妇。春天倪维思夫妇乘“斯派克”号在高德先生陪同下由上海到达宁波。

㊲ 约翰·赫德森是在宁波的美国商人。

休·米勒（1802～1856）1841年出版了《旧的红砂石》或《旧田野中的新散步场所》，在1849年出版了《创造者的脚印》。

约翰·哈里斯（1802～1856），伦敦新学院院长，是1846年出版的《亚当前的土地：对神学的贡献》的作者。所有这些著作都是科学与宗教新冲突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㊳ 魏德曼是美国商人。赫德在1893年写信给金登干，报告魏德曼死讯时描述他为“我的老朋友魏德曼。”他一定终生住在宁波。因为在他的一个儿子于1880年进入海关时，赫德曾指示金登干“一月派他去北京，给他两周左右的假期，顺路去宁波与家人团聚。”（见费正清、凯塞琳·弗罗斯特·布鲁纳、伊丽莎白·麦克劳德、马西森著《总税务司在北京》，第一卷，346页。）

威廉·哈特是商人和船主，和儿子理查德一起在宁波经商，参看1855年1月9日所记。

㊴ 1855年，文极司脱领事（接替密妥士）写道：“没有什么迹象比阿爸在宁波占有的职位更能表示中国政府的全然无能。他的八九只武装大船停泊在慈溪支流上。他和他的人在城中占有一所大商行，靠近盐门。他们中有好几十人常在那里厮混。他在这里指导他的徒众活动，派船出去加强在外面的船，或接收他们夺来的掠夺物。”（见费正清，第344页，注h。）

安官是英国领事馆的一名仆役。未经注册悬挂英国旗是非法的。英国鸦片船长未经授权就捕捉船只并将其出售，也属非法，但领事馆曾经这样做过。

㊵ 赫德在以前两个场合曾会见英国皇家炮艇“希腊人”号的船长基恩：一次在上海时与包令爵士一同进餐，另一次是去拜会江苏巡抚。

㊶ 恭喜：“祝你快乐”，比较“祝圣诞愉快或新年快乐。”

㊷ “斯派克”号是一艘武装船。威廉·戴维森1848年购于上海，供出租护航，抵御海盗。当时它带的是1846年颁发的过时证件，开列的船员名单与实际在船上的人全然不同。1849年，船长曾以海盗行为罪在香港受审。目前它从事各种航行，如贸易、护航和运送旅客；倪维思夫妇春天从上海到宁波是乘“斯派克”号来的。

㊸ 宁波道台以宁波、绍兴和台州三府为辖区。

㊹ 理查德·华生（1781～1833）在1832年出版《圣经与神学词典：犹太人与邻近国家的历史、风俗习惯》，是一本再版多次的书。

㊺ 略。

㊻ 在领事馆关于宁波的记录中，有关这次事件有各种参加者后来的证词，葡萄牙人的名字是“贝姆文多”。

㊼ 这是托马斯·胡德迈牧师，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自1845年以来即在宁波。宴会时他领奥尔德希小姐入坐是适当的，因为他们二人在年龄和传教事业上都是在场教士中最年长的。

㊽ 麦都思是伦敦会的先驱者，原是中国海岸的早期旅行者(1835)。他的两卷本《汉英字典》于1842年首次在巴达维亚出版。

艾约瑟是伦敦教会的一个先驱者、语言学者，对中国文学有广博知识，而且是本学科许多著作的作者。19世纪80年代他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任海关的翻译。

㊾ T.A.H. 杜因斯在1854年《上海年鉴》中被列为在吴淞的三桅船“科学”号的大副。可能在赫德记日记时，他是自己的

船的船长。

㊿“拉格德”是崎岖群岛。郭施拉是宁波以北杭州湾内的一个岛，是以早期传教士、后为香港汉文正使的郭施拉的名字命名的。19世纪30年代他到中国沿海做过几次旅行，分发基督教材料，在战争时期充任舟山的民政长官。

51《圣谕广训》是康熙的圣谕，出版时带有雍正的注释。它是中国钦定的儒家行为准则的官方文件。

乔治·罗伯特·格莱格（1796～1888）于1844年出版两卷本的《轻龙骑兵》。他是因下列作品而出名的：《切尔西亚的养老金领取者》和《陆军中尉》（参看5月24日所记）。

52 威廉·欧威克（老威廉、欧威克）是《中国在基督教青年会作的两次讲演》（1854年都柏林出版）的作者。

53 略。

54 恩卡纳考是一个葡萄牙人。“向中国船只敲诈勒索的主要头子之一”（宁波英国领事馆，见费正清，第343页）。

55 马丁先生（老马丁）：塞缪尔·马丁。

56“开始卸货”，打开到岸船只的货物。

57 先驱者传教士米怜（1785～1822）于1813年到达中国，与马儒翰一起工作。他是《康熙皇帝十六条箴言圣谕》的译者。该书于1817年在伦敦出版。

58 英国领事在领事馆法庭任法官，通常由两个当地的英国人协助，充任陪审推事。伊卡巴德·史密斯·斯潘赛，是美国人，是《一个牧师的笔记：或与焦虑的询问者关于拯救之路的谈话》的作者。该书已经出过9版。

59 宝顺洋行的颠地是怡和洋行的激烈竞争者，大肆贩卖鸦片，与加尔各答、孟买和伦敦都有联系，有一支在中国海岸航行的船队，在通商口岸外有接收站。

60 起义者占领的上海城在1855年2月被攻破。

⑥① 略。

⑥② 《上海年鉴和杂录》是“上海《北华捷报》，报社印行”的年度出版物。它包括该年的详尽的日志（包括“起义运动的日期”）、潮汐表、外国居民名录、商行名录等等。在“杂录”部分有各种题目的散文——中国的社会，包令博士翻译的诗，玛高温大夫的中国平原的沙雨，密迪乐的单词“夷”的词义等等以及北京公报的公告和摘录。

⑥③ 娄理华，1842年到达中国的美国人，是宁波长老会传教团的早期成员，于1844年由澳门来宁波参加麦嘉缔大夫和韦理哲的工作。1847年正从上海回宁波，在穿过杭州湾时遇难。在上海时他与其他几个人受聘翻译圣经。他的回忆录是他的父亲编辑的。

⑥④ 马若瑟神父，法国耶稣会教士，18世纪前期在中国，并写有关于在中国的经历的文章。这一本大概是用汉语写的读本。

⑥⑤ 约翰·杰姆斯·布朗特（1794～1855），是《新旧约全书中的偶然巧合，它们真实性的论争》的作者。该书美国版出版于1847年。

⑥⑥ 参看1854年12月31日所记。

⑥⑦ “孔子”号是一艘法国武装轮船，以后由上海道台购买用来对付太平军。

克陛存是1844年与麦嘉缔、娄理华和韦理哲同时到达宁波的美国长老会教士。1851年被调往上海，与裨治文共同翻译《旧约全书》。

⑥⑧ 城隍庙，大概是城市保护神的庙宇。

一良是一个仆人。“密太太”是密妥士非正式婚娶的中国妻子。小狗诺拉似乎是以赫德妹妹玛丽女儿的名字命名的。

⑥⑨ 秀才，头一级学位，包括几等。

⑦⓪ 船主、船长和船老大的区别在于：船主留在国内港口；船长

驾船航行；船老大负责船和货物。戴维森是船主。

⑪ 上海 1853 年 9 月为小刀会起义者占领。此后即或多或少被清军围困。虽然外国租界在英、美、法使节命令之下保持中立，中国县城则在起义者手中。最后，在清军反复攻击下，起义者于中国春节那天（1855 年 2 月 17 日）撤出城外。大部分起义者突破清军防线，一些投降后被斩首，少数经外国租界逃出，由海路南下。清军进城后掳掠横行，如赫德所写：上海“尸横遍地，血流成河”。（见马士，第 1 卷，第十七章）

关于包令和保证书问题，参看第二章注 6。

克里米亚战争英克曼战役是 1854 年 11 月 5 日进行的。

1851 年维多利亚发现金矿，此后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冒险家大量涌入该地。金矿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在 1854 年 11 月 12 日间达到高潮并成为公开反抗，即由德国和爱尔兰革命者领导的尤里卡监牢起义，但很快即为政府军镇压。

⑫ 弗兰克·巴黎施，是美国领事馆的助理，他的第一个住所是 1844 年在厦门。

“外国人”在这里指的是西方人。

⑬ 略。

⑭ 马老爷（密妥士）。

赫老爷（赫德）。

⑮ 夏洛蒂，赫德的妹妹，比他小 7 岁。以后得知，她与赫德在 1866 年的几周内各自在爱尔兰结婚。

希尔斯波罗的穆尔海德家，是赫德幼年时的家。赫德在这家人中长期享受友好关系。赫德在其日记中提到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这里所说的是罗贝和与其通信的亨利。

⑯ 文极司脱，自 1853 年起即在领事馆工作，当时是厦门副领事，他和妻子于 4 月 1 日乘“斯提克斯”号到达宁波。

⑰ 也许舟山“贯盗”是一名官员。

家伙：家什物件。

⑱ 斯坦危斯·艾格南·朱利恩（1797～1873）是法国汉学家。19世纪60年代他也写了有关中国的小说。

⑲ 皇家海军“斯提克斯”号是参加1854年秋天在九龙成功地举行的对海盗远征的船只之一。

丹尼尔·布鲁克·罗伯逊，自1843年以来服务于领事界。从1844年6月到1852年任上海副领事，1852年以后任厦门领事，1855年回上海继阿礼国任领事，阿礼国调广州。

星察理，自1845年以来在领事界任职。

宁波的特产之一是它的与众不同的家具，在类似栗木的浅色基础上镶嵌各种木材，而且打磨得非常光洁。相框雕刻雅致，也是很受欢迎的。赫德受托为凯恩代买了一些。

⑳ 虽然密妥士的辞职被克拉伦敦勋爵所接受，作为平息澳门政府不满的最好办法（澳门政府为密妥士对葡萄牙人贝姆文多的处理所激怒），但他一直是被“暂时”雇佣在宁波，直到1857年，他的哥哥密迪乐负责宁波工作为止。我们在以后会看到，1858年他被任命为广州翻译，该职位赫德原以为是他的。但此后不久，他即意在从商，成为天津商界的领导人物。赫德成为总税务司后曾在天津的一些场合中见到密妥士。（参见1865年11月21日所记）。密妥士死于1875年。

㉑ 奉化，宁波府属下的一个县，后来是蒋介石的故乡。

㉒ 白色舰旗：白旗上有圣乔治、圣安得鲁、圣戴维和圣帕特里克等十字，为英国海军舰只，而不是商船所悬挂。

㉓ 密太太：密妥士太太。

《名利场》（1847～1848），是撒克里规模宏大的第一部小说。当时大多数读者对这本书的评论与赫德的看法相似。

查尔斯·詹姆斯·利弗，是爱尔兰人，在一系列的作品中描写战斗、冒险和欢乐的高昂情绪。如《查尔斯·奥马莱》（1840）

和《我们的汤姆·伯克》(1844)。

⑧④ 略。

⑧⑤ 有两个李斯船长，是两兄弟，其中一个为怡和洋行工作，另一个托马斯为宝顺洋行工作。

“赛克”号是一艘百吨的纵帆船，原为运送奴隶船。1834 年从西班牙人手中俘获，并由宝顺洋行购买从事鸦片贸易。船头是方的，有一只鸟作为船头装饰品。

⑧⑥ 玉山位于从福建北部经广信江上的河口往东到上海的运茶路上。植物学家先驱兼茶叶专家福钧曾去过几次。赫德在到宁波的第一天即见过他。

提台，一般称提督，为省级司令官，是全国 14 个提督之一。这个是浙江省的，驻扎在宁波。赫德写作 Le - tai，而他所描述的军官实际是提台。

陆港（Loo kang），在宁波东面 12 或 15 英里处，是一个鸦片接收站。

⑧⑦《陆军中尉》，参看注⑤①。周切男爵罗伯特·寇松 1849 年在伦敦出版《地中海东部诸国的修道院》。

⑧⑧ 副领事：文极司脱先生。

⑧⑨ 巴夏礼 14 岁时进入中国的官场生活，1842 年开始学汉语，在赫德日记的下一部分，巴夏礼在广州事件中扮演突出的角色。他 1842 年随璞鼎查溯长江到南京，以后在广州任翻译，一段时间后，于 1854 年被任为厦门领事，但一年后被派往曼谷任约翰·包令爵士使团的秘书。欧洲与逻罗的第一份条约即于该处签订。巴夏礼带这份条约“回国”，并于 1856 年以代理广州领事身份回到中国。赫德在 1858 年将成为他属下的一个工作人员。

⑨⓪《汤姆·克林格尔的航海日志》是 1833 年在爱丁堡匿名出版的两卷本小说。《米奇的巡航》也是两卷本，3 年后出版。迈克

尔·斯各特是两书的作者。

⑨⑪《伊斯法罕哈吉·巴巴的冒险事迹》和《伊斯法罕哈吉·巴巴在英国》是詹姆斯·摩里尔的匿名小说，由伦敦约翰·默里公司于1835年和1828年分别出版。

⑨⑫《红楼梦》，曹雪芹著，是18世纪中国的著名小说。

⑨⑬赫德此处描写的婚礼是婚礼六礼的最后一项——亲迎，即“欢迎新娘”。前5个阶段是：纳彩、闻名、纳吉、纳征、请期。每一阶段都涉及精心的准备工作，而且多数还有宴请、交换礼物和拜祖先。最后阶段标志男子的“弱冠”和女子的“及笄”。在出嫁那天，新娘向父母和祖宗跪拜，接受关于妻子义务的简短讲话，然后坐红花轿一路喧闹、炫耀地被抬往丈夫家中。在夫家开始赫德所描写的仪式。

自然，中国传统的婚礼仪式和用语各地略有不同，可参看各种手册的不同叙述。例如，卢志陈（Lu Tzu－Chen）：《家礼大成》(台南重印，1975年）第106～171页；陈民胜（Chen ming－sheng)：《家札帖式集成》(1842年，序）第一卷第276～366页，及吴容光（Wu Jung－Kuang)：《吴雪录（1832年，序)》，第13卷，第1a～10b页。堪与赫德叙述媲美的另一段用西方语言叙述中国婚礼的文字可在卢公明的《华人的社会生活》(1865年纽约版）第65页中读到。

根据朱熹的《家礼》，男子结婚年龄为16到30岁；女子为14到20岁。订婚早于迎娶若干年是很平常的，尽管有赫德的老师凌先生的情况。看来其耽误的原因并不是像一般情况那样，是由于女方年幼时就订婚的缘故。在任何情况下，婚姻都是全家的事情，由家庭为了家庭利益来做安排，而不是出于个人选择和罗曼蒂克式吸引。

赫德叙述的典礼中使用红色作为幸福和好运的象征，这种做法是很普遍的。蜡烛和灯笼与其他装饰品一样，也是红的。

鞭炮用来避邪和作为欢乐的标志。“长寿面”、水果和其他食品表明婚姻的和谐、幸福和兴旺。香的使用揭示了其本质上是世俗仪式的精神。由订婚（纳征）仪式神圣化了的婚书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赫德提到的硬纸板包含有“天地”二字，表示这桩婚姻有着宇宙论的含义。总之，与出嫁有联系的婚礼仪式的安排是用来表明这桩婚姻是天作之合，表明它牵涉到新娘在丈夫家中仪礼上的再生，而且表明它是最神圣和最吉祥的事件。

赫德使用的专门术语大部分都在正文中说明了，而且大部分在仪式手册中都有对等词。赫德提到许许多多不同的鞠躬和其他形式的敬礼。所有这些都在仪式手册中仔细地描述过（例如陈民胜 1～20a；梁洁：《家礼全集》（1895 年，序），第 1 卷，第 4a 页。也可参看吉尔伯特·沃尔什：《黑暗的路》（上海 1906 年）第 24，46～48，54，109～110 页。

赫德未说明的一些术语包括：

好女，即妻子。

送娘子：女傧相。

天地君亲师：（也许这是五字牌位，但赫德的拉丁化拼音离“天地君亲师”颇远）。

三上香：把香举 3 次。

四拜四兴：拱手鞠躬 4 次。

平身：从跪着的姿势站起来。

第五章 赫德与时代俱进

① 见费正清、布鲁纳和马西森，第 2 卷。

② 赫德 1906 年 12 月 20 日致马士函。

③ 见费正清，布鲁纳和马西森，第 1 卷，第 193 页，注。

④ 见朱丽叶·布雷登著：《罗伯特·赫德爵士：一个伟大生涯的传

奇》，第 39 页。

⑤ 见马士，第 1407 页，注㊱。

⑥ 见费正清，第 344，页注⑨。

⑦ 见布雷登，第 40～41 页。

⑧ 见库克著《中国“泰晤士报”来自中国的特别信札，1857～1858 年》，第 132～133 页，以下简称库克。

⑨ 见马士，第 1 卷第 346～347 页。

⑩ 见费正清，第 361 页。

⑪ 同上，第 416～417 页。

⑫ 同上，第 420，450，456 及随处。

⑬ 关于这一时期的广州，见弗雷德里克·韦克曼著《大门口的陌生人：华南的社会动乱，1839～1861》及 J.Y. 翁著《两广总督叶名琛，1852～1858 年。》

⑭ 见 J.Y. 翁著《巴麦礼在中国的亚罗号战争》。

⑮ 见马士，第 1 卷，第 564 页。

第六章　日记：广州

① 福莱斯特炮舰，有炮两门，1857 年由英尼斯（海军）上尉指挥。(见柯克著《中国》259 页，“在中国驻地的战舰”)。

② 关于詹姆斯·孟甘，见第二章注④。1858 年他任驻广州汉文副使，后来与水师的提督贺布一起奉派北上。

《中国之友》是一种周刊，1842 年 3 月由马儒翰于香港创刊，并自任首任编辑。一星期后，该刊与《香港报》合并，联名发行到第 12 卷。威廉·塔兰特是它的第五任编辑（和所有人)。从第 14 卷起在广州开始发行一套新的《中国之友》。最后于 1869 年在上海停刊。塔兰特于 1872 年逝世。

③ “Bogue”是英国人对珠江主要出口的称呼。其中文名称（虎门：老虎门）源于江口中有一个虎岛这一事实，因此葡萄牙

人称它为“Boca Tigris”（老虎的嘴），英国人则把它简化为“Bogue”。

虎门要塞由于曾多次阻止外国人进入广州，也多次为外国人武装占领而闻名。

④“护民”号是一艘有31门炮的兵舰，当时由埃杰尔海军上校指挥。“阿克大勇”号是装有26尊炮的军用测量船，曾由海军中校巴特指挥。参看下条注文。

“驳船”，我们现在应该说是有照货船，用于在本地诸港口间运输货物——例如在黄埔和广州间。“照”的意义是一种证件——店家的发票，许可证，盖有印鉴的收据。在洋泾浜英语中，“first chop”就是上等品；“grand chop”就是让某条船出港的许可证。

⑤文极司脱于1855年4月1日（见第四章）到达宁波，任副领事，1856年以后任驻广州副领事。3年后他将受任为驻上海领事；赫德在那里又见到了他。

C·T·冯·斯特劳本齐将军和他的幕僚们于1857年12月28日上午占领林的要塞后，由威廉·T·巴特上尉陪同视察了广州城防。尽管他们是炮火射击的对象，巴特上尉还是继续对壕沟进行必要的检查。就在他和皇家工兵的曼上尉执行“此项危险任务的时候”，巴特中弹死了。

⑥“比特恩”号是艘装有12尊炮的军用船，G.W.柯克把它列为（见前注①）由海军上尉古迪纳夫指挥，埃杰称为“护民”号的指挥官。

⑦关于巴夏礼，见1855年6月1日的记事。礼贤会的罗存德医生用中文写了若干篇医学论文。

那一年有雅芝刚进入领事部门，初次任职。

⑧因为各方都仍然认为广州还很危险，不能供西方官员们的夫人居住，因此巴夏礼夫人暂时住在香港。

关于乔治，凯思，见第二章，注21。

⑨ Fuh－Kee：广东话“伙计”指中国本国人，相对于外国人而言，意思是“合作者”甚至是“朋友”——见赫翟理思著：《参照词汇表》（宇宙出版社再版，新德里1978版）第99～100页。

番鬼：外国鬼，“洋鬼子”的广东说法。

⑩ 外佬：赫德对“鬼佬”的写法，广东话，意义与番鬼相似，也就是说“外国鬼子”。“讨不是”是赫德爱犬的名字。

⑪ 1857年年末广州被占领后，成立了一个“英法委员会”以“协助总督维持秩序”并“审理涉及洋人的各种案件。”该委员会由汤姆斯·哈罗威上校、F·马蒂诺·德·查维斯上尉和巴夏礼先生组成，于1858年1月10日执行任务。

⑫ 巴达兰比是一个驻广东的鞑靼副都统。他的上级是鞑靼将军穆克德纳。

⑬ 爵士C·T·冯·斯特劳本齐将军，香港卫戍司令，1857年12月29日占领广州之役中曾负责陆上作战。

达巴维是法兰西帝国海军的最高司令官。莫奇侯爵曾随噶罗特使团来华，鞑靼将军被法军俘虏时他曾著文为其写照。“他是个大汉，身高几近6英尺，年约60岁；肥胖得出奇，几乎无法站直……他之所以身居高官，似乎主要是由于他拥有这么一副魁伟的身材，而不是其他什么德行。他是个最无关重要的人物。他这个人对政治上的任何举措都是可有可无的。他刚于那年二月份来到广州……”（见莫奇著《1857～1858年噶罗男爵特使团出使中国和日本忆语》第129页。）

⑭ 观音山：广州的慈悲女神山，见地图上10号。

⑮ 皇家工兵的亚瑟·阿奇特·费希尔上尉（战事结束时提升为中校），后来就他在中国的经历写了一本书：《在中国服役3年的小人记事》，1857年。1863年8月14日，赫德在日记中记

下，他读了这本书后，感到仅是一本“平平之作”而已。

⑯“广州的迪克森医生”曾是泰晤士报记者乔治·W·库克和艾约瑟医生的同伴（见第四章，注㊽）。1857年8月，他们3人从上海往内地作了一次旅行。这是为了使库克能够就“叛乱的进展”写出第一手快讯。（见库克，102～109页）

白云山位于广州城之北。

⑰ 符学宫位于广州试院之西，城隍庙之南。

⑱ 柏贵，挂名的广东总督，叶名琛被俘后，便自动地变成了广东政府的首脑。1858年1月9日，英、法两国代表和英法联军司令，以及柏贵本人发布的全街告示中通知老百姓，广州仍在英法联军控制之下，但是政府委托柏贵代管。莫奇（见前注⑬）对柏贵也有个写照：

“蒙古正黄旗人，自幼在北京；行动举止和谈吐都习惯于宫廷中的礼仪规范。他为人精明强干，外貌坚强果断。两位外国海军提督一见而知，他在任何方面都比那位武职官员高超得多……他们决心在广州要利用此人。”（见莫奇著《关于赴中国与日本的噶罗特别使团的回忆：1857～1858年》第130页）

⑲ 3位钦差是皇上委派来招募乡勇，组成民团，借以从联军手中收复广州。

黄宗汉是在叶名琛被英法联军俘虏后，皇上派来继叶任两广总督和处理各国事务的钦差大臣。Keang（江?）Chow（周?）是二位负责领导收复广州运动的钦差大臣。南海和番禺是广州府所属的两个县。

⑳ 花县是广州以北30英里的一个县城，“由于是组织乡勇的委员会总部所在”（额尔金爵士的话），同时又是为巴夏礼先生的脑袋而悬赏30,000元这一通告的发源地而臭名远扬。这也就是由官方赞助，由士绅领导的收复广州运动。

㉑ 公馆：办公府邸。

㉒ 皮姆是库克在1858年11月向《泰晤士报》发出的一则通讯中所称的指挥“戏谑者”号炮艇的（海军）上尉。但是在1858年1月28日，柯克又报道组成一支由皮姆上尉率领的新警察部队。“他手下有100个用剑和手枪武装的士兵，而法国则另有一个38人的部队。另有同样多的鞑靼人和欧洲人警察部队结合在一起。在城内和城郊各方便地点建立了5个英国警察所和两个法国警察所。看来，各店铺商在英法管辖之下可以获得以前不敢想像的安全。”（见库克，第356页）

㉓ 蔡：署理按察使的姓。

海关监督恒就是恒祺，是个满洲人，后来在北京发迹。

先后有5个商人继承浩官这一称呼。浩官四世在1834～1843年间的公行中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中国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他的儿子浩官五世继承了他的公司牌号，在1858年联合了其他一些中国商人，向额尔金爵士（通过他的翻译威妥玛）提出了建立警察组织，共管广州的办法。

㉔ 肖阿巧：一个被判了罪的犯人。

㉕ 略。

㉖ 高恩：不知是谁。

㉗ 在西马糜各厘爵士1857年12月26日发布的作战通令中，莱蒙中校所率领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被安排在天明时在库十八的小港湾内第五个登陆。（见库克，第312页）

沃尔什上校也是带领海军陆战队，在占领广州之役中负责到总督衙门去逮捕柏贵的。

刘先生：刘某。库克在报道工作中由于受到语言上的障碍而感到难以进展，于是他就用了多页的篇幅抱怨身边没有胜任的翻译。说来可供一笑。据他所知（不全面），“我们在中国仅有3个英语译员可供在整个中国使用。威妥玛先生和巴夏礼先生二位是已经再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们做更多的工作了。

说得更确切些，他们已经竭尽全力地争取满足公共事务的需要，但还是无济于事。阿查立先生是个对中文有一定修养的年轻人，正在为叶效劳。我们有一个姓王的中国人和一个葡萄牙人洛札里奥。这是我们能够借以和中国人交往的仅有的两张嘴。我估计其他几个学中国话的学者都忙于领事馆工作或是教会工作。我们那些带薪学习汉语的‘随习人员’都到哪里去了?”当然赫德是其中之一，但是库克还没有遇见他。(见库克，第358页)

㉘ 潮州：广东的一个州。

㉙ 佛山，是位于西江三角洲上，离广州上游12英里的一个工业城市。这是许多拥有工业和大量人口，却没有政治地位的地区之一。这种局面往往导致混乱。佛山曾是经常发生涉外事件的地方。1857年曾与来自香港的英国军队发生过水上战争，以英方胜利而告终。

㉚ 罗同源（LO Tung-Yen）、苏丁魁（Su Ting Kuei）和龙端席（Lung Tuan Hsi）是广东省的3个高等绅士，大清皇帝曾秘密批准他们把外国人逐出广东。他们在广州以北25英里的花县境内建立了顺德中央民团局（广东团练中枢），打算建立其他地区绅商正在建立的那种地方性民团。1855年2月8日，皇上亲谕，准许他们把民团活动的矛头指向英国人（见韦克曼著《大门口的陌生人：华南的社会动乱，1839～1861年》，第164～167页）。

Keang-kun可能是Cheing-tsun（江村），是位于番禺西北角，花县和南海县交界处的一个县城，从前曾是另一个民团组织者李方（Li Fang）的总部所在。

㉛ 赫德把字写错了。

外边街：外侧的街道。

㉜ 阿志是赫德的“仆役”或是管家。这时阿姚已怀孕两个月，

在1850年或且1850年初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宁柳

㊺ 潘定官。潘氏家庭以行商著称。潘侯官曾是1760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国对西方贸易的商人组织公行的成员。他的后代作为行商，有时还担任公行的首领，建造了几家有名的花园。

㊻ 赫德一定是为了防范自己受到攻击而要求拥有护卫队作为预防措施的。

㊼ 库克把科尔维尔（海军）上校列为在福州管带16尊炮的海岸炮舰“卡米尔”号的负责人。（见库克，259页）

㊽ 略。

㊾ 据库克说，广州陷落后，英国牧师休利阿特先生创设一家中国医院和粥厂。这些都是由“军队微薄的薪饷中拨款”资助的。在其后的某一页上又写道，他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向“1,500个中国人施舍3个月。”（见库克第361～378页）

㊿ 洪宁里：一条小路。
洪益街：一条路。

51 东山寺在广州东面。

52 潘［Pwan（Pan）］一定是雄视一方的潘氏家族的一个成员，是总合民团联盟的组织者。这种联盟和较低级士绅组成的那种相似。

53 五仙门：5个长生不老者的门。

54 略。

55 太和街：一条街道。

56 正南门：估计为城北的主要城门。

57 1854年，阿礼国被提升到广州任职，但是外交部暂时还把他留在上海（见第二章注㉒），当时他已经连续10年在远东任职，迄未离开，而且他还得了严重的痢疾，时发时愈。因此，当最终于1855年5月在广州就职时，他请准了两年的假，从1855年9月份开始休假。不过，实际上他是在1856年4月离开中国的。他的领事职务由巴夏礼接替。此时他刚回来。到

12月份，他将收到被任命为驻日本总领事的通知。到1865年，他还将回到中国来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

⑱ 是旌老徐广缙和叶名琛坚决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牌坊。

⑲ 星察理休假后回来改任驻福州署理领事。

⑳ 库克在1858年1月份的一份官员更动表内提到了长林顿，说他“以前一直任宪兵司令”，现在调到副官长手下接替佩洛上校，任将军的副官，佩洛则回到驻印度的那个营去了。

㉑ 一位行政官（在南海县境），名叫华亭之（Hua Ting-chieh）曾在1854年领导东莞县抵抗红巾起义。(见韦克曼第144页)

㉒ 库克在1858年2月提到“羚羊”号（一艘吃水浅的汽船，不是战舰)。说它是由美国公使列卫廉租来坐着从他那艨艟巨舰“明尼苏达”号无法到达的地方起，溯江而上，直到广州。库克觉得他把如此不合用的船只带到中国来，实在傻得可笑。

㉓ 略。

㉔ 闹得很：混乱得很。

㉕ 坦普尔（海军）上校是库克提到的，在占领广州之役中负责指挥维持登陆地秩序的部队的诸军官之一。库克称他为“苦力之王”这是赞扬他运用苦力的方式。（见库克，第325、326页)

小南门：略

㉖ 略。

㉗ 十三浦：“第十三个进口”。

㉘ 榕树头：广州城东北的一个地方。

㉙ 略。

㉚ 弹药库山是联军登上广州城墙后在城内首先占领的地方。庆祝1858年的新年时，联军代表摆出仪仗队，直列到弹药库山下，举行了占领广州城的仪式。

㉛ 略。

⑫ 略。

⑬ 略。

⑭ 地狱的魔王。

⑮ 天津条约于6月26日签订以后，清皇帝意识到部份赔款必须取诸粤海关，便传言给黄（宗汉），让他不要侵染这宗收入，并要公开声明与广东民团局断绝关系。到7月21日，等待已久的袭击广州事件终于爆发了。当时皇帝的旨意尚未传给罗东渊（LoTun-yen）。有七千名乡勇攀登了广州城墙，只是让英国人设在观音山上的大炮给顶回去了。攻击队伍退下来了，伤亡很重。这次进攻的失败和皇上拒不改变主意使效忠运动受到严重挫折。（见韦克曼，第171～172页）

⑯ 卜鲁斯（后来被封为爵士，并任英国第一任驻北京公使）是额尔金勋爵之弟，曾参加联军北征及天津条约的谈判。该条约于6月26日签订后，卜鲁斯把文本送到英国，议定1年内在北京交换批准书。

⑰ 南海监狱：南海县的监狱。

⑱ 醒世短文：可能就是“醒世宝言”。（见《汉语宝库》19）

⑲ 赫德显然是为了安全的缘故而把阿姚送到澳门去的。阿志是7月26日去的，到8月1日还没回来。

⑳ 都司：军队中的“上尉”，其官衔低于“少校”。
福利街：估计是通向海珠炮台的大街。

㉑ 货郎船是穿梭于停泊在海港内外的大船之间的做小买卖的小船。

㉒ 略。

㉓ 黄：黄宗汉，钦差。

㉔ 略。

㉕ 略。

㉖ 李先生。括号和问号都是赫德本人加的。

⑧⑦ 拜印："尊敬印信"——就职时的典礼。

⑧⑧ 钦差官办团练总局：钦差管理民团的总部。

⑧⑨ 临安，现代的杭州，宋朝时（960～1280）中国的首都。[应为南京（1127～1279年）——译注。] 1860年为太平军占领。1863年3月由左宗棠的部队收复。西马糜各厘为亚罗号事件在致英国外交部函中称："英国海军军舰南京号尊敬的基思·斯图尔特舰长"。(见库克，第291页)

⑨⓪ 额尔金爵士留在天津守候中国方面承认收到条约文本的通知，以及批准其条文。7月4日，条约批准了。于是他便前往上海，并于7月31日转赴日本谈判一宗条约。他回中国后于11月8日签署了条约协议；然后溯扬子江西上，以便选定3个口岸，供开埠通商。他到年初方南下，并于1859年3月4日离香港回英国——顺道到加尔角和他的老弟弗雷德里克·布鲁斯（卜鲁斯）会面，后者正带着已批准的条约到北京去当新任英国公使。(见马士，第1卷，第528页～438页)

⑨① 可能是"艺文堂"印书局：此3字意为"文学之堂。"

⑨② 略。

⑨③ 翻一个筋斗：意即"整个翻一个个儿"——头朝下，脚朝上。

⑨④ 略。

⑨⑤ 飞来寺：庙宇。

⑨⑥ 库克于1858年2月离开广州前对冯·斯特劳本齐将军由于办事独裁而日益不得人心曾有所评注。当前的总爆发看来是与同一个外国打交道的两个政府部门之间——军事和外交部门之间常年存在磨擦所常见的结局。参看后面赫德9月2日的记事。

⑨⑦ 略。

⑨⑧ 怡良曾长期为官，历任要职。1857年以健康为由辞职。他的最后官职为两江总督，在任时曾促成上海海关外籍税务监督

制度的建立，最后导致海关部门的建立。

1861 年设立总理衙门时，桂良成为其原始成员之一。但是他在 1862 年去世。其时，赫德与各位总理大臣经久不衰的关系还未开始。

直陈奏告：宫中一个直言极谏的官员提出的建议书。

⑨⑨ 略。

⑩⓪ 来自临安或临安人（临安即现代的杭州）。

⑩① 大江桥：江上大桥。

⑩② 这里赫德用“怀疑”一字表示“恐惧”或“害怕”的意思，这种用法已经过时。

⑩③ 大堂：大厅。

⑩④ 赫德所谓“knock head”，意思就是磕头，叩头，这是表示礼节的动作，就是在皇上或其象征面前跪下然后俯伏在地，并把这两种动作反复多次。

⑩⑤ 略。

⑩⑥ “奇袭”号是 4 尊炮的快艇，占领广州之役中由 S.G. 格雷斯威尔指挥。（见库克，第 258 页）

⑩⑦ 略。

⑩⑧ 总局和总都都是乡勇、团练等的总部。

⑩⑨ 1858 年 4 月 25 日，广州关闭，只开放 3 个城门。冯·斯特劳本齐将军致华北的额尔金勋爵函中说，由于广州的洋人受到攻击，并且有成群的乡勇决心要夺回该城，他已经下令关闭所有的城门（有 3 个城门除外），禁止把财物运出该城，所有进城的人都要搜身，城门周围的房屋都要扒光，并清除掉……。（额尔金伯爵的特殊使团，第 302 页）

⑪⓪ 1857 年 11 月，库克把索马雷茨列为驻在上海的英国炮艇“鸬鹚”号的指挥官。（见库克第 259 页）5 月份，索马雷茨随联军远征队北上，溯白河到天津，途中参与了炮轰大沽炮台。

在这次远征中，威妥玛担任卜鲁斯的英语翻译（见莫奇，第209页）。

⑪ 花县：见前注⑳。

⑫ 云贵：云南和贵州两省。

⑬ 阿尔伯特·理查德·史密斯（1816～1860），英国著名幽默作家，是《笨拙》的早期投稿人，也是一些闹剧的作者兼演出者。他把狄更斯的各种故事改编为剧本。而且狄更斯早年的一些文集事实上也是他策划的。他于1851年登上白朗山后，写出了一部“趣闻记”名为“白朗山”；其中描写了上山的过程，也有英国人在海外的共通形象。其后又写了其他一些类似的趣味作品，其中包括《中国》（很可能就是在这次来华之行中，他认识了赫德）。

⑭ 林太守：林知州。

林福祥：见前注㉟。

⑮ 苏、龙、罗：见前注㉚。

⑯ 略。

⑰ 打、捆、挤等刑罚的专用名称。

⑱ 略。

⑲ 此人无疑就是那没有耳朵的郭某。

⑳ 菲利普·梅多斯·泰勒上尉著，《刺客自白》，共3卷，1839年本特刊出版。

㉑ 石街铺（Shih tae fia poo）：有许多地方都用第一铺、第二铺等编号名称。

㉒ 阿依（Ayi），似乎是阿姚的临时替身。参看下面星期五到星期日的记事。

㉓ 1787年，法国人和安南签署了一项条约，其中法国应安南国王（通过一个法国传教士）的请求，同意派遣一支远征队来支援国王。作为回报，法国应把沈襄港和昆仑岛割让给安南

（原文疑有误，应该是安南把土地割让给法国——译注）。但是这宗条约从未付诸实施。到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没有人注意这事了。后来法国企图在印度支那扩展其影响，从1843～1857年间先后5次派遣海军远征队到安南来要求对一些传教士被杀害事件进行赔偿。最后，在1858年，法国纠集了怀抱同样目的的西班牙同来问罪。西班牙从马尼拉派来一个海军舰队，前者则从在广州作战的部队中分派出一部分。战事从1858年9月份开始，一直延续了三年半时间。（见马士第2卷，第342页。）

⑫④ 略。

⑫⑤ Nantow：南投。

⑫⑥ Fung Koon可能就是东昆（参看9月27日的记事）；到底是什么地方还是个谜。

⑫⑦ 巴达兰比：见前注⑫。

⑫⑧ 副标：巡抚的部队。

⑫⑨ 7月惨败和清皇帝传旨不再进攻广州之后（见前注⑦⑤），抵抗运动乱了阵脚，同时资金开始枯竭。有关3位领袖人物活动情况的谣言闹得广州满城风雨，不过从此以后，也仅是谣言而已。（见韦克曼著《大门口的陌生人：华南的社会动乱，1839～1861年》，174页）

⑬⓪ 彗星或扫帚星：彗星。

⑬① 广州财政委员会：可能是士绅管理的行政局（总局）。

⑬② 藤黄：一种告示，或黄色纸张。

额尔金爵士于10月7日与中国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通信，提请他们注意“黄”和“苏罗和龙等3位高级官员”的“行径”，他们仍在招募志愿乡勇。“黄亲自用印，悬赏3万元，征求巴夏礼的脑袋。甚至时至8月23日，他贴出的告示仍然支持3位钦差招募更多志愿兵的要求，并声称尽管条约已在

天津签订，但他并不知晓其中的各项条款，因此应“一如既往，以抵抗为宜，抗夷强如抗匪。”额尔金的结论是，“如果不把总督撤掉，不撤销授予士绅的各种特权，以示清廷有意于建立并永保两国之间和平关系之赤诚，则任何安排都不能接受。”（《有关额尔金伯爵1857～1859年在中国和日本的特殊使团的信札》英国蓝皮书1859，第16卷，第1册，第388～389页。）

⑬ 沃尔特·坎培尔少校的《护林老人》是1842年由伦敦的豪·帕森斯出版公司发行的，曾多次再版。该书的副标题：《内尔弗里山上、丛林中和原野上的印度野外运动》道出了它的吸引力。

⑭ 与各国（俄国、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条约于6月份在天津签订后，谈判的第二幕——确定贸易税则和法规——经安排在上海进行。联军方面，额尔金勋爵委托俄理范和威妥玛为代表（并且在专业委员会集会时打算要让“李泰国在场”），但是到10月1日为止，代表中国的专员还未到达上海。10月3日（为时过晚了，赫德得到的“迄至9月28日”的上海消息没有包括此事），代表团来到。10月12日举行了首次会议。

⑮ 梅太太：在宁波的密妥士夫人。

⑯《我的宝贝贝特西》，约翰·麦迪逊·莫当（1811～1849）写的独幕闹剧。

⑰ 广州樊阔（Hwang chow Fan Kueh）：大概指的是广州（不是Hwang chow）财政专员。

⑱ 略。

⑲《烧炭人》或《心感的艺术家》是马蒂尔达·伦奇从德文翻译过来的，1845年在伦敦出版。

⑳ 略。

⑭ 库克书的第二十九章，标题为“广州监狱”。其中鲜血淋淋地描写了他和一个官方小组一起度过的两天中的所见所闻。这两天中，他和官方小组一起核实了由于“与洋人进行贸易”而获罪的人经大赦后是否确实已经被释放。（他们在一个称作昆岗的监狱中找到 50 个犯人。）他说，库克本不愿把这种事情写出来，但是，如果情况比一般污秽杌陧、疫疠流行更糟，那么他觉得就有责任把它说出来。（见库克著《中国》，第 341～378 页）

⑭ 略。

⑭《显赫的陌生人》或《成亲与葬礼》是一出歌剧式的闹剧，共两幕，是詹姆斯·肯尼迪（1780～1849）的作品。

⑭ 巴夏礼选为联军专员之一时，阿礼国接替他担任了驻广州领事。但是这年年末又离任到日本去供职 7 年。1866 年他又从日本回到中国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

⑭ 天津条约的第七条规定，英国可以任命领事若干名，“这位或这些领事有权在中国的任何开放口岸或城市居住，只要英国女皇陛下认为有利于英国的商业即可。”

⑭ 根据马基·德·莫奇的著作（第 157 页），M·德·特伦贵里于 1858 年 2 月 17 日第一个在黄埔担任起他的职务。

⑭ 红王炮台：红色炮台，在广州港的河南岛上。（见莫奇，第 136 页）

第七章 赫德和中英新秩序

① 见魏尔特，第 141 页。

② 同上，第 142 页。

③ 同上，第 142～143 页。

④ 关于那些年的详细记述，见巴诺著《中国和西方，1858～1861 年：总理衙门的起源》及玛丽·克莱博·赖特著《中国保

守势力的最后挣扎：同治中兴，1862～1874年》，第二章，“新时代”。

⑤ 见魏尔特，第150～151页。

⑥ 见杰克·格尔森著《李泰国与中英关系：1854～1864年》，第128～129及魏尔特，第151～152页。

⑦ 见魏尔特，第152页。

⑧ 1866年3月2日赫德日记。见芮尼著《北京与北京人》。

⑨ 中国海关，第六卷，第129～131页。

⑩ 几理查德·史密斯著《外国雇佣兵与满清官吏：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

⑪ 见裴丽珠，第60～63页；魏尔特，第214～215页。

⑫ 见魏尔特，第九章及格尔森《李泰国与中英关系：1854～1864年》第七及八章。

⑬ 包腊1863年3月20日至12月24日日记手稿，伦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图书馆收藏；见该手稿之1863年6月9日（2）日记。

第八章　日记：在北京和上海

① 李泰国自1861年6月以来一直在英国，一方面是回国休假，另一方面是办理海关公务，特别是组织一支舰队，供中国对付走私者和反叛者之用，即“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他于1863年4月回到香港，5月1日到达上海。当时赫德作为代理总税务司正在视察通商口岸。他经常做此种旅行，这是其中的一次。赫德1863年的第18号通函——发往13个口岸，日期为5月9日——正式宣布了李泰国返回中国。

②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于1861年3月，处理对西方各国公使的外交关系。他们当时首次获准常驻北京。该机构以恭亲王为首，是军机处的一个下属机构，由约10名

高级官员组成。但他们仍保留别处——主要为军机处——的主要职务。例如：文祥是最初成员之一，也是一位军机大臣。在1901年设立外务部之前，总理衙门一直作为处理洋务的机构，但实际上并不作真正的决定。和以前一样，决定由皇帝通过军机处发出。

文祥，满人，军机大臣，于1861年被指派在总理衙门任职，时年43岁。当时赫德曾把他说成是“办理洋务的实际工作者……他非常敏锐、机警，而且就中国人的性格来说是一个诚实的人。”从赫德对在北京“办事处”——赫德对总理衙门的称谓——议事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提出一项不常见的议事程序时，他特别想要说服的就是文祥，同时在适当的时间把适当的消息带给恭亲王的也是文祥。（见马士，第2卷，第53页，注释之16。）

③ 恒祺，总理衙门最初成员之一（1861年4月任命），系前广州候补道。赫德在广州担任联军委员会秘书期间，就与他相识（见前，第188页以后）。恒祺任候补道期间，发了大财（这是司空见惯的），因而对由外国严密监管航运并不热心。虽然他在设立广州税务司署时曾予合作，但既已在北京，就变得——按照赫德在一封信中的评论——“成见很深，非常排外。”

崇纶，1854年曾任大沽盐运使，当时包令和麦莲正乘船北上强求修订1842年的条约。（见前，赫德日记，1854年10月10日及注释㉛。）崇纶奉上谕和他们在天津会晤，但拒绝了他们的全部要求，使他们空手返回香港。赫德此刻把崇纶说成——在评论文祥的同一封信中——是“一位老政客，曾于1854年哄骗包令爵士和麦莲先生，被认为是用花言巧语来诱骗贵人驯服的一位了不起的能手。”1861年4月奉派到总理衙门任职。（见马士，第2卷，第53页，注释⑯。）

薛焕，1857年曾任上海道台，1857～1863年继何桂清负责对外事务，最近（5月25日）奉派到总理衙门任职。他是李泰国从前就认识的总理衙门组成人员之一。过去他是李泰国支持者之一。但在李泰国暂去英国期间，政治舞台的变化使薛焕转移到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方面，而李鸿章是反对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因而薛焕来到北京后，就成了李鸿章的代言人，是总理衙门中最顽固的反对派之一。（见以下6月8日日记；又见格尔森，第65～66页及第193页。）

巴留捷克是第一位驻扎北京的俄国全权公使，于1861年7月到达北京；此时即1863年由倭朗嘎哩继任。

④ 可以看出，李泰国在就他与阿思本之间的协定进行谈判方面，已经经受了极大的困难。例如，他在1862年夏季从赫德处得知中国人下令停止支付舰队的款项，而且“提出向美国而不向英国定购一支船队。”赫德在北京的作用使李泰国能够继续进行此事，但其结果至少暂时是没有把握的。（见史密斯，第91页。）

⑤ 抚台系对巡抚的口头称呼。

⑥ 这里是一个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责问题。在包括李泰国在内的大多数外国人看来，清朝中央政府给予地方官员的财务处理权限和军事权力太大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见史密斯，第156～157页及第192～194页。

1861年，威妥玛曾任英国公使馆的汉文正使，1年后被授予第三级巴斯勋爵。

1863年下半年，他曾回国休假，但当1864年卜鲁斯爵士返回英国时，他作为代办接管了公使馆事务。

⑦ 雇佣外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可能提供有益的资料或服务，但很少完全可用。因此最好使他们放弃外国公民的身分而接受中国臣民的身分。（见注释㊸。）

⑧ 略。

⑨ 10,000,00 两的贷款以海关税收作担保。这种做法后来成为惯例。

⑩ 亲王指恭亲王。1861 年设立总理衙门时，以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䜣）为首。那年 6 月，赫德曾与亲王初次相见。当时这位年轻的代理总税务司应卜鲁斯爵士的邀请，前往北京与文祥及其他人商讨海关事务。（见芮尼，第一卷，第 202～264 页。）恭亲王的处境是危险的。他一方面受到朝廷上强有力的排外官员的反对，另一方面却又由于新近才驻扎京城的西方各国公使的种种要求而须作出种种艰难的决定。通过赫德日记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他不得不以微妙的方式和他们相处——延缓不受欢迎的行动，给总理衙门各大臣以争取时间的余地；而当他认为时机已到来时，则采取热情的态度。1861 年赫德曾这样评论这位亲王：他“并不很聪明，他对于外国政治或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十分精通；但是他是具有善良用意的人，只要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被准许去做的话，他是急于要去做的。他面临着很多的斗争，因为在许多措施当中他被排外的大员们所反对。在这些大员中有能令皇帝听从他们的话而又和皇帝一起呆在热河的那些主要的宠臣们。”（见马士，第 2 卷，第 53 页，注释 16。）由此可见，从那时以后的两年期间，恭亲王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⑪ 略。

制台，总督的俗称。

差役（?）代理人或特派员（?）。

略。

⑫ 略。

由于自负，李泰国同西方人和中国人都疏远了。看来，对于

中国人，他要求把他自己置于和政府主要官员同等的地位，要求给他巨额报酬而不附带任何条件，甚至要求给一座王宫作为官邸。这种住处只有皇亲国戚——在外国人中，只有公使馆——才有享受的资格。

⑬ 指舰队所需之款。1862 年 3 月 13 日，赫德把100,000 两银子(31,343 镑）汇给在英国的李泰国，这是中国皇帝通过恭亲王签应的600,000 两的第一期付款。李泰国现在既已到达中国，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弄到必须钱款的其余部分，以购买及装备船只和支付日常费用。命令各省或各口岸支付，而不由中央金库支付，是中国的一般做法。

⑭ “经过操练的中国士兵”不仅指 1861～1862 年华尔建立的、1863 年由能干的英国指挥官“中国的”戈登统领的著名的常胜军，而且也指上海地区外国人训练的其他中国部队。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外国训练的武装力量是对付太平军以防守通商口岸所必不可少的，也是中国新式军队的潜在核心。(这在史密斯书中到处可见。)

⑮ 阿思本海军上校在额尔金勋爵于 1857～1859 年第一次出使中国时，曾担任额尔金的旗舰、皇家海军军舰“狂暴”号的指挥官。李泰国招募他指挥拟议中的舰队，但合同条款尚待中国批准。实际上，这些条款成了整个事情失败的暗礁。

⑯ 丹麦在中国没有常驻的公使。拉斯勒福上校于 1863 年率领特别使团前来谈判条约，该条约后来于 1863 年 7 月 13 日在天津签订。

包令爵士任香港总督时，赫德第一次和他相遇。后来包令任总督、商务监督以及在修订条约期间任全权特使时，赫德又和他相会。

⑰ 略。

⑱ 这些人大概是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司员或章京)。“成”可

能是成林，“志”可能是志刚。（见巴诺，第230～231页；见S.M.蒙著《总理衙门：机构与职能》，第37页。）老爷，一种尊称。

⑲ 田提督名田兴恕，系贵州的地方总兵。1862年，在清军与叛军的战斗过程中，一位法国公民在贵州省遇害。据赫德说，是一位“女传教士”，其他人说是一位法国牧师。不管怎样，从那以后，法国人就一直迫使中国政府赔偿。最初由布尔布隆提出要求，他离职后由一位代办接办，此刻则由新到任的柏尔德密公使办理。按照美国公使蒲安臣的说法，由于这位法国公使是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他通过向他的同僚通报事情真相而使他们和他合作的办法，充分利用了集体压力。

赫德关于使田自尽的建议，看来是反常的，不郑重和无情的。试比较在李鸿章处死太平军八王一事上赫德对自己举动的担心（1864年3月21日日记）。

阿希旺，贵州地名。

⑳ 柏尔德密是1863～1865年法国驻华公使。他接替了布尔布隆。布尔布隆曾于1861年3月陪同卜鲁斯到北京，作为驻扎京城的首任法国公使。

关于法国公使馆的翻译丰大烈，见下文6月15日日记中赫德的评论。1870年在激起天津大屠杀中死去的就是这个丰大烈。

在1870年天津大屠杀（天津教案）发生之后，崇厚以钦差大臣身分奉派前往巴黎谢罪。

罗淑亚系法国代办。

㉑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定立之后，中国同意准许外国商船沿长江经商，但由于部分长江在叛军之手，所以在恢复和平之前只能开放镇江港；恢复和平后，在汉口与长江口之间也只商定不多于3个的港口开放为输入港和卸货港。因此，在法律

意义上，英国人还无权催促开放长江，但是商人正在变得不耐烦了。赫德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是指这种交易以及如何处理超过镇江以远的商船。他提到的“我们自己的船”是指李泰国正在美国采购的船只。

美理登曾担任以噶罗为首的法国使团的翻译。他于1862年1月进入海关，并被赫德任命为天津海关首任税务司，当时李泰国刚刚离华回国休假。关于进一步谈到美理登及其野心，见下文6月8日日记（原文有两篇6月8日日记，分别为星期一及星期二，此处指后一篇；又见原注之29——译注）。

“珍珠”号事件涉及一艘英国帆船。该船在未开放港口泉州装载了一船禁运品盐，运往福州。福州的海关监督声称有权没收船货。当英国领事反对时（他的反对意见得到香港检察总长的支持），阿礼国坚持了更为广泛的原则，即“当一艘船由于驶往一个它不应经商的地方故意违反条约时，它就丧失了得到保护的全部权利要求。”（见魏尔特，第354页。）

㉒ 商人在一个通商口岸交纳关税后，如因货物没有销路而拟转运到另一个通商口岸，就发给免税证。19世纪40年代非正式地采取这种措施后，各种灵活的解释导致其通过扩展到国际贸易方面而合法化。在提出一定证件之后，愿意把货物再出口到中国以外的某个外国港口的商人，就可以把原来的进口税金额从下一个进口税单中扣除。这还不是一项条约权利，而是“由海关认可的一种超出条约的便利。”（见费正清，第315～317页。）

㉓ 例如，劳崇光作为广东巡抚，曾在管理华工出口方面予以合作。他调任云贵总督（见下）并不是贬黜。

㉔ 哈孟德，美国人，1859年进入海关，1861～1864年任九江关供事。

㉕ 略。

㉖ 略。

㉗ 略。

㉘ 曾国藩是湖南人。这句话暗示中国同乡关系特殊纽带的力量。

㉙ 由于笔误，赫德把两篇日记都写作6月8日；星期二那篇应为6月9日。（据此，以下3篇日记的日期亦均有误——译注）

㉚ 这一段间接表明法国与英国在华势力方面的有力竞争，更不必说一些个人之间的竞争了。

㉛ 柏卓安和赫德虽然在中国见面之前，彼此似乎并不相识，但他们是同一年（1835年）生于北爱尔兰两个相邻的郡，而且一度在同一所大学（女王学院）就读。柏卓安到中国的时间比赫德晚。他于1861年到中国时是一名随习翻译。到了1864年，由于他的汉文学得如此之好，就成了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汉文副使。他和赫德的交往持续多年，因为他在1873年进入海关。在海关，他有一番卓越的经历。在作为朝鲜海关总税务司20年期满之后，他于1913年结束了他的海关生涯。

俾斯麦是普鲁士公使馆的翻译。后来他和赫德在北京是邻居，他的孩子和赫德的孩子是游戏的伙伴。

默里从1861年7月以后，一直在英国公使馆任助理兼会计。

马基1861年进入海关，这时候是天津的一等供事。1年之后，他担任了新开的牛庄口岸的首任税务司。

阿卜脱于1863年进入海关。

马福臣自1863年7月～9月是上海关代理税务司，此后为汉口关税务司。他是在1859年9月进入海关的。

赫德的信是写给密妥士还是其弟兄密迪乐，这一点不能肯定。

路森，英国人，1859年10月进入海关。这时候他是广州关的帮办。

㉜ 德尼克是一位新闻记者和作家，这时候是《德臣报》主笔，

后来和梅辉立及查尔斯共同编著《中日商埠志》。

瓦特斯是一名随习翻译，于1863年2月派任。

金登干是李泰国在英国录用的。他是苏格兰人，比赫德大两岁。他的一生和赫德都有联系。（见费正清、布鲁纳及马西森：《总税务司在北京》，该书是赫德致金登干书简的汇编。）他辞去了英国财政部的工作，以便进入中国海关。后来他成为总税务司署委巡各口款项事税务司和总理文案税务司。

陆可能是赫德的工作人员。

㉝ 中国的一甲子是60年；1863年是1804年开始的一甲子的最后一年。1864年将是新的一甲子的开始。

㉞ 大英是用来在条约中表示与大清对等的。

㉟ 略。

㊱ 略。

㊲ 略。

㊳ 蒲安臣系美国驻华公使。他通常被看作是所谓“合作政策”的设计师。这个政策的含意不仅是列强之间的合作，而且是和中国官员之间的合作。

㊴ 1斤约合$1\frac{1}{3}$磅或600克，1担约合133磅。当时1两银子约值1.6美元或英镑6先令8便士。

㊵ 略。

㊶ 1862年9月华尔死后，白齐文（将军）曾接任常胜军统领，但在一次争论后于1863年1月免职。在那次争论中，他被控不服从命令和占用公款。1863年2月，他到北京恳求复职。恭亲王把此事交由上海进一步审查。白齐文于4月到达上海，发现李鸿章决心阻止他复职。赫德写此篇日记时，事情就处于这种状态。（后来，在8月份，白齐文夺取了一艘汽艇，同他的追随者投奔太平军。见1863年8月19日日记。）

施约瑟牧师，美国圣公会教士。在1864年的《中国题名录》中，名列美国驻北京公使馆条目下。

卫氏指卫廉士，系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兼翻译。

㊷ 略。

㊸ 白齐文免职后，李鸿章与士迪佛立将军签订了改进常胜军管理的协议。根据协议，这支队伍及其指挥官受李鸿章的节制。伦奥上尉暂时统率常胜军。1863年3月25日由戈登上尉接替。造成迟延的原因是需要等待英国枢密院颁布敕令授权英国军官为中国政府服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李泰国在涉及戈登和阿思本时，曾详尽讨论此事。

㊹ 略。

㊺ 李泰国控制海关税收和管理雇佣外国人为中国工作的计划使戈登大为烦恼。当李泰国的舰队计划失败后，戈登全部归罪于李泰国。（见戈登书信文件集，手稿第33及222页，1863年11月15日戈登致其母函及1864年2月8日戈登致亨利·戈登函。）

㊻ 略。

㊼ 许可证书：领事所驻国政府对领事的书面承认，允许他行使权力。

比利时曾于1845年与北京换文，使它有权根据现行条约规定的程序进行贸易。当拉斯勒福于1863年作为英美两国公使的“客人”来到北京时，他们建议他在天津进行谈判。他们认为，中国只以“比利时条约为本，而无其他”的建议应予撤消。比利时的包礼士于1862年率特别使团到北京谈判条约，这个条约就是拉斯勒福所预言将要批准的。首任比利时公使金得俄于1865年到达北京。

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英国公使卜鲁斯比蒲安臣更加起劲地鼓吹白齐文的事业。

㊾ 略。

㊿ 略。

51 略。

52 略。

53 从中国的传统观点出发，最忠诚的外国军官自然是那些矢志成为中国臣下的军官。但是白齐文事件以及戈登的效忠（尽管他不愿成为中国臣下）使人对这个设想产生了一些怀疑。（见史密斯，第182页）这里，文祥及其同僚只是寻找借口，以免使皇上受阿思本协定的约束。

54 作为镇压太平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充满戒心地维护其权力。他憎恶使用外国军队和由外国军官指挥的部队与叛军作战。

55 略。

大沽在天津以南的白河口，是1858年4月额尔金谈判之处。当时李泰国是额尔金工作人员中的一名翻译。

56 庆谢齐是淮军一位主要将领，1862年奉曾国藩命协助李鸿章指挥解救上海的战斗。因战绩而受封为副都统，统率士兵三千人。1863年与戈登协同作战，攻克苏州。

庆攻克了苏州附近的各战略前哨，其中包括5月2日攻克太仓，5月31日攻克昆山。这时候是6月，戈登可能曾热情称赞他，但是后来戈登改变了态度，见7月5日日记。几个月之后，在苏州于12月陷落之后的处死投降太平军诸王事件中，主要鼓动者正是庆谢齐。（见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第115～116页。）

57 孙和明富系海关工作人员。

58 董恂，学士，担任行政工作，且不断升职，于1861年奉派在总理衙门任职。虽然赫德此时愿与文祥办事，但董恂以善于创新而逐渐露头角。后来他积极促成接见外国公使并力主向外国派遣中国使臣。

⑲ 体制，政体的原则。赫德的译文极好。

⑳ 吴道台，上海道台吴煦；1863 年曾一度为黄芳所接替。

会议：联合审议。

善后章程：附加于征税制度的通商章程（字面意思为建设章程）。

㉑ 略。

㉒ “总统”：类似总司令。（根据《赫德传》，“李泰国勉强同意……由清政府派总兵蔡国祥统辖舰队，阿思本任舰队的‘帮总统’。”——译注）

㉓ 略。

㉔ 略。

㉕ 此传闻为时过早。叛军于 1863 年 12 月才放弃苏州。这时候，戈登正忙于夺取通往苏州的进路。

㉖ 略。

㉗ 略。

㉘ 略。

㉙ 满人的发型是辫子。这种发型也强加于汉人，以示汉人服从满人的统治。

㉚ 略。

㉛ 所说的委员会可能是上海防务委员会，其相应的中国机构叫作会防处。会防处为常胜军提供轮船和其他形式的支援，以及通商口岸及其周围所需的其他防务物资。

㉜ 买忒勒是一名法国炮兵军官，于 1863 年 2 月被杀。在早期法国致力于在上海地区建立一支由外国训练的中国部队时，他曾出过力，并曾与常胜军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并肩战斗。

㉝ 李鸿章作为署理江苏巡抚暂住上海。他因在通商口岸进行有力及有效的行政和军事领导，而迅速成名。他原籍安徽，而且是曾国藩幕僚。其后 30 年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不断与赫德相

遇，因为他们都企图通过军事和行政改革来加强中国。

⑭ 略。

⑮ 坐轿子是一种特权。大英表示作为一个平等的外国的代表，享有高级官员身分。

⑯ 略。

⑰ 略。

⑱ 第三项“指望出现另一个政府”，意指在中国，或者特别是在上海，寻求一个外国控制下的政权。

⑲ 这里所说的“历书”是由钦天监编制的。它把一年的某些日子定为宜于或不宜于从事大至大祭，小至俗事的各种活动。这种历书的普及本叫做皇历。

⑳ 退税是免税单范围的扩大。见注释 22。在有关外国进口货方面达到目的之后，商人想把这项优惠扩大到再出口到另一口岸的中国货。(见魏尔特，第 184 页。)

“亚拉巴马”号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联盟舰队的最有成就的巡洋舰之一。这个舰队的目的是摧毁北方的商船队。“亚拉巴马”号于一年后即 1864 年年中被击沉。赫德在 1880 年 8 月份的一封信中称，薄安臣曾于 1863 年与总理衙门进行谈判。谈判中，蒲安臣劝说中国宣布禁止“亚拉巴马”号进入中国港口。(见费正清、布鲁纳及马西森，第 1 卷，第 336 页及注释②) 在 1864 年 4 月 12 日的日记中，赫德谴责中国人竟愚蠢到答应禁止向“亚拉巴马”号供应补给品。1872 年，日内瓦裁决给予美国约1,500 万美元，作为英国赔偿劫掠“亚拉巴马”号及南方联盟其他船只所造成的损失。这些巡洋舰都是根据外国名义的订单在英国港口为南方联盟建造的。

㉑ 通商大臣指三口（天津、烟台、牛庄）通商大臣。根据 1858 年天津条约，南满的牛庄披指定为 14 个通商口岸之一，但直到 1864 年 5 月 9 日该口岸才开放。以麦基（这时在天津）为

署理税务司。

㉜ 继英、法、俄、美四国与中国订约并在北京驻节公使之后，普鲁士、葡萄牙、丹麦和荷兰的代表也谋求订立给他们以同等权利的条约。中国根据对所有外国人一视同仁的政策，予以同意。中国已经接受了最惠国条款。丹麦全权公使拉斯勒福得到了薄安臣和卜鲁斯两个友好国家使节的极大帮助。当拉斯勒福未经邀请即抵达北京，致使恭亲王不悦时，蒲安臣和卜鲁斯声称拉斯勒福是作为他们的客人前来的。但他们劝告他折回天津进行具体谈判。丹麦条约于7月13日在天津签订后，他对各国公使馆的支助表示感谢，并感谢“洋关的”赫德先生。“中国人把条款的安排交由他办理。”（见马士，第2卷，第118页。）

㉝ 罗勃特·阿诺德，英国人，1857年11月进入海关工作，1860年6月辞职，1863年1月重新进入海关，1863年6月去世，当时为上海海关的一等供事。

㉞ 庆谢齐（见注释56）显然是妒忌戈登的成就。在一次与太平军作战中，他的部队曾向常胜军的一个支队开火。尽管如此，戈登仍然十分尊敬他。据说，戈登在得知他于1864年死去的消息后，竟失声痛哭。（见史密斯，第165～166页。）

㉟ “南京”号是英国籍轮船，属大德洋行所有，定期往返于上海及北方各港口之间。赫德本人9月份由天津赴上海，就是搭乘此轮。

在阿思本率领其舰队到达之前（预定8月份到达），李泰国奔赴上海，因上海又一次发生流行性霍乱而把他的家属撤走。1862年夏季，霍乱一直在上海蔓延。

㊱ 中国没有国旗，但是即将到来的中国海关船只——用以镇压叛乱和海盗——需要有一面国旗，以便使西方列强的船只承认中国海关船只的合法权利。为此，李泰国建议采用一种绿

地黄十字的舰旗。从那时起，这种旗便作为标志国籍的船首旗在海关全部巡逻艇的船头飘扬。后来，李泰国提出了一个更为花哨的样式，旗的中心有一条象征皇帝的蓝色大龙。(见马士，第2卷，第36页。)

⑰ 毛鸿宾，不久前的湖南巡抚。薛焕这番话的意思是毛的升迁归功于他和曾国藩（曾中堂)。

⑱ 成林，一位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见注释18。

⑲ 恭亲王不接见李泰国，而赫德于1861年——当时卜鲁斯刚驻北京并要求赫德前来——曾多次与恭亲王进行工作会晤，这一鲜明对比是意味深长的。

⑳ 略。

㉑《德臣报》，1845年于香港创刊，当时由肯伯以原业主安德洋行的名义发行，德尼克为他担任主笔。1865年肯伯死后，德尼克成为业主。

㉒ 这里可能仍然是指领事馆的休士。赫德自1854年在香港与他相识后，一直和他通信。但此刻也许是指休士；此人是英国人，1859年11月进入海关工作，1862年任税务司，此刻负责厦门海关。

㉓ 打狗（现高雄市——译注）和基隆是台湾的港口城市。

上海会审公堂，将于翌年建立，旨在处理同时涉及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司法问题。在此之前，必要的治安管理由条约国领事执行，由领事充任违警罪法庭推事。这一程序充满着法律上和政治上的隐患。解决办法就是这个会审公堂，由上海道台的代表主持，并视案件的性质，或者单独审理案件，或者会同领事陪审官审理。(见马士，第2卷，第132～133页)

西山，北京城外的避暑地。

㉔ 札子是对下级行文；对平级则称文。

㉕ 略。

⑯ 略。

⑰ 这是第一次提到赫德的仆人陈阿方。在赫德在华的全部岁月里，他一直为赫德所雇佣。在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图书馆，有一张他们两人的照片，日期为1906年8月9日，照片下面赫德写道："Par nobile fratrum Arcades ambo"。

⑱ 干儿子是非正式的养子。很容易被人认为这就是和赫德同居的中国妻子所生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起英文名为赫伯特·赫德的那个孩子，生于1862年。但是看来他年纪太小，还不能领会语言含义到这种程度。3个孩子的老大——安娜——生于1859年，可是赫德明确地说，"我不禁管他叫……"

⑲ 九袱州和基里州，分别在南京西边和北边，于1863年6月下旬被攻克。这就使清军能够全部控制长江北岸。（见郭延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998～999页。）

杜将军，可能是杜兴阿，驻防南京的将领。

⑳ 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外国人一直传播曾国藩的忠诚不可靠的谣言。但这些谣言无非是表示妄想由曾国藩取代满人的帝位并实行比较开明的统治。这种妄想反而助长了中国异族统治者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不断由满人表达出来并见诸赫德以后的日记中。

㉑ 亨利·惠顿的《国际法原理》，1836年问世，共两卷。在作者生前及身后曾多次再版。这篇日记之后约一年，丁韪良（赫德在宁波认识的美国传教士）应赫德之请并由海关付酬，着手另一个译本。（见1864年8月20日日记）这个译本由赫德于1865年5月以同年第7号通令发给各口岸的海关税务司，以便使各口岸均有一册，可作参考。赫德的译稿可能交由丁韪良使用，这些译稿为丁韪良的工作铺平了道路。1864年，恭亲王在拒绝同意普鲁士扣押一艘丹麦船只时，曾引证惠顿的著作。

⑫ 略。

⑬ 虽然在1863年西布尔德的中文可能比好博逊好，但是到了转年，好博逊已经进步到足以使赫德派他去担任戈登与李鸿章及中国其他官员会晤的译员。西布尔德，英国人，于1862年10月进入海关（好博逊则于1862年5月），死于1872年，在海关工作仅10年。

⑭ 福州将军：驻福州的鞑靼将军。

船钞，由中国人按“每吨5钱”的中等税率征收，是根据1843年的条约制定的。后来根据天津条约减为4钱。在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开始提出了海岸设施的改进——竖立灯标、灯塔，以及浮筒和灯船的分布——应自船钞中开支。1864年，海关向总理衙门申请用全部船钞的三成，建立一笔资金，用以改进这些设施。申请立即获得批准，自1865年1月1日起实行。（见马士，第2卷，附录二，1871年3月21日赫德的备忘录。）

⑮ 略。

⑯ 略。

⑰ 基里州，见注释99。

狮子山，南京附近的战略要地。

⑱ 崇厚，三口（天津，烟台，牛庄）通商大臣，驻天津，设置于1861年。崇厚任三口通商大臣，直至1870年该职务移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任职期间，与若干西方国家订立了条约和通商章程，其中包括丹麦、荷兰、西班牙和比利时。

想逃避领事对其船只进行控制的船长，都特别喜欢悬挂暹罗国旗，这大概很像现代船籍登记喜欢悬挂巴拿马国旗那样。为此，赫德的意见是只把暹罗本地建造的船看作是暹罗船。（见恒慕义，第209页；马士，第2卷，第16页。）

⑲ 李泰国于1861年回国休假时，由赫德和当时的上海税务司费

士来共同代理总税务司，直到1863年5月他回来为止。费士来工作到1863年4月，其余的一个月由德都德接任。德都德7月13日死去时，任上海税务司。

汉南于1859年8月进入潮海关，1860年代行上海税务司职务，1862年任闽海关供事。这时在烟台任税务司。他在中国度过漫长而杰出的一生，以1890年退休而告结束。

威妥玛在1861年汉口刚开放为通商口岸时，曾在汉口任“代理人”，1862年任江汉关首任税务司，1864年成为江海关税务司。

⑩ 这张清单代表了赫德慷慨好施而又不事渲染的性格特征。1906年，作为自娱，他开列了一份“1899～1906年赠品”清单，是手写的两大张。从他的两个女儿伊夫林（1,720镑）和梅布尔（760镑）开始，一直到几十笔“30至50镑的小额。”他供养双亲直至天年，对他的每一个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配偶）他都有馈赠，所赠金额远远超过了后来的读者所认为的应尽的义务。（见女王大学图书馆所藏赫德书信文件集中的清单。）

⑪ 施约瑟，见注释㊶。

⑫ 略。

⑬ 德克碑，常胜军的统领。该军由法国人统领，在浙江作战。1863年，在宁波的一次争论中，他打了一位官员，但他保住了对该军的统领，直至1864年后半年解散。[见戈登书信文件集，手稿之52，第386页；柯克致戈登函，1863年12月(?)；见史密斯，第164页。]

⑭ 赫德犯了一个他在引文方面很少发生的错误：教皇在通谕中写道，肤浅的学问是危险的东西。

⑮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有才能的一位领导人。他离开南京，转战在中国西南各省。骆秉章的属下之一杨应刚于1863年6月13

日接受了石达开的投降。6 月 25 日，石达开写了自供状后被处决。(见郭延以，第 996 及 998 页。)

⑯ 赫德预期于 1864 年 3 月回国休假。但正如以后所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各项任务，连同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对他的敦促，使他无法于预定日期出发。1866 年 3 月，他才终于离开北京，第一次回国休假。他在中国的全部 54 年中，仅回国休假两次。

⑰ 略。

⑱ 明富：海关工作人员。

⑲ 略。

⑳ 略。

㉑ 梁叔（leang Soo)，李泰国仆人之一，后由赫德雇佣。

“王牌之王”是一匹马。通州在北京以东 15 英里，是由天津过来的运河源头的转运点，由水路来北京的货物，在通州上岸，然后陆运到北京。

㉒ 赫德所表达的基本原则是孝。

㉓ 南京：船名。

㉔ 宓古，1853 年来华，1861 年成为林赛公司的合伙人。但多年来，他与其说是商人，倒不如说是新闻记者。他是《上海差报》的主要投稿人，偶尔也为《德臣报》撰稿。1883 年，他定居天津，并创办他自己的报纸英文《时报》。

㉕ 英国领事馆的福礼赐曾在北京担任联络官若干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太平天国问题的权威。1867 年，他在亚洲文会华北分会刊物上发表一篇资料丰富的文章，题为“洪秀全的基督教精神”。

休·贝克，英国人，1862 年进入海关任钤字手，不久提升为头等总巡，1869 年为福州海关的头等总巡兼理船厅。

㉖ 略。

⑫⑦ 福钧（见第二章，注释㊸），曾于19世纪40及50年代撰写若干篇在中国旅行的记事。这些旅行的目的是搜集茶树幼苗和植物标本。他最后一次东方之行是在1860～1862年，目的是搜集“博物学标本和艺术品”。这次旅行的记事，发表于1863年，题为《江户和北京：中日两国首都旅行记事》。

费希尔的书名为《旅华三年记事》。

⑫⑧ 丹尼尔·R·考德威尔，1854年曾为香港的注册处处长。年轻的助手们在初次分派政府职务之前，先向他引见。1863年，他列名于《中国题名录》为“译员，伍凯恩路”。

这表明该妇女是一位三品官或四品官（蓝宝石或青金石顶子）的夫人。

⑫⑨ 黄畹，王韬的化名，著名变节者及清末改革家，1862年与太平军联系，后逃往香港，与理雅各相识，协助理雅各从事中国古典作品的巨大翻译工作。19世纪60年代后期访问英国后，回到中国，成为一名支持改革事业的报界人士。

⑬⓪ 都司或土司：都司是绿旗兵的营级统领；土司是少数民族的土著首领。

吴道台：见注释60。

墨海馆：大概是墨海书馆，是由伟烈亚力主管的上海伦敦布道会的印刷所。

天是好生为德：大概是《易径》“天地好生之德”一语的讹误。

⑬① 略。

⑬② 左指著名的儒将和改革者左宗堂，当时在浙江省负责对太平军的作战，并负责该地区由外国训练的部队——最主要的是常胜军（见注释⑪③）——的行动。

⑬③ 白齐文于1863年8月上旬带着由常胜军窃得的“高桥”号轮船投奔太平军（高桥是1862年常胜军最初得胜的地方之一）。

⑬④ 略。

⑬⑤ 这时候，卜鲁斯给伦敦陆赐发文称，如果白齐文在冬季以“相当大的兵力”进军，他“非常可能会占领北京”，并最终推翻清王朝。此外，他不仅谴责北京中国当局，而且也谴责上海的中国和英国当局，谴责他们未能妥善处理白齐文事件。他认为白齐文问题是由他们处理不当造成的。(见史密斯，第122及143页。)但是卜鲁斯关于上海成为在美法保护下的自由城市的预言，从未实现。

⑬⑥ 这些要点都得到了充分的理解。(见史密斯，第120～122页)

⑬⑦ 整个1863年，戈登一直为常胜军的军饷问题而苦恼。例如，他于1863年8月7日致函马格里称：“告诉抚台，除非他付清账单，我发誓我决不再（统率这支军队)。”正如马格里的帮助那样，1863年下半年和1864年上半年赫德帮助常胜军弄到款项，对戈登是非常宝贵的。(见注释156。)

⑬⑧ 1里约为1英里的1/3。

⑬⑨ 巴德，英国人，1865年担任厦门关帮办。1872年4月辞去海关职务。1876年10月重新进入海关。死于1881年。他的儿子和孙子均在海关工作一生。

樊德霍文系荷兰派往中国的特别使团团长。首任常驻公使费果荪于1872年才抵达中国。

李泰国在英国时，曾亲自向巴麦尊勋爵申请授予第三级巴斯勋爵勋章，(C.B.)理由是在1858年的条约谈判中有功，应受奖赏。另外一个动机是他相信英国政府的这种敬重会使他在同中国各大臣的交往中受到重视。申请书是在1862年12月提出的，但不时“消失”掉，直到1863年3月，才为陆赐所注意。陆赐要求额尔金予以推荐。李泰国离开英国之后，才授予勋章。

⑭⓪ 略。

赫德当时阅读的书籍之一。《生平言行录》是一本比较新的（1859年）小说，系《约翰·哈利法克斯绅士》的作者玛丽亚·马洛克所著。

⑭ 西巴尔德是上海医院的外科医生。（《中国题名录》，1863年。）

如我们所看到的，天津到北京的路程包括一段水路和一段陆路。前者是天津到通州的白河，后者是到京城的最后几十英里。为了阻止外国使节靠近北京——1858年条约之后，他们急切要求进京——中国人在天津的白河入口处设置了一系列的障碍物。1859年6月，水师提督何伯首先碰到了一排横贯航道的铁桩；在这排铁桩之内放了一条重链，使通道正好处于要塞的大炮之下。在那里面，又有重铁索横贯航道。

劳伦斯可能是E. 劳伦斯，系开业律师及公证人。1862年的《中国题名录》列为住在上海。

法国领事馆的伊担继史密斯担任税务委员会的法国代表，该委员会于1854年设立了外籍税务监督。威妥玛是首任英国委员，卡尔是美国委员。

尤金·比索内特是上海的法国商人，比索内特公司的负责人。（1861年及1863年的《中国题名录》。）

F. 托布勒，上海鲍威兄弟公司商人，列名于1862年的《中国题名录》。

汉南，东海关首任税务司，3月23日到任。

⑫ 圣公会的慕稼谷牧师自1857年以来一直是安立甘会的传教士，后于1880年成为中国中部的主教。赫德具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生性爱好概述往事。他于1899年11月6日致函金登干称："今天我去教堂聆听慕稼谷主教讲道。1863年9月他和我曾一起乘'南京'号轮船从烟台到上海。他曾于9月6日在船上布讲《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4节……"（见费正清、

布鲁纳及马西森，第2卷，第1205页。)

⑬ 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第一批船只于8月1日到达长江。阿思本由于发现太平军一直试图诱使早先到达的水手为太平军服役，便把大部分船只重新安置于烟台。他本人则自烟台出发，于9月25日到达北京，与李泰国会合。舰队由八艘船组成，即："北京"号，"中国"号，"天津"号，"江苏"号，"广东"号，"厦门"号，"极北"号快艇，及"巴勒拉特"号补给舰。

塔尔布·布高英上校，海军军官，曾因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以勇敢著称而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阿思本选他为舰队的副指挥官。

西华是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的侄子，于1861年受命任美国驻上海领事，从而开始了他在华的外交生涯。两年后任上海总领事；1876年，任美国驻华公使。

马安的生涯始于1853年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随习译员。1863年6月～1864年3月，在巴夏礼离职之后，文极司脱到任之前，为驻上海署理领事。

⑭ 白齐文已于8月2日夺取了"高桥"轮（见注释⑬)。该轮经常被马格里用以为戈登往来于松江和上海之间服务。戈登当时无暇处理"高桥"轮事件，于8月7日致函马格里，建议他改用"纹银"号。(见布尔戈著《马格里爵士生平》，第82页。)

亚瑟·萨尔威上尉是阿思本为舰队在英国招募的军官之一。

⑮ 关于《中国之友》主笔塔兰特，见1858年3月20日日记的注释。

虹口是上海位于黄浦江左岸的一个区。

⑯ "玫瑰花"号于1862年曾为常胜军所使用。当时虽正式列为清政府的一艘轮船，但一般均理解为属于常胜军负责人之一

的个人所有。关于轮船管理的复杂性以及这种船只的战术重要性的论述，参阅史密斯，第95～98页及第136页。

又见1863年9月26日的《北华捷报》。

⑭⑦ 理查德·沃特利，哲学家及神学家，死于此年即1863年。他在哲学和神学方面的著作都很多。最有名的是《基督王国志》(1841年)。

⑭⑧ 梅辉立于1859年6月进入英国领事馆工作。他迅速掌握了汉文，1860年就担任了一个有关广州劳工移民问题的军事代表团的译员。这时他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像赫德本人和马格里那样，他在常胜军的事务方面，起了非正式而重要的作用。

⑭⑨ 若干曾在太平军服役的外国人，编入了戈登的扈从。[见《英国议会文体》，第63卷（3295），1864年，第171页，第123号之附件三。] 许多人通过大赦或由于证据不足，免予起诉。在整个19世纪60年代初期，列强的中立法令的执行情况是不平衡的。

⑮⓪ 佩恩，厦门海关三等帮办，在任仅几个月。

包腊是李泰国在英国招募的，曾与李泰国及金登干同船来华。作为一位敏感的22岁青年，他曾在他初次在天津任职时观察了李泰国、赫德和金登干于1863年6月初取道天津前往北京的情景，并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他的印象。

⑮① 默塞尔最近进入了海关。尼古拉斯中校于1869～1870年在海关短期任职，但被海事税务司福博斯停职。尼古拉斯控告了福博斯。看来，尼古拉斯是一个野心勃勃和反复无常的人。(见以下10月11日日记。)

⑮② 围绕白齐文士兵与戈登之间的关系，情况如比荒诞，以致有一次“白齐文一伙人”中的一员——被窃取的“高桥”轮(见以上注释之⑬③）船长琼斯——竟找到戈登并要求借用一些

工具来修理他的重炮！戈登曾特别提到这是一项“奇怪的请求”，他无法答应。(戈登书信文件集，手稿之52，第389页，戈登致其母函，1863年10月5日。)

⑮③ 10日来吃饭的不是李泰国，而是他的第二个弟弟李蔚海，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助理。

又是讹传。戈登尽管鲁莽，但只在1864年受过一次伤。

⑮④ 米德，英国人，1859年12月进入海关外班工作。1876年为头等总巡，是责任相当大的职务。

威妥玛负责江汉关刚满两年，在赫德继李泰国任总税务司后，接任江海关税务司。

10月13日，文祥请李泰国转交致阿思本函一件，大意是恭亲王将拒不批准李泰国——阿思本协议。据此，两天之后，阿思本送交恭亲王书面通牒一份。通牒最后宣称，如果他在48小时内得不到同意的答复，他将遣散舰队。由于未获答复，阿思本于19日把全部有关文件送交卜鲁斯，并附函称，他打算遣散舰队。(见格尔森，第190～191页。)

尽管戈登立即为白齐文安排了赦免，白齐文实际上于10月18日才脱离太平军。关于对这些安排的纵谈，见布尔戈所著《戈登生平》，第92～93页。

⑮⑤ 雷德，英国人，1859年进入海关，后于1866年成为上海署理副税务司。翌年在北京任汉文正使。

艾伦·扬，可能即林乐知，是一位教会报刊发行人。

⑮⑥ 皇家工兵团曼上尉在1857年侦察广州城墙时是巴特上尉的同伴，当时巴特被杀。(此人不是斯图尔特。后者在海关工作，是李泰国的秘书，后转为赫德属下。)

莫顿上校在1863年8月白齐文投奔太平军时，是白齐文的部下，但于10月苏州被围时又倒戈至清军一边。(见林德利著《太平革命使》，第641～645页。)

⑮⑦ 勒德拉姆上校是常胜军“萤火虫”号轮船的指挥官。该轮像“高桥”号（注释 133）那样，是由亲太平军的外国人从部队窃取的。偷窃“萤火虫”号发生于 11 月 15 日。（见该日的赫德日记）这个马丁不是赫德在宁波时结识的传教士朋友（指丁韪良——译注），而是“萤火虫”号的大副。

⑮⑧ 伍德是马奎斯·拉·伍德。（见艾德里安·贝内特著《教会新闻工作者林乐和》，第 14、20、28 等页。）

外跨塘：昆山至苏州陆路上的战略要地，轮船可以到达。

洛口：苏州北门近处的筑垒阵地。戈登进攻该地围桩时，以外跨塘为前进基地。

⑮⑨ 戈登于 1863 年 5 月底把常胜军总部自松江迁往昆山时，马格里被任命为松江防区司令并受权训练一支中国部队以守卫该城。1863～1864 年期间马格里的帮助对戈登的成功特别重要，正如当时（以后依然如此）对李鸿章的成功那样。根据戈登所说，马格里能就西方的发明创造、对外事务以及其他极端重要的问题“一连谈上几小时”。（见史密斯，第 166～167 页。）

马格里的传记作者详细讲述了赫德这里所谈的事件。（见布尔戈著《马格里》，第 98～101 页。）赫德的内侄女裴丽珠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赫德曾打算陪同伯郎将军前往昆山，但装有重要来文的英国邮件的到达使得伯郎延期出发。其中的阴谋是在伯郎能够增援戈登之前，先把他除掉。赫德日记似乎未采纳这个说法。

⑯⓪ 这又一次证明轮船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中的战术重要性（见注释⑭⑥）。戈登的其他两艘轮船是“扎特礼”号和“希森”号。戈登曾于 11 月 8 日致函马格里称，他即将把这两艘轮船送交“你在太湖使用”；那时戈登打算亲自率“萤火虫”号北上。

⑯① 在克士可士吉税务司暂离镇江两个月期间，A.J. 坎贝尔曾于

1863年9月10日受任为帮办。

“厄勒克特拉”号轮船的切希尔先生。

⑯② 鸿芳楼（?）：可能是上海一家著名餐馆。

金能亨，美国人，上海旗昌洋行的常务股东，也是代理瑞典领事。

沃登，1862年的《中国题名录》列名为大英轮船公司的代理商。

⑯③ 白齐文被捕并获释后，被放逐至日本，1864年才回中国。他第二次加入太平军，于1865年清军占领漳州（福建省）时被俘，并在中国人押解他回上海途中，在神秘的情况下溺死。(见马士，第2卷，第88～89页；又见马丁·林，《有关中国的论文集》，22A，1969年5月，第134～157页：“1863至1866年的白齐文案件和中国境内的治外法权”。)

⑯④ 关于金登干，见注释㉜。金登干乘“中国”号轮离开上海，该轮由阿思本的兄弟指挥。这组舰队还有“北京”号“天津”号和“海鸠”号。绕过好望角后，金登干于1864年4月在迪尔上岸。

⑯⑤ 赫德所提到的3艘船（注释⑯④亦提到），连同“巴勒拉特”补给舰，共338名官兵，以及全部储备军火，所有这些均直接送往英国。出售“巴勒拉特”号所得款项，用以支付遣散水手的费用。其他3艘船只于1865年下半年卖给了埃及政府。其余4艘由阿思本亲自率领到孟买。印度政府买了其中的“广东”号和快艇“极北”号。“厦门”号和“江苏”号于1866年卖给了福博斯上校，当时他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英国海军部的委员会对7艘主要船只所定的价格为152,500英镑，实际卖得的金额为51,350英镑。英国政府补足了差额。(见魏尔特，第249～250页。)

关于西方官员频繁干预中国事务的论述，在史密斯的书中到

处可见，特别是第 102～105 页、第 110～112 页、第 178～182 页。

⑯⑥ 船银大概是雇佣或维修船只的款项。

⑯⑦ 略。

⑯⑧ 不完全是实话。过不了多少天，赫德就卷入了著名的苏州事件，这个事件把他折磨到 1864 年。

⑯⑨ 实际上，恭亲王免去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和任命赫德接替的公文日期是 11 月 15 日，即在赫德听到消息之前几乎两周。赫德本人就其任命知照各口岸税务司的 1863 年第 23 号通令的日期则为 11 月 30 日。

第九章　结语：赫德仕宦生涯的影响

① 见魏尔特，第 326 页

② 见日记，1866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三。

③ 见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 44 页。

④ 见庆丕著《在中国海关：四十七年的亲身经历》。

⑤ 见中国海关。

⑥ 见格尔森著《李泰国与中英关系：1854～1864 年》，第 240 页。

参考文献

Banno, Masatake, *China and the West*, 1858～1861: *The Origins of the Tsungli Yam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巴诺，马萨塔克：《中国和西方，1858～1861年：总理衙门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

Beeching, Jack. *The Opium Wars in China*, 1834～1860. London, Hutchison, 1975.

比钦，杰克：《中国的鸦片战争，1834～1860年》，伦敦，哈奇森出版公司，1975年。

Bennett, Adrian. *Young J. Allen, Missionary Journalist*. 4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贝内特，阿德里安：《传教的记者》，第4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

Biggerstaff, Knight. *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毕乃德：《最早的中国官办学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63年。

Boulger, Demetrius C. *The Life of Gordon*.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6.

博尔戈，迪米特里厄斯：《戈登生平》伦敦，T·费希尔·昂温出版公司，1896年。

——.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London, John Lane, 1908.

博尔戈：《马继业爵士生平》，伦敦，约翰·莱温出版公司，1908年。

Bredon, Juliet. *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London, Hutchinson & Co., 1909.

布雷登，朱丽叶：《罗伯特·赫德爵士：一个伟大生涯的传奇》，伦敦，哈奇森出版公司 1909年。

China, The Maritime Customs: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Shanghai, 1941.

中国海关：《中国海兰起源、发展及其活动的文件汇编》，上海，1941年。

Clyde, Paul Hibber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Diplomatic and Public Documents* 1839～1939 Selected and Arrange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40.

克来德，保罗·希伯特：《美国对华政策：外交与公众文件，1839～1939年》，选辑，德拉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40年。

Cooke, George Wingrove.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1858. London, G. Routledge & Co., 1858.

库克，乔治·温格罗夫：《中国："泰晤士报"来自中国的特别信札，1857～1858年》，伦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1858年。

Couling, Samuel.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17.

库寿龄：《中国百科全书》，上海，凯利一沃尔什出版公司，1917年。

Elgin, Earl of.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 1857～1859. British Blue Book, 1859.

额尔金：《有关额尔金赴中国和日本特殊使团的通信，1857～1859年》，英国蓝皮书，1859年。

Endacott, G. B.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

思达科特，G. B：《香港的政府和人民，1841～1962年：一个连续的历史》，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64年。

Fairbank, John King.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1842～185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

——, Katherine Frost Bruner, and Elizabeth MacLeod Matheson. *The I. 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1907. 2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费正清、布鲁纳和马西森：《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信函，中国海关，1868～1907年》，两卷本，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

Fisher, Arthur a' Court. *Personal Narrative of There Yerars' Service in China*, 1857－. London, Bentley, 1863.

费希尔，阿瑟·考特：《旅华三年纪事，1857年之后》，伦敦，本特利出版公司，1863年。

Fortune, Robert.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London, John Murray, 1857.

福钧：《居住在中国人中间：内陆、沿海和海上》，伦敦，约翰·默里出版公司，1857年。

——. *Yedo and Peking: A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Capitals of Japan and China*. London, Murray, 1863.

福钧：《江户和北京：中日两国首都旅行纪事》，伦敦，默里出版公司，1863年。

Fox, Grace. *British Admirals and Chinese Pirates*, 1832～1869.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940.

福克斯，格雷斯：《英国海军将官与中国海盗，1832～1869年》，伦敦，基根－保罗－特伦奇－特鲁布纳出版公司，1940年。

Gerson, Jack J. *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2.

格尔森，杰克：《李泰国与中英关系，1854～1864年》，剑桥，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

Gregory, J. S. *Great Britain and the Taipings*. New York, Praeger, 1969.

格雷戈里，J. S.：《大不列颠与太平军》，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1969年。

Guiness, Geraldine. *Th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2 vols. London, Morgan & Scott, 1893.

吉尼斯，杰拉尔丁：《中国使团的故事》，两卷本，伦敦，摩根—斯科特出版公司，1893年。

Gumpach, Johannes von. *The Burlingame Mission*. Shanghai, 1872.

方根拢：《蒲安臣使团》，上海，1872年。

Hu Shêng. *Ti-kuo chu-i yü Chung-kuo cheng-chih*. Se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55.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北京：外文出版社，1955年。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 ing Period* (1644～

1919). 2 vol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两卷本，华盛顿，美国政府印书局，1943年。
Hurd, Douglas. *The Arrow War: An Anglo-Chinese Confusion*, 1856～1860. New York: Macmillan, 1967.
赫德，道格拉斯：《亚罗号战争：中英冲突，1856～1860年》，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67年。
Inglis, Henry D. *A. Journey throughout Ireland (During the Spring, Summer, and Autumn of* 1834). London, Whittaker & Co., 1838.
英格利斯，亨利·D. A：《爱尔兰游记（1834年春、夏、秋）》，伦敦，惠特克出版公司，1838年。
Jones, Susan Mann. "Finance in Ningpo: the 'Ch' ien chuang,' 1750～1880," in W. 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琼斯，苏珊·曼：《宁波的金融："钱庄"，1750～1880年》，载W. E. 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
King, Frank H. H.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金，弗兰克·H. H：《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1845～1895年》，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
King, Paul. *In the Customs Service: A Personal Record of Forty-seven Years*. London, Heath Cranton, 1924.
庆丕：《在中国海关：四十七年的亲身经历》，伦敦，希思·克兰顿出版公司，1924年。
Kuo T' ing-i. *T' ai-p' ing t' ien-kuo shih-shih jih-chih* (A daily record of historical event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aipei, 1963.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实日记》，台北，1963年。
La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赖德烈：《中国基督教会史》，伦敦，倡导基督教知识协会，1929年。
Lindley, A. F.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London, Day and Co.,

1866.

林德利，A. F.：《太平天国革命史》，伦敦，戴出版公司，1866年。

Lubbock, Basil. *The Opium Clippers*. Boston, Lauriat, 1933.

卢伯克，巴兹尔：《鸦片飞剪船》，波士顿，劳里亚特出版公司，1933年。

MacGillivray, Donald, ed.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季理斐：《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1907年》，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社，1907年。

Martin, W. A. P. *A Cycle of Cathay*.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 1896.

丁韪良：《花甲忆记》，纽约，弗莱明·雷维尔出版公司，1896年。

Mayers, Wm. Frederick, N. B. Dennys, and Charles King.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Trübner; Hongkong, A. Shortrede, 1867.

梅辉立，丹尼斯和查尔斯·金：《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伦敦，特鲁布纳出版公司，香港，肖特里德出版公司，1867年。

Meadows, Thomas Taylor.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London, 1856; Stanford, Academic Reprints, 1958.

密迪乐：《中国人及其叛乱》，伦敦，1856年：斯坦福重印，1958年。

——.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London, W. H. Allen & Co., 1847.

密迪乐：《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杂录》，伦敦，艾伦出版公司，1847年。

Meng, S. M. *The Tsungli Yamen: I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62.

蒙，S. M.：《总理衙门：机构与职能》，剑桥，东亚研究中心，哈佛大学，1962年。

Michie, Alexander. *The Englishme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Alcock*. 2 vols. Edinburgh, Wm. Blackwood & Sons, 1900.

密吉：《阿礼国传》，两卷本，爱丁堡，威廉·布莱克伍德出版公司，1900年。

Moges, Marquis de. *Recollections of Baron Gros's Embassy to China and Japan in* 1857～1858. London and Dublin, Griffin & Co., 1860.

莫奇，《关于赴中国与日本的喝罗特别使团的回忆：1857～1858年》，伦敦和都柏林，格里苔出版公司，1900年。

Morse, Hosea Ballou.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Ⅰ: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Vol. Ⅱ: *The 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 Vol. Ⅲ: *The Period of Subjection* (1894～1911).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910～1918.

马士，H. B.：《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冲突时期，1834～1860年；第2卷，屈从时期：1861～1893年；第3卷，被制服时期：1894～1911年。伦敦，格林·朗曼出版公司，1910～1918年。

Nevius, Mrs. John Livingston (Helen S. Coan). *The Life of John Livingston Neviu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 1895.

倪维斯，海伦·S·科思：《约翰·莱温斯顿·倪维斯生平》，纽约，弗莱明·雷维尔出版公司，1895年。

——. *Our Life in China*. New York, Robert Carter & Brothers, 1898.

倪维斯：《我们在中国的生活》，纽约，罗伯特·卡特兄弟出版公司，1898年。

Nevius, John L. *China and the Chines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9.

倪维斯，约翰·L：《中国和中国人》，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869年。

Oliphant, Laurence.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2 vols. Edinburgh and London, Blackwood, 1859. Reprin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J. Ger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俄理范：《额尔金勋爵出使中国和日本记事》，两卷本，爱丁堡和伦敦，布莱克伍德出版公司，185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重版，1970年，附丁.格尔森的导言。

Rennie, David Field. *Peking and the Pekingese*. 2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芮尼：《北京和北京人》，两卷本，伦敦，约翰·默里出版公司，1865年。

Ring, Martin. "The Burgevine case and extrality in China, 1863～1866", *Pa-*

pers on China, 22A (May 1969).

林，马丁："白齐文事件与在华治外法权：1863～1866 年，"载《中国论文》，22A，1969 年 5 月。

Shanghae Almanac and Miscellany for 1854 (also for 1855 and for 1857). Printed at the "Herald" Office, Shanghae.

《上海年鉴和杂录》(1854 年，1855 年和 1857 年)，上海"北华捷报"报社印行。

Smith, Richard J. *Mercenaries and Mandarins: The Ever-Victorious Army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illwood, N. Y., KTO Press, 1978.

史密斯，理查德·丁.：《外国雇佣兵与满清官吏：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纽约，KTO 出版社，1978 年。

Swisher, Earl, *China's Management of the American Barbarians: A Stud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841～1861, *with Documents*.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for 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1951.

斯威舍，厄尔：《中国对美国蛮夷的管理：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 年》，新哈芬，远东协会出版物，1951 年。

Toom, Cheuk-wo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15.

唐，丘温：《清代图书馆的发展，1644～1911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年。

Teng, S. Y.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坦恩，S. Y.：《太平军起义与西方列强：概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 年。

Wakeman, Frederic. Jr. *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18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韦克曼，弗雷德里克：《大门口的陌生人：华南的社会动乱，1839～1861 年》，伯克利，加里弗利亚大学出版社，1966 年。

Williams, Frederic Wells. *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 New York, Scribners, 1912.

卫斐列：《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的使团》，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

公司，1912年。

Williams, S. Wells. *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5th ed. HongKong, A. Shortrede, 1863.

卫廉士：《中国商业指南》，第5版，香港，肖特里德出版公司，1863年。

Wong, J. Y. "Harry Parkes and the Arrow War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9. 3: 303－320 (1975).

翁，J. Y.：《巴麦礼与中国的亚罗号战争》，载《现代亚洲研究》，9. 3，第303－320页，1975年。

——. *Yeh Ming-ch' en: Viceroy of Liang Kuang*, 185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翁，J. Y.：《两广总督叶名琛：1852～1858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

Woodcock, George.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

伍德科克，乔治：《英人在远东》，伦敦，韦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69年。

Wright, Mary Clabaugh.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 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赖特，玛丽·克莱博：《中国保守势力的最后挣扎：同治中兴，1862～1874年》，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

Wright, Stanley F.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Wm. Mullen & Son, 1950.

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马伦出版公司，1950年。

索 引

(以下索引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

A-Kow 阿宽 219
A-ssu-pen (Osborn's Chinese name) 阿思本 273
Abbott, R. J. 阿卜脱 270
Achan 阿蝉 16
Achih 阿志 191, 219, 364 页注㉜; 派往澳门, 204, 205
Actaeon 阿克大勇号 184, 193 360 页注④
Adjniery 阿吉涅克 天主教牧师 348 页注③
Adkins 雅妥玛 197, 212
Aicken, Dr. John 约翰, 爱坎博士 6
Aking 阿金 16
Alabama 阿拉巴马号 290, 381 页注㊽
Alabaster, Chaloner 阿查立 234, 作为译员, 363 页注㉗
Alcock, Rutherford 阿礼国 10, 22, 25, 26, 112, 155, 299, 343 页注㉒; 海关, 163～168, 375 页注 22; 暂时制度, 164～165; 税务监督的任命, 168; 生平, 198, 365 页注㊼, 370 页注⑭; 候补道来信, 227; 作为赫德的上司, 227, 228, 233～234; 在领事馆住宅, 228, 370 注⑮
Aldersey, Mary Ann 奥尔德希, 玛丽·安 38, 45, 61～62, 87, 348 页注②; 在圣诞节宴会上, 96。
Aldridge 奥尔德里奇 123, 124
Alexandria 亚历山大 11
Aling 阿林 122
Allan 阿仑 300
Allied Commission 联军委员会 广州, 176, 184 行政管理, 176～177; 赫德的工作, 179; 对柏贵的正式访问, 187, 188～189, 216; 条约后的政府, 206; 柏贵的文告, 219; 赫德被任命为翻译, 227; 赫德被推荐, 228

Allied Street 联军大街 207
Amaral 阿穆恩 301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美国浸礼会真神堂 37，146
Amoy 厦门 112，赫德的书，126，127，135；走私，162；舰队的配额，226，289，296；债款案，308
Amoy 厦门号 阿思本舰队的船员之一，310，311，313，314，392 页注⑯
An Ch'a Shih 按察史 331～332
Anglo-Chinese Calendar 英华－览 31
Anglo-Chinese War 中英战争 171
Anglo-Japanese alliance 英日联盟 337
Anhwei Army 湘军 247，253
Anqua 安官 57，92，95，102，125，131，138
Antelope 羚羊号 200，365 页注㊷
Aquang 阿光 16
Armagh 阿尔玛 3
Arnold, Robert 阿诺德 291
Arrow 亚罗号 57，171～172
Artis 亚提斯船长 97，131，救护船只，97～98，107；海盗，105
Assam 阿萨姆邦 268
Athenaeam 《学术讨论》 75
Atkins 阿特金博士 22
Australia 澳大利亚 金矿的骚动，122，356 页注㉑；移民，130
Austria 奥地利 赫德在那儿，322
"Anakening Tract" "醒世短文" 203，366 页注㉘
Ayaou 阿姚 151；重要性，153～154，在广州，191，364 页注㉜，192；送到澳门，204，366 页注㉙，219；索要钱，210，219；回到广州，218；赫德与她的关系的意义，230～232。
Ayi 阿依 220，231～232
Ayun 阿云 221
Bachelor of the Albang 阿尔巴尼的单身汉 82

Bacon, Mrs 培根夫人 25, 345 页注㉜
Bacon, Miss 培根小姐 25, 345 页注㉜, 66
Bagley 班格来先生 88
Bake, Hugh 贝克, 休 304, 386 页注⑮
Ballarat 巴勒拉特号 阿思本舰队的船只之一, 310, 312, 388 页注⑭, 392 页注⑯
Ballusek 巴留捷克 263, 372 页注③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London) 浸礼会伦敦布道会 38
Barker 巴克 216
Barton, Dr. 巴顿博士 67
Bate, Capt. William T. 巴特, 威廉·T 184, 360 页注④, 360～361 页注⑤, 187
Belfast 贝尔法斯特 与都柏林的差异, 4～5, 对赫德的影响, 6～7
Belgium 比利时条约, 278, 378 页注㊼
Bemvindo 贝姆文多 45～46, 354 页注㊻, 95～96, 97, 125, 357 页注㊽, 159
Benson 本森 315
Berthemy 柏尔德密 274; 关于贵州问题, 267, 375 注⑲, 270; 关于长江章程, 275; 德克碑, 301; 关于会审公堂, 302; 关于中国人, 308; 关于舰队, 316
Billings, S. 比林斯. S 审判, 189, 191
Binney, Thomas 宾内, 托马斯 14, 17, 80。
Bismarck, C. 俾斯麦, C. 270, 376 页注㉛
Bittern 比特恩 184, 361 页注⑥
Blunt, John James 布朗特, 约翰·杰姆斯 115, 355 页注㊺, 127
Bogue 虎门要塞 184, 360 注㉚
Bols, M. 包礼士, M. 378 页注㊼
Bombay 孟买 317, 392 页注⑯
Bonham, Sir George 文翰, 乔治爵士 上海海关, 163, 164, 165; 李泰国, 167
Books 书 赫德船运的, 28, 41, 97, 126, 127; 到达, 135

Bourboulon 布尔布隆 25，345 页注㉛，375 页注⑲；赴白河，172；在广州，174；在北京，237
Bowra, Edward C. M. 包腊，爱德华·C. M. 251，312，390 页注⑤⓪
Bowring, Edith 包令小姐 136
Bowring, Sir John 包令爵士 109，164，266；领事馆工作，8，17；贸易监督，9；在上海，22，25，121；赴白河，25，352 页注㉜，170，172，372 页注③；汉语学习，42；教会，62，347 页注①；在宁波，83；著作，355 页注⑥②；密迪乐，126；在西安，136，358 页注⑧⑨；赫德被推荐，137，139，233～234；江海关，166，177；李泰国，167，168；条约修订，170，174；通信，225，226，227；赫德被任命为译员，227
Boxer Uprising 义和团兴起 337
Boyd, Sgt. 博伊德上士 202
Brady, Mrs. 布莱黛姑妈 321
Brandon, Mr. 布兰登先生 302
Brazier, Professor 布雷热教授， 69，125，212，227，303，304
Breck, William 布雷克 美国领事，278
Bredon, Hester Jane 布莱顿，海斯特·简 154，321
Bredon, Juliet 裴丽珠 54，159，160，391 页注⑤⑨
Bredon, Rokert 裴式楷 322，324
Bredon, Mrs. 布莱顿夫人 海斯特·简的母亲 321
Brennan 布伦南 220
Brett 布雷特 297，303，306，317
Bridge, Judge 布里奇法官，311
Bridgman, Elijah 裨治文 356 页注⑥⑦
Brillsland, Miss 布里尔斯兰德小姐 128
Britt 布里特 274
Brown, J. Mcleavy 柏卓安 270，376 页注㉛；在北京时的联系，294，299，300，301，302，304，307；中文的运用，302，303；赫德任总税务司时的信，317
Brown, General 伯郎将军 313，315，391 页注⑤⑨
Bruce, Commander 代理指挥官布鲁斯 127

Bruce, Frederick W. A. 卜鲁斯 弗里德里克 W. A. 254, 258, 268, 292, 295; 将条约带往英国, 202, 366 页注㊻, 367 页注㊿; 海关, 234～235; 驻京公使, 237, 247; 邀请赫德赴京, 239～240; 推荐赫德, 242, 243, 244; 常胜军, 248; 小舰队, 249, 252～253, 257, 316; 关于白齐文, 378 页注㊽, 307, 387 页注㉟; 关于李泰国, 282, 284, 287, 288, 293, 294; 关于戈登, 294; 关于没收充公案件, 301, 302; 关于赫德, 317, 336～337

Bruner Katherine Frost, 布鲁纳, 凯瑟林·F 第六、第七章

Bryan, John 约翰, 布赖恩 189

Buddhism, Heng-Chi 佛教, 恒祺 306

Buffald 巴发尔德 66

Buissonet, Eugene 比索内特, 尤金 309, 388 页注㊶

Bulwer lytton, E. 布尔沃, 里顿; E. 20, 21

Bumboat 货郎船 205, 366 页注㊶

Bureaucracy, Chinese 中国人的官僚作风 赫德在这方面的本领, 317～328

Burgevine, Henry Andrea 白齐文 247, 277; 有关公文, 275, 377 页注㊶; 蒲安臣, 278, 279; 任命, 280 页; 变节, 307, 387 页注㉝; 卜鲁斯, 307, 387 页注㉟; 文祥, 308, 抓获船员, 310, 380 页注㊹, 315; 离开苏州, 314; 被捕, 316; 释放, 316, 391 页注㊸

Burgoyne, Capt. Talbot 布高英, 塔尔布上校 310, 389 页注㊸, 317

Burlingame, Anson 蒲安臣 257, 375 页注⑲, 274, 377 页注㊳, 381 页注㊷; 赫德同他的讨论, 278; 关于白齐文, 279; 关于小舰队, 316

Burton, Capt 伯顿船长 104

Burton 伯顿 223, 226

Bushe 布希 189, 191

Butler 巴特勒 310, 312, 317

Caine, George Whittingham 凯恩, 乔治·惠廷厄姆 22, 36, 185; 在宁波, 83; 象框, 97, 111, 127, 136; 被要求送小提琴, 114; 信函, 127, 300

Caldwell, DamelR. 考德威尔, 丹尼尔·R 305, 386 页注㉘。

Calendar, Chinese Por auspicious dates 中国历书 289, 381 页注㊾
Camille 卡米尔号 195
Campbell, A. J. 坎贝尔, A. J. 315, 391 页注⑯, 316, 317
Campbell, James, Duncan 金登干 322, 324; 信函, 150, 152; 作为李泰国的秘书, 251, 271, 377 页注㉜; 回到英格兰, 258, 316, 392 页注⑭
Campbell, Major Walter 坎贝尔少校 223
Canton 广州 来自宁波的人们, 87, 157; 西方贸易, 161, 中外摩擦, 169～175; 亚罗号事件, 171～172; 英国海军的行动, 172, 173, 174; 中外政府, 175～177; 赫德的到来, 179; 外国人的谋杀, 187, 192, 192～193, 193, 193～194, 197, 199, 200, 218; 阴谋收复, 187, 362 页注⑲; 190, 363 页注㉚; 骚乱, 188, 189, 190～191; 乡勇的攻击, 195～201, 202, 208; 罗的攻击, 202, 366 页注㉕; 和平公告, 202, 203; 条约签订后, 204, 208, 210, 211, 212, 217; 赛马, 209, 224; 重开大门, 215, 368 页注⑩; 需要建立海关机构, 234; 小舰队, 266, 289
Capricieuse 卡布里休斯号 160
Carr, Lewis 卡尔, 刘易斯 168, 388 页注⑭
Carrington, Captain 卡林顿上校 199, 365 页注㊻, 219
Catinat 卡汀纳号 193, 札子, 294, 297, 差事, 274
Chan Afang 陈阿方 294, 383 页注㊼, 303
Chang 张 可能是老师 225
Chang Ching 张清 266
Chang-chow sze 长寿寺 201, 217
Chang Hua 张华 310, 311
Chang seen sang 张先生 192
Chang seen sang of the Northern Cuild 北方行会的张先生 218
Chang Shen 长善 266, 274, 294
Chao Te-ch'e 江苏巡抚赵德辙 178
Ch'ao 钞 268
Chaou-chow 潮州 190
Chaou-paou-shan 招宝山 144
Chapdelaine, P'ere 马奥斯多神甫 172, 174

Chapman 查普曼 来函，76，97，136；去函，127
Chapman 查普曼 阿思本的秘书，313，314
Che hsien 知县 130，265；赫德首次拜访，64；回访，72～73；和包令一起用午餐，83
Che-tai 制台 265
Che-yay 差役 265
Cheequa 祈官 16
Chefoo 芝罘 赫德在芝罘，309
Che Kiang 浙江 154 页；叛军在浙江，246
Ch'en Chih 陈炽 325
Ch'eng Hsueh-ch'i 庆谢齐 28，379 页注㊻；戈登的抱怨，291，382 页注㊹
Ch'eng-lin 成林 266，276，277～278，292
Cheong ta jin 钟大人 218
Cheshire 切希尔 315，316
Chi-er-hang-a (Keih) 吉尔杭阿 25～26，345 页注㉜，47，167；江海关，166，168；与西方人的会谈，170
Chien-ch'a yü-shih shih Pao-Chien ta-jen 监察御史石宝坚大人 212
Ch'ien-chuang 钱庄 35
Chih-ch'en tsou-kao 直臣奏稿 212
Childers 契尔德斯号 56
Chin-hai 镇海 31，346 页注㊳，37，144；附近的海盗船，126
Chin Kwei tsih 金桂齐 194，364 页注㊷，208
Chin yung (braves) 乡勇 210
Ch'in-tz'u 钦此 302，385 页注⑫⓪
China (Chung-kuo) 中国 289；1854 年，8～9；赫德的有关文章，143～146；妇女的地位，153；和平协议，226；赫德的角色，230
China 中国号（小舰队的船只之一）256，310，316，392 页注⑯④，317
China and the Chinese (J. Nevius) 中国与中国人（著作） 50
China Mail 中国邮政 57，212，293，382 页注⑨①，386 页注⑫④
Chinchow 泉州 375 页注㉑

Chinese government 中国政府 与太平军，169；对外国人的态度，170，232；与西方列强，230；领导权的易手，237；与列强的合作，246；赫德的观察，254，282；与省级地方，373 页注⑥，289；派遣赴欧洲使臣，300；作为中国政府顾问的赫德，325。参见“清朝”条

Chinese language 中国语言 63；赫德的学习，16，42～44，65，349 页注⑪，67，68，76，92，110，138；中文书籍，75，98，108，109，114，118；学习中文的进步，79，81，85，98，104，107；过路客的中国话，94；学习方言，118，121，129，131；赫德在这方面的能力，154，230，240，329；李泰国的能力，178 页；库克关于缺乏中文译员的抱怨，363 页注㉗；劝告海关官员学习中文，333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中国海关 在上海，162～163 页；各省体系，164～165；阿礼国关于外籍监督的计划，166～168；扩展，169，233～236；问题，236；在新的清政府领导层下，228；与总理衙门，243；关税的重要性，244，245；与小舰队，249，266；374 页注⑬，286，289；李泰国建议的影响，271，277，317；财政，272；目标，277，378 注㊺，279，282，284，287；旗帜，291，382 页注㊻；在赫德领导下的发展，324；在中国国际事务中的作用，327；作为中国政府的机构，332；赫德的管理，333～334

Ching 庆 266，276，277，278，292

Ching-chang 清常 一个仆人，127

Ching hwang meaou 城隍庙 196，365 页注㊿

Ching-lin (adjustment) 调整 256，313

Ching-nan-mun (Cheng-nan men) 正南门 198，201，213

Ching-peaou chwang-yung (Ching p'iao chuang-yung; Ching-p'iao braves) 青标乡勇 200

Ch'ing dynasty 清朝 仇外、惧外，170；描述，216；政策改变，236～240，246；不稳定，276，387 注㉟

Chinkiang 镇江 268；新的条约口岸，196；搜索船只，267～268

Cho-lew 扣留 285

Cholera 霍乱 196，382 页注㊺

Choo-e 主义 274

Chop 驳船 360 页注④
Christianity 基督教 在中国，10～11；文祥的态度，300
ch'u-shen (beginning of one's career) 出身 280
ch'uan-yin ("boat silver"; allowance for Flotilla) 船银 317
chung-hsing ("restoration") 中兴 清朝的中兴，238
Chung-nan men 中南门 191，364 页注㉝
Cu'ung-hou (Tsung How) 崇厚，赫德的接触，243，297，384 页注⑩
Cu'ung-lun (Tsung-lun; Ching-lin) 崇伦 263，372 页注③，265，278；在总理衙门，272，274，280，281，282，296，297，299，301，334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 英国安立甘会 38
Chusan Island 舟山岛 54～55；海盗船，126
Clarendon, Earl of 克拉伦顿伯爵 8，60，100，357 页注㊵，136，139，155；关于中英贸易，164；关于广州当局，175
Cleopatra 克里奥帕特拉号 59，121，158
Clifford, Col. 克利福德上校 211
Coasting trade, and the Customs 沿岸贸易与海关 243
Cobbold, Rev. R. H. 柯宝德 24，27，38，40，87，99，108，109，118；共进午餐，45；一次被邀请，74；共进茶点，88；共进圣诞宴会，92，96～97；在密妥士的宴会上，97，共进午餐，103；在哈特案件中，109；讲道，110，122，129
Cobbold, Mrs. Caroline 柯宝德太太 61，96～97，109
Cohen, H. 科恩 305
Collier st. 科利尔街 广州，187
Collins 柯林斯 227
Colvile, Capt. 科尔维尔上校 195，365 页注㊼，196，216
Comet 彗星 赫德看到的，222
Comus 科莫斯号 193
Confessions of a Thug 《刺客自白》 219
Confiscation cases 罚款案件 304；阿礼国的涉及，375 页注㉑；布鲁斯的涉及，301，302；赫德的中文译文，306
Confucius 孔子号 116，131；海盗船，136，139

Consuls 领事 认可书，278，378 页注㊼，302；商人的，301
Contades, Vicomte de 康塔德，德 177，178
Cooke, George Wingrove 库克，乔治·W 186 页注⑯，365 页注㊷，366 页注㊺，367 页注㊻，370 页注㊵；海盗船，158；宁波之役，160；缺少译员，363 页注㉗
Coolie emigration 苦力移民 319
Cooper 库珀 在玫瑰花案件中的辩护，311，312
Cooper, James Fenimore 库柏，詹姆斯·凡尼莫 21
Cox, Teresa 特丽萨 22，97
Cox, Rev. 郭修理 在广州，219
Cox 考克斯 来信，205
Crawford, Lieut. Col. 克莱福德中校 广州法庭庭长，189
Creamer 克里默 312
Crimean War 克里米尔战争 173
Croker, Capt. 克罗克上尉 188，199
Crommelin, Louis 克罗美林，路易 4
Cruise of the Midge 《米奇的巡航》 137
Culbertson, Michael Simpson 克陛存 38，116
Cunningham, Edward 金能亨 165，315，391 页注㊷，316
Curzon, Robert 寇松 135
Cycles 甲子 271，377 页注㉝
Cymbon's lodying house 西梦寄宿舍 123
Da-ying 大英 128
D'Abouville 达巴维 法兰西海军最高司令官，185，361 页注⑬，186；路易·拿破仑，210
D'Aiguebelle 德克碑 299，385 页注㉑，300，301
Danicourt, Bishop 顾主教 38，348 页注③，110
Danvers 丹佛斯 209
Davidson William 戴维森，威廉 63，131；鸦片贸易，55；护航，56；海盗，59，354 页注㊷，129，158；船受到威胁，121
Davidson 戴维森 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账房，152

Davies, H. Tudor 德都德 去世，255，298，384 页注⑩
Davis, Miss 戴维斯小姐 304
Dawn 黎明号 47，126
Defence Committee 上海防务委员会 286，380 页注⑦，292
De la place, Father 田嘉璧神父 38，348 页注③，110
Denmark 丹麦 269，271，272，288，292，381 页注㉒；允准长江贸易，292～293
Dennys, Nicholas 德尼克 271，377 页注㉜，276；《中国邮报》，293 页注⑨
Dent, Henry 颠地 355 页注㊾
Dent & Co. 宝顺洋行 45，59；鸦片贸易，55；船只，111；茶叶出口，268
Deo-vu Ah-san 豆腐阿三 52
Depuis 德佩斯 49
Dewan 狄万号 134
Dick, Thomas 威妥玛 249、255、274、298，385 页注⑩，300；去信，304；在上海，313，316
Dickens, Charles 狄更斯 130
Dickson, Dr. 迪克森医生 186，362 页注⑯，190
Diao 第多号 56
Dom Joao I 东耀 1 号 159
Dombey and son (Dickens) 《董贝和儿子》(狄更斯) 42，81，82
Donegal Square Me thodist Church 邓尼格广场卫理公会教堂 6
Draw backs 退税 268，290，381 页注⑧，296，297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红楼梦》 138
Drum tower 鼓楼 宁波，35
Dublin 都柏林 与贝尔法斯特的差别，4；赫德在该地，321
Dublin University Magazine 都柏林大学杂志 75
Duins 杜因斯 88，97，98；海盗，118
Duncan 邓肯 一个商人，被杀，200，216，219；他的儿子，218
Dyer, Miss B. H. 戴尔小姐 (B. H.) 62；在圣诞宴会上，96

Dyer, Miss Maria J. 戴尔小姐（M. J.） 62，88，103 页；在圣诞宴会上，96～97；在船上，128～129，151
E-Wan-tang 益文堂 208
Earth-quake 地震 在宁波，125
Edan 伊担 165，167，309，288 页注⑭
Edgar, Richard 爱德加 理查德，3；通信，84，133
Edgar, Tom 爱德加 汤姆，去信，134；到广州，215
Edgell 埃杰尔 护民号舰上的高级海军军官，184，361 页注⑥，186，203，222；官员，208；翻译布告，208
Edinburgh Review 爱丁堡评论 75，81
Edkins, Dr. Joseph 艾约瑟医生 43，97，362 页注⑯
Egypt 埃及 392 页注⑯
Electra 厄勒克特拉号 315
Elfin 埃尔芬号 在九江被抓获，274，275，293
Elgin, Lord 额尔金公爵 215，388 页注⑬；任命，172～173；军队转移印度，173；策略，173～174；关于广州当局，175；在北京，177，236～237；关于李泰国的方法，178～179；在天津的谈判，364 页注㊸；旅行日志，367 页注⑳；关于持续的反叛行为，369 页注⑬
Ellis, Capt 埃利斯上尉 192，203；升官，211
Emerson 爱默生 41，86
Emperor 皇帝 权力，254
Encarnacao 恩卡纳考 105，355 页注㊹
Endeavour 努力号 失踪 88
Enterprise 企业号 86
Eōthen (kinglake) 《东方》 30，347 页注㊷。
Episcopal church 圣公会教堂 宁波，开放，108，110
Erin 厄林号 30，346 页注㊱，126，152；运送邮件，352 页注㉜
Essays 论文 赫德的，附在杂志上，140～142；关于宁波，143～146
Evans, Lient 埃文斯中尉 188，194，196，197，198，199，203；在广州的职责；204，208；会餐，206，215；一起骑马，216，217，218，219
Ever-Victorious Army 常胜军 244，247；进展；253；防卫上海，266；

支附，308，387 页注⑬⑦
Exemption certificates 免税证 268，375 页注㉒，296，297
Exequator 认可书 278，378 页注㊼，302，304；文祥的，305；总理衙门的，306，307
Extrality 治外法权 57
Fa-kuo (France) 法（国） 300，(赫德仅写了头一个字)
Fa-wen (French) 法文 300
Faix (burden) 负担 84，352 页注㉝
Fan family 范氏家族 34
Fan-qui (fan-kuei; foreign devil) 番鬼 185，361 页注⑨
Fan yeh-ko kintow 翻了个筋斗 209
Fang-sin 放松 283
Fatshan 佛山 209；防卫，190，363 注㉙
Fatshan Creek 佛山之役 173
Fei-lae-sze (Fei-lai ssu) 飞来寺 201，211
"Fene, puh k 'O' (without you, it willnot be possible)" 非你不可 273
Feng-hua River 奉化江 35
Ferguson 费果孙 387 页注⑬⑨
Finances 财政 赫德的收入，16，84，94，126，127，130，293；在广州，195；储蓄，208，225；海关方面，272；收入概要，298；礼物，298，385 页注⑩⓪，314
Firefly 萤火虫号 314～315，390 页注⑮⑦，注⑯⓪，316
Fisher, Capt 费希尔上尉 186，362 页注⑮，305，386 页注⑫⑦
Fittock, William Henry 费陶，威廉·亨利 22，344 页注㉒，127，136；购买，125，126
FitzRoy 费士来 235，267；李泰国回国时的职责，240，242，384 页注⑩⑨
Flags 旗帜 304，海关的，291，382 页注⑧⑥，293；中国船上的外国旗，301，302
Fogg, Elizabeth phipps 福格，伊丽莎白·费浦斯 345 页注㉝
Fogg, Hiram 福格，希拉姆 27，346 页注㉝

Fogg, James 福格，詹姆士 345 页注㉝
Fogg, William Hayes 福格，威廉·海斯 345 页注㉝
Fogg, Bros. 福格公司 76，84，110
Folkestone 《笨拙》 28
Folly St. 福利街 广州，199，200，204，205
Fong hwa 奉化 128，357 页注㉛
Fontanier 丰大烈 267，375 页注⑳，269；不能胜任，275，308；在总理衙门，299
foo 府第 李泰国的要求，257，265，374 页注⑫，284，287，316
Foochow 福州 112，375 页注㉑；附近的海盗船，139；茶叶贸易，268；为小舰队的款项，266，289，296；巡逻船只，296，297
Foo-seen chapel 湖山堂 宁波，113
Footae 抚台 373 页注⑤
Forbes 福博斯 390 页注⑮，392 页注⑯
Foresten 福莱斯特号 179，184，360 页注①
Formosa 福尔摩萨 196，294
Forrest, Robert James 福礼赐 304，386 页注⑫，305
Fortunate Union 《幸运的联合》 76，77，81
Fortune, Robert 福钧 30，347 页注㊸，45，358 注㊻，136；在密妥士宴会上，97；著作，305，386 页注⑫
Four Books, the (ssu-shu) 四书 43，75
Fox, Johnson 约翰逊·福克斯 41，86
France 法国 220，286；对华贸易，59；在宁波的船只，160；领事，161；二次鸦片战争，172；水手在广州遭伏击，193～194，195；在交趾支那，220，369 页注⑱；和平协议，226；防卫上海，247；传教士遭谋杀，266～267；丰大烈充任翻译，267，308；条约条款，296，297，299
Francis 弗兰西斯号 135
Friend of China, The 《中国之友》 223
fu (prefecture) 府 31
Fuh-keo (men from Fukien) 福建人 在宁波，85，353 页注㉞，87，125，157，159；在广州，185；传播谣言，221

Fung koon 东昆 221，369 页注⑫⑥
Furious 狂暴号 374 页注⑮
Galle 加里 11
Garstin 加斯廷 222，224
Gates 门 在宁波，35，127；在广州，209，216
Gentry 绅士 在广州的动员，169，171，175；恐怖活动计划，192～193，364 页注㊱，195；乡勇的参与，213；额尔金的抱怨，370 页注⑬②
Gingell 金格尔 167，168
Giguel 日意格 334
Girard 吉拉德号 317
Gleig 格莱格 98
Glover 吉罗福 235
gno-fang (wo-fang; bedroom) 卧房 315
Goddard, Rev. fosiah 高雪山 37，62
Goddard, Mrs. Josiah 高雪山夫人 62；一起喝茶，87；离开，109
Goddard, Miss 高小姐 87，88
Gordon, charles George 戈登 247，374 页注⑭，390 页注⑮②，316；战争的进展，253，315；任命，280，379 页注⑤③；关于庆谢齐，291，382 页注⑧④；扈从中的外国人，389 页注⑭⑨；通信，313，314，315；受伤之谣言，313；戈登的船只，314～316
Gough, Rev. Frederick F. 高夫 弗雷德里克，38，44，45，80，81，110，115；在密妥士宴会上，89；在圣诞宴会上，96～97；在密妥士晚餐上，97；寻找出租房屋，105，111；讲道，117；喝茶，129
Gough, Mrs. Frederick 高夫太太 80，81，96；分娩，109
Gough, Sir Hugh 郭富爵士 346 页注㊳
Gower 高尔 229；来信，205
Grand Counci 军机处 371～372 页注②
Grant 格兰特 77，93，97
Gray 格雷 在广州的一位牧师，227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赫德的角色，2；保护贸易，59，157～158；海关，162；广州人的仇外，170；第二次鸦片战争，171～172；要求，172～

173；和平协议，226；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230；防卫上海，245～246；对清政府的政策，246；赫德推动现代化的努力，325；从中国转向日本，337
Grecian 希腊人号 25，46，92；运送邮件，97
Gros, Baron 噶罗男爵 172，173；到达广州，174；在北京，177，236；在天津谈判，364 页注㊸；美理登充任翻译，375 页注㉑
Guierry 吉耶尔利 348 页注③
Gützlaff, Charles 郭士腊 329
Gutzlaff Zsland 郭施拉岛 98，354 页注㊿
gyang-dao 惯盗 126
Ha laouyay 赫老爷 赫德，94，117，123，226
Haeman Island 海南岛 20
Hague, Patrick 黑格 347 页注㊶，154；充任葡萄牙领事，158
hai-kuan (maritime customs) 海关 31
Hale 黑尔 副领事，广州，228
Hammond, Edmund 哈蒙德 E. 10
Hammond James L. 哈蒙德 J.， 268，274，300，313
Hangchon 杭州 85；抵抗叛军，136，157；蔡按察使受命到杭州，206；杭州公文，224；落入太平军之手，249
Hangchow Bay of 杭州湾 144
Hankow 汉口 开埠，248，251，263；为小舰队的负担，266；贸易规章，268
Hannen Charles 汉南 298，385 页注⑩⑨，309，388 页注⑭⓪
Hardy sisters 哈黛姐妹 贝尔法斯特，101
Harris John 哈里斯，约翰 41，353 页注㊲
Hart, Agnes 哈特，阿格尼丝 69，100～101
Hart, Anna 赫德，安娜 152，230，383 页注㊽
Hart, Mrs. Henry (Anne Edgar) 赫德夫人，安妮·爱德加 来信，97，128，303；去信，114，293，299，304；礼物，314
Hart, Arthur 赫德，阿瑟 152，230
Hart, Billy 哈特，比利 69，203

Hart, Bruce 哈特，布鲁斯 323，324
Hart, Charlotte 赫德，夏洛蒂 来信，125，284，303；去信，290，304
Hart, Evelyn Anny 赫德，艾米 323，324
Hart, Henry 赫德，亨利 3；来信，97，115，125，128，138，226；去信，126，208，304；汇款，314
Hart, Herbert 赫德，赫伯特 152，230，383页注㊽
Hart, James 赫德，詹姆斯 赫德的祖父，3
Hart, James 赫政，赫德的弟弟，5；来信，128，220；生病，226；去信，290；汇款，314；在海关，324
Hart; Mabel Milbume 赫德，梅布尔 323，324
Hart, Mary 赫德，玛丽 4，15；来信，22，69，110，115，133，220，266，302；去信，97，126，134，208，223，299
Hart, Richard 哈特，理查德 被抱怨，108；受审，109
Hart, Robert 赫德，鹭宾 早年生活，2～6；上大学，6～8；应聘赴中国，9～11；在香港，12～17；往上海，17～21；在上海，22～28；往宁波，29～30；学习中文，42～44；社交生活，44～49；早期的职责，67，84，104，154～155，161；生病，84，86，94，100，109，117，131，139；创作歌曲，90；第一次圣诞节，在宁波，95；被推荐，137，139；论文撰写，140～142，143；故事，142～143；婚礼的描述，147～149；和阿姚的关系，151，153～154，191，192，204，230～232；孩子们，151，152；晋升，156；在联军委员会工作，176，230；到广州，179，184；与广州女人的接触，210，211，218，231；被任命为译员，227，228，229，233；家庭生活（1858～1863年），231，232；辞去领事馆工作，234；进入海关工作，235；李泰国不在时的角色，240，248；第一次访问北京，240～244；小舰队，249～252；在北京谈判小舰队一事，252～259；上海税务司，256，303，308，310；充任总税务司，258，272；与李泰国在总理衙门的会议，263～266，269，273，274，275，282，283，284，289，290，292，304，307；单独在总理衙门的会议，266～269，272～273，276，278～279，280，281～282，285，286，288～289，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9，300，301，302，303，305，306，308；为李泰国的合同作解释，280，281；船只备忘录，283；关于李泰国要求的

摘要，284；健康问题，298，302，305～306；离开，300，385 页注⑯，301，303，319，320；关于中国赴欧洲公使的辩解，300；关于萤火虫号，314～315，391 页注⑲；后期生活，319，320，324；双重文化成就，324～332；个性，327～328；关于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认识，328～332；管理问题，332～338

Hart，Samuel 哈特，萨姆 100

Hart，Sarah Jane 赫德，莎拉·简 79，84，128；来信，217；去信，304

Hart，William 哈特，威廉 在密妥士宴会上，89；船队的情形，108；海盗船，126

Hazelton 黑兹尔顿 302

Hea laou-yah，at the Yamen 在总理衙门的赫老爷 228

Heng-chi 恒祺 候补道，215，219，228，269，278；在总理衙门，207；在广州时与赫德的接触，177，188，189，227，229；被皇帝降级，194；回到总理衙门，214；向商人发布布告，216；来自恒祺的马，221，224，225，226；晋升，224；给阿礼图的信，227；关于广州的贸易问题，234；关于海关问题，235，273；在总理衙门，239，372 页注③，272，274，295，296，300，301，334；与李泰国，266，275～276，277，279；赫德的拜访，270～271；关于甲子，271，272；比利时条约，272，278，288，290，291，292，293；关于李泰国问题，280，281，282，286；与亲王的会议，285，286～287；葡萄牙条约，296；法兰西条约，299；关于佛教，306

Henry，Dr. 亨利医生 112，113，114

Herriott 赫里奥特 205，206，216

Hewlett，Arthur Rotch 有雅芝 185，361 页注⑦

Hillier，Charles Batten 奚礼尔 83，352 页注㉚

Hillier，Edward Guy 禧在明 352 页注㉚

Hillier，Henry Mason 义理逊 352 页注㉚

Hillier，Watter Caine 熙礼尔 352 页注㉚

HO-tung（ho-t'ung；agreement） 合同 李泰国关于小舰队的合同，280，281，282

Hobson，Herbert E. 好博逊 296，384 页注㉓

Hobson, Rev. John 好博逊 约翰 24
Hobson, Mrs. John 好博逊 夫人 61
Hockey 霍基 副官，211
Holland, Capt. 奥伦上尉 378 页注㊸
Holland, John Yeats 奥伦约翰 247
Holloway Col. Thowas 哈罗威，托马斯 186，195，196，201，223；关于联军委员会，176，185，188；对赫德的命令，192
Honan Island 海南岛 204，229；红王炮台，229，371 页注⑭⑦
Hong kong 香港 9，161；赫德在香港，10，11，12～17，341 页注②；华人离开，205，210；走私，235
Hongkow 虹口 上海地区，310，389 页注⑭⑤
Hoo poo leuh le 户部律例 291
HO-ying-puh-ling 呼应不灵 269，280
Hood, Thomas 胡德 68
Hope, Amiral 何伯 388 页注⑭⑪
Hopeful 希望号 139
Hornet 大黄蜂号 191，198，205，214，215，216；水手的盗窃，222
How gua 浩官 192；在广州管理方面，174，188 页，363 页注㉓，195；广州的恐怖主义，193；需索钱财，204；和约之后，215，216，217
His-Shan 西山 265，294
hsiao 孝 386 页注⑫②
hsien 县 33
Hsien-teng 咸丰，皇帝，223，285；逃往热河，236，237；继承，237～238；去世，243
hsien-Kou 先扣 281
Hsin-an 新安 364 页注㊷
hsju-ts'ai 秀才 118，356 页注⑥⑨
Hsu kuang-chin 徐广缙 169，198
Hsueh, Huan 薛焕 240，275，277，292，305，334；态度的变化，372 页注③，263～264；与李泰国的争吵，263，268，273，280；想象的外国经验，279；在总理衙门，280，282，290，291，294，295，296，297，

301，302，306，307，308，335；来自亲王的有关赫德的信息，293
Hua-hsien 花县 187，362 页注⑳，188，190，191，192，216；花县绅士的布告，199，200；乡勇的解散，210
Hua-sha-na 花沙纳 364 页注㊸；额尔金的通信，369 页注㉜
Hua-Ting-chieh 花了枝 199，365 页注㊶
Huang Fang 黄芳 379 页注㊿
Huang Tsung-han 黄宗汉 被任命为两广总督，174，175，362 页注⑲，187，206，218；进展，190；“夷”字的运用，194；皇帝的命令，366 页注㉕；在花县，203；要求钱财，204，211；公文，205，206～207；210，223；被税务监督拒绝的公文，207，208～209；和议，211；鲍威尔被释放，216；侮慢的信件，217；转递，217；秘密公文，224，225；拖延策略，232
Hudson, Joseph 赫德森 58；船失踪，88；海盗，92，93；获救，107
Hudson, Rev. Thomas H. 胡德迈 38，45，86，96，106
Hughes, George 休士 294，382 页注㉒
Hughes, Patrick J. 休士 16，342 页注⑩，17，46，87，95，97，305；通信，112，113，125，129，131～132，201，208，210，212，227，229，294，382 页注㉒
hui-i 会议 281
Huliatt 休利阿 196，365 页注㊾；讲道，226，227
Hunan Army 湘军 253
Hung Shan 黄山 221
Hwa lin sze 华林寺 201，217
Hwa-ting 法庭 280
Hwang 黄州 204
hwo-chang 和商 279
Hyson 希森号 戈登的船，315，391 页注⑯
I (E, barbarian) 夷 355 页注㊷，281
I-hsin 奕䜣 恭亲王，256，384 页注⑩；崛起，237～238，224，371 页注②，373 页注⑩；与李泰国，239，255，273；与赫德的接触，241～242，326；小舰队，250，285；关于舰队的指挥，253，265，279，282，

287，288；与阿思本，256～257；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258；李泰国的来信，266，272；关于贵州传教士被害案，266～267；对总理衙门的指示，269；李泰国问题，271；关于白齐文，377 页注㊶；关于李泰国，275～276，292；对李泰国备忘录的评论，280，286；权力的限制，282；李泰国的上呈，282；布鲁斯关于没收充公事宜的来信，301；关于赫德留居北京事宜，319～320

I-liang 怡良 212；江海关，166，367 页注㊽，关于外籍税务监督，167～168

Imperialism and the Customs 帝国主义与海关 325～326，337

Indemnities 赔款 272，337

India 印度 10；鸦片贸易，54；兵变，173；英国在印度的角色，326

Inflexible 不屈号 叶名琛被囚禁，174

Inglewood 英格尔伍德号 104，125；服务员，104；船员的争吵，105；运送邮件，112

Inglis，Heriry D. 英格利斯，亨利·D 3～5

Inspector General 总税务司 李泰国充任，232；赫德充任，258

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 255；赫德的翻译，255，295，302，303，306

Iona 爱渥娜号 17～22

Iris 虹彩号 92 页；送信，97，113

Island Queen 皇后岛号 251，304

Jacobs 雅洛布斯 196，211，216

James 詹姆士 80

Jardine，Matheson 8c Co. 怡和洋行 22，152；鸦片贸易，54～55

Jehol 热河 236，237，243

Jenkins，Capt. R. 詹金斯上校 193，364 页注㊲

Journals 日记 赫德的日记，序言；日记中的缺页，150～151，230～231

Julien，stanislas Aignan 斯坦尼斯拉斯·艾格南 42，126，357 页注㊼

kae-yin 盖印 301

Kan-urh-lsze 干儿子 294

Kan-yin 官印 209

kea-ho 家伙 126
Kea-Keuen 家眷 279
Keane 基恩 25，26，46，353 页注㊵；在密妥士宴会上，97
Keang-kun 江村 190，364 页注㉚，192；鲍威尔在江村，216；邓肯和男孩在江村，218
Keangsu 江苏号 小舰队船只之一，312，313，316，392 页注⑯⑨
Keelung 基隆 294
Keentuh 监督 李泰国的推荐，269，280，284，291
Kemp，James 肯伯 293，382 页注㉑，194
Kennedy，Col. 肯尼迪 192
Kennedy Thomas 肯尼迪 托马斯，亚罗号船主，171
Kenney，James 肯尼迪 詹姆斯，370 页注⑭③
Kennie 肯尼 审计官，224
Keppel Commodore Harry 哈里，凯伯尔，173
kewen 权 265；李泰国要求权力，266；阿思本的要求，280
Kuen-Ke 军机处 279，301
Kew-fuh-chow 九袱州 295，383 页注⑨⑨
Khomburg 孔布尔格 少校，227
Kiaochow 高桥号 387 页注⑬⑧，313，390 页注⑮②
Kilburne，Wm. 基尔本，威廉 105
Kilmorit arty 基尔摩利阿 3
Kin chae 钦差 77，267
Kin chae Kwan，pan twan leen tsung Keuh 钦差官办团练总局 207，367 页注⑧⑧
King 庆丕 328
king-fei 经费 307
King lake 金雷克 亚历山大，347 页注㊷
Kick，Dr. 寇克博士 126
Kiukiang 九江 268；开埠，248；负担小舰队经费，266，289
Kleczkowski 克坷吉 240
Knowlton，M. J. 那尔敦 37，62；讲道，80

Knowlton, Mrs. M. J. 那尔敦太太 62, 85～86
ko-k'o-tow 磕个头 204
ko-kuo-t'ung-li 各国通例 305, 386 页注⑫⑥
k'o-woo 过瘾 295
Köng-tung 衖东 129
kuan-nua 官话 43
Kuan-li shui-wu, chu 管理税务处 334
Kuan-wen 湖广总督官文 248
Kuei-liang 桂良 在天津谈判, 364 页注㊸, 237; 黄的继任者, 212; 368 页注㊽, 214; 额尔金的通信, 369 页注㉜, 总理衙门, 238
K'un-shan 昆山 379 页注㊻
Kung-he 恭贺 102, 103
Kung poo She-lang 工部侍郎 294
Kung-sze 公事 104
Kwan-yin shan 观音山 186, 214
Kwang-heii loo-sze 都司 204, 366 页注㊵, 205
Kuangtung 广东 157
Kwangtung 广东号 小舰队船只之一, 314 , 392 页注⑥⑤
Kwei-lin 桂林 279 页。
Kweichowprovince 贵州省 法国传教士被杀, 266～267, 376～377 页注⑲, 270, 278
Kwei-keu 归结 302
Kwei-tih mun 贵德门 193, 200, 366
Kwo-peaou 没耳之头 218, 219
Lady Mary Wood 玛丽·伍德夫人号 163
Lambert, Capt. 兰伯特 209, 212
Lampson 兰普森 216
Lan wei-wen 兰蔚雯 168
Langton 兰顿 200～201
Lao Ch'ung-kuang 劳崇光 268, 269, 334; 关于粤海关, 234; 关于小舰队, 249

Laou teen 老天 296
laou fung lew 老风流 273
laou tseaou-je 老小姐 273
laou-sze 老师 205
laou-yay 老爷 266
Lawrence 劳伦斯 309，388 页注⑭
Lay，G. Tradscant 李太郭 343 页注㉒
Lay，Horatio Nelson 李泰国 22，343 页注㉒，注㉓，25，27，28，280，306；被任命为税务监督，136，161，168 页；在上海充任翻译，166 页；背景，167；崛起，177～179 页；在上海的贸易谈判，370 页注⑬，240；海关的扩展，232；广州的海关，234，235；总理衙门的任命，238～239；离任，239，256，284 页注⑩；个性，248，254，257，258，263，374 页注⑫，269，273～274，276，279，282，283，329，331；小舰队，249～252，257；在北京谈判，252～259，263；回到中国，263，371 页注①；在总理衙门的会议，263～266，269，273，274～275，282，283，284，285，289，290，292，304，307；关于小舰队的财务问题，266，269，270，284，285；赫德的备忘录，271，278，296；与恭亲王，275～276，292；争吵的结果，276，279；李泰国雇员充当密探，281；乘轿子到总理衙门，282；最后的条款，286；赫德对难点的摘要，287，288，288～289；离开北京，291，293；与布鲁斯，294；关于海关公文，297；在上海被任命，298；通信，298，299，300，302，313，314，315，316，317；新居，第303，306；巴斯勋章，309，387 页注⑬；阿思本的辞职，314，390 页注⑮，316；总理衙门的评论，316
Lay，William Hyde 李蔚海 22，343 页注㉒，27，167，313；对中国人的态度，47，84；在宁波，49，83～86
Lay-Osborn Flótilla 李泰国—阿思本小舰队 筹划，249～252；组织，250，388 页注⑬；北京的谈判，252～259；抵达，256，310，388 页注⑬；失望，257；赫德关于此事失败的看法，258 页；财务问题，266，374 页注⑬，269，271，284，289；解散，314，315，316 页，392 页注⑮
Le 李 广州的一个线人 207
Le-Kow 洛口 315，391 页注⑮

Leang Soo 梁 303，306，307
leang-tseen Ying-tsze 两钱银子 213
Leen-tung 岭东 131
Legge, James 理雅各 386 页注⑫⑨
Lelson 勒尔森 199
Lemon, Lieut Col. 莱蒙中校 189，363 页注㉗，225，226
Leonard 林纳 303
Lever, Charles James 利弗 7，130
Lew Seen Sang 刘先生 363 页注㉗，212；在狱中，217
li (principles) 礼 280
li (strength) 力 287
li (1/3 mile) 里 308
Li Hsiu-ch'eng 李秀成 236，246，247
Li Hung-chang 李鸿章 236，252，254，294，307，317，334；江苏巡抚，244；与太平天国，247；准军，253；与小舰队，255，372 页注③，287，380 页注⑬，288，292；与白齐文，377 注㊶；关于上海关税的征收，290 页；关于巡逻船只，296 页；支付戈登部下，308，387 页注㊲；关于马格里，391 页注⑬⑨
Life foralife 《生平言行录》 309，388 页注⑭⓪
Life in Earnest 《认真生活》 112
Light Dragon 《轻龙骑兵》(格莱格) 98，99
Lin Fu-hsiang 林福祥 192，364 页注㉟，218
Lindsay & Co. 林赛公司 278
Ling 林 赫德的老师，婚礼，147～149
ling che 凌迟 195，364 页注㊹，200
Ling Jyiao mun 临桥门 129；附近的庙宇，127
Linon 临安 杭州，孟甘在临安，208，367 页注㊾；布告，208；远征临安，209；对破坏的反应，213；新的困扰，220
lis burn 利斯本 北爱尔兰，4，321；礼拜堂，95
Little 李特 在广州，202，223
Lo Ping-chang 骆秉章 384 页注⑪⑤

Lo Tun-yen 罗同源 190，363 页注㉚，202，207，218；进攻广州，366 页注㉕；条约之后，222；额尔金的抱怨，369 页注㉜
Loan 借款 李泰国促动的，264，265，266，270，277，279，284，289
Lobscheid, Dr. Wilhelm 罗存德医生 185，361 页注⑦，204，225
Lockhart, Dr. W. 雒魏林医生 196，365 页注㊾
London News Illus trated 《伦敦图画新闻》 75
Lookong: receiving station at 陆港接收站 46，55，152；海盗，134
Lord, Rev, E. G. V 罗尔梯 37，80，81；讲道，102；海盗，126
Lord, Mrs, E. C. 罗尔梯太太 81；被偷窃的书，134
Loughlin, Ian 洛夫林，伊恩 76
Lowrve, Rev. Walter M. 娄理华 38，41，55；坟墓，113；回忆录，113，127
Luckwa 勒克瓦 194，218
Ludlam, Capt. 勒德拉姆上校 314～315，391 页注⑮
Luh 陆 271，301，307
Lung Tuan-hsi 龙端席 190，363 页注㉚，202，205，207，218；条约之后，221；额尔金的抱怨，369 页注㉜
Luson, Thomas Goddard 路森 270，376 页注㉛
Ma-laou-yay 马老爷 123
Macao 澳门 葡萄牙人，155，158；阿姚，204，366 页注㉙；华人离开，205，210；巴夏礼夫人，205，206；走私，235
Mac Cartee, D. B. 麦嘉缔 38，50，62，64，66，105，122；拍卖，88；喝茶，110；散步，111；到日本，115～116
Mac Cartee, Mrs. D. B. 麦嘉缔夫人 62，64，68，105，116
Macartney, Halloday 马格里 387 页注㊲，389 页注㊹，331；活动，315，391 页注㊾
Macgo wan, Danvel Jerome 玛高温 37，41，44，49，66，67，85～86，112，136；赫德的首次拜访，61；借书，70；一起用早餐，80，81；美国副领事，121
Maegowan, Mrs. D. J. 玛高温夫人 81
Mackey, J. 马基 270，376 页注㉛，381 页注㊶，291；来信，300，

303
Macpheson, A. 马福臣 255～256, 270, 376 页注㉛, 274; 来信, 304
Magazine Hill 弹药库山 200, 366 页注⑦⓪, 203
Mail 邮件 时间, 27, 46; 到达, 76, 97, 115, 125, 128, 139; 路线, 84, 352 页注㉜
Male branche, Nicolas 马莱勃朗奇 65
Mann, Captain 曼上尉 203, 361 页注⑤, 314, 390 页注⑮⑥
Manchus 满洲 中国人的排外, 170, 336; 征服中国, 326; 与英国的合作, 326～327
Mao Hung-ping 毛鸿宾 292, 382 页注⑧⑦
Markham, John 马安 310, 389 页注⑭③, 312, 316
Marques, J. F. 马奎斯 45, 62, 66; 95, 158; 海盗, 353 页注㉞, 159; 在密妥士宴会上, 89～90; 与贝姆文多, 96, 97
Marriage 婚姻 中国人的, 16; 赫德的思考, 71; 赫德关于婚礼的描述, 147～149
Marshall, Humphrey 马歇尔 164～165
Martin, Samuel Newell 马丁 38, 41, 50, 107, 110; 在密妥士宴会上, 89
Martin, william A. P. 丁韪良 37, 38, 40, 42, 44, 45, 84; 传教士生涯, 50, 54; 海盗, 55
Martin, Mrs. S. N. 马丁夫人 62, 110; 邀请喝茶, 74～75, 76
Martin, Mrs. W. A. P. 丁韪良夫人 129
Martineau des chavez, Capt. F. 马蒂诺 223; 关于联军委员会, 176, 185, 187, 189, 196, 197; 给赫德的命令, 192; 赫德的道别, 228
Matheson 马西森 黄埔海关副税务司, 235
Mauboujin 英布君 310, 311, 313
Mayers, willoam S. F. 梅辉立 312, 389 页注⑭⓪, 315
Maynard 梅纳德 宁波号大副, 129
Maze, James 梅兹 詹姆士, 342 页注⑧
McCosh, James 麦科什 詹姆士 80, 113, 114
Mc Cullen, James 麦卡伦 詹姆士 128

Mclane, Robert M. 麦莲 25，345 页注㉛，352 页注㉜，272 页注③；江海关，166 页；条约的修订，170；第二次鸦片战争，172
Meade, H. J. 米德 313，390 页注⑭
Meadows, John Armstrong Taylor 密妥士 30，346 页注㊶，39～40，49，86，112，135，138，270，274；中国妻子，40，153；举办宴会，44～46，89～90，97；与葡萄牙人，58；辞职，60，125～126，127，132，154～155；为赫德导游宁波，61～64，84；关于宗教，66，74，97，110；船只，67；健康，77，78，79；职责，87；在圣诞宴会上，92，96；贝姆文多事务，95～96，105，125，126，136，159；关于“维维德”号案件，108；上海之行，114，115，118，121；关于抓捕西方人的案件，123；赫德的租房，134，137，156；受命赴广州充任翻译，229，233；在天津，309
Meadows, Mrs. 密妥士夫人 47，117，130，131，224
Meadows, Thomas Taylor 密迪乐 346 页注㊶，43，355 页注㊷，212；在宁波，357 页注㊽，155；回国，166
Medhurst, Walter Henry, Jr. 麦华陀 25，345 页注㉙，125，167；在宁波，83
Medhurst, Walter Henry, Sr. 麦都思 43，349 页注⑪，97
Memoirs of Rizhard williams 《理查德·威廉斯回忆录》 93
Mencius 《孟子》 42，43，114，126，224
Mercer, Marcus Robert 默赛尔 390 页注⑤
Mercury 《信使》 133
Meritens, Baron Eugène de 美理登 267，375 页注㉑；李泰国继承者人选，270；去信，294；巡逻船只，295，296
Michie, Alexan-der 宓古 304，386 页注⑫
Middle kingdom, The 中国号 78
mien (“face”) 面 336
Mih-hae-kwan 墨海馆 306，387 页注⑬
Miller, Hugh 米勒 休，41，88
Millne, Willvam 米怜 108，355 页注㊼
Missionaries 传教士 在宁波，37～42，50，146；在宁波的名单上，37～38；报酬，76，350～351 页注㉑

Mixed Tribunac 会审公堂 294，383 页注㉝；布鲁斯，301，302；李泰国，304
Moges, Marquis de 莫奇侯爵 361 页注⑬，362 页注⑱，371 页注㊻
Mongan, James 孟甘 15，16，22，25，27，28，46，305，341～342 页注④；访问宁波，49，83～86，97；通信，76，108，110，114，115，125，126，127，138，204，215，227；赴广州，184；在临安，208；赫德的存款，208，225
Montagneux 蒙塔尼幼 348 页注③
Moorhead, Henry 穆尔黑德 亨利，223，228
Moorhead, Robert 穆尔黑德 罗伯特，125，357 页注㉕
Moriarty 默里 310，313
Morier, James 摩里尔 詹姆斯，358 页注㉑
Morris, Robert Frederick 莫里斯 罗伯特·弗雷德里克，228
Morrison, M. C. 马礼逊 罗伯特博士，27，360 页注②；编字典，27，346 页注㉟，125，128
Morse, Hosea B. 马士 150，175
Morton, colonel 莫顿上校 314，390 页注㊻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 最惠国条款 170，381 页注㉜
Moule, Rev. George Evans 慕稼谷牧师 309，388 页注㊷
Muirhead, Rev. W. 慕维廉 在上海讲道 313
Mu-k'o-te-na 穆克德纳 174，185～186，216；广州政府，175，232；叙述，361 页注⑬；条约之后，203，209；正式拜访，228
Mulock, Dinah Maria 马洛克，玛丽亚 388 页注㊹
mun-shang 门上 190，364 页注㉛
Murphy, Robert C. 马辉 上海海关，165～166，167
Murray, Capt. R. N. 默里 313，314
Murray, John C. 默里，约翰 270，301，304，306，307
Nanhai Magistrate 南海知县 216，226；在监狱，225
Nanhai prison 南海监狱 227
Nanking 南京 248，268，316；太平天国首都，157；清军的胜利，297，300

Nanking, Treaty of, revisoon of 南京条约的修订 25
Nan-zing 南津号 291 页，382 页注㊺，313；送邮件，293；退款，304；赫德关于该船，309，310
Naou tih heung 闹得很 200
Napolean, Book of Fate 拿破仑命书 23
Navigatoon Acts 航海法 162
Netherlands 荷兰 381 页注㉜
neu nyōh 牛肉 94
Nevius, Helen Coan 倪维思，海伦，柯恩，40，44，62，76，88，103，114；关于中国的著作，50，53～54；年龄，98
Nevius, John Livingston 倪维思，约翰 38，40，44，49，76，88，103，107，110，113，114；关于中国的著作，50；赫德的首次会面，62；讲道，85，94，113；在密妥士宴会上，89，年龄，98；生病，109，122；一起喝茶，115
New Year 新年 中国的，115，117，118
New chwang 牛庄 268；税务司，290，381 页注㉛
Nicolas, Commander B. G. W. 尼古拉斯上校 313，390 页注⑮，314，317
"Night at Notting Hill" 《诺丁山之夜》 227
Nimrod 尼姆东德号 160
Nina 尼娜号 111
Ningpo 宁波 33，304；赫德被派到宁波，17；从上海到宁波，28～29；到达，29～30；外国人社会，31；安顿，34～35；活动，35～36；贸易，36～37；传教士，37～42，50～54；对外贸易，54；广东人和福建人，87；叛乱，134，157；赫德的文章，143～146；妓院，145；葡萄牙人与广东人，157，159～160；走私，162；太平军的占领，246，249
Ningpo 宁波号 129
Nora 诺拉 一只小狗 117，356 页注㊽，137，151
North Brotish Review 《北不列颠评论》 75，81
North China Herald 《北华捷报》 212，221，245，311，314，328
North Edinburgh Review 《北爱丁堡评论》 75

nous (mind) 脑 274
Nuy-Ko 内阁 279，301
Nymph 仙女号 111
Old Forest Ranger 《护林老人》 223
Oliphant, Laurence 俄理范 36，177，178；在上海谈判，370 页注⑬④
Oliver, Rev. John 奥利佛，约翰 6
Oliver 奥利佛 玫瑰号可能的主人，312
Opium 鸦片 接收站，46，55，152；贸易，54；走私，234，268；海关，243；税收，295
Oriental Bank 远东银行 208
Osborn 阿思本 249～250，273；条款，251，256～257，275，283，286，287～288，291，313；到达中国，256，310，388 页注⑭③；辞职，257，258，313～314；390 页注⑮④；支付，266；亲王的评论，280；离开，316～317，392 页注⑯⑤
Osprey 鱼鹰号 98
Our Life in China 《我们在中国的生活》 50
pa shih-te 恐怕是的 264
Pa ta lan pih 巴达兰比 185，361 页注⑫；其子，221
pae yin 白银 207
Paine 佩因 218
Palmerston, Lord 巴麦尊勋爵 56，163，387 页注⑬⑨
pan sze 办事 189
Pan-tang 泮塘 214
Pan-t'ing-qua 潘定官 364 页注④⑤，218
P'an Chen-ch'eng (Puan khe-qua) 潘侯官 364 页注④⑤
Päng-jen 帮人 265
pang pan tsung shway sze 帮办总税务司 293
pang-t'ung tsung-t'ung 帮统总统 255
Pao-yun 宝鋆 334
Paoutihle 宝德来号 126
Paris Exhibition (1878) 巴黎博览会（1878 年） 322

Parkes, Harry 巴夏礼 10, 167, 189, 202, 203, 226, 240; 与巡逻的条约, 136; 亚罗号事件, 171～172; 关于联军委员会, 176, 184～185; 赫德与他的职责, 186, 187, 191～192, 196, 197, 210; 受到奖励, 362页注⑳, 198, 216, 369页注㉜; 关于中文的知识, 363页注㉗, 关于广州的恐怖主义, 193; 在澳门, 206, 208, 210, 218, 225; 一起骑马, 211, 214, 221, 223; 去信, 220; 将军的信, 223; 与赫德分手, 228; 在北京被捕, 236

Parkes, Mrs. H. 巴夏礼夫人 185; 在广州, 192, 226; 去香港, 195; 在澳门, 205, 206, 210, 225

Parkes, Major 巴夏礼少校 197

Pastor's Sketches 《一个牧师的笔记》 109

Patridge, Capt. Dan 帕特里奇船长 28, 346页注㊱, 36, 42, 57, 98, 109, 122, 129, 201; 在密妥士宴会上, 89～90; 海盗, 91～92, 134; 在晚餐上, 97; 赫德在其住处, 139, 152, 156, 231; 通信, 215

Payne 佩恩 212, 312

Pearl 珍珠号 261, 375页注㉑

Peen 聘 306

Pei seen shang 贝先生 225

Peiho 白河 包令赴白河, 170; 要塞, 309, 388页注㊶

Pekin 北京号 小舰队船只之一, 256, 310, 317

Peking 北京 西方人进入北京谈判的努力, 170, 177; 公使驻京, 196, 225, 232～233; 联军, 236～237; 赫德的首次访问, 240～244; 关于小舰队的谈判, 252～259; 作为赫德的总部, 319～320

Peking Convention 北京会谈 246

Perry, Joseph 佩里 108, 审判, 109

Pih-sha 白沙村 144

Pin-ch'un 斌椿 320

Pinder, F. W. 平德 310, 312

Ping hing 平行 265

ping-keuen 兵权 279

Pirates 海盗 18, 343页注⑲, 214; 进入宁波的通道, 29; 对外国贸易

的威胁，55～59；在宁波附近，85，352～353 页注㉞，111，125，126，136
Pitman, Capt 皮特曼舰长 56
Po-kuei 柏贵 215，362 页注⑱；广州的政府，175，232；正式访问，187，188，189，192，208，214，216，218，222，228；布告，193，219；被皇帝降级处分，194；条约签订之后，203，204；来自黄的信，205，210；病假，206；信函，207；撤除衙门的警卫；207，209，213，216；黄的布告，211；重掌官印，212，213～214；关于外国人的安全，215；与西马糜各厘，215；以严厉著称，219
Portadown 波塔当 北爱尔兰，2
Porten James 巴德 詹姆士 309，387 页注⑲
Portugal 葡萄牙 381 页注㉜；条约，296
Portuguese 葡萄牙人 在宁波，58；海盗，352～353 页注㉞，157；本姆文多事件，95～96，159；广东人，157
Post Office 邮局 赫德的职责，84～85
Powell 鲍威尔 被捕，204；被送回，216
Powhatan 宝哈坦号 159
Poyang 鄱阳号 263
Pre-Adamite Earth 《亚当前的土地》 88，93，94，104
Prefect's Colledge (Fu-hsueh kung) 府学宫 187
Premare, Father Joseph Henride 马若瑟 97，114
Presby terians 美国北长老会 在宁波，38，146；教堂，64～65
Priesthill Methodist Church 教士山卫理公会教堂 都柏林，6
Primitive Chapel 原始礼拜堂 贝尔法斯特，99
Prine Eugene 欧仁王子号 267
Prosons in Canton 广州监狱 赫德的访问，225，370 页注⑩
Prospect Hill 眺望山 227
Prospero 昌盛号 185
Provinces 省 权力，254；海关税收，264，373 页注⑥
Prussia 普鲁士 381 页注㉜
Psyche 赛克号 出售，131，358 页注㉟；船主被杀害，139

P'u Hsing-yu 浦新玉 58，85，91，158，159
P'u Liang-t'ai 浦良泰 352 页注㉞，158，159
Pughe，Capt. 皮格上尉 222
puh beaou teh 不晓得 94
puh kan pan 不敢办 277
puh show shang lang 不接受商量 279
puh tso 不错 279
Punch 《笨拙》 27，30，286，294，295
Putiatin，Count 普契心伯爵 178
Putung Point 浦东岬 165
Pwan 潘 197，205，206，209，210，211，214
Pwan-ju magistrate 番禺知事 布告，209；期望回返，216；公文，224
Pwanyu Prison 番禺监狱 218，227
Pym，Capt. 皮姆 188，362 页注㉒，190，226；在广州审讯中任检察官，189；赫德的接触，191，193，216；搜查，198，200，208；一起骑马，209，210，211，212，213，220，227；共同用餐，225；增援，226
Quarterly Review 《评论季刊》 81
Quarterman Rev. J. W. 夸特曼 38，39，44，50，54，76，88，105，109；讲道，69，87，110，138；在辩论会上 77
Queen's Colledge 女王学院 6；教育，7；为领事馆服务，9～10
Raaslaff，Col. 拉斯勒福 266，274 页注⑯；条约，278，291，292～293
Racehorse 赛骑号 16，21～22
Ranger，Willoam 兰杰 威廉，311，312
Rankin，Rev. H. V. 兰津 38，50，64，83，103，125；讲道，108，116；一起喝茶，110 页；在中国人的礼拜堂，113
Rankin，Mrs. H. V. 兰津夫人 62，103，116
Rattler 响尾蛇号 往白河，25；在宁波，83
Rebels 叛乱 攻击广州，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4，205，206；口令，209；坚持，221；斩首，221
Red Sandstone (miller) 《红砂岩》 88
Reed，William B. 列卫廉 365 页注㊷

Rees, Capt. 李斯船长 131, 357 页注㊺; 被杀害, 139
Religion 宗教 赫德关于宗教, 12～14, 65, 70～71, 77～78, 79～80, 81, 82～83, 91, 93, 101～102, 104, 107, 113～114, 116; 论文, 140～142; 热情减少, 153
Rice 米 在广州的价格, 134; 在上海的价格, 274, 276
Richards, Sgt. 理查兹警官 190
Rigault de Genouilly, Admiral 里戈, 德·吉奴伊 173
Ring, Jem 林, 杰姆, 125
Rizzi, Z. 里齐 348 页注③
Roberts, Capt. 罗伯茨船长 59; 援救费, 98
Roberts, Tom 罗伯茨, 汤姆 123, 124
Robertson, David Brooke 罗伯逊, 丹尼尔·布鲁克 127, 357 注㊾
Roche-Chouart, Count R. 罗淑亚 267, 375 页注⑳
Rocket 火箭号 128
Roman Catholics 罗马天主教 在宁波, 38, 62, 110, 145～146; 在中国, 299
"Ron of Amiens" 《埃米恩斯的罗恩》 224, 227
Rose 玫瑰号 210, 389 页注⑯, 311, 312
Ross, David 罗斯, 戴维 76, 351 页注㉒, 79; 去信, 84, 134; 来信, 133
Russell, Janet 拉塞尔, 珍妮特 101, 128
Russell, lord John 陆赐 27; 卜鲁斯关于赫德的信, 242～243, 244; 关于李泰国授与巴斯勋爵勋章, 388 页注⑲
Russell, Mrs. 拉塞尔太太 107
Russell, Rev. W. A. 陆赐 38, 41, 44, 49, 66, 87, 88, 109, 126; 海盗, 55～56; 在圣诞宴会上, 96; 在密妥士宴会上, 97; 拜访, 105～107, 125; 礼物, 109; 教堂, 110, 114; 讲道, 115; 随船旅行, 128
Russell, Mrs. W. A. 陆赐夫人 41, 62, 88, 96, 105～107
Russell 8c Co. 旗昌洋行 165
Russia 俄国 二次鸦片战争, 172; 海南的口岸, 196; 太平军, 246; 蒙古, 309

sa hwang 撒谎 272
Sacred Edict (trans. Milne) 圣谕 108
St. Guerre, Admiral 圣戈尔 25
Salamander 萨拉曼德号 124
Saltpetre 硝石做生意 55
Salrage 援救费 134
Salway 萨尔威 亚瑟，310，389 页注⑭
Sampson 桑普森 215；婚姻，212，220，223
san pai 三白 302
Sang/peaou/yung (braves) 乡勇 210
Saracen 赛拉欣号 17
Saumarez, Lt. 索罗雷茨 215，368 页注⑩
Savage, Marmion W. 萨维奇，马密昂 351 页注㉘
Savage, Lient 萨维奇中尉 212
Schereschewsky, Rev. S. I. J. 施约瑟 275，299
Scott, Mr. 斯科特先生 去信，300
Scott 斯科特 走私者，227，229
Scott, Michael 斯各特，迈克尔 358 页注㉚
Scott, Sir Walter 斯各特，沃尔特爵士 21
Sekwa 西瓜 296
Seaou nan mun 小男人 200
Sedan chair 轿子 李泰国的，282，287，381 页注㉕
Seën tsung 先生 104
SeuseenShang 许先生 赫德的老师，76，118，来信，134
Sew Achow 肖阿巧 188
Seward, George Frederick 西华 310，389 页注⑭，313；释放白齐文，316
Seward, William Henry 西华德 278
Sewell 西维尔 127
Seymour, Admiral 西马糜各厘 172，173，225，229；给赫德的指令，215；白河，215，216

Shaftesbury, Earl of 沙福特司伯利伯爵 10
shan-hou chang-ch'eng 善后章程 281
shang-liang 商量 273, 276, 277, 281
Shang hae Almanac and Miscellany 《上海年鉴和杂录》112, 355 页注㊷
Shang hai 上海 赫德首次到上海, 21～22; 离开, 29; 英国护航, 59; 太平军, 121, 156; 海关管理, 136, 161, 290; 贸易谈判, 223; 270 页注㉞, 224; 和议告示, 226; 赫德署理总税务司, 240; 防卫, 245～249, 266, 374 页注⑭, 379 页注㊻; 税务司, 256, 300, 308, 310; 为小舰队的负担, 266, 289
Shang hai Courier 《上海差报》 386 页注㉔
"Shang hai, securities" "上海担保" 15, 342 页注⑥
Shaw 肖 219, 223
Shen-seen sang 沈先生 135, 138
Sheng-yü kuang-hsun 《圣谕广州》 43, 98, 99, 104
Shih-ching 《诗经》 43, 75
Shih-deo-2 雪窦寺 28～129
Shih san poo 十三铺 200
Shih-shou 实授 272
Shih Ta-k'ai 石达开 299, 385 页注⑮
Shih-tsieh-poo 石街铺 212
Shih-tsze-shan 狮头山 297
Shillingten, Nora 席林顿 诺拉, 138
Shillington Thomas 席林顿 托马斯, 138
Shimmo tungsē 什么东西 94
shin ching 上呈 李泰国给亲王, 265, 269, 284
shoo 署理 273
Short 肖特 216, 224
Show 手 285
Shu-ching 《书经》 43, 75
shui 税 268
shui-wu 税务 269

Si-Keang 西江 221
Siam 暹罗 条约，358 页注㊾；船只，297，384 页注㉘，300，304，314
Sibbald Dr. D. C. 西巴尔德医生 309，388 页注㊵
Sibbald, William Lee 西布尔德，维廉 296，384 页注㉓，301
Sinclair, Char les A., 星察理 137，155，167，199，221，226，268
Sing she 形式 288
Sing-sin-sang 邢先生 赫德的老师，118，121，122，126，130；被盗，134
Small Sword society 小刀会 344 页注㉗，156
Smith, A. 史密斯，A. 223
Smith, Alkert Richard 史密斯 阿尔伯特·理查德，217，368 页注㉓
Smith, Arthur J. 史亚实 22，344 页注㉒，24，168，388 页注㊶
Smith, Elder & Co. 史密斯·埃尔德公司 152，217；汇款，228，229，314
Smuggling 走私，海关税收 162；在广州，234，235；沿海鸦片走私，268
Snipe 斯奈普号 122
Soo-Ching-Hwang 苏城隍 202
Soochou 苏州 俄理范和德·康塔德赴苏州，178；叛军占领，245；进军苏州，379 页注㊻，316
Southampton 南安普顿 11
Spain 西班牙 369 页注㉘
Spec 斯派克号 56，57；海盗，92～93；白旗，129
Spencer, Ichabod Smith 斯宾塞，伊卡波德，斯密思 41，109
Sphinx 斯芬克斯号 126
Stace 斯太司先生 15，47
Staveley 士迪佛立将军 378 页注㊸
Stephenson, Col. 史蒂文森上校 190，209
Strani, Lizzie 斯特拉尼，利齐 314
Strau benzee, Gen. C. T. von 斯特劳本齐将军 361 页注⑤，185，190，191，203，205，220，221，224，225，229；对黄的回复，211，367 页注

⑨; 一起骑马, 221, 222; 抱怨, 223
Straubenzee, Mrs. 斯特劳本齐夫人 221, 222
Styx 斯提克斯号 357 页注⑥, 127, 132
Su-shun 肃顺 237, 238
Su T'ing-K'uei 苏丁魁 190, 363 页注㉚, 364 页注㊷, 202, 205, 207, 218; 条约之后, 222; 额尔金的抱怨, 369 页注㉜
Subaltern, The (Gleig) 《陆军中尉》 98, 135
Suez 苏伊士 11
Sui-ting-fu 绥定府 266
Suion 遂安 208; 乡勇, 221
Sullivan, G. T. 琐离完 55
Sun 孙 一个佣人 299, 306 送 307
Sung-chiang 松江 391 页注⑨
Surprise 惊奇号 214
Swanton, James 斯旺顿 詹姆士, 77, 100～101, 151
Swanton, William 斯旺顿 威廉, 100～101; 来信, 115; 去信, 119～121, 126
Swatow 汕头 新的条约口岸, 196; 海关, 225, 296; 为小舰队负担, 266, 289
swatow 汕头号 274, 311
Swinhoe, Rohert 郇和 16, 17, 112, 127, 153, 305
Sycee 纹银号 310, 389 页注⑭
Sze-kwan 司官 299
Sze-tang 司堂 276
Ta-Keng-Kioh 大江脚 213
Ta Shih Keae 大右街 207
Ta-ying 大英 272, 377 页注㉞, 287, 380 页注㉕
ta-ying 答应 284
Tae-ping man 太平门 192, 202
tae-pan 代办 265
T'ai-ts'ang 太仓 379 页注㊻

Taiping Rebellion 太平天国起义 10，15，342 页注⑤，157，336；在广州，169；清政府政策期间的变化，236；上海的防卫，245，246
Taipings 太平军（起义军，乡勇） 15；在上海，24，121；在宁波，59，122，134；在镇海，91；胜仗，134
Takao 打狗 294
Taku forts 大沽炮台 233，236
Tang chih chung 唐志忠 190，191
tao-li 道理 329
Tao-t'ai 道台 63
Taotai 道台 宁波，133；赫德的接触，48；海盗，58，85，352 页注㉞，91，126，134，136，159；赫德首次拜访，63～64；道台回访，72～73；和包令一道进餐，83；水上警察，93；“维维德”号事件，108；两个西方人被捕，123～124；海关，136
Tapley，Mark 谭普来，马克 86
Tardif de Moidrey 买忒勒 286，380 页注⑫
Tarrant，William 塔兰特，威廉 184，360 页注②，189，223，310；处罚，214
Tartars 鞑靼人 在广州，203
Tay lor，A. 泰勒，A. 121
Taylor，Capt、Philip Meadows 泰勒，菲利普·梅多斯 369 页注⑳
te-che 体制 254，281，287，336
Tea 茶 销售，136；贸易竞争，162～163；出口，268
Teachers 老师 赫德的，63，67，72，76，80，92，223，225；书，75，98，118；报酬，84，94，109；新年礼品，102；要求威妥玛帮助找老师，109，114；非法行为，111；典型的授课，119～120；翻译，130；盗窃，134；婚礼，147～149；在广州，192
teaou too 条款 273，283，284
Teen Tetuh 田兴恕 法国传教士被田兴恕的部下杀害，266，374 页注⑲，269
Teen tsin Wang 庆亲王 279
Telesio 泰勒修 187

Temple, Capt. 坦普尔上校 200, 366 页注㊺, 207, 226
Ten Thousand and a Year 《一万零一年》 88 等, 317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萨克雷 130
Thetis 西提斯号 136
Thom, Robert 汤姆 罗伯特 55
Thombey, Major 汤贝少校 216
Thomson 汤姆逊 113
Thompson, Lient 汤普森 226, 227
Thousand-Character Essay 《千字文》 43
Thule 极北号 小舰队船只之一, 312, 392 页注㊻
t'i-tu 提督 133, 358 页注㊻; 正式访问, 135
T'ien I Ko 天一阁 34
Tientsin 天津 372 页注③; 李泰国参与谈判, 178, 364 页注㊸; 卜鲁斯的居住, 237; 赫德在天津, 242, 243, 308; 包令在天津, 251～252
Tientsin 天津号 小舰队船只之一, 312, 317
Tientsin 天津 条约, 195, 364 页注㊸, 294; 预备, 196, 200; 卜鲁斯带回英国, 202; 签订, 203, 237; 否认, 225; 领事居住, 228, 270 页注㊹; 公使驻京, 232～233; 引起的问题, 240
Tilby 蒂尔比 315
T'in Chü d'an 天主堂 129
ting-chai 听差 299
ting tuh fou teaou heen 顶戴都抚 287
ting yeu 丁忧 266
Ting hai 定海 18, 343 页注⑯
T'kint de Roodenbeke A. 金得俄 378 页注㊼
Tobler, F. 托布勒, F 309, 388 页注㊶
Tonnage dues 船钞 268, 296, 384 页注㊿, 297
T'oo-wa 土话 112, 121, 129, 131
Tourane, Cochin China 沱濃港 交趾支那, 220, 369 页注(123)
Townsend 汤森 316
Trade 贸易 在宁波的问题, 54～60; 鸦片贸易, 54～55; 航运, 55; 海

盗，55～59；在广州，177
Transit passes 过境通行 243
Trans lations 翻译 赫德的，记录本，204；广州告示、公文等，205，207，208，209，210，211，215，216，217，219，223，224，227；“钟鼎铭文”，219，220；揭贴，223；惠顿，225，295，302，303，306；总理衙门，301，302，303；海军规章，302；没收案件，306
Travis, Brigadier Major 特拉维斯少校 211
Treaty ports 条约口岸 天津条约后，196；太平军的威胁，246；赫德开埠，248
Treaty revisior 修订条约 170，172，354 页注㉛
Treaty system 条约制度 做为处理对外事务的工具，236～237，326
Trenqualye, M. de 特伦贵里 228，371 页注⑯
Triad Rebels 三合会 59，125，126
Tribune 护民号 184，360 页注④
Trinity College 美以美教会学校 都柏林，6
Tsae 蔡 按察使，广州，188，363 页注㉒，190，206，215，232；关于失踪的印度士兵，192；降级，194；征收罚金，194～195，197；到杭州，208；返回，214
Tsae 蔡 总理衙门的文案，266，269，276
Ts'ai-ch'un 载淳 237
Tsao Seen Seng 赵先生 127
tsching-ming 清明 130
Tseen Kuh 金库 198，365 页注㊹
Tseën Tang 造币局 294
Tseih-le-chow 基里州 295，383 页注⑨
Tseng Kuo-fan 曾国藩 246，254，269，280，292，295；统一指挥，236，244，253；与小舰队，255；新王朝的潜在首领，286，383 页注⑩，229；静波寺
Tso Tsung-t'ang 左宗棠 244，253，307，387 页注⑫
tsouhwa 脏话 315
tsu leo 节略 269，275

tsung-pan 总办 317，320
tsung shui wu ssu 总税务司 317
Tsung-tuh 总督 215
tsung-t'ung 总统 282，287
Tsungli Yamen 总理衙门 建立，238；职能，244，371 页注②；关于小舰队，249；谈判小舰队事宜，252～259，284～285；与李泰国、赫德的会议，263～266，269，273，274～275，282，283，284，289，290，304，307；与赫德的会议，266～269，272～273，276，278～279，280，281～282，285，286，288～289，291，294，295，296，299，300，301，302，305，306，308；海关事务，267～269；赴欧洲公使，300；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318，392 页注⑯⑨；赫德与总理衙门的个人关系，334～335
Tszechulin 紫竹林 309
Tuh-foo 督抚 283
Tung-Chiang i-yung 东江义勇 207
Tung chow 通州 303，386 页注⑫⑦，308；新的条约口岸，196
Tung Hsun 董恂 281，379 页注⑤⑧，282，334；辫子，285；关于小舰队的财务，286；在总理衙门，286，290，294，295，299，300，301，302，307；关于法国条约，296，297；关于美国条约，300；关于惠顿，303，306
Tung Ken 同庚 275
Tung-shan Temple 东山寺 197，365 页注⑤①，214，215，222，227
Tung-tu Men 东土门 35
t'ung-shang 通商 296
T'ung-shang ta-ch'en 通商大臣 290，381 页注⑧①
T'ung-wen-kuan 同文馆 244，320，321
Two Kwang 两广总督 292，382 页注⑧⑦
Tzing-hwang-meaou 城隍庙 117，356 页注⑥⑧
Tz'u-an (Niuhuru) 慈安 237
Tz'u-hsi (Yehonala) 慈禧 237～238
Ulster 厄尔斯特 3，7
Uncle Tom's Cabin (Stowe) 《汤姆叔叔的小屋》 98

United Defense Bureau 会防处 380 页注⑦
United states 美国 对华贸易，59；领事，161；茶叶贸易，162；江海关，164；第二次鸦片战争，172；台湾的条约口岸，196；和议，226；条约，300；玫瑰号事件，310～311
Upton sgt. 厄普顿上士 200，207，218
Van der Hoeven，J. des Amorie 樊德霍文 309，387 页注⑬
Vancouver volunteers 温哥华志愿军 228
Vanity Fair (Thackeray) 《名利场》 42，130
Victoria 维克多利亚 香港，12，341 页注②
Victoria 维克多利亚 女王生日，134～135
Virid 维维德号 108
Vlanguly 倭朗嗄哩 372 页注③
Wade，Thomas Francis 威妥玛 22，344 页注㉒，25，27，60，112，167，215，242，283，290，291，293，319；学习中文，42，43；赫德请他帮助找一位中文教师，109，114；海关，136，161，168，177，239，243；驻上海副领事，166；为额尔金任翻译，174，178，363 页注㉗，364 页注㊸；关于赫德的中文，215，230；在上海的贸易谈判中，370 页注⑬；在北京任汉文正使，246，264，270，273，286，302；关于丹麦条约，269，271，278，288，291，292；关于清王朝，276，286；关于李泰国的要求，284；被总理衙门所利用，305
Wadman 魏德曼 57，98，353 页注㊳，129；在密妥士宴会上，89．97；海盗，91～92，134，139；关于理查德·哈特的案件，109
Wae Kwa dong 外跨塘 315，391 页注⑬
Walsh，Col. 沃尔什上校 189，363 页注㉗，202，205，211
wan-kuo/kung-fa 《万国公法》 386 页注⑫
wän kwan 文官 295
Wan ming mun 文明门 201，207
Wang 王 暗探，217，220；女儿，218；广州办事人员，280
Ward，Frederick Townsend 华尔 247，250，374 页注⑭，280，331
Warden，E. 沃登 316，391 页注⑯
Watters，T. 瓦特斯 270，271，294

Way, Rev. R. Q. 韦理哲 38, 44, 66, 125; 讲道, 77, 122; 洗礼, 87 页; 一起喝茶, 88, 129
Way, Mrs. R. Q. 韦理哲夫人 62
Wedding 婚礼 中国人的, 赫德的描述, 147～149
Wei loh 外佬 185, 361 页注⑩
wei-nan 为难 286
Wen-hsiang 文祥 275～276, 277, 302, 330; 与英国、法国的谈判, 237; 总理衙门, 238, 371 页注②; 赫德的接触, 241, 242, 243, 287, 292, 295, 297, 298, 299, 300, 304; 小舰队, 257; 关于赫德充任总税务司, 258; 与李泰国的谈判, 264～265, 273～274, 275, 280, 282, 283, 289; 过度操劳, 269; 关于李泰国, 269, 270, 307; 在亲王中斡旋者, 272, 276, 279, 292; 赫德解释李泰国问题, 278, 281, 286; 关于认可书, 305; 关于白齐文事件, 307, 308; 品质, 334; 关于清王朝问题, 336
Wesley, John 韦斯理 3, 7; 赞美诗, 115
Wesleyan connexional school 美以美教会学校 6
Wesleyan Magazine 《韦斯理杂志》 75
Wesleyan Preparatory School 美以美教会预备学校 5～6
Westerminster Review 《威斯敏斯特评论》 81
Whampoa 黄埔 184, 203; 外国人的进攻, 193; 阿礼国到黄埔, 229; 海关, 235
Whateley 沃特利, 理查德 311, 389 页注⑭
Wheaton, Henry 惠顿, 亨利 255, 295, 383 页注⑩; 赫德翻译他的著作, 298, 299, 302, 303
Whig 《辉格》 125, 133
White 怀特 去信, 300; 在上海的晚餐, 313
White Cloud Mountain 白云山 广州, 186, 193
Wilford, T. 威尔福德 审讯, 189, 190, 191
Wight, J. K. 怀特, J. K 38
Willioms, Richard 威廉斯, 理查德 41, 70, 93
Willioms, Samuel Wells 威尔士 42, 78, 275